编译参考丛书

仅仅一年



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 著

仅仅一年

〔苏联〕 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著

刘 白 岚 译

内 部 材 料
注 意 保 存

《编译参考》丛书
仅仅一年
斯·阿利卢耶娃著
刘白岚 译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

外文印刷厂印刷
1980年9月·北京
定价：1.40元

内部材料 翻印必究

Светлана Аллилуева

ТОЛЬКО ОДИН ГОД

* * *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AND EVANSTON
1 9 6 9

（根据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1969年俄文版译出）

出版说明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1926年生，194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现代史专业。曾从事历史、俄罗斯语言及儿童文学研究，并有国际史方面的译著数种。阿利卢耶娃1962年正式加入东正教，并受了洗礼。

阿利卢耶娃1967年叛离苏联以后，发表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定居美国后，又发表了《仅仅一年》。这是斯维特拉娜表示坚决叛逃、与苏联义断情绝的宣言书。由于作者的身份，多年来本书一直为西方所利用，作为不仅反对苏联，而且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口实，影响很坏。也正因此，这本书是我们研究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和苏联社会现实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这本书在苏联列为禁书，但在世界各地已有各种文字的译本。本书原用俄文写成，1969年由美国哈珀和罗公司出版。这个译本是第一个中文译本，直接从俄文译出，并参照英文版做过校核。本译本个别地方略有删节。

书中用数字标明的脚注是原作者的，以＊号标明的脚注和正文中方括弧里的注文都是中文译者所加。



斯·阿利卢耶娃

目　录

一 决 定

在苏联的最后一天

我从来没有料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会是我在莫斯科和俄国的最后一天。再说我的儿子奥夏*、他的妻子莲诺奇卡、我的女儿卡佳**以及这一天跑来给我送行的朋友们当然谁也没有料到。

这一天特别冷，摄氏零下十五度，到断黑时分温度降到摄氏零下廿度。飘起了雪花，暴风雪开始了。飞机应该在半夜一点从谢列梅捷沃机场起飞，可是，不管我给机场调度挂了多少次电话，谁也说不准在这样的天气飞机能不能起飞。看来莫斯科是打定主意不放我走了。朋友和熟人们一个劲儿打电话来问："是真的吗，是你今天要走吗？"我只好上百次地重复一些同样的话。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居然会获准将我已故丈夫的骨灰送往印度，因此好些人怎么也不能相信：我今天夜间就要飞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如果不算一九四七年夏天那次的话。那年我应邀在哥哥那里作了十天客，当时他和空军军团驻扎在东德。连我自己对这次的事也觉得有些怪，虽然批准出国命令一个月以前我就收到了，这段时间我本来可以安心把行李收拾停当的，但是我从女友那里借来的那只大箱子里的东西还没有检好。我拿不准在德里会碰到什么样的天气，在那儿要穿什么

---

* 奥夏即《二十封信》中的约瑟夫。

** 卡佳即《二十封信》中的凯蒂、凯提亚。

衣服。第二个箱子要小一些，已经检好了：里面放了许多送给印度亲戚的礼物（别人告诉我没有礼物不行），还放了一些印度语言学家巴哈里博士托我带给他在阿拉哈巴德家里的礼物。

最使我不放心的是那只手提包，里面有一只稍小一些的白色袋子，袋子里放着一只小小的白瓷骨灰盒……我一直苦恼着，不知道怎么带它走才好。人家给我出了各种各样的点子，但我只感到一点，就是我应该把它带在身边。这几乎是一样有生命力的东西，我感到它非常沉。这是我本身的一个神秘的部分。

我小学时代的女朋友阿莉雅一早就来了。我和她一块儿读完十年级，一块儿进的大学并且一块儿修完同一个专业：美国近代史。甚至我们俩人之选上这个专业也部分是阿莉雅作主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的妈妈。阿莉雅的妈妈多年来一直是《真理报》国际部美国科的主任专员，英文很好，有个姐姐早就定居在底特律。

阿莉雅非常沉静，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她是班上也是大学里数得上的优秀生。她不会生气，发急，提高嗓门嚷嚷。不过她自有她坚定的原则，那就是善良，诚实，勤劳。她的三个女儿也是这样，阿莉雅和女儿们的关系就象是平起平坐的女朋友。

和阿莉雅在一起特别使人感到无拘束，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她最善于听人家说，而且总是想理解对方。她唯一不能理解我的一次是当我告诉她我受了洗礼之后。她懂得宗教感情，她自己内心也有这种感情，但是她惧怕教堂这种社会势力。

她全家都认得勃拉哲士·辛格。她的女儿丹娘和女婿——一个数学系的大学生——曾在出版社分配给辛格的住宅里住过几个月，因为辛格本人住在我家。阿莉雅认得很多在莫斯科的印度人，她本人在东方文学出版社当编辑。

这会儿她来了，文文静静，逗人喜爱，象往常一样。我们在厨房里喝咖啡，这间厨房是我们住宅里的一间主房，我都在这里接待我的好朋友们。这一天还来了我从前的两位同班同学——米沙和薇拉。

我和米沙从八岁起就同学。他和我一样：红头发，满脸雀斑。班里数他书看得多。那会儿我常和他一起讨论儒勒·凡尔纳、费尼摩·库珀和现代科学幻想小说。十一岁起我们开始读莫泊桑的作品，读得入了迷。我们两人的父母亲都有丰富的藏书。就在那段时间我俩在课堂上用吸墨纸互相写条子："我爱你！"如果偶尔碰到难得的机会，我们还亲亲嘴。但米沙的父母亲没过多久就被捕了（他们两个人都在一个国家出版社工作），后来他的一个当医生的姑姑也被捕了。我的家庭教师坚持要校方把米沙调到另一班去，还向校长提供了物证——我们写在吸墨纸上的条子。友谊中断了，此后我们只是在战争时期匆匆会见过。但是，过了很久，在党的二十大开过以后，米沙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并给我打电话来了：他对我的处境表示不安。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的声音（在学校时我俩几乎天天通电话），打这天起我们复为朋友如初。他成了建筑工程师，尽管他自小爱的是文学和人文科学，而且还和从前一样读书不倦。他为人善良，而又古道热肠，他了解每个同班同学的行踪：谁在哪儿工作，谁结婚了，谁有了孩子，等等。他居然和任何一位老朋友都保持联系，仍能和我们学校许多人保持友谊。他通常每隔半年来看我一次，讨论我们作为父母面临的问题。他把自己的小儿子——一天到晚象夜莺一样地唱个不停——送进了音乐学校培养，梦想有朝一日他会成为卡鲁索*。他那个漂亮

* 负有世界声誉的已故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而又有点神经质的大女儿给他添了不少麻烦。这一年她中学毕了业，忽然对东方和印度史产生了兴趣。这天我送给她几本我最心爱的关于印度的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写的《自传》和《印度的发现》。

薇拉和我也是从小就认识，因为她的妈妈是我妈妈的朋友。她们俩又和有才华的教育学家雷金娜·格拉斯是至交。这位教育学家的教育思想传进了我的家门，实际上我的孩提时代过得那么有意思也是得益于她。雷金娜·格拉斯在瑞士受过教育，在俄国和沙茨基①一起工作。我的母亲非常迷信教育学，因此受到雷金娜·格拉斯的深刻影响，可是在我家谁也和雷金娜谈不到一块，我父亲受不了她和她的那些“教育学把戏”，很快就执意不让格拉斯登门。

可是薇拉一家却喜欢雷金娜。还是妈妈在世的时候，薇拉就被引到我们在祖巴洛沃的家里来。那时，每逢夏天她总住在祖巴洛沃邻近的一个村子里。我的保姆有时也带我上她那儿，再不就是我和她在附近的散发着清香的松树林子里会面。

后来薇拉和我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学习，不过在这里各人找到各人的朋友，各有各的兴趣。薇拉是一个天生的自然科学家，中学毕业后就进了大学生物系，而我却爱好文学和人文科学。

薇拉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不过她这个人从小就培养了献身精神、顽强的意志和全心全意致力于事业的决心。她迷上了遗传学。可是在一九四九年，正当她读完大学可以进行独立的

---

① 沙茨基为著名俄国教育学家，曾追随托尔斯泰的“自由学派”为贫苦农民子弟办过学校，传授艺术。他曾与泰戈尔通信，从后者的教育经验中获得很多借鉴。

研究工作的时候，这门科学在苏联被宣布为“唯心主义的”并遭到禁止。薇拉也象许多遗传学家一样，不愿放弃自己的志向，因此不得不藉助“伪装”继续搞她的试验。而今“染色体理论”已经“恢复名誉”，这么看来，她这些年总算没有白过。薇拉现在是苏联国内最拔尖的遗传学者之一。当我离开的时候，她正写她的博士论文（现在她可能已经成为生物学博士了）。

薇拉一辈子没有成家，虽说她比任何人都富有爱心和对他人的关切之情。每隔一天她就给住在她家不远的九十高龄的雷金娜送一次饭。我们本想把那半瞎而且孤身的雷金娜安置在养老院里，可是难以做到：因为雷金娜不情愿，她要独立生活。此外她离不了音乐学院的演奏会，就是最难搞、最稀罕的入场券她也总有办法搞到手。在大学时代，我和薇拉如果没有别的会面的口实，就在音乐学院碰头。这些年来我们忽然又觉得遥远的童年时代变得有意义起来，于是我们又互相思念了。我的孩子们打从她来看他们那天起，就喜欢上她了。

她有一种和人交往的特殊本领，但并非和所有的人：在那些以貌取人的人眼中，薇拉的确平平，而对她来说，那些人也自无可取之处。她既谈不上漂亮，也说不上衣冠楚楚。从外表看来她很少“西方味儿”，可是，在她曾用法语宣读论文的巴黎，却迷住了所有的听众。从容貌看，她是属于上世纪俄国民主知识分子的古典类型——一张农妇的脸，却被发自内心的理智之光所照亮。长长的亚麻色头发梳成一条辫子盘在头上，她的脸庞嫌大了一些，不算端正，身段矮胖，骨架粗重，顶得起地里的活。可是她有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大而忧郁，灰得象俄罗斯的阴霾天空，而且也象这个天空一样令人难以忘怀。

当薇拉谈及什么时总仿佛谈的是一些了不起的大事，那怕

她给我女儿讲的是她的小猫咪或是金丝雀，也是如此。

和薇拉分手时总是令人依依不舍。她的作为一个献身科学者的独身生活总不免带上若干纯洁和高尚的悲剧色彩。决不能把她说成是不幸的，或者当成孑然一身的畸零人，但是每当见到她总感到一阵隐痛，仿佛是在心痛一颗落在鹅卵石堆里的钻石，多少人从它旁边匆匆走过，可就没有人发现它。

许多人打电话来，都是一些我在世界文学研究所共事的同志。丽萨只问了一句："是真的吗？"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莲娜打破砂锅纹(问)到底：难道他们真的放你一人走？你能在印度四处逛吗？你带些什么出国？这些盘问十分令人不快，他们忘了我这次出国的不幸缘由，忘了我这次的使命并非去寻欢作乐，这是与旅游一词根本挨不上边的出国旅行。

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和玛丽娜也打了电话来。这二位心里都很明白，因此就没提那些不识相的问题。她们哪能不明白呢？虽然我们彼此相识不过数年，但是我的这些饱经风霜的老友和我相处得那样亲密无间，就象这一辈子我们都一直在一块过似的。再说玛丽娜和她的丈夫纳罩，总是要保护一些别的什么人，他们也就用自已的爱保护了我。受玛丽娜一家庇护的还有伊哥尔（是她介绍我们相识的），这一天他也跑来送别，并且看一看我是否确实要走。

伊哥尔很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艺术，还写过书，可是就是不让他上这些地方去，尽管他工作的艺术史研究所为此也曾提出过请求。

受到这种遭禁待遇的还有我亲爱的伯莎。这一天她来得晚一些。她是莫斯科最懂得非洲音乐和艺术的行家。看来，我们都是一些"信不过的人"。伯莎是辛格最喜欢的人，一方面是因为她在我所有的朋友中英语说得最流利，同时也因为她性格

豁达乐观。她老是给我带来一些莫斯科的新闻和小广播，在我们家里她的哈哈大笑真是声震屋宇。

伯莎是美国黑人和犹太女人的女儿。她的双亲是卅年代到苏联后在这里安家落户的。她出生并且成长在父母亲定居的塔什干。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可真是出了格，当伯莎成年，领取了苏联护照之后，民警局要她在“民族”这一栏里填上“乌兹别克”或“俄罗斯”。

“你们打量打量我吧！”伯莎嚷道。她和她的爸爸象两滴水一样相似。“你们瞅瞅我，我哪点儿象乌兹别克人？哪点儿象俄罗斯人？我是黑人，我也愿意当黑人！”

警察当局作了让步，因为她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唯一的“苏维埃黑人”和这个共和国的网球冠军。但是有关这个民族栏的填法在各个人事部门总不免受到盘诘。

这个愉快的、高大丰满的女人从不怕力排众议，而且敢于和上司顶撞。她衣着鲜艳俏丽，再加上浓妆艳抹，四周总是围了一圈热闹的交谈者，使得她工作所在的研究所里那些黯然失色的女党员们暗中咬牙切齿。她们受不了伯莎的笑声、她的黝黑皮肤和染红的指甲，但又缺不了她。她会说英语，懂得非洲艺术，可是到非洲去的却是那些开不得口的门外汉，因为她们有党票和工农祖宗。伯莎和伊哥尔一样，只好转而羡慕我的卅天，这期间我即便见不到全世界，至少隔着小窗子也能看一眼外面的世界呀。

伯莎留在我家，以便当夜送我上机场，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天气还在坏下去，刮起了暴风雪，搞不清飞机能否按时起飞。

然后阿联大使穆拉德·加利卜和他迷人的妻子也来了。他们在莫斯科已经十二年，他家小女儿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因此

在家里也多少说一点俄语。这是我在莫斯科外交圈中除印度大使以外的唯一熟人。这主要是两位大使相互很友好又同时都对死去的辛格不错。穆拉德和淑淑都亲眼见到辛格病重，知道我们和他所经受的一切。穆拉德感到不安并且几次同我说："在那儿别耽搁久了，快点回来！回家时要不要到开罗去一下？淑淑可以到那儿去，陪你在我们家呆一个星期，那样的话，您可以在料理这些事后休息一下……"。我说，"不了，下次再去吧，穆拉德，我这次去不是为休息的。"

他决没有理由为我归来担心，不过穆拉德特别会体会"上头"对我这次出国的想法，因此对他自己的名誉和对苏联的影响更担心些。他和淑淑揣摩到一个少数人明白的道理：由于辛格之死引起我的极度绝望、悲痛和内心的愤懑，这种状况会使人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他们想说服我由于天气的关系，在没搞清楚起飞的准确时间以前不要到机场去。但是我坚决要在晚上十点从家里出发，以便早点到机场，如果需要的话，我哪怕在那里一直等到早晨也行。我的心开始被一种迷信的恐惧揪住了：我仿佛觉得就连自然现象也好象是商量好了似的，反对我这次出行。准会发生什么事，飞机也就该不能起飞了。不，不，我只能在那儿等！

终于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卡西洛娃光临了。她是葛罗米柯坚持指定要给我作"随行人员"的。不管我怎么解释说，在亲属小圈子中我不需要翻译；也不管可怜的卡西洛娃哭了多少次鼻子，认为她的使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两个人还得服从政府的决定。对于我这次去印度，国家想搞得气派一些，至少可以此来弥补对于我们婚姻曾作出粗暴禁令的过失，也用来消除辛格之死这一事实所造成的不快。

这个"护送"从一开头起就使我万分扫兴。悲剧性的结局

还要为两国的政治利益派用场。而我还在奇怪怎么这么迅速就批准了我的出国申请呢！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德里外交部的秘书之一、前任大使考尔一连给我来了几封信？为什么我丈夫的侄子、国务部长迪内希·辛格要求我出国展期到议会闭会、他可以陪我一起下乡之时呢？怎么人都死了，打哪来的这股子关心和兴趣呢？印度驻莫斯科新大使凯瓦尔·辛格走进我家门的时候，也是关怀备至，装出一副颦眉蹙额的样子。

一层层的国家利益包住了我完全由于个人因素而导致的出行。其实，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我整个的一生不就是在"国家利益"压力之下度过的么？不管我是多么想方设法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国家财产"，我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可是这会儿我最少想到的是这些令人不快的"层层"，我只被一种连我自己也开始觉得是奇迹的想法所占据，那就是今天夜里我终于要走了，过上八个小时我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对于我来讲，其意义不啻是到另外一个星球去。

我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有充分把握认为我可以和亡夫的兄弟和亲戚找到共同语言，虽然我一共只给他们写过一封信。我希望我整个身心能在我听得很多的那个村庄得到充分休息，在阳台上坐坐，从那里眺望恒河上的落日余晖。我知道那里是一片宁静和安谧；我知道那个村子里，小男孩个个都熟悉并且热爱辛格；我知道，经过最近三年的日日夜夜的焦虑以后，我会休息过来的。我想都没有想过，过一个月我会不回家来了……更准确一点说，我根本没有想过再过一个月会怎么样……我疲惫不堪，心如止水。我只要到达恒河平静的水边，看看这永恒的静静的水流，在那里每一个印度人找到了他的最后归宿。我深信，在那里我终于会让我郁积的眼泪溶化并且尽情抛洒。

我觉得此行是正义的一种胜利。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这

次胜利是三年来为争取个人的起码的权利和争取人的尊严而进行的毫无成效的斗争之后取得的。

已经到了该出发上谢列梅捷沃机场的时候了。刮着暴风雪，道路可能不好走。还弄不清飞机能不能准时起飞。伯莎和我的儿子决定陪我一道上机场，虽然他们要搞到深更半夜才能回来。愁眉苦脸的卡西洛娃和我们一道走。

好不容易我的东西捡好了，但匆忙中我甚至忘了带孩子们和我母亲的照片。我急急忙忙又慌手慌脚，搞不清在干什么。

印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来了，为的是送我们上机场。官方人士的在场使我都没有机会好好和孩子们告别。我走到自己房里，在那里伫立了片刻……

勃拉哲士·辛格在这里只生活了一年半。当时很困难也很压抑，但生活在一起是多么好、多么安谧呵！一个半月以前他死在我怀里。然后那个小小的骨灰盒就摆在这个房间里。他人还在。他继续参与我的生活。这是床头小柜上他的眼镜，这是他的钢笔和纸摆在书桌上，这是他的书还放在书柜里。在他火化以后的一个半月以来，每次我走到这里来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屋里。这也许是一种令人心里发毛的感觉，但同时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房子已不是空的和没人住的了。有一个善良的灵魂待在这里，用柔和的眼光抚爱着四周的墙壁和窗户，用衰弱无力的瘦小的手摩挲着书桌和书籍，这只手，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以前几分钟还曾爱抚地拍了拍我的面颊。

可是善良的心永远不会停止跳动。瘦小的无力的手象以前一样地抚摸着我的面颊，使我振作起来，温存的微笑从远远、远远的地方追随着我……

• • •

在汽车里大家都沉默着，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我很过意

不去的是我只匆匆地吻了一下站在自己房门口的卡佳。而她对于面前发生的使大家都很扫兴的生硬场面感到难为情，虽然这事也怨不了谁。当大家已穿好了大衣，我的儿媳莲诺奇卡为了帮我拿东西，抄起了那只手提包。可我吓了一大跳，因为里面有骨灰盒（莲诺奇卡不知道），我尖叫了一声："放下，别动。"奥夏跳了过来，眼睛怒气冲冲，来卫护自己心爱的妻子，而她则面有愠色。而且，的确我们相互之间帮点忙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一天大家都烦躁易怒，神经过敏。这股紧张劲儿直到在汽车上还未消除，我儿子满脸重霜地坐在一角，只有伯莎还象往常一样，谈笑风生。

可是飞机场有它自己的规章。我原想起飞以前（飞机因气候关系已经推迟了个把钟头）我还可以和伯莎以及儿子安安静静地在候机室坐上一会儿。可是，作为"出国公民"，我已经被认为对其它公民是危险的，因此，我就必须与其它人用玻璃隔墙分开。我们只得在一大堆箱子行李中间，在前推后拥的旅客行列中，匆匆话别。

我吻了吻奥夏（他的那双眼睛还因为我对莲诺奇卡的态度仍然带着怒气），吻了伯莎，我们毫无意义地相互叮嘱着："写信来"、"我会写的"。之后就剩下我和卡西洛娃，她现在是我的影子，我走到哪儿，她就会跟到那儿，任何隔墙也分不开我们二人了。我们托运了行李，把苏联钱兑换了外币，交验了苏联护照，这时我才再一次看到玻璃隔墙以外的伯莎，她这会儿已不笑了，还有奥夏，他神情有点悲伤，已经不生气了。我只能向他们招招手，他们也向我招招手……

就是这样。

勃拉哲士·辛格在莫斯科

只有八个小时的航程就把冰雪严寒的暴风雪中的莫斯科和温暖的德里隔开了。这里的十二月相当于我们的五月：阳光普照，鲜花似锦。

这八个小时的飞行对于我来说是不祥的。这八小时以及它越过的里程把我从看来我注定要与之联在一起、生死与共的一切，看来是隶属于它的一切分割开来。可话又说回来，我们谁都想象自己是隶属于某种东西或某个人的……

夜里在飞机上我睡不着觉。我们是向着东方飞的。这里的晨光要早三小时来到，天亮得非常快，雪青色的天空中星星熄灭了。我们朝太阳升起的地方飞去，天空越来越明亮地被金光浸透。我凝视苍穹，俯视飞机下面被朝晖染上玫瑰色的兴都库什山脉和山口，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山，很快就会把我和昔日生活之间用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分隔开来。

卡西洛娃睡着了。在睡梦中她的脸看来有点倒楣相，眼皮也哭红了。她旁边放着一口箱子，里面是她送给大使馆同事的礼物：裸麦面包和莫斯科熏肠。

我们飞得很快，早晨正朝我们迎面而来。前面什么地方太阳已升起，可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发红的天空，在这么个高度上亮得刺眼。舷窗在左边，我和舷窗之间是那只珍贵的手提包，我用手扶着它。

勃拉哲士·辛格，你瞧，咱们这不是正向印度飞去吗。你多么想有这一天啊，你答应我会有这么一天——你是从不食言的。我并不孤独，对我离开我过了一辈子的城市这一点我并不

感到害怕。我的护照、机票、证件都放在你的皮夹里，就是你到莫斯科来时带来的那只，我现在带在身边留作纪念。哦，终于看到太阳了！空中充满了太阳，山脉的投影愈来愈见分明。我们这会儿是一块儿上你家哩。我们终于得到上面的批准了。

• • •

我们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在莫斯科邂逅相识的。完全是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他同一天来到同一个医院。他是去切除鼻息肉，我呢——开扁桃体。病房一侧的走廊上，我们就餐的小桌子并排放着，我们一连几天默不作声地散着步，我们两个人穿的都是医院里的睡衣和长褂，就象犯人一样。人家告诉我，这位个子不高、头发花白、有点弓背、带着眼镜、鼻子里还塞着棉球的人是印度来的共产党员，我于是悄悄地打量了他一下。他和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姑娘讲英语，和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人讲法语，和管膳食的护士用手势解释着什么，彬彬有礼而且亲切可爱地微笑着。他朝我这边瞟了一、两眼，并无多大兴趣；我脖子上缠着围巾，一身病员服装，一副苦相，也不可能让人有其他反应。我的喉咙痛得厉害，没法说话。

在赫鲁晓夫自由化的日子里，位于孔策沃的郊区政府医院里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当然，只能是共产党员或是有特殊杰出成就的“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战士”。他们甚至被安排住在和苏联公民一起的病房里，可以不通过翻译和中间人相互交往，这一点在别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我们走廊里可以遇到来自意大利、印度、加拿大、印尼的各种人，而那位马来型脸孔、口操法语的年轻小伙子却原来是从留尼汪岛来的。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印度人。

这一点并不偶然。苏联国内对印度的兴趣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引起的。这位人才出众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不久以前访问

过苏联，这成了当时一件重大事件。俄国对印度哲学和文化一直抱有兴趣。但是尼赫鲁使它“重新点燃”起来，这不仅是由于他写了《印度的发现》这本书，而比这重要得多的是他这个人，在他的身上东方和西方结合在一起了。使我感兴趣的是尼赫鲁笔下的印度，这位持现实主义态度的政治家、对艺术也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美学家、具有丰富的人道主义真知灼见的历史学家——但不是哲学家——笔下的印度。那时我最不感兴趣的是印度文化中神秘主义的宗教成分。我对罗摩克里希纳和魏韦克南德了解甚少，仅仅从罗曼·罗兰的书中知道一些。早期佛家的道德教义、释迦牟尼其人、圣雄甘地的伟大献身精神是如此和谐地把古代哲学和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使我感到更加有意义，更加兴味盎然。在医院时我还从家里带来一本南布迪里巴德写的关于甘地的书，我多么想知道眼前这位印度人对此书有什么看法。我很想走上前去和他攀谈，问问他的意见，但是又打不定主意。我说英文还不大习惯，再说，一般讲来，我首先主动走近生人，何况又是一个外国人，似乎有些不自然。

我终于鼓足勇气，想好了英文句子，趁有一天在走廊里看见辛格朝我走来时，就下决心要和他交谈了。可是他只有礼貌地向旁横跨了一步，给我让了路。我挺不好意思，默不作声地走了过去。事后一、两天我都没敢再试。我在图书馆里找了找那里有没有关于印度的书，书倒并不多，只有尼赫鲁和泰戈尔的。这里有没有我在学校里读过的诗歌《吉檀迦梨》呢？没有，找不到。这是什么，什么诗句？

“今天，我的胸怀不知为何敞开，
和平闯进了我的心扉，将我拥抱、依偎。”

——《晨曲》

我把这几行诗抄在纸上，一边念着，一边走上我住的那层

楼。当我走到辛格房门口时，他正好从房间走出来。一下子我忽然不怕了。

我对他说："您象是从印度来的吧？"

"是的，是的！"他亲切地微笑着。

"那可以问问您……"我胆子大一些了。

于是我们就在小走廊的沙发上坐了下来，谈甘地，谈尼赫鲁，谈印度的种姓制度，约莫有个把小时。辛格随即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是哪个单位的，因为他已经习惯只和代表集体的人交谈。他一听说我就是"我自己"，就眉开眼笑了。我们的谈话因开午饭而中断，但此后只要在走廊里碰到，我们两人都可自由而轻松地交谈。

很快我就清楚了，尽管辛格已有廿八年的党龄（他是在伦敦入的党），但他对自己同事南布迪里巴德关于甘地的看法并不赞同。当我问及这本书的时候，他笑起来，把手一摆，说："南布迪里巴德是我们的左派。"说时带着一股无可奈何的轻蔑表情。

至于辛格本人，他认为共产主义仅仅是人类大同的理想，以人道主义和正义的原则为基础。他不希望通过流血而达到这一理想，他也不能这样作。他相信改革和和平民主斗争的途径。在成为共产党员的年轻印度人的伦敦小组内，谁也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是在读过几本通俗的小册子以后，年轻的热心抗议派就"决定成为共产党员"。

辛格是一个富有的印度王公* 的儿子，他长期在德国、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居住过。他曾竭尽全力帮助过各处的欧洲共产党员。多年来他曾一直是M·N·罗伊的密友和追随者。

---

* 现代及中世纪印度的公爵。

在廿年代末、卅年代初，共产主义曾是全世界的时髦风尚，因此吸引了不少人。那时在印度只有高级种姓家族出身的年轻人才能接受欧洲教育并接触欧洲社会学说，伦敦小组就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而是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成为这个受到良好教育的自由化知识界生活的主要内容。印度独立以后，他们停留在和平的议会主义的立场上，和党内的左翼的分歧愈来愈大。从辛格的最初几句话就可以听得出，不管是多么伟大的事业，他决不会为此杀生，不仅不杀人，甚至不打杀苍蝇。

我最满意的是，我的谈话对手并不知道他在和谁谈话。我们结识的第二天他就向我提出有关苏联的各种问题，并且问我："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内部生活变化大不大？"我回答他，当然很大，不过我认为这种变化并不十分深刻，也不是根本性的。后来我认为有必要向他作自我介绍。

辛格从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瞅着我，然后又从眼镜片上面瞧了我一眼，只说了一句："哦！"这个奇异的英文"Oh"，它包含了多少语气在里面啊！此后他再没有说什么。打这以后他再也没有问过——连一次也没有，即便日后我们一起生活时——有关我父亲的任何问题。他既不属于斯大林的崇拜者那批人，也不属于那些把苏联当成世上公理的化身的那批人。他很了解欧洲，欧洲的共产党员是他的朋友。社会主义的波兰，特别是南斯拉夫，对他来说要比俄国亲近得多。总的说来，他是既老且病，对于地球上无谓的流血杀戮，对于有损无益的党内争吵以及沽名钓誉的无聊斗争，他已感觉厌倦不堪。所以他就只迸出了一个"哦"字，然后就说了几句哲理性的话，诸如："时代不同了，世上新人送旧人，政策也不一样了……"其实这一切对他是无关宏旨的。他感到有意思的是：他在莫斯科和

一个人不期然的邂逅，这个人什么单位也不代表，跟他说英语，讲人话。我之于辛格——是一个人。另外，他是出身于一个和甘地、尼赫鲁以及其它印度名门熟识的家族。他阅历颇广，熟谙世事。他的那个“哦”并不包含多少惊奇成分在内。这样，我认为他作为一个谈话对手是再好也没有了。

在医院住院剩下的日子里我们每分钟的自由时间都在一起度过，相互介绍各自的生活。我怎么也说不清楚我怎么会对这个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陌生人抱有这种绝对信任的感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深信不疑。

我脑子里贮存的大批死的英语单字一下子都活了。要知道我过去从未和别的人用英语会话过，可是现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用英语说话,并且也能听懂他说的每个字。辛格的英语很好，很纯正，发音准确，这是他从苏格兰籍的家庭教师和勒克瑙学院的英籍教师那里学来的。他的行为举止全部欧化。只有他的那种温文尔雅的态度和常年挂在脸上的亲切微笑才使人感到传统的印度教的非暴力和清静无为。从他的外表上看不到鲜明的东方情调。当他带上贝雷帽、裹上长围巾外出散步时，他就变得象一位意大利长者或者是温良恭谦、面有忧色的犹太人。

我和他穿着病人衣服，坐在走廊里或是沿着走廊散步，我们一个劲儿说着话，有的病人就对我们侧目而视了。不要忘记，这个医院只收党政机关的高级官员们、最著名的演员、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一言以蔽之，只收莫斯科的“上层人物”。在这些人的眼里（个别人可能例外）我的行为举止是带有挑衅性的，因为我只同一个外国人泡在一块，只看得起他，而全然不把苏联社会上层精华放在眼里。可是我已习惯于违背这个上层社会的天条戒律，他们也就习惯地把我当成这个阶层的害群之马。

住满了克里姆林宫医院各病房的思想保守的党员们，早就对赫鲁晓夫要求加强与国外接触的这一点忿忿然了。这批人对一九五三年以后国内发生的一切心怀不满，他们从“肥缺”上被赶了下来，养得脑满肠肥，由于伏特加酒、满腹怨气和被迫赋闲而患脑溢血，中了风，此刻这批人都围坐在医院的电视机旁“接龙”（他们是这样称呼“多米诺”骨牌戏的），玩得昏天黑地。

当这些穿着睡衣的臃肿笨重的躯体在走廊里散步靠近我们时，我就很替这位风都能刮倒的、近视眼的辛格捏一把汗。他大声说着英文，无拘无束地笑着，一点也不知道苏联规矩是要压低嗓子说话。可这些人却憋着一肚子气，看到这所专门为他们盖的、过去也只属于他们的医院里竟然发生了这种“丢人现眼”的事而感到忿忿然。

辛格的病是治不好的。他患支气管扩张（慢性支气管炎）已有廿年了，是在英国得的病。肺气肿又使他的双肺情况十分糟糕。抗生素只能管一时，可是寒冷的气候和感冒很快使他到了不支的地步。

象许多印度人一样，他能忍耐，不诉苦，置生死于度外，常常很诙谐地谈到自己的病，有意一笑置之。他其实已不为党工作，只希望靠自己在波兰、德国和南斯拉夫搞翻译工作挣来的钱度过余年。他到处有朋友。他是初次到苏联来而且完全是偶然的机会：每个共产党都从莫斯科得到一定数量的、到苏联治病、疗养的邀请。他是在得到邀请后，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来休息一下，治一治病，也看一看“共产主义的麦加”——莫斯科的。

他在这个医院已经住了一个半月，不久将被送到索契去休养，最后，在回印度途中，请他看看第比利斯和塔什干，这是

对外国人的通常的接待计划。这会儿他能了解到的关于苏联的一切，并未使他大喜过望，不过有一点他心里是有数的，那就是这次他的苏联之行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得以相遇的一连串的幸福的巧事，继续为我俩撮合。医生们建议动手术后去南方休养——向他提，也向我提出了。这是同一批医生，同一个医院，同一个医疗系统，在那里每一个病人都根据他的社会地位而各得其所。按照这个规矩，我和他须要都去索契，都在同一个休养所，整个十一月份都待在那里。

在莫斯科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的索契却格外温暖和晴朗。到处是开放的玫瑰花。这所在五十年代初兴建的休养所，是按照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冒牌古典风格修建的，大柱廊、壁画和雕象充斥其间，比比皆是，竟把这所房屋弄成建筑领域中俗不可耐、硬摆阔气的宝贝货。只有党员才有资格在这里休养。那些区委、边区委和州委的工作人员，他们从苏联各地来到这温暖宜人的黑海之滨。但是莫斯科人却来得很少，因为十一月是个重要的月份——游行，节日，这时，政府成员全体在莫斯科，在红场上——不是休养的时候。党的整个领导在十一月份都在莫斯科，在“自己的岗位上”，只有省一级的人才来度假。在索契，西伯利亚人喜悦地享受着阳光和海洋，而乌兹别克、塔吉克和阿塞拜疆人却觉得冻得要命：有一个人连在食堂吃饭时也带着毛皮高帽，还有一个穿着厚制服和毡斗篷还嫌“冻得慌”。伟大的俄罗斯哟，你不能使人人满意啊！

这里还有“海外”共产党人：两个来自希腊，几个非洲人和两个印度人：一个是勃拉哲士·辛格，另一个是孟加拉人索姆纳特·拉赫里。为了这些外国人，休养所的编制中还安排了

一名女翻译：不过印度人谢绝了她的帮助，他们情愿和我一起逛市区。我们三个人坐在海边上，或是沿着索契码头的大街蹓跶，整天待在一起。无论对于他们俩还是对于我自己而言，这是绝对的违纪行为。党内公众已注意到这一点。

尽管眼下是自由化的时期，但大多数习惯性的教条仍在支配生活——特别是象这里的那种党的圈子内。这种教理之一是：在苏联的每个外国人都是一名潜在的间谍，因此必须死死盯住他，绝不可予以信任。根据这一点，在餐厅的一角特为“外国客人”设了一张专用桌子，桌上摆满了各种瓶子和鱼子酱。对这一点，一般休养者啧有烦言。当然他们可以走过去和那些外国人凑到一起；那外国人不用说，只有高兴的份儿。可是，他们从小学时就受到的教育使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印度人可不知道这些教理，因此一下子就请我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喝茶。这是严重的违章行为，为此我们付出了代价。从第二天起“外宾席”就被挪到一个单间里，这个房间开完饭就上锁。主治医生通过女翻译告诉印度人说，现在他们可以爱怎么请我就怎么请。他们简直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向我讨教。我就把一切心里的想法都告诉了辛格……他只微笑了一下，挥了挥手。

在那个十一月的日子里，我们从广播中知道了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消息。印度人简直被这个新闻惊呆了。疗养院里的人对此消息不知如何反应才好，一直到中央报纸登出了苏联政府的唁电以后。

外国共产党人都有机会“参观”一下这个国家。印度人给带到索契城的总建筑师那里，去听未来廿年内这个疗养胜地远景发展规划。报告由那位女翻译口译，一切均按预定计划安排。这两位印度人微笑了一下，致了谢意，说廿年之后他们早

已作古了。然后又把他们带到一个种植茶叶的国营农场里，原以为他们会满有兴趣的：苏联所有的人都喝从印度进口的茶叶。不过这两位印度人在归途中互相承认，他们从未见过茶叶是怎样生长的。他们居住的省份里根本不种茶。

在国营农场里把他们引到地里，向他们谈了收成的情况，然后又到了幼儿园，孩子们给他俩系上了红领巾，随后，他们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听了有关在本区发展种茶叶的报告。女翻译给他们充当口译。他们耐着性子等着，想等到最后能准许他们有一次和农民交谈的机会——他们是多么想知道苏联的农村生活啊！可是日程安排中没有这项活动，于是他们又给载回索契。一路上索姆纳特·拉赫里尽睡大觉，辛格的手里握着几枝开花的茶树枝，是带回来送给我的。

当他们把这些讲给我听的时候，我简直又羞又忿，我气的是无力变更或改动这些官僚主义的俗套。他们同意我的看法，但一边却又毫无恶意地笑着。他们不会发狠，因为他们脑子里压根没有发狠这根弦。他们的安详和泰然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到了，不过什么事也不会使他们光火。他们取笑我们那种刻板僵硬的形式主义。他们要胜过这些多多。

我也带他们参观了索契，可是用了另外一种方法。白天我们上沿海开设的餐馆，因为那里什么人也没有，我们久久地坐在餐馆的阳台上，眼睛看着大海。辛格想看看东正教的礼拜，我就把他带到教堂里。他很惊奇地发现：东正教教堂的礼拜使他想起印度教庙宇，这一点是他在西方从来没有感觉到的。

我们有时上市场，打听打听葡萄、木瓜、梨和鲜鱼的价格。我们在沿海大街上散步，索姆纳特·拉赫里，这位孟加拉议会议员，他的秉性却和辛格不同，他老向我打听我父亲的事

和政治，使我颇不好受。

他们两个人都极想和苏联人进行无拘束的谈话，但是他们感觉到了人们对此十分不习惯，至于那些党员简直害怕到了极点。这使他们大为扫兴。他们曾经到过捷克和波兰，那里的气氛全然两样。我向他们解释说，他们正置身于最糟糕的环境中：苏联的党员，一般说来，是最因循守旧、最保守的人；如果是在知识分子圈中，他们就会感到完全另外一个样子了。我这样一解释他们就更扫兴了：因为在印度，人们把苏共党员完全理想化了。

我们休养所里许多人想把我从外国人身边“引开”。有几个人甚至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这样有失体统，应该多和自己的人待在一起。”有一对年老的夫妻殷勤地向我建议：“来吧，和我们罗斯托夫来的人凑在一起吧，我们的人这儿挺多，晚上咱们一块儿去散步吧。”我不便拒绝，便上他们那儿去了，结果整晚听的是一些庸俗的、有关党内生活的老掉牙的笑话。

不止一次地有人走到我身边来，把我拉到一旁，谨慎地四面看了看，然后压低了嗓子对我说：“你父亲是个伟大的人！您等着吧，有朝一日人们会想起他来的！”之后还要搭上一句：“别搭理那些印度人！”

有时候一些不相识的人走过来，和我握握手，然后请求和我一起合影留念。我一生对此事总是感到羞愧，我不知道如何能摆脱这些人的耿耿的忠君感情。可是现在向我表达这种忠君感情的那些人却并不知道，我的生活和全国的生活一样，在一九五三年以后才变得好过一些，轻松一些。

那些对赫鲁晓夫新政和二十大决议感到不快的人认为，我给“父亲丢了脸”，而且对我不用“伟大的姓氏”而用母亲的姓

表示惊奇。

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工勤人员，看来都接到指示不要让我们处在监视范围之外。如果有时候我们三个人在辛格的房间里玩牌，那就不断有人进房来：有的是来送水果，有的是来掸灰尘，还有的在大白天也来换床单。

我的房间里也来了个女邻，尽管我一再要求让我独个住。印度人房里他们不好“夹塞”——好赖是客人嘛，搞不好还可能告到党中央外事部去。印度人可以说过于宽宏大量，他们从不想告谁的状。不过毫无疑问，莫斯科那里已有人把他们的和我的越轨行为打了小报告送上去了。我们当时没有对这种旧时代的回响予以重视，但是，不幸得很，只过了一年赫鲁晓夫就垮了，于是许多事情起了变化，又倒向了丑恶的过去。就在那时我想起了索契，想起了那些在休养的党内人士……

温暖的索契十一月再加上它的玫瑰花、橙色的落日余晖、星空下面的蝉鸣促使我和辛格日益亲密，并且作出了许多决定。勃拉哲士·辛格，本来应在十二月份返回印度的，改变了下一步的计划。他决定不迟于半年以后返回莫斯科，为了在出版社搞翻译工作，也为了和我在一起。

他和我一样也是孤独的，他的第一个妻子是印度人，跟两个廿岁以上的女儿另外住在一起，和他就象陌路人一样。这是印度教家庭中的传统婚姻，由父母包办，谈不上年轻人的相识和爱情。一九四〇年在德国人占领的维也纳，他结识了一个想逃避德国法西斯的犹太姑娘。她随他去了印度，二人共同生活了十六年，之后她决定在英国定居，以便他们的儿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辛格在伦敦找不到工作，于是又回到印度，虽然他很爱他的儿子——一个有才华的摄影师，而且非常思念他。

他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生活，而莫斯科此刻可以向他提供

安静生活的最佳机会。住在莫斯科的印度人中他有不少熟人，而印度大使考尔是他青年时代就认得的。再说他知道我的心扉和我的家门都是向他敞开的。

他相信我，可怜我。“一辈子待在一个城里？”他简直吓坏了，“我一定带你参观印度和欧洲，我们一块四处旅行，每隔三年我可以重订一次合同，那么每次假期咱们都可以在各个国家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度过。你们这些俄国人的生活是多么闭塞啊！这简直没法过！”

这个天真的人，他哪里知道，俄国人象这个样子已经过了五十年。我这一代人过的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一直盼望着日子会变得越来越好，变得那怕象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或者捷克那样自由，人们终于就能够四处旅行了。谁都应该见见世面呵。我们就这样指望着。可是我们迷路了……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他回印度去了，我就一直等着他的归来。我的孩子认得他，也知道我俩的打算。我象往常一样，把什么都告诉了我的儿子，他那时是十八岁。我们两人谈话时就象两个平辈的成年朋友。

对于我来说，辛格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远方来客，在精神上他那个世界要比我生长的这个世界丰富得多，也有趣得多。我们的相互了解既出人意料，又如此美满：我们各自的经历、国家、语言、经验和年龄都不相同——辛格比我大十七岁——但并未妨碍我们日后的结合。看来正是这些差别有助于我们相互理解，彼此怜惜，互相眷恋。从交谈的最初一刻起，我们就彼此相爱，充分信任。

在他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他上我家来了。在我的房间里他忽然用手遮住眼睛，为的是不让我看见他的泪眼，问我说：“斯维塔，要是万一我再也见不到您了呢？”可是马上他又兀

自强作欢笑地补了一句："不，不，一切都会好的！几个月之后我又会来的。"他叫我"斯维塔"比称"斯维特拉娜"顺口些，因为在梵文中有一个叫"斯维塔"的名字，表示"洁白"的意思。其它的俄文词汇他一个也不知道。

可是只是在一年半以后，他才得以回到莫斯科来。他来信不多，而且都是托人带来的，苏联的邮政太靠不住了。辛格寄给我的信都是寄到在莫斯科的一个学生物学的印度研究生名下收转。这位年轻人把辛格的信带给我，然后又把我的信取走，当成自己的信通过印度大使馆的外交邮袋寄走。我和他成了好朋友，我把他写的有关遗传学的副博士论文从英文译成俄文，不久以后他就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这一年半时间都花在争取出版社签订合同和发聘书这些事上，还花在和两个中央委员会——印共和苏共——的阻力作斗争上面。我们没有估计到，莫斯科的政治气候会变得如此之快，别国的共产党就象风信标一样，立刻随风转了……再说，谁又能预见到那个正处在世界声望顶端的赫鲁晓夫会垮台呢？难道我们能猜得出我们的命运是取决于这些？

要搞到来莫斯科出版社工作的外国翻译的正式聘书可不是三、两天的事。不过辛格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再加上他是印共总书记丹吉推荐的。驻莫斯科的印度大使考尔认得他并且从旁赞助。从形式看来这一点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一切都取决于莫斯科的党中央，取决于党中央的外事部。

开始一切都还算顺利，辛格告诉我，丹吉已把他的介绍信寄到莫斯科去了。我们耐心地等待着。

一九六四年，苏联与印度的友谊与日俱增。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预计在九月要访问苏联。为了更详细地商谈这次访问的细节，八月到莫斯科来了一位印度副外长——迪内希·辛

格，一个年纪和我相仿的年轻人，他是勃拉哲士·辛格的侄子。

他当然也知道自家叔叔的打算。他从旅馆给我打来电话，非常殷勤，还跑来看我生活起居如何。这位年轻的、官运亨通的外交官光顾我，使我简直受宠若惊。他和他叔叔一样，西装雅致，说的英语也是那样无懈可击。他在莫斯科电视台发表了谈话，谈到了社会主义，谈到印度的五年计划，迷住了所有的人。他向我保证：勃拉哲士很快就会来，他本人和他的家属都希望能在德里看到我。

我一个劲儿傻等出版社向辛格正式下聘书的消息；辛格也是日也盼，夜也盼，搞不清楚为什么聘书至今盼不来。他在印度不能就业，因为一心以为快上莫斯科，把好差事也辞掉了，在炎热和灰尘中，他徒然奔波往返于农村和德里之间，从他的来信看出，他常常在病中。

我现在想起了在索契和医院里那些党内官僚主义者投给我们的斜视眼光。根据我一生辛酸的经历，我早知道他们决不轻易放过我们两人的，只不过是等待时机而已。我还知道，在莫斯科的印共党员小组（形式上辛格的事情都应该通过他们）是处在左派分子影响之下，他们眼里的勃拉哲士·辛格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员”，而只不过是个“王公”。这个小组的书记钱德拉·舍卡尔就曾笑着这么说过，那是在辛格离开莫斯科前，他和他一起来看我的时候。

钱德拉是一九四九年从南部的喀拉拉邦来到莫斯科的。他因在该邦组织公社宣告失败而出走苏联。他放弃了印度国籍，娶了一位俄国女子，完全成了个“苏联人”，俄文说得很流利。在莫斯科公认他为印度工人运动专家和学者，尽管在印度未必有人承认他。他写过有关“印度无产阶级”的书，从而获

得历史学副博士的头衔。他向苏共中央外事部提供内参资料，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唯一的马拉雅拉语（南印度使用的一种语言）播音员。他老梦想印度会发生革命，就象他的老乡、左派共产党员首领南布迪里巴德（此人写的关于甘地的书我和辛格都不喜欢）一样。可是辛格命运中的许多事却握在他的掌心里。

我找到钱德拉那里，当面问他知不知道有丹吉的介绍信这件事，按说这封信早就该送到苏共中央了。钱德拉象他平时那样神经质地笑了一声，瞧了瞧天花板，然后又朝四面看了一下，尽量不朝我看，回答说："我记不得把它塞在哪儿啦……怎么也找不到这封信了……"

同年夏天我见到了米高扬，他对我总是那么善良，象人对人的那样关切。我把我和辛格的一切事以及我们日后的计划告诉了他，他对我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但是，为了获得什么人的意见以便成为自己意见的"后盾"，他把什么都告诉了赫鲁晓夫。听米高扬的口气，赫鲁晓夫非常满意，并且说："这太好了！让她去吧，看看印度，——看看人家的国家总是有益的！"

我告诉米高扬，正式聘请手续还未开始。"咳，这些衙门老爷，"米高扬恨恨地说，"他们一辈子就怕这怕那！多会儿你的辛格来了，就和他一起上我家来吧，我要给你们'祝福'。"

一九六五年三月终于收到了聘书，辛格就可以到莫斯科签订到出版社工作的合同。

四月七日我的儿子奥夏和我自己在谢列梅捷沃机场上接他。我们站在玻璃隔墙后面挨个儿盯住德里来的旅客瞧。

我那时哪会想得到，一年零八个月以后我将又来到这个大厅，把丈夫的骨灰送到印度去，我又哪里想得到这次我和站

在同一玻璃隔墙后面的儿子会成永诀呢？

德里来的旅客都走光了，可是还没有见到辛格的影儿。我们只好贴在玻璃墙上往外瞅。我的儿子见我发慌，他也慌起来了。

我终于看到手里提个重提包、蹒跚而行的辛格。远远望过去，他上气不接下气，因此比谁都到得晚。在所有的旅客交验证件以后，我们还隔着玻璃瞅了他半天。他微笑着，向我们招手，一个劲咳嗽。看来这一年来他的健康恶化了，显得老了，脸孔有点浮肿。他象平常一样，穿着一件厚大衣，戴着贝雷帽，围着厚围巾。厚眼镜片后面是一双和蔼善良的近视眼，亲切可爱的微笑。

接辛格的不光是我们，还有出版社的两位代表——一个俄国人，另一个是久住在莫斯科的印度人，辛格的老朋友，就是他给辛格出主意上出版社工作的。他们将把辛格带到根据合同由出版社提供的住所里。我们商量好了，我过些日子再去，暂时则和儿子一起回家去。我那格外懂事的儿子说："妈妈，何必呢，这就把他带到咱家去不就得了，迟早是那么一回事，倒莫如现在就去！……"

终于可以坐下来谈谈了。经过一年半前景莫测、日夜等待的日子以后，我们又相见了，这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啊。不，等一等，辛格首先把一只小巧的手表戴在我手腕上——他带来送我的。（他本人早已作古，而这块表此时仍在我手腕上的嗒的嗒，活着……。）然后他对我说："您听我说，斯维塔，您能看到，我自己觉得不怎么行了。我需要打抗生素，还要住两、三个星期的医院。我希望我会好起来的。我在印度累得不行，这一段遥遥无期的等待实在太可怕了。可是我请求您，请再考虑一下，现在还不晚！我还没有签订合同，我还可以上南斯拉

夫我朋友那里去，留在那儿工作。您的日子会不好过的，我不愿意成为您的累赘。我活不了多长了……。”他的胸膛里发出嗞嗞声和哮喘音。

不，经过这么多的努力和磨难，这会儿大功告成，怎么能分手呢？怎么能再度分离呢？我说：“尽说傻话。一块儿上我那儿去吧！您总归不能一个人住在这所空房子里。咱们回家去吧！”

我们回到家里，开始清箱子。他首先从箱子里把给我孩子们的礼物拿出来。他谁都想到了。然后我们全家一起到厨房吃晚饭。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正常，那么习惯，就和一个久客异乡的游子终于回到家里一样。

* * *

我们互相等了一年半，尔后又只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半。要不是我们遇到的那些就是更强健的身体也经受不起的横生枝节，他本可以活得更长一些……

当辛格在等待莫斯科的聘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总理换了人。一九六四年十月保守分子通过“宫廷政变”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推翻了使他们火冒三丈的赫鲁晓夫，从而将柯西金扶上了王位。所谓“三头政治”（柯西金、勃列日涅夫、米高扬）的集体领导，实际上意味着以苏斯洛夫为首的党内保守分子掌权。新政权的第一件伟大的行动是柯西金的中国之行，那时全世界都看到一张照片——懒洋洋地坐在单人沙发上的毛主席和在他面前弓腰曲背、鞠躬如也的柯西金。

可是谁又能想得到这些“伟大的”的变化居然也会对我们的私生活产生影响呢？

苏联的法律只承认非宗教婚姻，宗教婚姻却不具备合法性。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遗孀就是类似事件的先例。他

俩的婚姻是在侨居国外时由天主教堂证婚的，大家知道，天主教堂根本不承认离婚这一说。可是，普罗科菲耶夫的寡妻在丈夫去世之后，却不能恢复自己作为妻子和继承人的权益，这是因为当她在监狱服刑时，普罗科菲耶夫和另一个女人，苏联女公民，缔结了非宗教婚姻，而现在根据苏联的法律，这个女人有权享受未亡人的一切合法权益，尽管他俩并无子息，而第一个妻子却和他生了两个儿子，均已成年。在任何一个国家里第一次婚姻应当是有效的，但在苏联不行。对于我们说来，这个先例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辛格和他第一个妻子是宗教婚姻，故此不必要求离婚手续。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可是我们也知道，苏联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可由于"国家利益"而作任意解释，这实际上蕴藏着全然违法的危险性。

我们刚来得及在莫斯科一所唯一的办理与外国人结婚的登记处打听到一些情况。

第二天我就接到总理接待室约见的电话。这件事可没想到，我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赫鲁晓夫在位的年代把我"遗忘了"是我的头等运气。那时的政府对我生活如何绝不感兴趣。可现在又会怎么样呢？

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这一天既冷、又刮风。我穿过斯巴斯克大门来到了我睽违已久的克里姆林宫。一种不快的感觉抓住了我，天气很冷，似乎眼看就要下雪。我走到卡扎柯夫枢密院那所旧楼里，第一层曾经是我们的寓所，我们在此几乎住了廿年之久；而第二层是部长会议主席的接待室、办公室和办事机构。赫鲁晓夫两次和我谈话都是在位于旧广场的苏共中央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柯西金现在则在我父亲过去的办公室里接见我。

我在接待室里等候着。一种沉重的预感使我的心紧缩起

来。仍旧是四面镶着护板的阴沉沉的墙壁，对我是最熟悉不过了；仍旧是这些标准的公家地毯，所有的克里姆林宫走廊几乎全部铺满。还有这些铺在几乎是空荡荡的桌子上的绿呢子桌布……

我干嘛又到这儿来了？为什么？这个等候的功夫是多么令人生厌啊！这些墙壁、这些老式的拱形天花板使人感到阴冷。还有墙上电钟里指针的慢条斯理的嗒嗒声——这样的电钟在我们过去楼下的住所内的每间房子里都有，也是这样嗒嗒响着。这几年过的平民生活使我对克林姆林宫阴沉的室内布置早已不习惯了……

我过去从未见过柯西金，也未和他说过话。他的脸鼓不起别人的乐观主义。他站起来，伸给我一只皱巴巴、有点发潮的手，稍稍咧了咧嘴，就当是微笑了。他似乎感到难以启齿，我却根本想象不出这个人会说些什么。

“呃，您生活如何？”他终于挺为难地开口了。“您那里情况怎么样，我是指物质方面？”

“谢谢您，我样样都有，”我说，“诸事顺遂。”

“您工作吗？”

“没有，这会儿在家待着：有孩子、家庭。有时搞点翻译，不过很少。”

“干嘛您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呢？”

“我离职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再说家里的孩子也没人管。我认为对于我来说，家事和孩子更重要一些，再说我们也有退职金……”

“我明白，那会儿您在集体中处境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不愿意继续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执行的糟透了的路线！我们打算作出某些决定。您必须仍旧参加集体，担任

应有的工作。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会帮助您的……”

“哦，不是这样。我不是因为这个才离职的。人家对我都挺好，”我开始说，但是忽然一下子我觉得要对此人说些什么、表白什么都不会奏效。原来他认为我在二十大以后是受压的。要向他解释我近年生活比从前要好些，是没有用的。

“不，人家对我都挺好，”我又重复了一句，“我现在不工作仅仅是由于家里事儿挺多，丈夫又病得厉害。”

一听到“丈夫”这个字，总理就象触了电一样，他忽然轻声轻气，用比较随便的口吻、捎带一点并非做作的不满说：

“真亏您想的！您，一位又年轻、又健康的妇女，运动员，难道您就不能在咱们这里找一个壮壮实实的年轻人？您懂吧？您要这个病歪歪的老印度教徒干什么？不行，我们大家都坚决反对，坚决反对！”

起初，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不仅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就连脑子都没转过弯来。大家都反对，谁是——大家？

“对不起，可是怎么会呢？”我这么开口了，“‘反对’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我晓得这不会引起任何反对的……（唉呀老天爷，我怎么搞忘了：我们总理也换了，全都不是那回事了，路线也变了……）“一个病人为了我，上这儿来工作。是不是他还得回转去？”我这么说，一心想先发制人，阻止一切可能发生的麻烦。

“咳，不行，这样作不策略，”总理开腔了。“不过我们劝您别去办理婚姻登记。劝您别去。我们也不允许。因为要是根据法律他把您带到印度去又该怎么办？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我到过那儿，见到了。再说印度教徒对妇女不好。回头把你带走又把你给扔了。我们有很多这种情况，走了之后又请求回来……”

慢慢地我心里开窍了。

“第一，我们不打算去印度，”我说，这时心里稳当一点，脑子也清醒一些了。“他是到莫斯科来工作的。不过我们也倒是想走动走动，看看印度和其它国家。”

可是总理没有闲功夫管这些细节。他只想说服我：

“您算了吧！您应当工作，回到集体中去。谁也不会碰他，让他工作好了，条件挺不错。不过您这么干没有必要。”

“现在晚了，”我尖锐地说，“人都来了，这会儿住在我家，以后还得继续住下去。我决不会离开他。他有病，又是为了我才来的。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事。”

“那好，您自己看着办吧，”总理冷冰冰地说。“您好自为之，不过您登记结婚我们是不准许的！”

接见到此结束。他站起来，向我伸出了手。

“好吧，”我冷冷地说，“感谢您，再见。”

在这个世界闻名的、父亲过去的正式办公室里我得不到任何支持。四堵墙从各方面向我压来。从窗口看出去也还是巴任诺夫* 兴建的那个兵器陈列馆。多少年里这个黄色带白、饰有一排排铜炮的建筑物的正面一直展现在我的窗前，多少年里除了这个兵器陈列馆和克里姆林宫的灰蓝色的枞树，我啥也见不到。这些往昔的阴影一齐向我逼近、挤我、窒息我……这些空荡荡的走廊、这些地毯、这些拱形天花板……快、快出去！

快些离开这儿吧！可诅咒的克里姆林宫！可诅咒的牢狱！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逃不出你的手心，你又追着我来了，跟在我脚后……快回家去吧，那里住着正常的人，那里正在等我的有我的孩子和那个可怜、不幸而又天真的人。

---

* 十八世纪俄罗斯建筑师。

在回家的路上我极力想镇定下来，想考虑一下现在该怎么办？我要买点糕点、大蛋糕和糖果，因为不巧的是这天正是我的卡佳和辛格的生日，而他俩都爱吃甜食。我在商店里选购了糕点，极力想摆脱那些阴沉沉的克里姆林宫的印象，而其中最糟的是总理本人。

辛格简直不能相信我讲给他听的一切。

“为什么？为什么？”他心慌意乱地问道。发生的事是一个来自自由世界的人心理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简直不明白。我忽然感觉到这个善良、心软的好人心里的坚强性，他摇着头说道：

“不，我不喜欢这种生活，就象在兵营里一样。我又不是罪犯。我应该和他们讲清楚。”

当天我们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柯西金。辛格等待着回音，等了又等，他心里寻思，对他这么一个五十七岁的人该会以人的态度和他讲清楚的。他哪里知道，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人，他在这里原本是不存在的。

我们真没想到居然和国家干上了。青铜骑士*，重重地抡起拳头，朝着那个安安静静的带角质框眼镜的人冲过去了。在沉重的马蹄下是无处逃生的。

辛格就是没有得到复信。青铜骑士不能下马和一个人并肩而坐。他没有功夫。他于是又拍马向前，把那些在路上碰到的人打翻在地。

• • •

辛格只在莫斯科住了一年半。他的健康一天一天恶化。这也是寒冷的莫斯科天气所致。但是我认为，对于他，我国的政

---

* 普希金历史题材长诗，以彼得一世时代为背景。

治气候——从赫鲁晓夫的解冻到寒潮和霜冻——起了更加具有毁灭性的作用。在意识形态机构、出版社、文学杂志社里，在和我有同窗之谊或友情的艺术、科学和政治知识分子圈中，整个气氛来了个突变。

一九六五年九月作家西尼亚夫斯基* 和达尼埃利的被捕揭开了非法迫害的可耻的一页，引起了全世界的一片抗议声浪。判决的残酷使辛格为之震惊："就为了几本书要在监狱服刑七年？就是因为作家——写书吗？"

当我把一切告诉他，谈到我们世界文学研究所开的大会，在会上出席者必须在审判之前审判并判决尚未认罪的原工作人员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告诉他，在会上，根据上级党领导的指示，事实上已预先作出了判决等情况时，辛格只是把双手一摊，悲哀地摇了摇头。

他从我这里知道，苏联有大量的文学作品，由于书刊检查而不能出版，有许多人写了书不发表。他知道我有一卷手稿——我的家史。他对我那《二十封信》里写的什么并不大感兴趣；他知道我的思想和信念，所以也就不刨根问底。那年冬天他劝我把手稿交给他的老友、考尔大使带到印度去，我们就这样作了。在苏联可是人有旦夕祸福——抄家、书架上书籍查封充公、抽屉里找出的手稿没收，等等……这一切都发生过，这一切都见过。用这种方法没收了格罗斯曼的小说《为正义的事业》第二卷以及索尔仁尼琴的所存文献和长篇小说《第一圈》。

除了保存一份手稿这个念头外，我当时没有别的想法。考尔大使趁一次前往印度之便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带走了手稿。当时我觉得他是一位可靠的朋友，常到我家来。我们——我的孩

---

* 即阿勃拉姆·捷尔茨。

子、辛格和我——也到大使馆去作客。这对于我们大家是一次愉快的换空气的机会。我们说英文，浏览外国报刊和杂志。考尔和他的朋友阿联大使穆拉德·加利卜一样，喜欢我孩子他们举行的学生晚会，听听吉他伴奏的唱歌，和女大学生一起跳舞。青年人也喜欢考尔：他到我们别墅来总带着一大锅咖哩饭、杜松子酒和威士忌，唱俄国的歌。

辛格的老朋友——印度共产党员们——听说苏联政府对他不满意，就回避他了。艾哈迈德博士、哈志拉·贝干姆、利托·高士（阿约艾·高士的遗孀）都一个一个不见了。印共总书记丹吉不只一次到莫斯科来，可是老也找不出时间来看辛格，尽管辛格极想见他一面。自从英迪拉·甘地上台以后就当上了国务部长的迪内希·辛格，再也不给我们来信了，尽管他知道叔叔的健康情况堪虞。只有一直住在印度卡拉康卡村的他的弟弟苏莱士每个礼拜都写信来。

已经不当苏联主席的米高扬，仍然是那样关心备至，但已不愿给我们"祝福"了。这会儿他对我说："形式上的婚姻对爱情没有意义。我和我老婆根本没有办理婚姻登记也过了四十年，谁也没有和我说过我们家的五个小子是——非婚生子！"

唉，可怜的米高扬，关于他的狡猾别人编了多少笑话呵！——我们明白，他想帮忙当时也力不从心了。流行一个关于米高扬在各种政权下都一直当不倒翁的笑话："您知道吧，这会儿米高扬在写回忆录，标题是：《从伊里奇到伊里奇①：不梗塞，不麻痹》。另外一个笑话是："在俄国恢复了罗曼诺夫王朝，当流放的赫鲁晓夫要求沙皇赦免时，沙皇征求大臣米高扬

① 意为"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的意见，问道：‘我们如何处置这个赫鲁晓夫？’沙皇大臣米高扬回答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他是谁？’”。

现在米高扬又提醒我不要和外国大使们“过从太密”。

“这个考尔太刚强好胜了，”米高扬说，“一点不象印度人。你离他远点儿，远点儿！”

后来我就再也不上米高扬家去了，就是他的大儿媳妇，我的老朋友，见我也掉头不顾而去。

苏联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你不论朝哪儿瞧，都看得到这两大派别的斗争反映在一切方面。是守旧还是和过去坚决一刀两断？是继续二十大的路线还是回到“斯大林主义”去；是要国际联系还是要闭关自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要现代化艺术和艺术实验还是保守的“古典传统”；是要呼吸总是由青年一代带来的那股新鲜的空气还是吸入老党员的“重量级”的列宁主义——这两股截然相反的势力在各处冲突着。分歧侵入了家庭，离间了多年的友谊和私人关系。

我认为倒不如把这一切称之为“追忆党”和“希望党”之间的斗争。我这是借用我到美国以后读过的一本书上的名词。这是爱默生用的术语，不过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而且再没有任何地方比用于苏维埃俄罗斯更合适的了——这个巨大的国家，在这里一切似乎都由一个党说了算。可是不要相信这些！在苏联，现在是“追忆党”和“希望党”之间进行着各个方面的生死搏斗，亦即“过去之党”和“未来之党”之间的生死搏斗！

当苏斯洛夫—柯西金的新政权想将历史车轮倒转并且回到老一套的作法上以后，这种冲突就使人愈加明显地感觉到。“追忆”把他们推到过去那个方向去。“希望”则使大家一遇机会就在各个方面奋起抵抗。

在辛格从事从英文译印地文的“进步”出版社里，也有这两

种趋势在斗争着。英文部的主任编辑是我父亲过去的私人译员巴甫洛夫（他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充当翻译，大战期间我父亲和罗斯福及邱吉尔的通信都是他翻译的）。女编辑们都崇拜辛格，欣赏他的印地文风格——这批人都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印地文部的主任编辑却是赫鲁晓夫时代从党中央调到出版社来的，故此耿耿于怀。此人抱怨说辛格“完不成定额”，翻译质量差劲。

惊奇得不得了的辛格问道：“印地文是谁的祖国语言？是我的还是他的？他干嘛要改我的稿子呢？”他哪里知道，人家就是要把他搞下去，而达到此目的的唯一方法是：让他瞧瞧他作为一个翻译是块废料。出版社的工作是他留在莫斯科的唯一形式上的理由，如果没有这个依据，他就只好卷铺盖回印度去了。

如果我们能办理结婚登记，那么法律就会保护辛格和他的健康。由于健康的关系，辛格在工作上已感到日益不支。可是这一点我们办不到。他只好强打起精神干，哪怕住在病院里也在工作。人家很敬爱他，尊敬他，不过他总感到来自领导方面的一种潜在的恶意。巴甫洛夫有一点怎么也转不过弯子来——翻译辛格竟会是我的丈夫，就象他对我的父亲——他当上帝崇拜的那个人——死后在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转不过弯子来一样。

就是医学也未能保持不介入和客观的态度，按理说它应超脱于政党之外的。当初他们想把辛格送进结核病院。我象一只卫护幼仔的母老虎一样扑向那些想夺走他的人。

我拒绝让辛格去住那个医院。我们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仅仅是为了向国际旅行社的医院出示各种X光片和化验单，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诊断是错误的：辛格害的只不过是支气管扩张，

病人不需要隔离，他可以工作。既然一年半以前孔策沃的医院都确诊了是支气管扩张，而且一直对症治疗，为什么现在又要向医院证明这个诊断呢？要知道那是赫鲁晓夫时代啊！现在就要从头开始提出证明，向另一批医生，另一个医院和另一个领导班子提出证明。我们就这样做了，花掉了我们本来就剩下不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一年半期间辛格三次进了孔策沃医院住院。在那里人家认得他，理解他，敬重他。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护士和医生们都到病房来祝贺我们——他们知道我和辛格是三年前在这个医院相识的。这一天病房里摆满了鲜花……

我不能指责谁在有意误诊。但在苏联免费医疗制度下你根本没有可能挑选或更换你不中意的医生：你命里注定就该他给你治。我觉得，治疗是很折腾人的，病人服药过多因而中毒，我看到辛格一天弱似一天。如果心脏出了毛病，那就再也无计可施，只好用针剂和输液维持生命。

辛格生前最后几个月由一个美丽的、淡蓝色眼睛的格鲁吉亚女大夫治疗。她每次走进病房，辛格一定对她说："我今天好多了。"她会说一点英文，待人亲切有礼，静脉注射手法极佳，一下子就能插进细软无力的静脉管。她走出病房时她几乎总是带着哭声对我说，病人情况已经无望，要我随时准备好后事。当发生心力衰竭和喘息性呼吸困难时，完全靠注射。

这个漂亮的年轻妇女走进病房时总是面带微笑，谁也想不到她有时胃溃疡发作得很厉害，她过于劳累，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

"一些党的会议要占去我们医生多少时间啊！"她说道。"说了多少废话，搞了多少没用的公文、名单、表报！我们应该给病人治病，时间应该用在病人身上……"

到医院来看辛格的有莫斯科的印度人和两位大使——考尔和穆拉德·加利卜。入门证要头一天就办好。入门处和大门口的门卫对辨认外国来客的名字总是十分吃力——这些人是来探望生病的外国共产党员的。进入克里姆林宫的入门证早就取消了，但是各个机关单位仍然保留着自己制定官僚主义条条框框的权利。对大使们就更严了。每次要申请特别许可证。不过他们总还是少不了来，每次来淑淑一定给辛格带上他喜爱的奶油夹心糖果。

现在这个医院行了新规矩：所有的外国人都搬到了同一层楼上，以便和“同胞”病人隔离。只有那些到花园散步的人才能和俄国人交谈几句。这使那些只能和自己一伙泡在一起的外国人十分恼火。三年前，情况要简单得多。那时候我和辛格能在走廊里一连数小时说着话儿。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的一天，在辛格再次住院期间，他忽然对我说，他想“死在印度”，哪怕看一下亲近的朋友们……他感到自己已经为日无多了。他对这些没完没了的药物、病人食物、入门证早已厌倦。他喜欢烹调，这会儿在医院里他看英国的烹调书，从上面把食谱摘抄下来。他想活。我们想着今后的计划，我们彼此都想让对方相信，我们的好年头在后头！这会儿他很严肃地谈到，在我们前面的不是年头，而可能只是星期了。

那些日子我天天在他身边度过，早上出城上医院，晚上回到孩子身边，他们什么都懂。奥夏——这时已是医科大学生——问我说：“怎么样了？”然后查阅着自己的教科书，解释道：情况十分糟。

辛格被允许在走廊里散散步，我陪着他一块走，可是很快他就喘不过气来。天气暖和的日子我就用轮椅把他推到花园里

去。我们坐在太阳下面的长凳上。这时他谈的多半是他的年轻时代，谈在欧洲度过的时光——总的说来，谈的都是过去的事。眼下的情况是乏善可陈的。他指摘印度共产党，这个党已分裂成为左右两翼。他取笑中国的报道，里面说的是“毛主席如何游过大江”。当他知道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悲哀地说，这些暴行很象德国法西斯发生的初期——他亲眼见过。有一天他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能活着回到印度，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党。”

他常谈到印度的历史，谈到佛，一再谈到克里希纳的传说。他忽然重新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印度教徒，他是多么渴望接触亲爱的故土，喝着那永生的泉水啊！除了我之外他没有任何听众。我总是坐在他脚旁的地上，或是坐在病房的小板凳上，他无力的手放在我的头上，闭着眼睛说着。他只有这样才轻松些，我的心里也好受些……。

我处于绝望的心情中，他的生命之火正在熄灭而我束手无策，而且我感到对这一切我要负责，我有过错。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我写了一封信给勃列日涅夫，请求他允许我把辛格送到印度去，理由是辛格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是他请求我这样作。我在信里解释说，我在印度要待多久虽然说不准，但决不会太长，因为他将不久于人世。我恳求他，因为我怕辛格死时就我一人在身边——可以说他整个人都交给我了。

代替复信的是几天之后我应召到中央委员会——可不是上勃列日涅夫那儿，而是去见苏斯洛夫。这比我原先想的还要坏——直接去见保守党员头子。

我走到老广场，心想准没有什么好事。父亲在世时我见过苏斯洛夫几面，但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

他一开口就和柯西金总理一个样：“生活如何？物质情况

怎么样？干嘛不上班？”不过我还是提到了那封信，我说：

“我请求的可能批准吗？这是我们两人一起作的请求。难道不能满足一个人一生中最后一个愿望吗？”

坐在桌子后面的苏斯洛夫烦躁不安地扭动着身体。硬化的粗血管凸起的一双苍白的手一会儿也不停。他身体瘦长，一付肝火旺盛的宗教狂的面孔。厚眼镜片也未能使他那向我逼视的、疯狂的目光稍稍柔和一点。

“你要知道你父亲是最反对和外国人结婚的。甚至于我们还有这么一条法律！”他一字一顿地说。

“那又怎么样呢？”我尽可能有礼貌地说道，“他在这个问题上搞错了。现在别人都可以——就我不行？”

苏斯洛夫将身子猛地朝前一凑，气得差点说不出话来，双手使劲地转动着铅笔。

“我们不放您出国！”他极端愤怒地说，“辛格要走，他走他的好了。谁也不留他。”

“他会死的！”我大声说，觉得现在是把话说明白的时候了。“他会死在这里而且要不了多少日子了。这种死会使我们大家、会使我的良心负疚的！我决不能答应！这是我们大家的羞耻和耻辱。”

“干嘛会是耻辱呢？不是一直给他治病吗？谁也怪不到我们头上，说我们没给他想办法。死了就死了嘛。他是个病人。您不能出国。人家会搞挑衅的。”

“能有什么挑衅？这碍着挑衅什么事？”

“咳，您不懂！”他大声嚷了起来，“当我战后到英国去时，我们的飞机刚到机场就碰见一伙举着标语牌的人：‘把我们的妻子还给我们！’——您明白吗？！”

“我不明白这算什么挑衅，”我说。“我真不懂，人家干

嘛要替我操那份心：难道我就不能回答问题，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

“您一到那儿就会被记者包围。您根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句话，政治挑衅处处都有。我们不想让您遭这份罪。”

这纯属白费唾沫，说不到一起去：我们各说各的，从各不相同的观点谈论着不同的事情。再说下去也没有什么用了。

正象总理本人一样，苏斯洛夫更感兴趣的是我“在集体中占应有的地位”，使我和我的姓氏、我的赫赫有名的姓氏相称。

“您干嘛一个劲儿想出国呢？”他最后终于问道，好象是我求他放我出去作海外旅游似的。“你瞧我全家和孩子都不出国，也不想出国！没劲儿！”——他由于自己家属的爱国主义而颇为自豪地说。

我离开了，带走的是这个目前领导着全党、满脑子旧习的古化石共产党员留给我的可怕印象……

第二天，我再到医院去时就把这次谈话源源本本告诉了辛格。他的幽默感始终没有离他而去，他讥笑苏斯洛夫式的“爱国主义”，摇着头说：“可我们党里还把苏斯洛夫当成国际主义者和当代最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哩！”他挥了一下手，就象是把这些胡说八道赶走一样。

他这一天真正忧虑的是另一件事，早晨在他身上放了水蛭放血，这在苏联的医院里是习见的作法，用过的水蛭随即丢在盛有液体的罐子里，它们立刻就死了。这使辛格很难过：在印度，水蛭是不弄死的，而是保存在水里等下次再用。

“要是我知道这里是这样干的，我会拒绝给我使用水蛭的！”他对我说道。他不许我在病房里扑打窗户上的苍蝇，我

必须开开窗户放它们出去。

这一天他比平常更忧郁，忽然对我说："斯维塔，把我带回家去吧。我腻味这些白墙和白褂子，这些入门证，还有这些饭食！我自己要摊鸡蛋，这里不会做。咱们回家吧，明天就走！"

人家终于放行，知道他厌倦了，也知道他活不久了……

他在家过了一周。地区医生是一个阴沉的、上了年纪的妇女，有礼貌，但脾气很躁：莫斯科的医生怕给外国人治病，怕担风险。给辛格静脉注射的是另外一个男医生，因为她找不到静脉。不过辛格担心的倒不是这个，他到了家，怡然自得地坐在我家大客厅里的安乐椅上。印度人来探望他。

他在世最后一天是个星期日，十月卅日，正逢我家的一件大喜事：奥夏和莲诺奇卡向我们宣布决定要结婚，结婚登记定在十一月末。我们为他们的幸福喝了几杯。

后来前任印度使馆代办里希·贾帕尔和他的妻子来了，——他们将去英国，特来辞行。傍晚时分，和辛格一起在出版社工作的纳列施·魏迪也来了，给他带来了他弟弟的信。

晚上辛格已经很累，呼吸困难。纳列施匆匆走了，和我说了一句："他今天的气色真不好！"

当他走了以后，辛格坐在安乐椅上，久久地反复读着他弟弟的来信，然后他把我叫过去。我象往常一样坐在他身边，拉着他的手。

"斯维塔，"他柔声地唤着我，"这是我最后一天了。我很冷。我去躺下吧！"。

我想用句笑话岔开，可他却是一本正经的。他累了，很快就发生了象过去常常有过的那种憋气。需要赶快叫医生打针。再说话已经没有时间了。我只想给他——也给我自己——鼓

气……

喘息性窒息和心力衰竭接踵而来。我夜里第二次把医生叫来，到天亮时又叫了第三次。打了几针以后，他觉得轻松一些，就打盹了。可是并没过多久。每次来的医生都不同，在礼拜天值班的医生碰到谁就是谁来。他们每次来都吓坏了，每次都建议立刻送医院，每次辛格都摇摇头说："让我留在这儿。"每次我都得对每个新医生重新讲一遍他的病史以及医院的治疗方法。每次当医生走后，辛格都要我坐在他旁边，用他的手抚摸着我的面颊，说他觉得好一些，要我放心。

他这次发病，与平常发作时那么相象，以致当他早晨告诉我说"斯维塔，我知道，我活不过今天了"时，我全然不能置信。他说这番话时非常安详，非常柔和，他不诉苦，也不急躁，因此我根本不相信……

早上给他在静脉注射了斯妥反汀，这种药在住院时是用一种作用比较温和的药物代替的。但是和这些新医生争论也没有用：他们形式上做的是一般在这种情况下照例作的。

注射五分钟后，他说他好一些了。但是"这里有些突突跳，"他指着他的心。"现在在这儿了，""又高一些，在这儿！"他指着他的喉咙，然后仰身倒在枕头上。心跳停止了。

我赶紧跑出去叫奥夏，把他叫醒，然后一块儿回到房间来。医生正在给他做人工呼吸，身体挪放在地板上。我问奥夏说："干嘛这样？""应该这样！是该这样，他们作的是对的。"他站在我旁边反复地说。我和他互相靠着，我内心颤抖着，奥夏脸色煞白。

"他死了，"那位陌生的年轻医生说，带着绝望的神情看了我一眼。这时正是早晨七点钟。印度教徒认为，有德者如死于早晨刚天亮的时候，那么就是寿终正寝，灵魂得到安宁。这

次是骤然的毫无痛苦的死亡。

在这以前我只见过一回死，那是我父亲的死亡。这两次死亡如此迥异，就象他们两人的生命那样天差地别。

医生们走了，遗体停放在床上，他们告诉我，下一步如何做法要等候电话通知。

我很怕官僚主义的手续和种种耽搁，那将是对死者如此平静地归去的作践，于是给印度朋友们打了电话，他们会知道该怎么办的。通知了大使，给辛格在伦敦的儿子拍了电报。下一步的后事都是印度人安排和组织的：肃穆庄严，安静无哗。遗体定于翌日火化。这一切作得非常及时，因为“医疗部门的领导”已决定自作主张，把尸体送到停尸间，进行解剖。我不愿在最后的日子里和他分离，而印度人是不作兴尸体解剖的。

我悄悄地坐在我们的卧室里。相识的在莫斯科的印度人络绎不绝地前来吊唁。他们都是从从容容地走动着，小声交谈着。随着他们的到来，家里变得宁静了。这一点正是我最喜欢辛格的地方：平衡和内心的宁静在任何情况下都得以保持。

我的朋友伯莎和塔玛拉——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印度组工作——也来了。她们和我待了一整天，照顾孩子们吃喝，把茶和咖啡端到客厅里待客，该做的什么都做：她们在我这里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坐在卧室的小沙发上，不愿离开那儿。我没有哭，但我的内心片片碎裂。碎裂的东西不能修复，我内心的一切也如同槁木死灰。那时我正是四十岁。往者已矣。有一种内心的境界。我坐在这里，用冷眼旁观这个房间曾发生的一切……

我不惧怕死亡和尸体，死者的苦难已经告终了。夜里我安心地睡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虽然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和一个死者在同一所房子里过夜。孩子们有些紧张，伯莎留在我家宿夜。

不过，这里有一个善良的、和气的、仁慈的灵魂在徘徊，故此没有什么好怕的。一清早我安静地走进了卧室，把手放在他冰凉的、腊一样的额头上。天气很冷，但房间里已充满了阳光。

白天，在移灵之前，所有的印度人都集合在这里，大使来了，我的女朋友们和医院里那位可爱的女医生也来了，她两眼都是泪水。一位印度人用梵文朗诵了薄伽梵歌中关于永生不朽的灵魂那一段诗。房间里焚起了檀香。出版社的女编辑们眼睛都哭红了，她们送来了鲜花。房子里满都是人，很快他们就跟着灵柩走了出去。家里就剩下卡佳和莲诺奇卡，她们害怕火葬。

十一月一日是一个寒冷的晴天。院子里站着几个小男孩。女邻居们都回避了，她们怕见外国人和大使馆的汽车。当我见到在火葬场门口等着和遗体告别的玛丽娜和她的丈夫（尽管天气严寒总使她感到气闷）以及我在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朋友时，我感到十分惊奇，因为他们甚至从未见过辛格。这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心里感到一阵温暖。

我也没有预料到我的儿子居然会在和遗体告别时吻死者的额头——他吻得很突然，象被某种冲动驱使似的。当时我没有想到，一个对谁都不存恶意的人，即使不能引起大家的真正的爱，至少也会受到真诚的尊敬的。

三年前我在辛格的笔记本里读到这么一句话："余死后愿将遗体火化，骨灰撒入河中。毋需宗教仪式。"我当时还对他说，这不就是印度教的宗教仪式吗？不过他指的是什么河呢？是恒河？他微笑着回答说："对，就是恒河。不过我可能死在国外，那时谁会想起上恒河呢？所有的河流都是一样，条条归大海。"

这会儿我想起这番话来了。近三年来，他在许多方面起了变化，内心已经和共产主义离心离德了。有时他给我背诵吠陀

经。他是照印度教徒应有的方式那样地迎接了死亡。现在他应当回到恒河去，可是由谁来安排这件事呢？

现在放在卧室里的那个小小的骨灰盒我谁也不交，我和它之间有着无形的、千丝万缕的连系。我不能和它分离，它用一种我过去从未体会过的眷恋和忠诚之情召唤着我，吸引着我，使我追随其后，不离左右。

“你应该自己去，谁也别托付。就该你自己去。”淑淑·加利卜是把这层意思点破的第一个人。伯莎支持她的意见。我不相信这事能得到批准。不是清清楚楚地和我说过决不会让我出国的吗？不过我还是又给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写了信，给两人都写了。显然问题很快就获得解决——第二天一早就把我叫去了。

这次柯西金的脸色起了变化。是他感到惭愧吗？我不想妄加评论。接见在五分钟之内即告结束：准许我出国，但条件是不得和报界接触。这次谈话使双方都感到不快，于是我们三言两语就赶紧说完了事。

莫斯科的政府机器工作敏捷而且配合极佳。到了傍晚时分我填的各种表格都收上去了，而且答应我一俟照片交上去，即可发给我出国护照。在外交部的领事司里，迎接我的是一张张有礼貌然而是木僵的脸。这里任何人对什么事都不感到奇怪：这些人早就见怪不怪了。谁也没有提问题。既然一切都是“上头”决定的，对这一切负责的也是“上头”。

护照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发下来的，上面载有印方为期一月的签证，从到达德里之日算起。不过行期由于迪内希·辛格的请求而延到十二月廿日：现在他终于寄来了一封措词极其礼貌的信，邀请我在他家下榻。

一个半月之内我几乎是足不出户。我生怕安放骨灰的这个

房间无人照看。不过每天都有朋友来探视我，或是留在我这里过夜。我的同班同学、同系同学以及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同事都象过去一样和我在一起。不断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并非孑然一身。

十一月末我的儿子结婚了，莲诺奇卡搬到我家来住，看到这一对年轻的爱侣是多么令人愉快。生活在继续。辛格生前曾是一个快活的、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他爱可口的食品和美酒，可最不希望他身后别人长久为他哀哭。他快活善良的灵魂和我们同在，温暖着我们——这个灵魂最不喜欢黑暗和沮丧。黑暗和凶残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

……呶，已经看到了德里郊外帕拉姆机场上的灰尘满布的干草，机坪是用柏油铺的，到处散落着碎纸屑。暗淡、苍白的天空。刺眼的阳光。缠着头的大胡子地勤人员站在机库旁，我们飞机正朝那边开去……

勃拉哲士·辛格啊，我们总算到家了。你善良的灵魂战胜了那么多艰难险阻，连“青铜骑士”也在它面前畏而却步啊！

德　里

我穿着冬季的毛皮半统靴在干草上跌跌撞撞地走着，阳光格外明亮，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就是这样在印度的土地上迈着我最初几步的。不过我倒没觉得我这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因为小小的帕拉姆机场很象我国南方的辛菲罗波尔或是阿德列尔疗养地的机场：也是这样小小的白房子，周围一片干焦的平原，还有那些四处散落、无人打扫的碎纸屑。

我一眼就看到了前来迎接的人中有我认识的两位身着纱丽的妇女：一个叫娜姑，迪内希的妻子；另一个叫普丽蒂，考尔的女儿。他们正向我挥手。

原来的打算是：我直接从机场前往迪内希家，因根据正式安排，我算是他的客人。但是机坪中忽然有三个穿灰色西装的身影走过（按说是不许走的），正是朝我们来的。卡西洛娃高兴地喊了一声："这是咱们大使馆的人！"

这一下不知为什么大家的动作就立刻加快了。我来不及和娜姑说上三两句话；后来才搞清楚，我得先去使馆，然后下一步如何作，再通过电话联系。使馆的二秘苏洛夫催着我赶紧通过海关，我跟在他后面，模模糊糊地感到有点煞风景。我们坐上了他的车，这时我已不知娜姑和普丽蒂的去向，我只觉得初次见面可说是令人扫兴之至。

原说的是去迪内希家，我还给他家六位姑娘带了礼物来，可结果是来到使馆区的大使馆招待所，这里一切是如此眼熟，就象压根儿没离开莫斯科一样。带着乌克兰口音的女管理员递给我一把房间钥匙。我用眼睛四处张望，看看哪儿有电话机，

可就没找到。没有，人家对我说，电话只有另外一个房间才有。

“大使馆里哪个房间都能打电话，”苏洛夫殷勤地说，“咱们现在走吧，尼柯莱·伊万诺维奇正等咱们吃早饭呢！”

别涅季克托夫* 这些日子不在德里任内。临时代办尼柯莱·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瘦瘦的个儿，很神经质，显得特别不安的样子，他的紧张情绪立刻传给了我。客厅里的矮桌旁除他以外还有几个人就座：胖胖的、有一张泰然的圆脸的一位黑发男子、使馆二秘苏洛夫，卡西洛娃和我。别瞧这顿早饭开得早，桌上的食品和酒瓶倒不少。斯米尔诺夫给就座的人都斟上了白兰地酒，勉强装出一付笑容举杯祝酒说，为“纪念受到人们敬爱和尊重的勃拉哲士·辛格先生”干一杯。在坐的男人们装出一付哀戚的面容，友爱地喝着酒。吃饱喝足以后，斯米尔诺夫一边极力想表现得客气周到的样子，这就开口谈正事了。

原来我挑了一个最不恰当的时间访问印度。二月中旬举行的普选前夕是印度国内政治局势最紧张的时刻。执政党的反对派十分强大，谁也不能担保日后印度将选择什么道路走下去。

“法西斯的威胁也的确有！”那个面孔表情泰然的胖子颇有权威性地插上了一句。“反动的人民同盟和亲美的自由党想把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引开。”

“总之一句话，形势万分、万分紧张，”斯米尔诺夫吸了一口气，“因此我们劝您还是待在招待所里，最好是根本不到乡下去。我们可以就在这里举行骨灰转交仪式，特别是因为我们和迪内希·辛格经常接触，因此这一点并不为难，他们会顺着我们的意思的。在大使馆里举行一个仪式，该怎么就怎么，鲜

---

*当时苏驻印大使。

花什么的都应有尽有。既隆重，又庄严。然后再逛逛德里，到亚格拉去瞧瞧泰姬陵，郊区好玩的去处还不少。一月四号恰逢我们的班机，您正好可以按期回到莫斯科——您的批准期是两周……

“当然，我们还要帮您在这儿采购一些东西，这位卡西洛娃同志对所有的商店都熟悉。绝对不能让新闻界披露您的行止。我们不主张您住在迪内希·辛格家里。您知道不，他和前任大使考尔当然对咱们还是友善的，不过您如果住在我们使馆里还是稳妥一些。”

“迪内希和考尔我们哪个都信不过！”那位圆脸的表情泰然，然而斩钉截铁地说。

由于失眠和气候急剧改变，我的头直发晕。我一口未吃，这会儿也顾不上吃。我听到的一切实在使我感到意外，不过我太习惯这些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了……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限期：两周？

“我护照上的印度签证是一个月，”我说。“莫斯科外交部的领事司也是这么给我交待的。我打算过一个月再回去。一月四号这个日子是怎么定的？”

“咳，印度人什么签证都给！”斯米尔诺夫叫起来了，“可是除了签证还有莫斯科的许可，特殊许可哪！您不知道，这是您第一次出国，”他倒是诚心诚意想让我开窍。“给您批的就是两周，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批准，无论是我还是那些印度人，都不能改变这个决定。”

“可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为什么不给我讲清楚呢？有一点您是知道的：那就是我是迪内希·辛格在德里的正式客人，也是苏莱士·辛格在卡拉康卡村的正式客人。您知道我此行的原由和目的：我并不是来参观泰姬陵的。我应该下乡去，应该和他

弟弟一家住一些日子，他们给我写信来着，他们在等我……”

“我和这个国家的选举以及政治生活毫无干系，除了我丈夫最亲近的弟弟和侄女以外，我谁也不想见。我从不打算答记者问，干嘛老对我提这些？”

“我还没见到迪内希和他的家庭，我应该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上卡拉康卡村去，要知道我把从莫斯科到此的行期推后了一个半月是因为迪内希在议会的事情很忙。苏联大使馆举行的任何悼念仪式也代替不了我此行的目的……”

“刚刚听到您说的这些都是白搭！早知如此我何必到这儿来呢……给我说的是一回事，现在我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根本意想不到的事。”

斯米尔诺夫也挺为难：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体谅我的心情。我和他始终不能达成协议，便只好决定第二天再谈，我今天先见见迪内希和考尔。

我双腿发软，心想哪怕睡一小会儿也好。招待所里没有电话，我只好在使馆里用电话和他约定晚上见面。一个陌生的官员坐在桌子旁边，板着脸孔，毫无表情。

白天我也就根本没有睡着，然后就上迪内希·辛格家去了。娜姑比我六四年在莫斯科认得她的时候发胖了。她很亲切，问到叔叔的病情和去世的情况。她六个女儿，小的六岁，大的廿二岁，她们如果不是用一些老式的首饰妆扮起来的话，看来是很现代化的，与当今任何国家的女大学生和女学生都没有区别。

她们对我表现了某种好奇心，可是并不长久，很快就各人干各人的事情去了：罗托*、美国画报、小型日本电视。在陈

---

* 一种玩具，由袋中取出有号码或图画的牌子置于本人手中纸板上的相同号码上，先摆满纸板号码者获胜。

设现代化的宽敞客厅里燃着电光壁炉，三条狗躺在厚厚的地毯上。这个大家庭正在忙自己的事：讨论大女儿行将举行的婚礼和她的嫁妆，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在德里盖一所自己的私邸，因为现住这所有大花园的房子是政府拨给迪内希住的。

全家都在做前程似锦的美梦，因为春天迪内希可望在新内阁里获得外交部长的任命。不久他本人也回家来了，仍是这般亲切可爱，就象两年以前在莫斯科那样。但是他不知道能不能到乡下去，他要想法尽可能下乡……他的全家在两天内走，而他只能在廿五号那天坐飞机去。那时他就可以带我一起走。

我和他谈了大使馆给我设想的那些不近情理的作法。他笑了起来——似乎是同情我，然后说道：

"我认为您最好别和斯米尔诺夫斗气。您要知道，这也不是他自己作主的。要您住在招待所，您就留在那儿好了，到卡拉康卡村时您再和我们一起好了。我相信他们会同意您下乡去的。"

"可是人家说我呆一个月都不行，"我说，"要知道我的签证是为期一个月的！"

迪内希·辛格摆了摆手，就笑起来了，他这个摆手的模样就象他叔叔遇到不愉快的事时把手一挥那个模样。

"签证的问题是我家娜姑的哥哥* 在外交部决定的，"他说，"只要莫斯科同意您多住一些时候，我们会给您延长签证的，多久都行。"

他给我看一些旧的照片，把家庭照片册、彩色幻灯片都拿来了。看来他对我充满了同情和好意。他不希望因为此事产生芥蒂。他一心想当外交部长。对这个前景的响往得益于下面几

* 即迪内希的大舅子。

个方面：他叔叔指引他选择的外交仕途十分亨通，他和尼赫鲁一家以及英迪拉·甘地有多年交情。要是当上了的话，夏天他就会上莫斯科，一定去看我和我的孩子们……

迪内希为人开通、随和。他曾长期担任印度驻伦敦和巴黎使馆的秘书。他早就明白，出身高贵种姓的人并非何时何地都吃得开。这是一个清瘦、城府颇深的外交官，仕途堪称一帆风顺。

那天傍晚我在前大使考尔家进晚餐。他这位外交官完全是另外一付派头。即便在莫斯科时他也敢于口出烦言，故此最受青年一辈欣赏。他有许多俄国朋友——诗人、艺术家、年轻的电影演员。他常到贝拉·阿赫玛杜琳娜和叶夫图申科* 的妻子那里作客；喜欢大学生举行的跳舞晚会，他跳狐步舞和“吉普赛女郎舞”。他常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带到我家来。

这个谈笑风生的克什米尔人会说俄语，喜喝加胡椒的乌克兰烧酒。见到他这样，莫斯科的那些将军们和元帅们可真服了。他顶不高兴的是外交官不得走出离莫斯科四十英里的地方，他本人多次违反这个规定。他和朋友们看头轮新电影，这些电影一般是不让外国人看的；他还把新来乍到的外国人带到彼列杰尔金诺去看帕斯捷尔纳克**的坟墓……现在考尔又为我受到使馆的限制这一点大声表示不满。

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仍劝我不要在卡拉康卡村逗留太久，说那里“没什么好玩”，建议我回到德里，用余下的一周时间和他以及他的孩子们一起乘汽车游览。他可以带我去参观

---

*前者是现代苏联著名女诗人，后者是现代苏联著名诗人。

**苏联作家和诗人，曾因写《日瓦戈医生》一书获诺贝尔奖金，在国内则受到批判。

一些真正值得一看的地方，他说，泰姬陵是光给那些对印度历史一窍不通的游客参观的。

我们一起在无拘无束的家庭气氛中吃了晚饭。菜是考尔的妻子亲自下厨作的。她是一个已不年轻的克什米尔妇女，风韵犹存，皮肤特别白，脸部轮廓完全是欧洲型的。在座的还有他的儿子，刚从英国某一大学毕业；他的女儿，曾在莫斯科进修过俄语，一心想考进莫斯科大学。考尔九十高龄的老父是一家之主，这是一个腰板还挺硬朗的老汉，目光锐利而狡黠。刚吃完饭他就抽起雪茄来，考尔把他叫做“淘气的小男孩”！然后老汉就坐在壁炉旁的地毯上，一心读他的“薄伽梵歌”。

我们坐的那个客厅里只有老头一个人显得幸福和泰然自若。普丽蒂想到莫斯科去，她爱俄罗斯到了着迷的地步，不愿嫁给她父母给她选择的对象。儿子用英文写诗，梦想文学生涯，而不是去干他父亲想要他干的外交差事，也不想娶他母亲给他挑的姑娘为妻。父母心里也明白，和子女斗没有用处。母亲对孩子们和考尔都有气，不停地口出怨言。考尔抱怨说，在这个“素食主义的国家，没处喝酒，简直把人憋死”，他说，他还想到哪个国家去当大使。当我把莫斯科他朋友们送的伏特加酒给他时，他简直喜出望外！

考尔对回国后看到的一切十分不满——到处是贪污受贿，一片破落潦倒的景象。此人曾在中国和苏联担任过大使，行事素来讲究气魄，敢作敢当。现在他说，他想念莫斯科……

这儿谁都顾不上我，顾不上我的烦心事。考尔认为我两周以后只能返回莫斯科，别无他法。他顺便把大伙都数落了一顿——这其中也包括迪内希·辛格，说他谈论社会主义是言不由衷，其实他拉拢的人全是些王公和大君，说他这次可能落选。这天晚上我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我的意外发现是：

敢情我的印度“朋友们”没有一个有相助之意。

第二天，再次和斯米尔诺夫谈话。我们现在吵开了，讨价还价。他们对我让步了："好吧，下乡去吧，不过得和卡西洛娃一道，而且只能住一个礼拜；之后可以和考尔坐汽车游览。不过一月四号你得坐飞机回国。”（班机一周只有一次。）这可又是别出心裁：干嘛和卡西洛娃一道去呢？在莫斯科时告诉我说，卡西洛娃在德里等我，只在坐飞机时陪我一道。她到村子里去好干些什么呢？和一面未谋的、别人的亲戚她有什么好说的呢？

“没关系，别着急，”斯米尔诺夫说，“这个国家她很熟悉，她曾陪同瓦莲金娜·切列什柯娃* 访问过印度。她知道该干些什么，注意些什么。”

想解释一下我的此行与第一位女宇航员的游历情况大不一样，却等于白说。我肺都象要气炸了似的，真想说我不到乡下去了。可是有一个悄悄的声音叫我制怒。要知道我去是为了亲自走到恒河边；他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去总是要去的……

我忍住气，答应了。斯米尔诺夫乐开了花。我们讲妥十二月廿五日我和迪内希一起飞到勒克瑙。和考尔坐汽车游览的计划我只好放弃——在村里呆上个把星期我就回来。

斯米尔诺夫今天更是烦躁。看来他们格外不想放我到乡下去——到那个远离德里的偏远地区，既无电话，又无苏方代表。

这些无理的争论把我弄得疲惫不堪，我知道，我整个人都取决于莫斯科变幻莫测的情绪，因此我一开口就很难心平气和了。

---

*苏联第一个女宇航员。

莫斯科的这些变幻多端的情绪哟！你们一会儿由黑转到白，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从勇敢转为恐惧，从友谊转为责怪，从珍爱到仇恨，从首肯的“是”变为置人于死地的“否”。这些从解冻到严寒之间的来回摇摆，这些变幻莫测，是和他们自己制定的一切法律和准则相左的！不幸的国家，不幸的人民啊！他们获得的不是答应给他们的自由，而是比皇帝的喜怒无常还要糟糕的变幻莫测，而整个国家的生命不得不取决于这些……

我都没有注意到我是怎么来到大街上的。我在毒日头下面信步走着，没有明确方向。我脑袋里嗡嗡的，心里发痛，这是因为近几个月、这些天来我是太累了。啊，你们大家，我恨死你们大家了！我不是想到，而是整个身心感觉到这一点，我信步走去，毫无目的，仅仅是为了走走而已。这会儿要我和卡西洛娃坐在一间房子里，我简直无法忍受。

我在人行道上走着。右边是林荫道，左边是一些什么建筑物之类。这里是篱笆和大门，小小的一群人，人行道上坐着“弄蛇者”，他们前面的篮子里盛着眼镜蛇。我没有停下来看，转到一个街口，绕过一个不高的建筑物前面的篱笆，那里有宽宽的阶梯。进口的地方有一棵很大的圣诞树——这就是美国大使馆，我看到建筑物正面的国徽。他们快过圣诞节了，我们只有过新年时才有这树，那里面过得多么欢乐，还有给小孩的礼物……全世界都在过着正常的、共同的生活，唯独我们这些丑东西，什么都怕。“挑衅”——能有什么挑衅？“法西斯的威胁”——这儿哪里有什么法西斯？还是拿廿年以前的老框框来套，真蠢！我真恨死了这些官僚主义者！监狱的禁子们，你们真不让人们正常生活，喘口气都不行啊！

一个围白色印度腰布、黑皮肤的人，头顶一篮糖果向我微

笑。我素来不喜欢甜食，可是他的微笑突然给我一种安慰，我就买了蜜饯胡桃，甜甜的粘糊糊的一块东西立刻吃到嘴里了。我给他付了太多的钱，因为我还搞不清卢比的计算法，不过没关系，让他也高兴高兴好了！卡西洛娃早就警告我不要买街上的任何东西，说“到处是苍蝇和细菌”，咳，你们都算了吧！你们轻视这个国家，可是我爱她！你们什么都怕，可是我喜欢这些充满阳光的空气，就象甘甜的蜂蜜一样：多么温暖！多么温柔的轻风啊！红色的攀援植物的花开得多么绚丽啊！

我沿着胡同朝前走，然后再往回走，我毕竟不认得德里的街道呀。往回走的时候我的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我再次经过美国大使馆的门口，朝它仔细打量了一下。我想都没有想，我日后有可能进到这里面来……我只注意到，房子挺漂亮，几乎和苏联大使馆紧靠着，离我要回去的招待所也不远。

这就是我在印度的最初的一昼夜，是相当激烈的一昼夜。下一步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好委曲求全，完成自己的任务，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我走进自己的招待所房间，卡西洛娃已经在桌上摆上了莫斯科糕点，煮好了茶。她也满肚子不高兴。她想留在德里并且采购点东西，根本不想下乡。她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慰我，告诉我说，她回到莫斯科“一定向领导报告，说这次出国一开始就没搞好”。

• • •

下面三天就是普丽蒂·考尔领着我参观德里。她熟练地驾驶着她爸爸的那辆红色的“梅塞德斯”牌汽车——这辆车在莫斯科时我就见过了——在人力车和自行车中间绕来绕去。这些车辆——包括行人——都泰然处之，毫不在意，不过有一点我很奇怪，在这个无人指挥的车流里居然谁也没把谁压死。天气暖和而晴朗，我们时而坐在公园的草坪上，时而漫步在红

堡*，我们去参观了离现今德里不远的伊斯兰古都博物馆。和这位如醉如狂地爱上了俄国一切的可爱的姑娘在一起，我心里觉得轻松和舒坦。卡西洛娃把我“托付”给她了，因此自己没有来。

这些日子以来我对德里已有了初步印象，这种“对印度的初步感受”在日后一段时期里也一直未曾改变。四处是代表各种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不同影响的形形色色的东西……身穿着纱丽的、美丽的印度教妇女驾驶着最新型汽车，就象普丽蒂那个样子。一个“瑜珈”脑袋朝地在公园里面倒立着。要饭的孩子在红堡的小铺子周围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们吃冰淇淋的那个阿贝鲁伊大饭店里布置得象欧洲饭店那样讲究和方便。德里老城的街道上到处是乞丐和半裸体的人，就象蚂蚁窝一样。几十个小小的店铺象个蜂窠，这里人们嗡嗡地成群结伙。离此不远就是多层的百货公司，街上到处是美国电影的广告：《日瓦戈医生》，《音乐之声》，侦探片……年轻人和欧洲人的穿着打扮一个样，年长的人则穿宽松裤和一种穿在裤子上面的白色长衬衫，或者黑上衣。印度女子穿纱丽，年轻一点的妇女或女学生穿连衫裙，下面是灯笼裤或是楚力打。穿欧洲式连衫裙的只有西方妇女，西方女子在这里有不少。

德里周围的道路都种着悦目的老树：枝叶婆娑，浓荫匝地。在粗大多节的树根上坐着猴子，它们正给自己的幼仔捉跳蚤。奇怪的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始终抓住我……这些树，这些猴子，这些小铺子我都见过……这一切我都知道……是从电影中知道的吗？从故事中知道的吗？

来到商店里，我看得眼花缭乱，头昏目眩——那么鲜艳而

* 德里的市区之一，因莫卧儿王朝旧宫殿得名。

又不重样的纱丽，克什米尔〔或译开司米〕披肩，凉鞋，手镯，不过我还是省着我那在莫斯科用一百卢布换来的美金，我想用来买礼品，送给乡下的亲戚，然后给我的孩子们买些东西。

我再次在考尔家吃晚饭和早饭。比起迪内希家，这里气氛自由一些，亲切一些，虽然按道理说我应该归迪内希的家庭接待。不过那些王公贵族——娜姑的兄弟姐妹们，马上使我和普丽蒂在一次访问中感到，我们是低级种姓。美丽活泼的普丽蒂在他们面前一下子就蔫了，不吭声了，她知道这个差别。我也觉得挺不自在。

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贵族在自己和其它人中间所设置的无形的藩篱。这些王公贵族当着我们的面有说有笑，旁若无人，就象这间屋子里只有家具存在似的。这并不是无礼，他们只不过让你感到这里没有你们这些人，或是你们这些人就象地毯上躺着的三条狗，谁也不拿它们当回事。为了表示礼貌，六位姑娘有时也问我个把问题，这也无异于摸摸一只狗……

和考尔一家人在一起是愉快的，无拘无束的。他的妻子一年到头腰上挂着一串钥匙，什么也不打听，就只骂骂孩子，然后回到自己屋里祈祷。她的耳朵眼里穿着用长长的红丝线挂起的沉甸甸的耳环。她没有陪考尔一起出国，一直住在印度，过着她老式的印度教妇女的生活：外面的世界对她是陌生的和乏味的。老头子在壁炉旁边取暖，坐在地毯上，总是亲切地对我微笑着。

考尔对我说："您的手稿在我这里放在很稳妥的地方。普丽蒂给我念了头几页。"

"好的，"我有点漫不经心地说道。我根本不需要这些手稿，我想都没有想过要取走它。我现在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我想到的只有一点：不节外生枝、突然变卦，让我能到达乡下就

是万幸。

可是，突然变卦的事并不劳人久候。

* * *

十二月廿五日我和卡西洛娃清晨六时就起了床，为了去迎迪内希并和他一起上飞机场。可是我们白白地在约定的使馆区大门口等他好久，他却没有来。我心里挺纳闷，只好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打电话也不知往哪儿打！最后苏洛夫坐着汽车赶来了，建议乘他的汽车到机场去，也许迪内希在那里等我们。我们于是上了机场，可是还是不见迪内希，而去勒克瑙的班机，据说已经改期，下面该怎么办谁也说不上。

我对苏洛夫说："请把我送到提亚格拉查·马尔格的迪内希家，我想当面搞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

苏洛夫不知如何办是好，有点着慌。

"请开车走吧！"我坚持要去，于是我们便掉转车头回城里了。在半路上我们碰到了全速前进的飞车——斯米尔诺夫的小轿车。两辆车都在路上停下来了。斯米尔诺夫和苏洛夫商量了一会儿，然后斯米尔诺夫走到我跟前说：

"刚才迪内希的秘书打电话来说，他今天去不成勒克瑙了。我想，您这会儿最好还是回招待所去，我们一会儿再打电话和迪内希联系。"

"不，我现在就上他那儿去！"我说道。"我的招待所没有电话，这非常不方便，我自己去当面问清楚。"

这是早晨八点钟。对于印度教徒来说，这会儿已经不早了。迪内希穿了一件讲究的欧式晨衣，把我带到了他的书房。

"和我一起吃早饭吗？"他问道。"刚才列娃* 来过，您

*迪内希的长女。

可以和她一起坐十二点的班机走。其余的人都是坐火车到卡拉康卡村去，可是我去不了啦。一个钟头以后我一定得到总理那儿去，晚上必须飞往锡金。我当时没法通知您，我们给大使馆打电话，可是那儿也没有人。我只好又给斯米尔诺夫家里打电话。您别着急，您今天能到卡拉康卡村的。”

他说话的口气很温和，想冲淡我的不快。可是他倒底设法摆脱了亲自下乡这桩差事。怪不得他叔叔劝他搞外交呢！

今天早上迪内希分外殷勤：“在这儿呆着吧，好好歇歇，坐我的车和列娃一道上机场，我会告诉斯米尔诺夫，让卡西洛娃在飞机旁边等着。他们倒底还是把她塞给您了，是吧？”他哑然失笑了。“不要紧，有人在勒克瑙接您，您可以在那儿用点点心，从那儿还要坐三小时汽车才能到卡拉康卡村。”

他真是关心备至：可能是因为让我在莫斯科等了他一个半月，而他还是不能陪我去乡下；还有我今天提着这个装骨灰盒的提包白白跑了一个早晨等这些情况，使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吧……

早饭他吃了炒鸡蛋和吐司，完全是英国式的，然后就换上了尼赫鲁服。他对我说：“我现在上总理那儿去。她知道您在这儿，并向您表示同情。您要不要我现在带您去见她呢？”

“不必了，现在不是时候，我没有准备作这样一次会见，”我说道，一边对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有些不知所措，忽然我受内心深处某种冲动的指使，冒了一句：“迪内希，请告诉她，我想留在印度，这——这可能吗？”

迪内希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走吧，和我一起走，”他说，“我现在打电话告诉她，我将带您去见她。”

“别，可别！现在，今天可不行。可是您可以在总理面前替我说句话吗？”

“可以，”他说，“可以的。我很快要上卡拉康卡村去，要知道那是我的选区，总理的选区就在紧邻。我们可以在那里会面。”于是他就走了，用一种意想不到的善良的、让人放心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我走到为客人准备的房间里，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我说了什么啦？我请求什么来着？我怎么会脱口而出呢？说了这句话以后，我忽然感到一身轻快。是的，我情愿留下。是的，我情愿这样——不回去了，不回到过去。这一点是我想到的。叫我怎么都行，就只别回到柯西金和苏斯洛夫之流的可怕的世界中去。

我累极了，我没有力量再思考判断这些了。我们马上要飞走了，我在农村可以呆一周，只有一周，看一看，可能还想得出一点办法……用半个钟头小睡一阵，但愿今天能到达恒河之滨。我再也受不了这些可憎的人了！再也受不了了……

恒河两岸

小小的飞机飞在灌满了水的、四四方方的田块上面：不久以前这里曾下过雨。阴郁的、长鼻子的列娃一言不发。她心里想的是即将和一个十分富有、出身望族的青年男子结婚，这个人她总共只见过一面。也许还在想，人家将给她的婚礼送些什么样的绿宝石和红宝石呀。我和她谈不拢，各人在想各人的心事。

后来我们就在尘雾蔽天的农村道路上坐了三小时的汽车。随着我旅途终点的接近，那种奇怪的不安感觉就越来越揪住我不放。这个焦枯的平原和它那稀稀拉拉的圆鼓溜秋的树怎么这样眼熟？我曾在哪里见过这条满是尘土的大路呢？

我们正在距德里六百英里的地方，来到一个穷乡僻壤。四周的人我谁都不认识，现在正到一个陌生的家庭去，可是此刻在我感觉上倒好象我正在回家的途中。我把那只手提袋紧紧按在身边。勃拉哲士·辛格，这回你回家了，你该高兴了吧?!你的灵魂也高兴，我们象长了翅膀一样向前飞，别看慢，快了，就快到了。

……我们转到一条岔道。四处是干旱无水的田地。树木的绿荫由于灰尘而变得黯淡。小小的农村街道也就是大路。抱着孩子的妇女、男人们都走到街上来了，他们都在等待着我们，跟着我们的汽车走。汽车缓缓地从人群穿过，一直开到一所大的白房子门口。房子背面靠着阳光照耀下的一泓静水。

多少人啊！不管你往哪儿瞧都是人，看样子还有从邻村来的。勃拉哲士，你瞧，他们是来迎接你，也是来向你送别的。

在这里，我终于看到善意的人的脸，人的眼睛和泪水……

车停了下来，我们一下子就被围住了。两个赤脚穿白上衣的男人终于从我手中接过我最珍贵的手提袋——勃拉哲士，这一位是你弟弟，现在你到家了。这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弟媳妇普拉卡施瓦提——还有你最心爱的侄女达都，这是你另一个侄子西利什，一个穿白衬衣的年轻的胖子，他不是王公也不是部长，他满脸是泪。我把你交付到好人的手里了，我现在放心了。

想休息一下是作不到的：所有这些人都集合在这里，已经等了几个小时。男人们都登上小船，打算开到河中间去；女人们则不可以去。我们留在房子前面的大游廊上，娜姑和她的六个女儿也站在那里。

我们看着恒河的沙岸，葬礼的行列正向那边走去。岸上都站满了人，小男孩们跑着，扬起了沙尘。葬礼的行列朝下游走去，离我们越来越远，走到停船的深水地方去。永别了，勃拉哲士！永别了。

我忽然痛哭起来，全身发抖，不能自已。有一个人把手放在我肩上，递给我一方手帕——这是普拉卡施瓦提，她一直搂着我，站在我旁边。我们久久地站在游廊上，一直等船泛到中游，看到舟中人大家起立默哀为止。

从我们站的游廊上，我们可以顺着河身望过去，远处河弯隐约可见。沙岸和河中浅滩也历历在目……然后我们看到，船只缓缓掉头，朝岸边划来……

普拉卡施说："他们扔了许多鲜花在河里，花朵将长久地顺着河流向下游飘去。您看，孩子们顺着河岸跑着，追着看那些鲜花。他们总是这么干的。"

游廊上的人慢慢散去，我再也离不开高大、体态匀称的普拉卡施。

“多少朋友要从勒克瑙和阿拉哈巴德到这里来，”她说，一边叹着气，“但是这两个月都不知道您要来。今天迪内希忽然从德里通知我们说您来了，我们这才赶紧通知周围的人。要知道勃拉哲士在这里的每个村子都受到爱戴，您瞧，来了多少人！我们今天一直在等，又怕您来不了。城里的人我们没来得及通知，他们可要见怪我们了！”

“怎么？难道早些时候没有通知你们吗？这是迪内希要求我等一些时候再离开莫斯科的呀。他早就知道我大约十二月廿日左右到这里，是他自己指定在今天，可是临到末了他有事，今天不能来，我想您早知道了，朋友们也早知道了……请您相信我，这件事决不能怪我！”我说道，同时觉得十分羞愧。我明白了这是谁的过错：决定不让我下乡来，但又不通知辛格的兄弟，怕这些事泄露给朋友们，以期严守伟大的“国家机密”。当然，迪内希对苏联政府也是从旁出力、加以协助的。

普拉卡施叹着气说：“我知道这事不怨你！看到你我们是多么高兴啊。走吧，一块儿上我家去吧，一会儿都会回来上咱们这儿来的。这里是王公府，王公的官邸。村里的人都怕娜姑，可都愿上我们家里来。”

他们把我安置在小房间内一张床上，这个房间是勃拉哲士从伦敦回来后最近几年住过的。本来这所房子都归他所有，后来他把它送给自己的兄弟了。来的人都是些普普通通的穷人，他们盘腿坐在地板上。苏莱士和他的儿子也回来了，仍然满面泪痕。每个人都和我谈到勃拉哲士·辛格生前的一些事，谈到他的为人，他如何帮助农民，如何乐善好施，济人危难，给人家出主意，等等。

谈话用的是印地文，有人给我翻译。大家问及他的病，谁也不能置信是他的心脏出了毛病，他离开这里的时候还挺精神

嘛！

纳嘎医生也来了，他在当地的一个小医院里工作了四十年，我是听人家说起才知道这个人的。奇怪，我对卡拉康卡村竟了如指掌！勃拉哲士给我详详细细谈了每个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现在我更是深信不疑了。在德里尝到了五天的欺骗和紧张的滋味以后，现在我的心中感到多么甜蜜！这里的人都在盼我来。怪不得我这么渴盼着要来到这些可爱的人们身边。

“现在这是您的房间，您愿意多会来就多会来，您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他们对我说。

傍晚我们一起到王公府吃晚饭。在这所四面是厚石墙、象一座白色城堡的大房子里，人们给我和卡西洛娃都安排了住房。这所房子是一个名叫兰帕尔·辛格的王公在上世纪末盖的，他本人在英国过了大半辈子。然后带回一个英国妻子。这是先人辈中最不凡的一位；他老穿西服，第一次创办了一家印地文的地方报，开了一条灌溉全区的大运河。房子里还保留着他晨起锻练身体的大哑铃。

娜姑象卡拉康卡村最好的导游，不停地说着，我和卡西洛娃就象旅游者坐着听她说。无疑这里有值得娜姑自傲之处，可是在这所巨厦中，勃拉哲士·辛格早已为人遗忘。

然后我再一次走到游廊上，久久坐在那里，我无法把我的眼光从庄严、平静的河面移开。

天黑了，蝉声鸣唱。大而亮的星辰一个接着一个亮了。高大的老桉树发出轻轻的沙沙声。之后就是夜禽的啁啾——它们的叫声有如海鸥，从河上飞掠而过。远处河对岸小小村落的灯火闪烁着。四周是如此安宁和恬静，经过今天手忙脚乱的早晨和劳顿的一天以后，对这一切简直难以置信。

我内心一切都稳定下来，安静了。夜晚是温暖的。一个人坐得越久，我就愈加清楚地意识到，一周以后我决不回德里。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和我的大使馆斗。在这条河流旁我觉得自己镇定、有力、立于不败之地。是的，我要留下来，我有到一月廿日的印度签证，我什么法也不犯。到时候再看下一步如何走……

一阵微凉，我走进这所象城堡一样的白色房子里去歇息。

* * *

第二天一早起，我就给斯米尔诺夫和别涅季克托夫写了一封信，我通知他们，我要在村子里待到一月十八号才走，因为我的护照里有为期一月的印度签证，我说卡西洛娃爱什么时候回莫斯科，就什么时候回，如果迪内希一家离开的话，我可以作为苏莱士·辛格的客人留在村子里。

往下凡是我想到的、有关苏联大使馆对印度国内的私人生活施加的不能容忍的压力我全写了。我写道，曾在私人信里邀请我访问德里的迪内希，被迫取消他的邀请；我写道，由于不许我下乡，他也就无法通知我丈夫的兄弟我到达的日期。因此一切都瞒着亲属和密友，不过好在他们都能谅解，这决不是我的本意。我写道，这样做并不能给我的国家以及它的使馆增添光彩，我为他们感到羞耻。

然后我把这封信交给卡西洛娃，请她转交大使，我向她说明我写了些什么，请她上德里去，然后回莫斯科。

卡西洛娃简直吓坏了。然后她就开导我，怜惜我，最后是生气了，大发脾气了。可是我坚持己见——我是按照印度签证规定的日期留在这里的。这是我的合法权利。她没有法子，只好走。娜姑给她订了一张从勒克瑙到德里的机票，和六个女儿一道，暗中窃笑着，把卡西洛娃送到吉普车旁。

我留在村子里，沉浸在印度生活中，就象泡在温暖芳香的浴盆里，每一分钟都是莫大的享受。卡拉康卡村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我过去的生活，这现在对于我就象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在德里的这些日子和在莫斯科的近几个月使我疲惫不堪。这种疲劳也归咎于最近三年的熬煎，归咎于四十年来我的不正常的双重生活。我感到我的内心已走到一个极限，到一定时候就会发生深刻的内部转折。

我还没有能作出明确和清晰的抉择。我只希望按另一种方式生活。我不知道能不能留在印度，虽然我希望如此。我自己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我怎样才会在这里生活下去。我等着迪内希来，盼着与英迪拉·甘地可能的会晤，这里村子里的人都期待她可望于一月中旬前来此。我一连几个钟头地坐着，眼睛望着恒河，我只有一个念头：这种静谧和河上吹来的清风对我来说是多么需要。

卡拉康卡村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和谐的。辛格同我说过，这里有两个家族、两种制度一直尖锐地冲突，多年来始终对抗。这就毒化了这个美丽非凡的地球上的世外桃源。幸好关于这一点我已早有所知。

王公府是归迪内希和他的家庭所有，外观象一艘停泊的大白轮船。从它的平屋顶上——相当于轮船的上层甲板——恒河的波光水影和周围的景色可以一览无遗，尽收眼底，气象之壮观使人为之倾倒。水涨时分可以漫过这座房子的地下室，与游廊的底边齐。兰帕尔王公是知道该怎么挑选房子的地址的，房子的地基是三面环水的岩石架。可是这座有大藏书室的房子却相当阴冷。一方面是肤浅的欧化情调——女孩子们短发、使用隐形眼镜、英国式早餐和美国杂志；另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优越感，那种意识到自己是属于高级种姓的优越感。

每一个人进入这所房子之后就会感到它的贵族式的疏远气氛。甚至迪内希的妹妹达都，由于当初违反种姓法规恋爱结婚，结果被革出家门，不仅受人轻视，连财产权也遭剥夺。许多年来她一直不得进入王公府，她出生的地方。现在她在此作客，由于我的关系，人家对她不得不客气一些，普拉卡施告诉我，达都觉得十分幸福。

小个子，滚圆身材象皮球一样的达都在游廊上和那些女孩子们一起，一天说到晚没个完。勃拉哲士很爱她，尽可能地帮助她，还从莫斯科寄钱接济她，是她在这个家庭里的保护者。可是对于多少年来的传统，辛格本人也无力反对，因为在印度它们仍然胜似法律：达都就是拿不到她母亲的、现已由迪内希存在银行的珍宝首饰。她有一双含怨的大眼睛和温良的微笑；她很象自己的叔叔。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她晚上来到我屋子里，坐在我的床边上和我象老熟人一样聊起来。

达都显然感到自己在这里是一个穷亲戚，我也有同感。别的来访者——亲戚、邻居、村里的客人也觉得挺不自在。每当他们来看娜姑时，她照例和那些女孩子们端坐在客厅里沙发榻上，织着毛线。只有在家族的年老妇女前面娜姑才收敛一些：她从沙发榻上站起来，走到长者面前深深鞠躬，把双手触额然后触老年人脚旁的地面。然后她再坐到沙发榻上，继续谈天说地，旁若无人。为了表示尊敬，客人进屋时光着双脚，把鞋脱在门口。

王公府门禁森严这一点由于一个健壮的旁遮普人把门而显得特别突出。他手执一长木柄矛，矛头是钢打的。他总是把门闩着，以他的矛威胁村里的饿狗。说实在的，除了狗以外，村里的人谁也不到这个门口来。

苏莱士一家住的那所房子的大门总是大开的。这是一所经

过翻建的老房子，围墙上爬满了开花的藤蔓，外观很象现代的别墅。这所房子曾经十分漂亮，受到精心照管，现在还能依稀看出两兄弟当年过着富有的地主生活的、盛极一时的痕迹。印度独立和土地改革留给他们的是一处不大的田庄，一个大芒果园，以及世家的赫赫声名，如是而已。

现在这所房子早已由勃拉哲士给了自己的兄弟。它已荒废近半，大部分变成了仓库。窗户朝恒河开的那一半房子，仍然住人，相当舒服。不过从各方面可以感到，屋主人已是家道中落，生计无着，对一切只有摆摆手的份儿了。陈设着简单欧式家具的房间里，摆了许多英文书，圣雄甘地的照片，以及一位现代印度画家的水彩画。客厅里的石头地面上铺了一块破地毯，地毯上照例坐着村长，带着打字机的文书，拖儿带女的妇女和许多其它来访者。纳嘎医生、学院校长和本地教师以及城里来的客人就坐在沙发上。

苏莱士·辛格是个受过教育的自由派地主，在卡拉康卡村过着隐居的生活。他和他哥哥都毕业于名牌的勒克瑙学院并且专心致志于争取独立的斗争，正象印度其它的优秀人物一样。当印度获得独立以后，苏莱士多年一直担任本地——北方邦——的立法议会的议员。

他为自己消遣计用印地文写点农村题材的幽默小故事；他写过一本关于印度鸟类和植物的青少年读物，并曾因此获得国家奖。他喜爱植物，自己的小花园里收集了不少，并不断考察它们。苏莱士是一个沉默寡言、一团和气的人。他待人极其和睦，但不善经营，无论是他管理的田庄，还是进益，他都无甚可夸耀之处。他一半精力都用在和自己的亲侄子斗争上——这是财产之争，野心之争。

原来，根据传统凡在一个印度家庭中，王公的封号、他的

房屋、财产和社会地位只能由长子继承，就是他的亲兄弟也没有资格和他平起平坐。

千百年形成的种姓制度的传统，决不能在短短的廿年* 期间消失殆尽，何况又是在这个穷乡僻壤？在卡拉康卡村，四十岁的迪内希成了王公和这个小小的王国的实际上的统治者。这里是他的选区，周围的农民除了自己王公外，决不敢把别人选到中央议会里面去。迪内希同时也是家族托拉斯的头子，这个托拉斯资助了卡拉康卡两所学院、一家医院、几所庙宇、一所梵文学校，总之，地方上的各项义举。

迪内希两个叔叔受到的敬爱远不止在卡拉康卡村一地。可是比起这位王公侄少爷来，他们是既无权，又无势。这种情况在东方诸国是司空见惯的，可是对西方头脑它却实在难以接受。

勃拉哲士·辛格充当的是和事佬角色。在青年时代他毅然决然地和自己家族的传统和种姓家规决裂。后来他就成了共产党员。不过他内心想的总是与至亲为善，成全别人——这是一切印度宗教的戒律之一。由于他一辈子始终不渝地恪守这个戒律，故此到头来落得两袖清风，无房、无地，无一切他这个阶级视为常例的生存手段。这样，他就卖掉仅有的东西，带着老婆和儿子上了伦敦。过了几年，当他又回到印度来以后，他不得不请求兄弟在过去原属于他的房子里拨给他一间小屋聊以栖身，此时他经常是不名一文。最近几年他的兴趣是在给周围的人出主意、帮忙，所以人家都敬爱他，他给兄弟撑腰，给受气的人打抱不平——没有家庭地位的达都就是头一个，他自然就成了王公的眼中钉。他常对我说，卡拉康卡村的生活十分艰难，这也是每个印度大家庭必然会遇到的情况。现在我看到了，他

* 指印度取得独立的1947年至作者写此书时谈到的1966年。

说得多么对。

勃拉哲士住过的那间房子旁边是一个小小的游廊，正对着恒河的沙岸，一排浓密的暗绿色的阿育王树给它遮荫。游廊的一端长着三米来高的仙人掌，大石板缝里长出了青草。这里非常安静，我常一连几个钟头坐在这里，看着恒河在昼夜不同时辰里的变化。我觉得，正是在这里我才到了地球上的蓬莱仙岛——我的内心如此自在、安宁。这种意想不到、又似乎吹弹得破、转瞬即逝的极乐境界使我不由得每分钟都细加领略，就象饮着甜蜜的甘露一般。

两座房子之间是一块不大的空地，上面有一座印度教的老庙，里面满是各种各样的彩色神象，在印度教神话里面，神是挺多的。每天我得在庙和一个棚子间穿行，几乎是露天棚下——住着个九十岁驼了背的恰克拉潘迪特〔学者〕、他的妻子和小孙女。这个小女孩每次见到都对我喊“那玛斯切”〔弓身合掌致敬〕。我也只能停住脚步对每个人都说“那玛斯切”。

很快人家就问我，我是怎样看待——借用基督教的术语——亡人“安魂礼拜”的。不过这倒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你相信灵魂的不朽，你就会祈求它的平安和安宁，这在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样的。我向亲属们建议，他们自己决定该为亡人做什么，尽管去做好了。这一点不大好办，因为迪内希和苏莱士分属于印度教两个不同的流派。

开始，娜姑在正统的印度教庙里安排了一次仪式。恰克拉潘迪特（勃拉哲士把他叫作“滑头和骗子”）握着铃铛，绕行小庙数圈，点起了腊烛，洒了“圣水”，水是从恒河取来的，然后长久地拨弄着念珠，嘴里喃喃念着祷词。仪式特别长，就象没个完似的。我穿着白色纱丽，盘坐的双脚都发麻了，我点了灯盏，该干什么我都干了。

第二天早晨，苏莱士稍微有点激动地和我说，勃拉哲士、他本人和他的一家都属于雅利安协会，即印度教的新教派，以吠陀教为基础，这种教派不承认多神、庙宇、多尊神象和长仪式。现在他们都想按照各自的方式为死者超度。我同意了，因为我对什么都感兴趣。来了另外一位潘迪特，这一位挺招人喜欢；他器宇不凡，举行超度时唯一的仪式是在露天底下生一堆火。向火堆里扔芳香的树脂，读梵文祈祷文。这种仪式较为简单、美观，容易理解。印度教的安魂祈祷文我觉得早已背熟："愿汝之灵安息……"。

两种仪式的唯一共同点是都必须给婆罗门僧侣及其徒弟以钱财作为报酬。他们盘腿坐着，嘴里念念有词。

普拉卡施向我介绍了此地生活的规矩。娜姑虽说是名为卡拉康卡村的王妃，但她对这个大村庄的生活却不大感兴趣。可是普拉卡施却是本地公认的精神领袖。

一大早普拉卡施就坐在靠近门口的小游廊上，在太阳底下眯缝着眼，讨论一些管理方面的事务。村庄离此仅一砖墙之隔：从那里传来了梵文学校学生单调的唱歌声——原来他们在背祈祷文。早晨，凡是想和普拉卡施谈话的人，一下子都来了。她给妇女出点子，施药，又是"计划生育"最权威的宣传者。她还给各家排难解纷，解释有关选举事宜。

大选前，村子里议论纷纷，谈的都是政治斗争，卡拉康卡村的人对此可说是关心备至。迪内希属于当权的国大党，苏莱士也是，不过后者特别同情在本邦有相当影响的社会党人。普拉卡施则更倾向于年轻的亲资本主义的自由党。她和她丈夫都暗中希望迪内希落选，但为了维持家庭的面子，他们二人都为迪内希竞选。普拉卡施常坐吉普到邻村去，召集群众会议，和妇女谈话。这种事娜姑根本不干，她一心只想上贝拿勒斯去为

列娃采购结婚纱丽，然后回德里去。

有一天正当我和普拉卡施坐在小游廊上，我看见两个年轻人——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穿西式服装、凉鞋和衬衫，他们向着房子走过来，普拉卡施用印地语和儿子嘀咕了一句什么，他就把那两个人引开了。

“这是什么人？”我问道。

“这是和平队的美国人，”普拉卡施有点窘，解释道。“他们都是些好小伙子，在我们农业中心干得挺欢。他们十分年轻，在这里也是举目无亲。我常常叫他们来喝茶，他们是来找西利什的。可迪内希却说他们是‘美国间谍’，叫我不要让他挨近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已经来熟了。那个名叫米勒的黑人说，他到我们这里就象回到了家一样。他们也知道一点印地文。”

“留下他们吧，瞧这事弄得多不好！”我说，又一次替我们大使馆感到脸红。“难道他们知道我是哪儿来的吗？”

“他们啥事都不打听，”普拉卡施把手一挥。“真是些挺可爱的小伙子，整天干活，还教农民，可是我们的农民，你要叫他干活可不容易。不论怎么干，临到末了还是靠天吃饭。”

和普拉卡施在一起是多么好、多么有意思啊！我太讨厌那些高官们、部长们和总理们、大使们和贵族们、各民族和个别人命运的主宰者们了……当我挨着普拉卡施，坐在她当饭桌用的石板地上一张小席子上面时，我简直乐而忘忧。她坐在这里切菜、在煤油炉上烧着美味无比的菜——扁豆、土豆、葱、蕃茄、菜花等所谓“冬季菜”。夏天则有芒果、番木瓜等夏季水果。

住宅旁边的小菜园简直是一处小小的绿洲。它由井水灌溉，就和那个小花园一样。每天早上我和普拉卡施一起上那儿

去采撷鲜花。木犀草、紫罗兰、豌豆都是间月一开花。有多少我不认得的植物在我周围生长、开花！

* * *

我从小在大自然中长大，对于四周绿色世界一岁一枯荣的现象早已习以为常。树木和花卉对于我常常比人还更意味深长。它们常常帮助我，安慰我，向我的心灵再次证实：世界是美好的、理性的，人类失去理智的愚蠢和残忍是逆大自然和理智的自然规律而行的，在这个地球上，暴力迟早要彻底失败。书上印的字都绝不会比树叶、浮云、水面涟漪、雨滴的话语更能打动我。我从小就熟悉这种语言，并且对它已经习惯。因此，现在当我从莫斯科的严寒一下子来到印度的温暖气候中的时候，我如饥似渴地聆听着这种语言，象以前一样，大自然和我说了很多、很多。

在印度乡村里，我以不寻常的方式迎来了一九六七年的元旦。十二月卅一日对于印度人是不知不觉过去的，因为在乡下还是使用印度教的历书。因此我只得早早就睡了。不过我总是还想用什么方式纪念一下新年来临，因为在莫斯科，我多少年来都是在家里和孩子们以及几个最亲近的朋友一起迎接新年的。因此，我离开王公府，在勃拉哲士曾住过的那间小房间里度过了年夜。

这房里有一套白色旧家具，可能是上世纪那位古怪爷爷和妻子一块从英国运来的。一张老式木床摆在朝河的窗子旁边。

我躺了很久，毫无睡意，眼睛望着在月亮下闪闪发光的沙岸，我在想象莫斯科近郊的雪堆和新年期间刺骨的严寒。除夕夜晚如果到茹科夫卡去多好，在月光底下银妆素裹的树林里散步……

我窗下就是石板铺的游廊，然后是一行象树一样高大的仙人掌，再往后是沙岸，最后就是离我不过百米之遥的恒河了。它如油的水面异常平静。天气微凉，万籁无声，只有蝉的鸣叫：背很驼的恰克拉潘迪特慢慢地一瘸一拐走到河边。他扶着手杖站着，另一只手拿着黄铜钵从恒河里舀水。黄铜在月光下闪光：我就在这会儿入睡了。

根据老的说法，新年过得怎么样，这一年就会怎么样。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看来将和以往那些年头颇不相似。

一早起，趁天还没有大亮的时候，我到恒河沐浴去了。我并没有神秘的或宗教的动机。我激动是因为在河里撒了辛格的骨灰，也因为恒河是我心目中永恒、智慧和平安的象征，是我所珍爱印度的一切的象征。这条河流有其不可解释之处：每次当我眼光接触到它水面的时候，我的心便一阵紧缩。

达都和我一块下河去的。她告诉我一般是日出之前、夜半时分去沐浴。我们赤着脚，从冰凉的沙岸走到船上。一个男孩用竿一撑，这只小船就朝河心小岛驶去。

到恒河来的人就象去庙里朝拜一般。他们先把鲜花扔在水里，然后用手捧起一口水含在嘴里，把额头打湿一下。这以后才念着祈祷文走到水里去。达都行礼如仪。她穿着纱丽在河里洗澡，象所有的印度女人一样。普拉卡施也叫我别脱衣服，我便穿着睡衣洗澡。我就这么赤着脚走，睡衣上面披着大衣。

凉水刺痛皮肤只是一会儿功夫，然后全身皮肤发热，水似乎是温的。真不想走出水来。自古以来就一直认为恒河水可以治病，可能是因为它天然具有放射性，河水里含多量盐份，有一股硫磺味。不管怎么样，恒河水沁人心脾，浴后的皮肤久久发热，就象经过轻微的太阳烤晒一样。

船儿轻轻地击着水，掉头驶向岸边。天空已经发红，水变

成玫瑰色，吹过一阵拂晓前的凉风。小男孩撑着船竿，达都和陪送她的女孩，都对我微笑。我顿然觉得我年轻了，幸福了，我的心和这些玫瑰色的静静流过的河水一样，非常平静。

恒河在一天之内变化多端，美不胜收。它的两岸或是荒地，或是沙滩。有一岸较高，刮风时吹成一堆又一堆的沙丘。河的下游是浅滩，北方的鸟类象野鸭、鹭、灰雁等在飞行途中在那里歇脚：

有一天，当我信步沿着恒河走的时候，忽然听见了熟悉的鹤唳，要不是我看见高高的天空上排着人字的鹤群的话，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鹤在飞，它们从俄罗斯飞到卡拉康卡村的上面——这些幸运的鸟儿们，它们既不知道什么是签证，什么是护照，也不知道人们凭空想出的一切无稽之事。仙鹤们只知道，恒河是一条不寻常的河流，因此它们在高空中就把这条河当成广阔无垠的天地之间的一条蹊径，沿着它飞翔。鹤群栖息在浅滩上，在沙上闲游。就这样它们飞向南方，然后又回到北方。

太阳高高升起在村庄上，快到中午时分，恒河褐色浑浊的水面上，粼粼水波发出刺眼的闪光。白天的风特别清新，有时掀起高浪，农家小船都张起帆来。有时几十里、几百里都没有一座桥。人、成捆的货物和牲畜都靠船只运输。卡拉康卡村就是一个水运码头。

白天，河岸上热闹非凡，人很多，到处是狗、灰尘。有的来汲水，有的来洗纱丽和腰布，放在水里用力捶，洗好以后就铺在沙上晾乾。黄铜炊具用细沙擦洗。人们来到江心岛，那里种下的西瓜已经长出来了。当雨季来到、小岛将因涨汛而遭淹没之前，就可以收获了。现在还需要给瓜地浇水，夜里赶老鼠。现在小岛归农村小男孩管辖，他们看守西瓜，竖起吓唬鸟雀的

稻草人。河的对岸不时有骆驼走过，那里也有村庄。

到一天将尽时，嘈杂声静下来了，尘清风止，水色变得深暗、凝滞，象油一样，一直到日落之前，太阳始终紧贴着如镜的水面。太阳渐渐进入垂暮之期，一息奄奄，它失去了灼人余威和烨烨光华，它兀自只把苍天、大地和流水镀上金碧辉煌的橙红色。橙色——是印度民族的代表色。这种色调愈来愈浓，它渲染的不只是地平线上的某一处，而是将你置于其重围之中，仿佛你呼吸的就是苍茫暝色……

最后，橙色的圆球终于没入地下，看来就在河的对岸，黑暗旋即迅速来到；一切均陷于茫茫夜色，恒河纹丝不动，静止着，一直到翌晨。倒映在河中的是那些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星辰。

茫然四顾，一片荒凉。这个地区远离城镇：它距阿拉哈巴德四十英里，离勒克瑙——九十英里。这儿地处印度的腹地，在古代，它的名称叫阿尔耶瓦他，这些沙岸依旧如当年，河流仍然象以前一样，冲刷着这所房子下面的岩石架。卡拉康卡的意思是：黑色的石头。

辛格族的廿代人都在这里世代相传，最后的归宿都是恒河。有些人为自己举行隆重宗教仪式：经过长期斋戒，他们拖着孱弱的身体，坐着木排，来到河中心，在雷鸣般的鼓声中，投身恒河之中，随水飘逝，一去不返。恒河收容了所有的人，把他们带到永恒之国；冬天枯水季节，露出江心岛和浅滩。

这里没有驰名的庙宇和艺术文物，没有名胜古迹，在这块荒凉焦枯的土地上，在这个肮脏的村子里，这些都没有。没有绚丽鲜明的色彩，只有农民单调的白衣衫，满布尘土、颜色发暗的植物。这里没有异国情调，没有神奇色彩，没有那些旅游者们寻求的一切。但是这里无往而不在、处处可闻的是一种象从风

琴奏出来似的、捉摸不到的、深沉的声音；你别说话，安安静静地坐一小会，看着河水和它的两岸，这时，你就会听到这种声音——一种仿佛是慢悠悠的、深沉的锣声；仿佛是强大、永生的心脏在跳动、在呼吸。大地、恒河、苍穹、鸟儿、人类——万物皆融合在这永生之中。甚至于那些不知道有神也并不信神的人，也不由得为自己心灵得到安宁而感谢上苍，他的心灵会迸发出一声喊叫："真是好哇，上帝！"

延期和尝试

这种沉思默想的境界和休息有一天突然给打断了，就象遭到电击一样。早晨，当我和达都早饭后坐在王公府的游廊上时，院子里忽然一阵骚动。一个仆人朝我跑过来，我定睛一瞧，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原来苏联驻德里大使馆的二秘苏洛夫来了。他象休假的样子：穿着薄薄的长裤，短袖的条子衬衣，心境挺好，露出了微笑。

娜姑带着六个女儿出来相见，领他参观房子和四周美妙的景色。苏洛夫有礼貌地表现了惊喜之情。娜姑明显地变得活泼了，女孩子们由于好奇，眼睛闪着光。他们在邀请苏洛夫留下来午餐后，就都退出，只留下我们两个人。

苏洛夫脸色困窘，点了一支烟抽着，告诉我说，给我的访问期限"延长"一周，我原来一月四号的机票可乘坐一月十一日的飞机，仍属有效。卡西洛娃在德里等我。他是乘了十二个小时的车来的，昨晚在勒克瑙的旅馆下榻。他还可以在那里等我一天或者两天，然后将我载回德里。"您的愿望得到了迁就，"他说，流露出为自己大使馆的活动而自豪。

"可是我给斯米尔诺夫和大使都写了信，说我将按照印度签证上规定的、到一月廿日为止的日期留在这儿，"我说道。"我不会早于这个日期离开。让我和这些人在一起呆些日子吧，也许我会永远见不到他们了。为什么这样作就不行了呢？"

"我将把您的回话转达，"他说，"不过我觉得您在这儿已经休息过来了，您气色挺好……"

"我已经和大使说了，再没有别的好说的了。卡西洛娃让

她回家去好了，我托她捎封信给孩子们。她到这里来实在是多余。您自己也看得见嘛，这里挺偏僻，什么记者也没有。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然后就是午餐，象平常一样是印度式的（早餐是英国式的）。女孩子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瞧吧，情况变得有趣了，大使馆都来接了，我还赖着不想走。

娜姑又说起兰帕尔·辛格王公是怎样盖了这所房子的。苏洛夫毫无胃口地吃着咖喱食品。终于他坐上了停在大门口的汽车。我走进了普拉卡施的家，她全家都在等我，很着急，说：“我们真怕他会把您带走！”

这次访问留下了不快的尾声，我还不知道我德里的大使馆还有什么高招。我不由得想起了莫斯科，一想到那里我就浑身发冷，坐立不安。我不愿想起我家的住房，我的房间，那死神呆过的地方。可是家里的孩子们在等我，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心里想给他们带些什么礼物才好，普拉卡施正给卡佳织一件毛衣。唯一吸引我、召唤我到莫斯科去的是我的孩子们。我已经想念他们了。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相依为命、友爱相处，但是，与此同时，我更强烈地感到我不想回去了……

这种内心冲突愈演愈烈，终于迫使我不得不清醒和冷静地全盘思考各种可能性。一想到又要出席党的会议，又要“进入集体”——象柯西金和苏斯洛夫说的那样，我心里就实在受不了。近十年来我一直悄悄地、不起眼地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我操持家务，搞点翻译。我怎么打发时间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呢？不，他们决不会允许我过一般正常人的生活……

苏洛夫此次来访所起的效果与他的初衷适得其反。现在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迪内希来，以便和他谈一谈留居印度的可能性。我似乎觉得他有心帮我一把，至少我和他在德里进行的有

关这件事的谈话对我是个鼓舞。

* * *

为了讨好苏联大使馆，迪内希巳给所有的人发出指示，不让我在村子里闲逛。趁着他本人不在，我在左右周围逛了个够。

这一年冬季无雨，一片干枯景象。小小一阵风就吹得尘土四起。小而脏的乡村街道上到处是饿狗，露天小贩摊上出售蔬菜、水果、香料。有一个水井是用挂在绳子上的吊桶打水的，就象俄国农村一样；那里总是妇女成群，提着黄铜水罐来汲水。另一个是大而古的水井：水牛带动一具轧轧作响的装置，把一皮口袋水提上来。一个小男孩把水牛赶得绕圈走。经过一定的时间另一个小男孩就把皮桶的水倒进木槽里，它经过若干条木槽以后，就流进田里。这个"永动机"工作节奏极其缓慢，轧轧作声，令人昏昏欲睡，但水还是在流。可是几处电力水井却没有水流出来，因为最近的一处电厂在罢工，希望大选前能增加工资。

由于同一缘故，进城的公共汽车没有了，法院和国家机关也停止办公。电厂有时白天稍稍送一点电，为的是供水井打水，而到晚上电流就截断，室内只好点煤油灯照明。

虽说大河就在旁边，村周围的田地就象久经大旱一样。特为浇地用而开凿的深水井反倒用不上；买电泵花钱太多。一种荒废、消极的可悲气氛处处可以感觉到。上世纪末兰帕尔·辛格生前特为灌溉田地而开的大而深的运河原本满可以将整个地区变成花园的。这条运河里还曾走过大船。可是它早巳乾涸，河底长满了树木和稀疏的灌木丛，山羊群就在那里面放牧。

大地主制的另一可悲纪念品是那承印第一份印地文报纸的破旧不堪的印刷机。创办人还是那位兰帕尔·辛格，他也是国大

党的创始人之一。乾涸的运河旁边一座美丽的小山上，矗立着断垣残壁，辛格家的老友、著名诗人苏米特拉·南丹·潘特就在那里住过。

这些地主文化的凄凉废墟和苏莱士一家的生活使我多次想起契诃夫的《樱桃园》。这里也有花园，只不过是芒果园；高大而美丽的常绿芒果树也似乎处于半荒芜状态，四周的土硬得象石头一样。尽管这里谁也没砍伐具有象征意义的花园，但谁也不来更新它，没有新生的东西来取代逐渐死亡的东西。卡拉康卡村唯一最卓著、最进步的改良者要数兰帕尔·辛格了。可是那会儿时代不同，现在村里的全部生活就是等雨。看来，这只是印度农村总情况的一个例子而已。

印度的独立和土地改革给予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全部旧文化以打击。可是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以社会主义为精神的各种试验不能解决农业国印度的重大问题，也引不起大众的热情。尼赫鲁对社会主义的那种唯心主义的偏爱已作为遗产留给国家。可是当迪内希谈起“五年计划”时，我简直觉得他是再想跑一趟莫斯科，对那里他有个好印象。不能把他的这套当成唯心主义的错误认识。

当娜姑——这位鼻子孔里穿着钻石、除种姓以外一无所知的土邦王妃——试图对我解释社会主义以及国家管理的优越性时，我心里多么好笑。对我！似乎我们在苏联的都不如她知道得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

卡拉康卡村的唯一共产党员——一个名叫兰姆金的又穷又病的农民——也想向我证明这些“优越性”，他手里拿着的是印地文的共产主义小册子。可是，当我告诉他苏联的农民没有地，而且就象工人在工厂里一样，一起在地里干活时，他一下子傻了眼了。可怜的兰姆金不会说英文，除了这些小册子他什

么书也不读。他信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因为勃拉哲士·辛格是他喜爱和敬重的人。至于那些受过教育的王公和王妃们，他们只不过是假心假意。实际上迪内希和娜姑巴不得保持旧秩序。他们的大农庄、几所房子和田地都归一个总管管理，在卡拉康卡村人称这位总管为总管老爷，对他比对王公和王妃还要惧怕。

虽然，为了符合当今潮流，迪内希把祖宗遗留下的老王府献给了国家，区的农业试验中心现在就设在里面。在美丽的北印度拉其普特人风格的白房子前面，青年们在排球场上玩得尘土飞扬。可是农民们对这种“新法”反应消极，认为还是得看下不下一场好雨。美国和平队的那两个小伙子对普拉卡施抱怨说，很难把农民喊下地去干活，因为他们有各种数不清的印度教忌讳，怕“晦气”，宁可祈祷丰收而不愿卖力气干。

我看到不远的地方还有两座老王府，这也是这个辛格家族的远亲住的房子。有一天普拉卡施把我带去给本族最年长的一位妇女致敬。我穿上了白色纱丽，普拉卡施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走到一个很大的露天内院，石板铺地，我们把鞋脱了以示尊敬。在一个小火堆旁边蹲着一位非常瘦的妇女，穿着家织的粗布纱丽，象一只生了病的老鸟。她眼睑发红，只瞧着火堆，拿着一根棍子轻轻拨弄着炭火。我学着普拉卡施的样子，走到老妇面前，深深一弯腰，重复普拉卡施的手势，用手碰了一下老妇的赤脚。可是结果我犯了一个弥天大错：原来只要碰一碰她脚边的地就行了。老妇立刻站起身来净身去了，因为我这么一碰她就表示了亵渎。后来她就再也不出来相见。普拉卡施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她非常迷信，现在正准备后事；她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院子。年轻妇女走出这所房子时也只能先用纱丽把头和脸蒙上，眼睛朝下看。我们早就不这么干了！”

我们撩起纱丽，坐上吉普车，回到家去，那里人们可以正常地生活……

普拉卡施家里很随便，但种姓制度的遗风很难除掉。家里仆从成群，各司其事。作饭除普拉卡施本人以外，只能由婆罗门出身的厨子做；另一个仆人专给厨子递东西，洗食具，但无权做饭。家里两个佣人专收拾房间，上菜，但不能吃这些饭菜。他们随时准备一喊就到，那怕是要一杯水。他们两个人，一个相当年轻，另一个年纪大一些，衣服洗得很好，还会用电熨斗熨衣服。不过熨衣服是在地板上，而不是放在桌子上。他们不是婆罗门出身，但也不是最低种姓。

家里的石头地板由一个贱民女子擦洗。现在根据法律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可接触者（即贱民）种姓，但是其他人却无权洗地板或是收拾盥洗室。唉，盥洗室！

幸好这家的盥洗室是现代化的，还好使，按这个偏远的村落来说是个奇迹，也说明这家主人的文明水平。一般说来，农村不知道什么是厕所，就象俄国许多农村一样，多会儿想方便了，就到院子里去"解手"。这里的农民都是走到恒河岸边，蹲在那里，这样一来十分妨碍对美景的欣赏，除秽工作只好由炙人的阳光和每天在河边蹓跶的鬃毛蓬乱的一群黑猪来完成。

家里倒是安了自来水管，不过哪个水龙头都不出水。洗漱用水每天由一个潘尼瓦拉——一个老水伕送来。他两腿弯曲，背也由于终身干这个活驼了。一般他是从井里提水，逢到没有电的时候，他就上恒河去挑水。王公府也是这样，那里客厅里有漂亮的时髦家具，可是用水——冷水和热水——都是水伕挑来的。那里的佣人还要多，大部分人都呆在下房里，从不在正房露面。两家的家仆都穿软底网球鞋，家织的长腰布，外面罩欧式衬衣，或是上衣。

很快我就让人看出我是个平民出身的人，因为我自已洗衣服，还向他们要熨斗使。可是在地板上熨衣服要没干惯的话可不成，而且洗西式衣服非得有大量的热水不可。为了不把我带来的衣着洗坏，我只好改穿纱丽，因我发现这种衣着十分方便。六米长的纱丽我交给仆人去洗熨。不管怎么样，他们仍然认为我是“平民百姓”，所以对我分外亲切。

全家的工作，如果由配备现代化工具的西方妇女来做，只需一个人就足够了。这里的佣人用手挥着毛巾掸土，可是尘土仍然落在四处。犄角旮旯的地方满布蛛网。不过这些我都能凑合，因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仆人和主人对我的亲切态度，他们可亲的笑容以及对我发自内心的同情。

人家处处对我温存有礼，而我对这里的生活条件也很快就适应了，并且认为它们于身心都有益。早晨用取自恒河的凉水浇身，早餐吃米饭、蔬菜、水果等简单食品，不喝酒而喝井里汲来的清水，不喝咖啡而喝浓酽的喜马拉雅山茶，还有比这更有益的生活条件吗？两个月乡居生活使我觉得自已身体较前强壮，既不忌生水，也没有因把石头地板当饭桌而闹病。当然，象苏联大使馆教导我的那样，水要烧开喝，水果和食具要特为洗一洗这些事我想都没有想。我只不过爱上了我在周围所看到的一切，他们也以爱回报我。

卡拉康卡村虽说不是贫穷饥饿到顶点，但周围的贫困现象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如果想到相邻的比哈尔在这个大旱之年野有饿殍的话，那这个区可算不幸中之万幸了。可是每次在村里散步回来都会使人感到心情沉重。不论人们的脸孔是如何亲切有礼，但都是面有饥色，半裸的身体只见皮包着骨头……。

有一次苏莱士告诉我，他想给卡拉康卡村作点事以纪念他的哥哥，于是请求迪内希在学院里辟一个纪念室。可是掌握公

共事业基金的迪内希不支持他。

“我们本可以自己干，只是没有钱，”苏莱士和普拉卡施一筹莫展地这么说。

由于他们的启发，我脑子里忽然出现一种想法：如果我留在印度，我就要写书；我可以在国外出版我的第一份手稿，那么我就不会是此地人家的累赘，我反倒可以帮助这些人。最好能盖一所小小的医院纪念勃拉哲士。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所小诊疗所，纳嘎医生在两间肮脏的屋子里进行必要的初步治疗。既无设备，又无药房。是的，应该赶快从考尔那里取出手稿，寄到巴黎达斯迪埃那里去，他是我在苏联国外唯一的熟人，好在他自己也是个作家。

我从不认为《二十封信》可能给予西方读者任何政治启示，因为它完全是家庭纪事，而不是历史回忆录，我毫无意思要叙述大家知道的或尚未知道的政治事件。不过我知道，象我们家庭这样不寻常而且富于悲剧性的纪事，自然而然会引导读者作出某些政治结论的。

我给在巴黎的柳芭·克拉辛娜——埃马尼埃·达斯迪埃的妻子——写了一封信，我曾在莫斯科和她见过三次面。我在给她的俄文信里写道，我正在印度，我不想再回苏联，同时问及有无可能在国外出版我的书，并将全部版税用以救济卡拉康卡村。

几天以后，我收到一封简短的电报：“是，有可能。”然后又收到柳芭一封信，她用俄文写道，她完全理解我，但来信中并未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能不能信赖那些相交不深的人呢？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向达斯迪埃求助比向印度求援要安全可靠些。他的妻子，柳芭·克拉辛娜是俄国人，她是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

辛①的女儿，幼年时曾认得我的妈妈。我们的外祖父阿利卢耶夫同克拉辛一家都很熟。在目前我处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很高兴地想起了这件事，于是我就提笔给了解不深的柳芭写了一封信。

至于她的丈夫嘛，一九六二年七月的一天，埃马尼埃·达斯迪埃忽然按了我家的门铃。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专门写关于我父亲的报告文学的，现在想来和我核实若干传记资料。要按苏联生活的一切准则，我必须婉言谢绝，或者事先向上级机关弄清来由，问明我可不可以接见一位外国人。可是这种准则十分讨厌，我决定予以蔑视，于是我就把他请进家来，和他一连谈了几个钟头。

达斯迪埃这个名字在莫斯科知识圈内较为有名：大家把他看成自由派、和平主义者、亲共分子和争取和平的战士。苏联曾出版一部他关于法国抵抗运动的长篇小说的俄文版。在出版前言中爱伦堡友好地把他称作“艺术和政治方面的半瓶子醋”和“唐吉诃德”。

达斯迪埃一开腔就说，爱伦堡曾劝阻他别来找我，可是他还是从熟人那里搞到了我的地址。他把自己写的关于我父亲传记的小册子以及为此书收集的照片带给我看。我那时就很肯定地告诉他，从欧洲来源收集的、占那些照片半数的全是伪造的。作为替代，他从我这里取走约莫一、二十张照片，都是从我的照片本上取下来的。他怎么也不相信，布都·斯瓦尼泽的书《我的约瑟夫舅舅》也是伪作。只有阿·斯·斯瓦尼泽的儿子——我找来见达斯迪埃的——才能使他相信，根本没有布都·斯瓦尼泽这个人。那次达斯迪埃从我的谈话中摘录了许多东

① 列·鲍·克拉辛，老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苏联第一任驻英全权代表。

西，并且一再重复地说我自己应当写一本谈我生平的书。一年以后出版了他的书：《关于斯大林》。在这本书里，我发现未说明出处地引用了我的那些照片和谈话，但是其中人名、日期和事实都颠三倒四。

在这次会见以后，米高扬忽然把我请到他别墅去见他。散步时他对我说，当然并不“禁止”我同外国进步人士会见，但“最好别这样作”。忽然他问我：“你从来没有想到要写点回忆录吗？想写你就写吧。就是别给那些外国人，要不然他们该盯住你不放了。”我说，我什么也不打算写。不过我记住了这次谈话，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年以后当我写成《二十封信》时，我始终一直瞒着官方。我知道我的手稿会立即被没收，或者是强迫我按照例行的“党的立场”精神将它改头换面。

后来达斯迪埃又到莫斯科来了两次还是三次，也上我这儿来了。每次会见以后我都被叫到苏共中央委员会去，委婉有礼地问我“这个法国人想干什么”，我说他只不过是把柳芭的一封信捎给我或是给我带了法国香水来，可是这些话他们根本不相信。

我没有把这些访问首先向上级汇报，当然就违反了“党纪”。我也不想遵守这些“党纪”。我们这些生活在苏联、与世隔绝的“隐士”们，特别是我本人，把这种能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意外和不寻常的机会，当成一件值得分外珍惜的大事。我特别珍视和相信这位法国作家和他的俄国妻子的见爱，尽管我对他们了解不深。于是这会儿我给德里的考尔去了一封信，请他把我的手稿寄到卡拉康卡村来，因为我要在这里多呆一些时日。想到这份遗忘了的手稿，我就产生一种还要再写、还要多说的欲望……

如果我留在印度的话，再也找不出比这个安静的村落更适

宜于写作的处所了。

• • •

与此同时，卡拉康卡村和整个区都在热烈地讨论即将在二月份举行的议会选举。迪内希是执政的国大党在本地区的候选人。为遵从臣民效忠的传统，当地许多农民都投了他的票，多数时候仅仅是出于害怕心理。这有点象苏联的“选举”。所不同的是这里有七个主要政党的党纲和候选人参加竞选。

我真没想到这个乡村也会出现积极性和对政治的关心。衣不蔽体的、半裸的农民参加选举邦议会和中央议会，他们讨论着从地方报纸和电台传到这里来的各种新闻。许多人都有便宜的印度造的小半导体。苏莱士·辛格、他的一家、纳嘎医生、村长、当地学院的老师都参加了按老规矩选举迪内希的竞选宣传。不过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向着迪内希甚至迪内希的党。

这个邦的反对党如自由党、人民同盟和社会党都十分强大。执政的国大党有负众望，勒克瑙有可能成立反对派政府。共产党人在这个省里不得民心，在卡拉康卡村给他们宣传鼓动的只有一名名叫兰姆金的穷措大，人家都管他叫“同志”。

一月十六日全卡拉康卡村都在等待着英迪拉·甘地的到来，她已跑完了自己的选区——卡拉康卡村的贴邻。大家笑着谈论说，先要来六百名“保安人员”，这些人身穿农民服，在英迪拉讲演的每次群众大会上，他们都要坐在前排。大家等着，这下他们该骤然光顾卡拉康卡村了。苏莱士的家象俱乐部一样：大门敞开，客人坐在地板上讨论新闻，听无线电广播。

许多人公开对执政党和总理表示不满。人家问我：苏联怎么样？当我告诉他们一党制的“选举”是怎么一回事时，他们

不满地摇着头。这些手提半导体的赤脚农民怎么也不相信在苏联选票上只有一名候选人，于是他们对这种荒唐作法快乐地笑起来了。

终于迪内希在一大群助手、秘书、选举工作人员的簇拥下从德里来了。他的西方民主一下子消失殆尽，人家只称他“大君”。他脱下往日的西装，穿上了白色的棉布裤子和蓝色上衣，赤脚盘坐在沙发榻上接见来访者。墙上悬挂的全身披挂的卡拉康卡王公——他的父亲的照片，正好在他头顶上。

现在要走到迪内希跟前单独和他说几句话是作不到了。来访者一走，六个女儿就把他围住了。迪内希假装忘了我和他在德里谈的那番话。他非常亲切，进餐时给我敬菜，可是他告诉我说，我应该赶紧回到德里去，因为大使馆十分担心。他还把考尔的信转交给我，也是叫我回德里去。至于我的手稿，信内一字未提。

有一点我明白：就是要趁现在把我叫到德里去，以免我同总理会面。迪内希究竟和她说过没有，还不得而知。我最吃惊的是考尔没有把手稿还我。他写道，他要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不过特地为等我和他见上一面而延期，因为他很希望我能听他的忠告，立刻返回德里。我于是又再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把手稿给我寄到卡拉康卡村来，我还在信上补了一句：“可能您那里已经没有手稿，您已经将它交给苏联大使馆了吧？”

现在我只好设法和总理在卡拉康卡村谈一次话了。我坚决拒绝现在就返回德里，我的理由是：我的签证日期是到一月廿日为止，由于下一趟班机是廿六日，所以我还能稍待一些时日。迪内希深深叹了一口气；好客这顶帽子迫使他不得不随我之所愿。

“就这么着吧，”迪内希说道，“我家里的人和我将于廿

五号离开这儿，到时您和我们一道走好了。”

很快总理的“保安人员”就蜂涌而至。他们仔细看了看两所房子和河岸，他们还要分散住到各处，结果是一阵忙乱。迪内希和他的随从在这个地区到处巡行，有时一连几天都在外面。娜姑为接待总理和她的随从准备房子，因此，我在王公府住的那间房子也终于给腾了出来。我搬进了勃拉哲士住过的那间小房，对这次迁居我十分满意。

苏莱士一家挺高兴我暂时还不走；娜姑显然很紧张，生怕给她丈夫惹些节外生枝的麻烦事。可爱的达都两头跑，把闲话传来传去。大家对我同大使馆之间的明争暗斗感到十分好奇也十分有趣。巴黎来的信和电报也没躲过他们的眼睛。

另外，我干什么也并不背着他们。再说，在印度家庭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秘密，家庭成员拆阅别人私信的事完全认为合理合法。涉及任何家庭问题的讨论谁愿意参加就可以参加，参加者坐在沙发榻上或是地板上。卡拉康卡村此刻都知道“太太”不想回莫斯科了。每次来一个新客人都问我：“您喜欢这儿吗？您情愿呆在印度吗？”我总是毫不掩饰地说，“是的，我情愿留在这里……”这一点博得了他们的好感。本地学院的老师、医生、村长、佣人都同情我，不过他们也都明白，无论是老爷还是印度政府，都决不会为了我一个人的缘故搞坏同苏联的关系。学院老师还来教我印地文，我在莫斯科时本来就学了一点。

全村要在学院旁边集合举行群众大会，会上有英迪拉·甘地讲话。这个日子终于到了。我们是坐吉普车去的。迪内希全家在入口处等候，他七岁的幼女拉特娜穿着橙黄色的节日盛装，手里早就拿着一串橙色的花环。我们也站在那里。我很奇怪，这天迪内希并没有来。

不多久总理的小轿车卷起一阵尘土开来了。很快从车上下

来一位穿纱丽的妇女，她朝我们走来，向左右欢迎的人们弓身合十敬礼。拉特娜拼命跑上前去，把花环套在这位妇女的颈上。我们大家也都向她弓身合掌敬礼，她经过人们身旁时也一一还礼。她早就认得辛格一家，张张脸孔她都熟悉，她用注视的目光在我和我身上的白纱丽上面停留了一秒钟。（考尔大使曾于一九六五年夏在莫斯科把我介绍给英迪拉，那时她还没当总理。）然后大家都尾随她走到学院的露天游廊上，那里装了一具扩音器，代替“主席台”的是一张蒙了地毯的沙发榻，上面就座的有苏莱士、普拉卡施和娜姑。我和其它人一起坐在旁边地板上。

英迪拉·甘地穿着深色家织的小格子布料纱丽。因为是孀居，所以什么珍宝首饰她一件都不戴。她有一张聪明而充满鼓舞力量的脸，目光锐利。她用印地语作了长久而热烈的演说，看来说的都是进步的、许愿的话。谁在选举前不是这么说呢？坐在她面前的听众并不是特别专心地听她讲，倒不如说是盯着她的脸瞧。如果这些人不是农民，而是保安人员，那他们就不知道听过若干次了。讲完以后人家又给她献了花环。纳嘎医生结结巴巴、激动不已地读了卡拉康卡村的祝词，可是忘了使用扩音器。

群众大会结束了，她又象方才来时那样匆匆回到自己的小轿车里，我们拎着纱丽跑回自己的吉普车里，因为此刻大家都上王公府去吃晚饭。总理并未屈尊同医生、学院教师或任何欢迎她的人谈话，是不是晚上她会叫他们到桌子上一起进餐呢？

晚饭前，在挤满了人的客厅里，总理问我喜不喜欢卡拉康卡村。我望着她的眼睛回答道，我非常喜欢，我想在这里尽可能多留一些时候……英迪拉有点天真地反问道：“难道他们不允许吗？”普拉卡施于是果断地坐上英迪拉坐的那张沙发边

上，用印地文在她耳边嘀咕了一些什么。英迪拉听着，偶尔用眼睛瞟着我，不时点点头。特为来看总理的巴德里王公和王妃不耐烦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娜姑把大家都叫到桌上就座。我和总理的会晤到此结束。

饭桌开在大饭厅里——那里天花板上写的都是罗摩* 的功勋——和旁边那个小房间里。到处装饰的都是鲜花，甚至于电力这天晚上也不“罢工”了。在小房子里和总理一起就座的有娜姑、苏莱士和普拉卡施、巴德里王公和王妃，另外还有几个随行人员。在大房子里进餐的有为数众多的随从，还有就是卡拉康卡村里那些不能靠近英迪拉的人。女孩子们、达都和我都被排除在小房间的范围之外，这一点我倒不奇怪：我知道迪内希看来根本就没有和总理说过有关我的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今天才没有来，而只嘱咐娜姑切莫让我到英迪拉跟前去。咳，又有什么要紧，我坐在这儿也挺不错嘛，和达都坐在一起，她不能和总理一起坐席，尽管这是她的家。可怜的达都无精打采地挑着咖喱食品吃。食品精美极了：有咖喱食品、大米饭、香料、水果，丰盛之至。总理知道不知道，这“王公府”墙外的人生活又如何呢？

不大一会我就进入自己的房间，因为已经没有我的事，我便躺下睡觉。总理要早晨吃了早饭以后才走。

一大清早普拉卡施走进屋来对我说：“您看见了，我昨天和英迪拉说话来着。她早就认得我了，我和她什么都能谈。他们都挺害怕，现在时间不对，刚好是选举之前。我想，如果你能待到春天，她重新获选为总理的话，她和迪内希要帮助您就方便得多。去吧，他们这会儿正在上面游廊上吃早饭，迪内希

* 神话中永胜的皇帝，印度叙事诗中的主人翁。

是昨天深夜到的。”

“这都没用，”我说。可是普拉卡施帮我披上纱丽，自己在前头走，说：“同我一起去吧！”我便和她一起去了，不过我心里很反感，很难受。

游廊上洒满了早晨的阳光。迪内希和英迪拉并排坐着在喝桔汁，当我们走近的时候，他的脸马上拉得挺长，他第一次带着明显的敌意瞧了我一眼。我们坐了下来，喝着桔汁。“好吧，我该走了。”这位四亿人民的首领说道。于是大家都站起来。迪内希给全家人和英迪拉一起拍了合影留念，他邀请我也站进去，然后大家都走下去到院子里送总理。

当大家都向她弓身合掌告别后，她忽然走到我跟前，向我伸出两只手，热情地望着我说：“我祝您幸福！”

“祝您胜利。”我回答说。我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意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然后他们都走了。

我们走到我小房间旁边的游廊上。普拉卡施气炸了：“迪内希不干！”她重说了一遍。“他们就等着你快点儿走，娜姑还挺恨……咳，要是已故的夏斯特里总理还活着该多好啊，那可真是个好人哪，我和他本人以及他的妻子都能谈得来。他们多么平易近人，而英迪拉在这里和谁都不说话，周围就是些‘保安人员’！这个国家的一切变得多快啊！难道甘地先生和人们相处也这样吗？现在他们只依靠些王公贵族，可是甘地先生却同贱民谈话，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贱民不贱民的。国大党现在都成了什么了？”她难过地摇摇头，并且一再重复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国大党都变成什么样啦！”

我们坐在阿育王树旁的小游廊上。佣人把搬到王公府给随行人员用的家具又搬回家里来。他们告诉我说，我在那边的房子又腾出来了。

“现在要不了多久了，”普拉卡施说，“月底娜姑和女孩子们都上德里去，你就可以搬到我们这边来。”她深信我是不走了。我多么感谢她和苏莱士啊。他们尽可能设法让我在他们那儿住下，同时设法使签证延长二至三个月，使用的是他们一家的客人这个身份。根据苏联规定，在海外亲属那里作客的，只要不由大使馆负担费用，签证都可以延长两、三个月。

咳，就这么着吧！这就是说再试一次。可能我真的来得不是时候，要是总理选举获胜，她的胆子肯定会壮一些的……

我挺担心的是莫斯科的孩子们，他们此刻音讯全无。我给伯莎去了电报，询问他们的消息。我给孩子们也发了电报，每天都在等着他们的回音。忽然有一天娜姑似乎顺便提起说：“您儿子拍到德里我家的电报难道没有转交给您吗？迪内希告诉我说，有一封电报，他看到了。电报没有什么要紧事，您儿子说，诸事顺遂。”

我简直跳起来了！这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事：迪内希把我的电报读给老婆听，可是却忘了告诉我本人。至于娜姑，不用说肯定是坐在沙发榻上，把这件新闻向所有的人说了个遍。

客厅里的这张大沙发床是真正的妇女俱乐部、讲台和主席台，什么小事都逃不过坐在那里飞快织毛活的妇女们的眼睛，她们的咀巴只有放进一片新的蒟酱叶*时才闭上一小会儿。

就在没有几天以后沙发床上又将有可供讨论的新话题了。

* 或称蒌叶，印度人用以包槟榔而嚼之。

“美国话题”

迪内希家里有一间大的英文藏书室。客厅里摆着：《妇女家庭杂志》、《时代》周刊、《生活》周刊、《新闻周刊》。女孩子们只看英文书籍。

我在迪内希家里读了尼赫鲁的《世界历史的教训》，温莎公爵夫人的自传，浏览了邱吉尔的回忆录，读了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写的书，最后还以极大的兴趣埋头读了当时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写的《大使报告》。

这本书异常生动并且引人入胜。这位大使了解印度、热爱印度——这一点在字里行间处处可见。我忽然发现圣雄甘地的一句话，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对它体会尤深，我止不住按照老习惯把它抄摘了下来：“为了挽救自己的荣誉、宗教和灵魂，为了使一个非正义的帝国沦于毁灭或者使之开始得到新生，一个人也能单独向这个帝国的全部恶势力挑战。”*

人们出于某种理由，通常认为，“东方对个人和人的意义不予重视。”这完全是谬见，甘地的话和他整个一生，恰好道出了与这相反的意思。我对他这番话思考良久；在卡拉康卡村有功夫整天整天地想。

一连几天我都带着这本书。这没有逃过那些大一些的女孩子的眼睛。于是沙发床上象鲜艳的蝴蝶一样飞出了新话题：干嘛她不到美国大使馆申请避难，等有了美国护照以后再回印度

---

* 切斯特·鲍尔斯：《大使报告》第74页，纽约第1版。

来？沙发床上激动地讨论着各种新方案，这些话达都赶紧都告诉我了。

“她们说，这是最好的办法，”达都激动不已地说道。“您自己怎么想呢？您巴黎的朋友们还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我的巴黎朋友沉默无声。然而我开始严肃地考虑这位大使——切斯特·鲍尔斯——如果我能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他，他会理解我的……不过我把这想法放在心里，一点也没说出来。它还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距离作出这样的决定还极其遥远。我只不过怀着对作者本人深切的好感继续读着这本书，并且不由自主地将他对本行业务的精通与苏联大使馆那些庸人们作对比。而我对达都就只说，我将设法获准留此作客到五月。

这个“美国话题”似乎象是自己突如其来地出现的，就象空中不知从哪里飞来的一只蝴蝶一样。它也同蝴蝶一样，飞舞翩翩，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而复来，以意想不到的执着，闯进我的心扉。

苏莱士一家是经常在谈论美国的，不过完全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的大儿子阿育已在美国住了七年之久了。阿育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工科毕业以后就在波音飞机公司当设计工程师。阿育和他的弟弟西里什都生长在卡拉康卡村。但西里什和他爹妈一样，从未离开过印度。阿育特别响往西方。工作使他羁留美国，此外他还和一位荷兰的女大学生结了婚，那里有他的家，还有一双儿女。两年前这对年轻夫妇曾回卡拉康卡村探亲。使大家扫兴的是印度不需要喷气机设计师，而那位整洁成性的年轻的荷兰女人没有自来水和电气厨房就过不了日子。

在卡拉康卡村，对这对年轻夫妇不久前的归省还谈论不已，

他们离去后留下了若干“文明的痕迹”：室内无线电天线以及现在有时还用来加热茶壶的电炉。可是普拉卡施总是喜欢用煤油炉做饭，自己坐在石头地板上。

一些贵重什物都放在“阿育的房间”里，房门钥匙则吊在普拉卡施的腰带上。这里有阿育自己做的木头书架，上面放满了他的技术书和杂志。这里还有成套的美国的《全国地理》月刊和《生活》周刊，都是阿育为卡拉康卡村订的。当我在这个印度荒村看到这些杂志时，我不由得想起在莫斯科的一件事：有一天，我想给自己孩子们订阅《全国地理》月刊，结果不行；只有科学院订到几份。政治性杂志《生活》周刊和《时代》周刊在莫斯科只有内部图书馆才有，而且不许借回家。

阿育的房间里有一套色彩鲜艳的柳条家具，扔下的一台收音机、唱片、不要的玩具，等等。普拉卡施很珍爱这些东西，因为阿育是她最宝贝的儿子，离了老树飘走的一片叶子，看来，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年轻人。

阿育在西雅图有一所房子、两辆汽车、称心如意的工作、紧张而又舒适的生活，这些都可以从他的言谈和来信中知道。父母对这些事情百听不厌，一遇到什么小事就会想起这些事，天天说也说不腻。有时阿育寄些彩色的幻灯片来，让家里人看看孩子们长得多快，看看他们花园里的花开得怎么样，因为他最爱侍弄花草了。这些事离这里远而又远，在地球的另一面。

阿育的从未出过国门的父母觉得美国的生活太紧张，生活节奏也过分快。他们把这归之于勤劳以及因之而来的美国的富裕。他们喜欢那里所有的人都干得挺欢，工作给人们以安适和自由，喜欢那里物价便宜，人们富有进取心而且朴实无华。他们尤以自己的儿子能在这个遥远的国度过着一帆风顺的生活而感到自豪。他们一再重复地说——看来，也是他儿子说的话

——印度也需要首创精神、自由的企业经营、城乡小工业、现代化机械化的农场。凡是“阿育说过的”，在这里都当成确定不移的真理。

我去找美国大使馆的这种想法，卡拉康卡村任何一个人都不认为是悖于情理的事。所有的国家都知道，苏联公民不少是这么干的。这里的妇女谈到我这步棋的时候却天真得很，完全不理解它的政治含义。她们只相信一种神圣的真理：人愿意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

不过我已经领教过这些娘儿们的多嘴多舌、私拆他人信件和讨论人家的私事的习惯。所以我只一再声明“我不能这么干”和“我这样做不合适”。我非常清楚，这一着棋意味着什么，哪怕是随便说说，传到了我的大使馆去，可不得了。

很难说这种念头什么时候使我觉得它有现实可能性的。总的说来，这是我读了切斯特·鲍尔斯的书以后。可能这些女孩子们猜着了一点什么。切斯特·鲍尔斯大使可能理解我、帮助我的这个念头我藏在心灵最深处，只有在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才敢想一想。只有在没有见证人、我只身默坐的时候我才更经常地想到这些，试图在想象中再现我曾一度路过的、德里美国大使馆的那座楼。

比起其它国家来，我对美国了解得要多些。这是由于我从小就学英文，我很早就读王尔德、高尔兹华绥、斯坦贝克和海明威的英文原著。我曾有机会看到美国电影，并通过这些电影了解美国生活，这是因为每逢周末政府别墅里常常放映这些电影。那些不能在苏联城市电影院放映的外国电影都在这些别墅里放映。当然，别墅里的主要观众都是学外文的青年。象葛丽泰·嘉宝、秀兰·邓波儿、蓓蒂·黛维丝、狄安娜·窦萍、凯塞琳·赫本、史本塞·屈西、米娜·罗埃、克拉克·盖博、巴巴

拉·史丹妃和罗勃·泰勒这些演员* 我战前就已熟知。后来我最喜欢的演员一直是英格丽·褒曼**。在四九年我离开从小居住的祖巴洛沃别墅之前，我是老有机会看这些内部电影的。

在进了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以后，我专修美国史。这主要是由于那些年——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的共同情绪和兴趣使然。和美国盟国修好的情绪非常强烈，人人都想多知道些大洋彼岸的大民主。

我的第一个丈夫——当时是外交学院的学生——和我一起读弗雷德里克·舒曼写的《俄美关系史》。在大学学习时，我写了有关一九三三年美苏建交、罗斯福新政以及美国工会的学程报告。我的老朋友阿莉雅写了有关建立联合国组织的报告。我们大学全班都研究了美国历史、经济和地理，美国在南美和欧洲的外交政策，等等。

我们也涉猎了极其有限的、在苏联国内翻译的美国文艺作品。在战争期间我居然看到了《伦敦新闻画报》周刊以及《生活》周刊、《时代》周刊和《幸福》月刊，那里面谈了许多有关盟国、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有趣的细节。

只有过一次，在一九四二年的某一天我父亲把我叫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里，将我介绍给温斯顿·邱吉尔。我只向客人问候了一下，没过五分钟就给打发回去了。这是我父亲通常规矩中唯一的例外：他从不引我去见“大世面”。他不仅从未想过要带我去参加国际会议，他甚至认为我出席莫斯科的外交宴会都是绝不能允许的事情，尽管他也知道我会说英语。

这些规矩在父亲死后照样沿袭下来，因此，我在莫斯科既

---

* 以上均为美国好莱坞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著名影星。

** 瑞典出生的美国著名女电影演员，所主演影片多次获奖。

不能接触外交界，也不能接近外国记者。唯一的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是在一九五五年，这是应伦道夫·赫斯特及金斯伯里·史密斯的请求并经政府批准才举行的。采访前莫洛托夫先给我耳提面命一通，而在接见记者时，又派来一位外交部的翻译和我们坐在一起，其实完全无此必要。

莫洛托夫的指点大致概括如下：即既不要谈国内政治问题，也不要涉及我父亲的政治观点。不要说我哥哥华西里正在蹲监狱，就说他在生病就行了。不要谈及政治，总之，尽可能三言两语把话说完。我本想不接受采访，但莫洛托夫说："不行；那样的话他们该说我们把你藏起来了，或是说你不在莫斯科了！"于是我只好按此指示办理，旁边坐着一位一言不发的翻译。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与外国人的"接触"，另外就是埃马尼埃·达斯迪埃了……

尽管这样，我从书本、电影、谈话中间对美国早就得出一个生动的印象。不久以前阿莉雅在底特律的姨来看她们了。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儿子——一位年轻的医生和他的一家。她和自己的姐姐住在一起，打她离开苏联以后，老姐儿俩已经四十年不曾会面了。在莫斯科街头所见使她大惑不解：每个妇女手里都提着一个挺沉的包，有的还提着两个。

"可怜的女人们哪！我们那儿谁也不这么驮东西，"她说。"大包小包装在汽车上就得了，或者由商店送到家去。"

她的儿子靠儿科医生的收入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负担大家到苏联探亲的很贵的旅费。

伯莎家也有美国的亲属来探亲，也是这么多年没见过她妈了。这是一对老年夫妇，正在作环球旅行。可怜的伯莎和我们大伙是多么羡慕他们啊！

话又说回来，比谈论、展览会、巡回演出和电影更具有重

大意义的是俄国内部对美国早就形成的一种深切的好感。这种好感是苏联每个人本身固有的——从中小学生、大学生、知识分子到最普通的人，他们对美国的技术比对美国的历史了解还要多。对和俄国一样幅员广大、有着各种文化、语言和自然区的国家、对这个从未和俄国交过战的国家，这种好感和同情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有落后于生活的党和政府才不能分享这种感情。

走遍全球的俄国著名外科大夫亚·亚·维什涅夫斯基有一次从美国回来后对我说，他从来没有受过这种亲切和热忱的接待："人家想同咱们友好，人家挺喜欢咱们，真是些了不起的人哪！"他一再这么说。我从到过美国的运动员、音乐家、作家那里也听到同样的话。此刻，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觉得，如果我真的下决心投奔美国大使馆的话，我会找到共鸣和得到谅解的。

在莫斯科时我没有机会和美国人相过从。但是和在莫斯科的印度人的友谊给了我不少好处：我现在可以流利地说英语了。勃拉哲士·辛格和他的朋友们帮助我感觉到，世界不是到苏联国界为止的。勃拉哲士·辛格实现了他曾许下的诺言：把我带进了世界。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如何同陌生人应对自如，这一点由于我天生的害羞和拘谨在过去是作不到的。

现在连我自己也奇怪，我居然能在远离同胞的异国过得象在家里一样。我内心产生了本来没有的自信心、冷静和镇定自若。这是从哪里来的？谁在莫斯科会相信，我在这里日子挺好过，而且什么也不怕呢？

在印度，我一天一天养精蓄锐。我身上卸下了在苏联压在我心上和思想意识上的沉重锁链。在莫斯科我想都没有想我会上美国大使馆去，在那里我总是消极悲观，整个人都是麻木不

仁的；我只觉得以后的日子就是“度此余生”、抱抱孙子，至于生活嘛，那是年轻人的事情。就在这里，在印度，我忽然觉得我有力量开始一种新的、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不过我还需要时间才能作出决定。所以我故意拖，我需要延期。我还不能就在明天走这一步路。同时千万不要使别人猜到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才好……

有一天，正当我和本地学校教员坐在游廊上，他正用粉笔在石板上写印地文的时候，象从地里钻出来似的苏洛夫忽然站在我们面前。教员立刻跳了起来，很得体地告辞而去。我准备对付一场难以招架的谈话。

迪内希和考尔看来已通知苏联大使馆，说我要在卡拉康卡村待到一月廿五日，一直要等到下一班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为止。这一点总算勉强同意了。可是当我告诉苏洛夫，说我要请求莫斯科将我的探亲期再延长三个月时，他半天没吭声。

“那么，斯维特拉娜，下一步你打算怎样呢？”他终于小心翼翼地问了这么一句。

“下一步就回家呗。”我竭力控制自己，回答说：“要知道我有权探亲的。”

苏洛夫对此点了点头，可是他有点不知所措。

“您真是在这里住得不想走了，”他说，但还鼓不起勇气提到我身上穿的纱丽，“还学语言哩！”

除了同意我到印度来的柯西金以外，关于延长我探亲期限的事莫斯科谁也作不了主。我没有别的法子，只好给他写信，请求延长。我把信交给苏洛夫。苏洛夫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心里寻思着该怎么办……我知道，这封信到莫斯科，还要经过讨论，那就得不少时间。即便拒绝我的要求（对此我几乎不怀疑），我也能拖上一些时候了。苏洛夫灰溜溜地走了，带走了

我给总理的信。

过了几天之后，考尔终于把我的手稿寄来，还附了一封挺见怪的信："亏您想得出，我怎么能把您的手稿交给苏联大使馆呢？如果您真是把我当成这种人的话，那咱们的交情就算完了。"

手稿是由迪内希面交给我的，不用说，他已经从娜姑那里知道我写信到巴黎去的事了。他小心翼翼地想盘问我，我这份三年以前写成的手稿里面究竟写了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他可有时间和我单独谈话了，因为他非常好奇。看来，他对考尔在莫斯科时和我们之间过从较密这一点感到有些不快。我再次看到我面前的迪内希：一个富有魅力而又豁达大度、通情达理的人。

我告诉他，手稿里并无任何政治"发现"和"秘密"，它只不过是一部家史。

"您要把它寄到巴黎去吧？"迪内希问道，我只好闪烁其辞地答道："还说不准"，"可能"。我不想和他说得很肯定，但有一点我是下了决心，那就是决不把手稿寄给达斯迪埃。我告诉迪内希，如果苏联官方知道有这么一份手稿的话，马上就会没收我的。

"您可以肯定他们至今不知道吗？"他问道。

"是的，我可以肯定他们暂时还不知道。不管怎样，考尔这一年是守口如瓶的。"我回答说。

迪内希然后换了另一个新话题，看来那是最使他担心的一件事。

"我不认为，"他说道，"美国人能帮你的忙。当然，他们会出你的书，甚至还会把它改编成电影，你自己也会成为一个类似电影明星的人。可是您并不需要出这种风头。据我了解，您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对记者和电视摄影机一概谢绝。"

“是，是这样，”我赶紧回答。“这种事我不干，绝对不会！我根本不打算靠美国帮忙。”

“切斯特·鲍尔斯我挺熟，”迪内希继续说，“印度人很尊重他，敬爱他。这是一个挺逗人喜欢的人。不过，我认为对您来说：此路不通。”

“不，”我说，“绝对不会！不过我请求的是延长我在印度探亲的期限。我已把申请报告寄到莫斯科去了，可能会批准我呆到夏天。如果不准的话，我只好回去。”

“可能会批准您的要求的。”迪内希稍稍松了一口气，回答说。

一连几天他都挺亲切可爱，问及我的孩子们，当然也问到我的手稿。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客人们，吃饭时给我夹菜，请我沿河划船玩，那一天河岸上全是人。他对苏莱士一家也客气多了，上他们家去，普拉卡施直好笑，说这种事可是多年来少见的。可是看看苏莱士家陈设简陋、满是灰尘的房间，这位大君简直掩饰不住他的讪笑，而当他看到墙上挂着的系着印度腰布，腰里还吊着一只大表的甘地的大照片时，迪内希竟然禁不住轻蔑地一笑。

迪内希邀请我和他一起在区里作竞选旅行，然后到选举那一天和他同到选区去，不过这种荣幸鄙人不敢当。现在我只守口如瓶，我关心的只是一件：唯恐迪内希探出我的真实思想来。

我把手稿锁在床底下的箱子里，钥匙随身带着。我常常一个人走到楼上的空房间里，坐在那里翻阅我已忘了一半的、自己写的手稿。这会儿我看到：三年前写的许多东西极其天真、不明确。要知道这些都是信，而不是书；如果更早几年以前写的那篇关于女朋友的短篇小品不算在内的话，这就是我初次的写

作尝试。我在莫斯科的朋友们都看过那个小故事，劝我不要放弃这种尝试……有多少次他们对我说：“写你的生活吧，你挺能讲得娓娓动听的。”

于是接着我就写了这二十封信，信是写给一位莫斯科的朋友，一个很有文学修养的人，虽然他本身并不是作家。他看完以后很满意，对我说：

“天哪，多么黑暗啊！这种暗无天日、这些惨剧、这么多人死于非命！可怕，真可怕！不过我想看到的是更鲜明、更肯定的结论。这种结论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如果你下的结论更鲜明一些的话，那么这意义就会更大一些。多么不幸的国家啊！想一想是谁在统治我们啊！”

读了我手稿的其它苏联国内朋友也谈了类似的意思。

我此刻坐了下来，仔细思量：可以改动哪些地方。不过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一改就会损害全书。需要的是再写，换另外一种方法写。已写好的东西我不想再改。这些用抒情体写的“给友人的信”，是一部家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告一段落。一九六三年我并没有真正在写书。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发表的可能，没有想到读者。这些信当然不需要将苏联内部生活全貌展开，也不需要解释我父亲的历史作用和政治作用。抒情体信札是另外一种范畴，与历史回忆录不同，与其说它们是历史，倒不如说是诗。

一月底，迪内希和他一家到德里去了。看来，我暂时在卡拉康卡村不走这件事，大家也只好认了。迪内希临走前，在他那间又大、又阴凉的藏书室里，再次和我谈了话。

“我认为，您是理解的，总理爱莫能助，”他直率地说。“即便是总理选举有把握的情况下，当然我希望如此，对您说来也无济于事。您必须自己向您的政府申请在印度长住。到那

时候，甭说我们大家也都会帮助您安置的，但是这件事不得引起印苏两国之间的冲突。”

我别无它法，只好默不作声地听着，然后说：“我懂……”

大家都走了，王公府一直到选举之前都空着。大门口还是那个持矛的高大看门人在逡巡着。

• • •

每次，当迪内希走了以后，卡拉康卡村的人都觉得自如一些。趁他和随行人员都不在，趁莫斯科还没有回音的时候，我决定去看一看勒克瑙。

打喷嚏的吉普车把我和西利什带到离卡拉康卡村三英里的车站。我们买的三等车厢票——苏莱士·辛格和他一家向来如此。火车误点。已经是晚上，天都黑了。别人告诉我，晚点在这里是家常便饭，从阿拉哈巴德开来的这趟车，一定载了许多从恒河归去的香客，他们是到恒河参加每年一度的印度教宗教节日——在二月初举行的恒河沐浴仪式的。

火车到底还是来了。它挤得简直连车门都进不了。我们从这节车门走到那节车门，终于挤进了一个车厢，但只有站的地盘。车厢里灯是灭的。西里什说，到勒克瑙要走三、四个小时，有时还要长些，至于行车时刻表只是理论上存在。

我们站了很久。车厢远处角落点着一盏小小的灯，灯下站着一位飘着白发和长长的白胡子的老头，拄着拐棍。他的脸特别好看。一边随车的摆动摇晃着身体，一边闭着眼唱着，声音清亮，中气也足，歌声流畅，袅袅不断。这是来自阿拉哈巴德的一位香客，他唱的是梵文赞美诗，它的曲调富于宁静的节奏。

行李架上也挤满了人，针插不进。那上面有的坐着，有的

躺着，蜷成一团。印度人最能少占地方，他们把身体那么一蜷曲，就象混身上下没有骨头似的。尽管非常挤，但是没有人推搡，也没有人骂粗话。空气异常闷人，从门那里吹过来的一阵风却只把厕所的臭味带来。不多久，坐在板凳上的一位年轻人就设法挤紧一些，请我坐下了。我就这样夹在他们当中，一坐几个钟头，一直到勒克瑙为止，中间停了无数站。

到了勒克瑙，我们在普拉卡施的亲戚家歇足。这是一所大而老的房子，院子中间有一口水井，人们用水桶从那里提水。这所房子算是“王府”，不过其方便程度和卡拉康卡村那座“王府”差不多。

勒克瑙和德里一样，也分成旧城和有现代化的街道及造价高昂的现代化商店与银行的新城区；现代化的街道在世界各个城市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古老的纳济阿巴德和阿明阿巴德的众多的窄街小巷是城内独一无二具有印度特色的街区。这里有妙不可言的卖便宜东西的小铺，比那些大商店更适合我的购买力。在莫斯科我获准换了一百个卢布的美元，在印度我的一百一十块美元就变成七百七十个卢比。这笔钱并不多，因为其中一半已给了卡拉康卡村的佣人，另外还送给普拉卡施一点钱。

勒克瑙是印度北方的手工业中心，这里手工艺品特别便宜：比如，同样精美的刺绣，在德里要贵一倍。因为德里的游客是在大百货商店买的。我在这里给自己买了一件淡灰色的布纱丽，上面绣满了花。做这样的手工，伊斯兰教的姑娘们也许要花掉整整一年，但纱丽却卖得挺便宜。我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些有意思的东西：绣金翘梁家用平底拖鞋，叮当作响的银制手镯，还有一些便宜的印度小玩意儿。我能想象得出，他们见了这种灿烂夺目的小东西该有多么高兴……

纳济阿巴德有许多便宜小吃，是放在当街的火炉里直接加

工的。吃的东西的确美味；但最好别往四处瞧——墙、地板、桌子都脏得要死。可能人们已习惯这种肮脏，因此熟视无睹。我也想不予理会，但是办不到。城中心的饭馆看起来要干净象样得多，但在这纳济阿巴德的小街头，小吃比什么都香甜些。

我们浏览了市容，是坐在三轮车上参观的，这是最好、最廉价的市内交通工具。三轮车在人群中一钻就过去了，可是汽车还得使劲按喇叭。我们就这样游览了全城。

中世纪伊斯兰教的纪念碑、精致如花边的伊曼巴尔建筑艺术、清真寺和矗立在花园绿荫丛中的高塔是勒克瑙这个“玫瑰之城”的标志。大学的规模之大使我惊讶。我还真没有想到能在这里看到那么多占地庞大的现代化建筑物，以泰戈尔命名的大型图书馆以及那么多大学生，其中包括不少欧洲人和非洲人。这个城看起来既富又贫；这里的一切，似乎需要击一猛掌，它才能脱离昏昏欲睡的状态，重新获得活跃的生机。

在一条街上有一座小小的神庙，庙里是冠带冕旒的哈努曼的彩绘雕象。印度教神话里的哈努曼是猴神，罗摩的忠实朋友，曾襄助他建立了功业。可是看到人们现在还膜拜这么一个彩色猴子雕象，不免令人感到荒诞不稽，哪怕是加涅什——智慧之象——看起来也顺眼一些。现代化都市的街上居然出现拜猴王的事真可谓谑而且虐矣！可是当我把这层意思告诉西利什时，他却说，哈努曼是个善良的神，他给人们带来运气，因此在他脚底下供了不少花。

我们去看了达都，她就住在勒克瑙城郊。虽然对这里的贫穷我早已有精神准备，但是住房中灰泥剥落的墙壁、肮脏的小院子还是使我大为吃惊。孩子们都是一付闷闷不乐的倒楣相。真难以想象，卡拉康卡的王公、达都的亲哥哥竟不能接济一下自己唯一的亲胞妹。不过达都仍象往常一样，异常亲切。她还

把我们领到邻居、一个名叫佩吉的爱尔兰女人家作客。这个佩吉生于印度，嫁给了一个印度教徒。

佩吉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面颊红红的，穿一件印花布罩衫，她的几个孩子倒是都象印度人。小小的房子是东西方的混合体。她快活地大声说，她的父母很爱印度，她自己也爱这个国家，他马上就问我：您能长住印度吗？达都马上向她解释，说我本人是愿意的，但是别人不准我这样。

“上美国大使馆去！”佩吉打抱不平地叫起来。“要求他们给予政治避难权和国籍，然后再回印度来！”

我没答腔，但对这种念头已不感到奇怪了。。

晚上我们一起去逛街。竞选宣传在这里尤为壮观，简直象演戏一样。面向广场的拐角上有几所楼房，每个楼房的阳台上都安了扩音器，广场上则人头攒动。没有人发表演讲，大家对此已腻烦。每个政党的施政许诺都编成滑稽歌，在音乐伴奏下唱出来。这很吵闹，但比起演说来更吸引人。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笑声：人民同盟把国大党挖苦得够呛。在震耳的乐曲声中人们在街上游荡，买甜食吃。

第二天，达都把我们送到车站，我们又等了一个半小时的晚点车。不过这次车厢倒没有全满，所以我头枕着自己的手提包，坐在木板凳上一路都在打盹。

二月份我游览了两个地方：阿拉哈巴德和贝拿勒斯。我到那里去是由于认得巴哈里博士，他是阿拉哈巴德的语言学家，当时正在莫斯科编印地文—俄文词典。

他的儿子，一位律师，曾乘自备小汽车和妻儿及朋友——一个汽车修理厂主一起到卡拉康卡村来过。我向他转达了他父亲的殷殷问候和礼品，他于是立刻邀请我和他一起到阿拉哈巴德去并住在他家里。我同意了，于是和他们的妻子们并排坐在

车里，年轻的人坐在前排说说笑笑，想压过收音机的声音。

这位年轻巴哈里可一点不象他六十岁的老子，一位素食主义者和苦修教徒。他在这个年纪已经稍嫌臃肿，说起话来老气横秋，爱喝几盅。他和他的朋友比尔都是进取心极强、勇往直前的旁遮普人，他们的妻子完全不象辛格家的人那样，而是印度新型中产阶级。

当然，在卡拉康卡村他们就知道了我想留在印度的打算，也知道两国政府对此不表赞同。一路上这两位朋友谈的就是这个。巴哈里立刻建议和反对党领袖之一、社会党人拉姆·马诺哈尔·罗希亚会晤，此人当时正在阿拉哈巴德。勃拉哲士在世时我在莫斯科曾和他有一面之交，勃拉哲士说这个人是个好小伙子，但是相当怪。罗希亚留给我的正是这么一个印象。

巴哈里和比尔都是好人，他们一心要帮我留居印度，简直拦都拦不住。和他们一起在阿拉哈巴德度过的时光真可说是马不停蹄，疲于奔命。可是还多亏这两位“导游”，使我获得不少新观感。

在一个什么公园旁边，那里正举行竞选大会，巴哈里把拉姆·马诺哈尔·罗希亚找着了。社会党人的领袖想起了和我在莫斯科的一面之缘，马上就说起辛格的好话来。巴哈里三言两语就把我的“问题”和他说了。

“真是些孬种！”罗希亚喊了起来，他的眼睛闪着光。“我要为你的事到议会里吵架去！”

“不必了，不必了，”我赶紧说，“这样做无济于事。”

罗希亚沉默了一阵，然后深情地握了我的手。继续谈下去已没有时间，因为别人已经来叫他了，我们已处在人群包围之中。

看来，朋友们想把我介绍给阿拉哈巴德的所有有影响的人

物。晚上我们在“世界主义者俱乐部”时被介绍给著名律师和警察长。俱乐部人很多，气闷极了，客人们都已酒至半酣，放浪形骸。喝醉酒的印度教徒看起来十分丢人显眼。这可能是因为酒精与他们的习惯和传统无缘。那位知名的律师嘴里一面唱着，一只手老往我肩上放，我只好制止他。他于是便大声骂起总理来，说了一些影射她的脏字眼。他老婆好不容易把他拽回家去了。坐在桌上的另外一批人在讨论着怎么“帮”我。警长说，如果我下了决心要留下来，那么在“他的城”里，没有人敢把我怎么着。巴哈里和比尔已经把许多杯威斯忌喝下肚，此刻是中断讨论、打道回衙的时候了。

清早，我们和巴哈里两个小弟弟一起略略填了填肚子作早餐，他请求我回莫斯科时别告诉他父亲说他喝威斯忌……

然后他们又把我带去见达万法官，他是本地印苏友好协会主席。巴哈里认为，达万能出点主意。达万是个老来俏。只有他一个人说话的份儿，谈他在苏联旅行时如何如何。他立刻明白，所谓我的“问题”讨论起来要担挺大风险，不过他想尽可能表现得殷勤一些，把我请到他家去，老想刨根问底地盘问我。他家里有妻子，还有一个成年的儿子。他打破沙锅纹(问)到底：问我的父亲、母亲和赫鲁晓夫的事。当我告诉他，我知道想法子留在印度简直白搭时，达万松了一口大气，临别时用东方式的讨好语气对我说：“您真是又聪明，又迷人！”

后来，巴哈里家中来了一位地方报纸记者，他听着指手划脚的巴哈里谈话，不时向我提问题，然后就提笔记下来。这一切太危险了，我一心想回安静的卡拉康卡村，可是要脱身也并非易事。我们还在当地一位有钱的企业主家中作客，他的厂出产供全印度用的手电。他刚给自己盖了一所现代化的别墅，舒适而且漂亮，还有游泳池。房屋内部陈设全部欧化，并且颇不俗

气。漂亮而殷勤的女主人乐意地领我参观了各个房间。我不知道，用茶时有哪些人在座。不过谈的是农业。我于是也乐意地谈了一通我认为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失败处。哪知道座上还有一位共产党员，他使劲驳我：看来他根本没去过苏联，只读过一些小册子……

在阿拉哈巴德，我听了用锡他* 琴伴唱的即兴演出。这种乐器真是奇妙，孟加拉人对此颇为擅长。客人都散了，可我还坐着不想走。这位即兴艺人，闭着眼睛，忘了一切，曲调一个接一个，宛如流水潺潺。这次深夜乐声是印度留给我最好的印象之一。

我看到了阿拉哈巴德大学，它面积很大，和勒克瑙大学一样。我们还到了桑嘎姆—恒河和朱木拿河汇合的地方，那里才过了沐浴节，节日集市还开着。那些成千上万从遥远的省份步行来到这里的香客，这个时候并不急着各奔东西。在回家的路上，他们拄着拐杖，不慌不忙地走着。传统的力量是多么难以克服呵！它把这些人从几百英里以外吸引到这里来，为的是要在两条河汇合处的“圣水”里浸一下！

后来巴哈里和比尔又把我拉去参加当地的“国际狮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他们两个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我过去从未听过这个世界性“雄狮和母狮”协会，因此我就好奇地打量着那些衣着考究的印度和欧洲女人。忽然我听到主席发言中提到我的名字。我只好站起来，并说了几句我爱印度之类的话。就是在这里我的两位“响导”的咀巴也还是把不住关。我坚决表示我要回卡拉康卡村去了。不过他们怂恿说，我们还可以绕上百把英里的路程去看看“圣城”贝拿勒斯，我终于抵挡不住

---

* 一种多弦琴，属拨弦乐器，形似琵琶，亦译作“印度诗琴”。

这种诱惑。

坐在汽车里游览全国更全面些，而大树复盖下的道路尽管尘土很多，但是很有意思。我们驱车一路上经过了多少大树，多少街道集市，吃了多少恰帕提〔一种薄饼〕。这是一种和辣菜一起在炉子上煎出来的食品。辣得烧嘴，但特别好吃，如果就着喝一杯浓茶加牛奶的话，味道尤佳。慢慢地我对灰尘和泥土完全不在意了，路上的小吃并未给我带来坏处。

“圣城”给我的印象极坏，首先是泥和一种莫名其妙的臭味。在通往恒河岸边的街道上，半死不活、脱了毛的牛在逛着，脚底下到处是牛粪。要饭的残废人、垂死的香客就坐在尘埃里面。看见他们这个模样真揪心。

恒河岸边庙宇很多。在那里有祈神的，有洗澡的，有洗纱丽和印度腰布的。一座庙前的台阶上坐着一个长头发的老头，穿了一身红衣裳，他闭着眼睛在唱，就象火车里遇到的那位香客一样，只有这一个老头好看，其余的都令人看不上眼。船夫们招待游客到河上乘船游览，可是我拒绝了。卡拉康卡村荒凉寂寞的恒河比这里号称“印度教中心”的恒河要漂亮、庄严得多。

我想回卡拉康卡村去。我腻味这些吵吵嚷嚷的旅伴，他们在汽车里也手不离酒瓶，他们在我身边搞的那些手忙脚乱的场面，使我七窍生烟。他们原来是一些挺可爱的人，诚心诚意想帮我一把，可是由于他们扯旗放炮，在阿拉哈巴德搞得这样满城风雨，到头来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一点他们并不清楚，我也没向他们交底。好不容易他们把我送回卡拉康卡村，又喝了一玻璃杯饯别酒，才驱车离去。

当我一个人留在房间的时候，我又看了一下：手稿在不在原来的地方。这里谁也对它不感兴趣。这可太好了。柳芭·达

斯迪埃来电报了："我们将乐于同您在巴黎会晤。"我一边读电报，一边简直要笑出声来：这会儿要是能请我上巴黎等于是让我登月球……

早晨，在河岸上，我又见到一群农民，还有穿白色西式上衣和短裤的几个人。

"这也是和平队的美国人，"普拉卡施说。"他们教我们的人怎样测绘地形图。"

好奇的男孩子们在这一群人周围跑着。我忽然想同这批年轻人搭话，我只不过想看看这批美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小伙子们都挺逗人喜欢，他们问我从哪儿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之后，其中一位说，他有亲戚在拉脱维亚。我和他们一起约莫呆了五分钟就回去了。他们也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因为他们要工作。

当我回到家里以后，普拉卡施笑道："既然您自己已经认得这些美国人了，现在我就可以请在我们农业中心工作的那两位来喝茶了。让迪内希生他的气好了，反正这事不怪我！"

于是准备了茶和印度甜食，西利什终于把自己的美国朋友领来了。那个黑人叫米勒，淡蓝眼睛的叫史密斯。他们刮了脸，洗得干干净净，换了衬衣，年轻的脸上露出亲切的表情，他们高兴的是又能来作客了。米勒说，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做饭的厨子，他们觉得幸福极了。

"咳，这个厨子可不简单！"他喊道，"我真喜欢我们的厨子！"

印度农村的种种不便看来并未使这些健壮活泼的年轻小伙子在意。普拉卡施问他们，收到父母的来信没有，在这里工作有没有困难。可是他们一点不觉得困难——有了厨子就好办！这是一次令人感到愉快的会见，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会见，

因为如果我决定投奔美国人的话，我将会很容易地和他们打交道。

二月十七日议会选举的日子快到了。苏莱士非常激动：他发现选民名单里有几十个早就去世的居民。普拉卡施生气地说，在竞选群众大会上，国大党的支持者威胁那些不选国大党代表的人，还揍了那些为社会党宣传鼓动的人。

“这种事过去从来没有过！”她说，“他们吓唬我们的农民，因为这些人不懂得这是不记名投票。农民们以为只能投迪内希的票。”

选票实际上并不开列候选人的名字，而是代表各党的七个象征性图画。国大党的象征是一只犍牛，共产党——镰刀和禾捆等等。要在七个印章中挑一个盖在选票上。在最偏远的农村里目不识丁的老头儿、妇女们也会挑，只不过他们不知道选谁是好罢了。

选举在不同的日子里在各省举行。苏莱士家的收音机一分钟也不停。这是执政党性命攸关的日子。在许多邦，国大党的命运都如一发系千钧。

在卡拉康卡村所属的那个区，选举也非暴力莫办。国大党的对立面被毒打。连想都不让农民想，就催着他们盖章。这几天出进这家时时敞着大门的人都这么说。迪内希，不用说，获得了胜利，但是以非常微弱的多数当选的。现在他即将去德里，自己这个小小的王国又被他置之脑后了。

• • •

不久以后苏洛夫再次光临卡拉康卡村，带来的是莫斯科对我的申请毫不含糊的答复：“鉴于探亲目的已达，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印度。”

我已超出印度签证期限多住了一个月，现在印度外交部将它延至三月十五日。我除了回德里，别无他法。开往莫斯科的班机为三月一日和三月八日。

我只想赢得哪怕是多一个礼拜在乡下的时间，以便积聚我全身的力量。因此我请迪内希给我订一张三月五日由勒克瑙到德里的机票，同时把这件事通知了苏联大使馆。我给阿拉哈巴德的巴哈里和比尔写了一封信，说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走了。

在剩下的屈指可数的几天里，我在如今众人已经离去的卡拉康卡村徘徊，或坐在游廊上眺望恒河。过去我一直被逼得走投无路；此刻我的一切官能都警觉起来了，十分紧张。说不定这是生活给我提供的唯一的机会，去和过去彻底决裂。

我是否有勇气利用这次机会，还是又回到那条走了多年的莫斯科生活的老路上去？我本人究竟有无力量敢于踏上新的道路？我的决心时隐时现。这些天里，我不停地想着这些问题。我的手稿，那个通向另一种生活的门票，烧得我手指发痛。就算什么手稿也没有，我照样会进退两难。

在卡拉康卡的最后一天令人黯然神伤。普拉卡施一早起就哭开了。我处于绝望中，心情异常压抑，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象我这回是去自投罗网。

末了，我在每间房里都摆上鲜花——在我走后，好让他们想念我几天。东西装上了吉普车，它将载着我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颠簸三个小时。院子里满是人，都是村里来送行的。

西利什陪我去勒克瑙。我真想吻吻我亲爱的主人们，和他们一起我觉得十分满意。可惜印度不作兴亲吻。大家只欠身合掌告别。

“我会回来的！”我对他们说这个话时心里也明白，只有不回莫斯科的情况下我才会回到这里来。可是他们并不明白这

一层意思。

我们的吉普车转过砖墙，再也看不见恒河银色的粼粼波光了。我们的车慢慢地驶在上坡的窄小街道上。

这是那口老水井，这是学院建筑物，卡拉康卡村终于消失在眼帘中。我不知道，此次离别是暂别，还是永别……

归 无 计

三月三号和四号我是在勒克瑙过的，住在普拉卡施的侄女儿阿伦娜·辛格的家里。我不想在阿明阿巴德再买什么东西了。我勉强我自己和阿伦娜瞎聊。我们也曾上过馆子：乾净、价钱贵但是一点也不舒服。阿伦娜的丈夫和我谈他去日本的旅行，他特别欣赏日本农业采用的现代化耕作法。他拥有一个大农场，实现了印度条件许可下的机械化。通过实际他知道怎么叫作收成。晚上坐在小小的庭院里，我们长时间地谈论着所谓"社会主义"的试验在印度农村可说是毫无用处。

和年轻人待在一起极为愉快和有趣，不过我的心事翻来覆去还是那桩事，就象中了魔咒一样。这件事可对谁也不能提啊……

我想到我在莫斯科的家，那里只留下我的孩子们……

十四年来我和我的孩子们住在沿河大街的住所里，那是我头一回有的、真正的家。我是一九五二年搬到那里去的，那时父亲还在世，我和日丹诺夫〔指安·亚·日丹诺夫之子〕离了婚，不想再回到克里姆林宫去了。我七岁的儿子从这里开始上小学，后来卡佳也上了同一所学校。开始我家有佣人，孩子有保姆，后来，孩子们长大了，我们就自己操持并不复杂的家务。我在这里学会了使用煤气炉，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去这些事都是别人替我干的。我的老保姆认为，最要紧的是读书、上学，因此家里的活她从不教我如何干。现在我只得加紧补上这一课，但错综复杂的"家政科学"并不是一下子就学得会的。我高兴的是由我自己来付煤气、电费和房租了。住了那

么多年官邸，这可是生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住房。

孩子们占了两间房，我在卧室里安了一个书桌，客厅却很少利用：我们爱的是知心朋友，来宾恕不招待。我家真正的主要房间是厨房，桌子搁在朝外头院子的窗旁，窗外是一座硕果仅存的十六世纪的白色木雕小教堂。我们就在厨房里接待朋友，吃早饭、午饭，喝晚茶。孩子们放学时间不一样，各人有各人的课程表，但我们尽可能凑在灶边一起吃。在这里我们做简单的早饭和晚饭，午餐则到食堂买现成的。

十四年来我们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各人有各人一个小角落用于工作和休息，还有自己必需的书和简单方便的家具。我们是两手空空搬进这所一无所有的住宅的，克里姆林宫的东西我一样也不想拿，因为那个地方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我们慢慢地添置了一些必要的家什。只是在一九五五年我才向总理布尔加宁提出，至少将父亲生前的大量藏书中的一部分给我，因为这些藏书是打妈妈手里就开始搜集的。根据一切法律，这些藏书是应全部移交给我和孙儿女的。不过在苏联，法律是不起作用的，至于那个总理，他干脆对我的申请不予理睬。我也没有坚持一定要。我开始逐渐搜集了自己的一小批藏书，这样心里反而痛快些。

我家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各行其是。卡佳房间墙上都是马和骑手的照片。那里有一张杰奎琳·肯尼迪〔前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夫人〕带着小儿子约翰骑在马上、旁边卡洛琳〔肯尼迪之长女〕骑在小马上的照片。照片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

奥夏有一床越南凉席，墙上挂着镶银的牛角，还有格鲁吉亚的黑陶瓷。我的儿子是个美学家兼保守派。他知道我有搬动家具、重新摆设房间的癖好，可是绝不让我搬动他那张又旧又

破的沙发椅。他和我逗笑说："你都折腾遍了。现在是不是想把旧门堵死，另开新门？"他的特点是墨守成规、一动不如一静。

他从小就不踢球，不扯破或弄脏衣服，不玩"打仗"，不象其他小男孩那样。可能是在进小学之前有整整七年他象隐士一样孤独地居住在森林别墅里，因此不习惯于集体生活。他懒得搞运动，虽说他滑雪、游泳都挺棒。可是小小年纪他就爱好看书，十四岁时读起托尔斯泰的作品就手不释卷了。

我没有教他音乐，我认为英文课对他好处更大。可是他的听力和音乐修养都很好，很快就迷上了古典音乐，于是我们俩就一起上音乐学院去听室内音乐和交响乐演奏会。他喜欢亨德尔、海顿、维瓦尔迪*，我们喜欢听巴赫的管风琴演奏晚会，特别是德国人的访问演出。他有欣赏能力，他那一帮人很逗人爱，我特别爱看我们周围那伙年纪和他相仿佛的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管风琴演奏晚会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去听，我们在当时是极其个别的听众。时代和爱好都变了。我的儿子会跳各种最新式的舞，不过与他这一代人不同的是，他却不喜欢艺术中的现代派。

他画得不坏，完全可以成为职业动画片画家：他会画华特·狄斯耐**风格的十分传神的小动物和漫画。夏天我和他在别墅里出版幽默墙报以消磨时光，同我们邻居们的家庭出版物竞争。

他对人文科学和语言有爱好，不过他还是选择了医学这一行，为的是政治不会干预他的工作和生活。他愿意和永久性的

---

*1678—1741，意大利作曲家和小提琴家。

**1901—1966年，世界有名的好莱坞卡通片制作人，创造有米老鼠、唐老鸭等拟人动物形象。

价值准则打交道，免受风云多变的政治的影响。这并不是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象我一样，注视政局；但对于他来说，政治不是他生活中的基本部分，就象对于我一样。他想工作并善于工作，他会成为一个好的医生。他爱儿童和动物。他——这个安详、和平的创造者，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胜利之后，即一九四五年五月。我所有的成年朋友和女朋友都喜欢他，而他也乐于与长辈为伍。

我们搬到这所住宅时他是七岁，卡佳才两岁。他的启蒙读物是我买的，我教会他游泳、滑雪和照相。他第一次跳狐步舞是和我跳的。后来移交给他的有我的旧书桌、我的书、我对巴赫的爱好、对印度的着迷，最后还有我的那张床，在他和那个女孩子结婚时也送给了他。他和她吵吵又谈谈，整整拖了四年。

现在他面前展现的是艰苦而又能有所作为的医生生涯，他有一个可爱而勤劳的妻子，他父亲对他简直爱煞。比起卡佳来，他不怎么特别挂念我，他已经不再需要我了；能为他做的，我已全都做了。

卡佳生于一九五〇年。她是在这个灰砖大院里的小朋友堆里长大的，看来合群是她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点。这是一个无忧无虑、开朗、没有心眼的小东西，两颊绯红，老是和一帮子人结帮成群，叽叽喳喳。她喜欢滑雪、打乒乓、打篮球，时时刻刻都在动。十二岁上头她就停止学音乐，她自己说，倒不如把这些时间花在骑马上，打这以后她就乐此不疲了。夏天在体育馆她还和一群象她这号顽皮女孩结伙甚至还踢足球。

《战争与和平》这部长篇小说她连一半也读不下去。长篇小说她读起来味同嚼蜡；她从不分析自己，也不分析别人。小时候她喜欢童话，幻想题材，后来自己还编了一些，日后她又迷上科学幻想小说了。她和我儿子一样，在班里作文名列第一，

信也写得生动。不过总的说来，文学和艺术不是她的行当。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学、矿物学，她认为要有趣得多。

遗憾的是她的美学观点欠缺一些。可能这要等稍长时才会出现，不过在十六岁的年纪里她对式样和颜色都不讲究，她太需要活动和实干了。她不会穿着打扮，奥夏和我不得不提醒她，而莲诺奇卡则替她梳头，把发式搞得挺合适。

和那些谈过不止一次恋爱的同龄人比起来，她大大落后，她和男孩子要么是好朋友，要么就吵架。她是一个不自私、好心眼而且能推心置腹的朋友，难怪和她年纪一般大的青年都喜欢她。她能毫不畏惧地走到别家的恶狗前面，最喜欢爬到性子暴烈的马背上，如果掉了下来，就再爬上鞍去。她从家里带新鲜水果、蔬菜和白糖喂马吃。

她很温存，也很朴实。一盒巧克力会使她惊喜万状，就象是得了半个世界似的。她的唯一物质财富就是巧克力和书。在衣着方面她十分随便，这使我那个格外注意外表的儿子很看不惯。世界上她最喜欢的衣着是紧身裤和套头运动衫。

她的不务实际的程度使我为她的日后担忧：她不会缝补、不会熨衣、不会作饭。而这些我的儿子却干得挺好。不过她解起算术题来十分顽强，她知道她自己需要什么。哥哥和妹妹两人秉性各不相同，但他俩很要好，不在一起就想念。

他们两人都是"妈妈宠爱的孩子"。家里多年来一直是我说了算。我们一家过得亲密无间，后来莲诺奇卡又加入了我们的阵营。有年轻人生活在身旁是多么好啊！他们的年轻的声音就象鸟儿的啁啾。

他们俩开跳舞晚会时跳扭摆舞、摇摆舞和扭肩舞，跳什么都好看。平常家里总是冷冷清清的。孩子们一早就上课去了，回家以后急急忙忙到厨房，把现成的午饭热一热就吃，然后各

自回房。在房里他俩都是坐在书桌旁啃书，半天足不出户。他们生长在安详和爱抚的环境中，热爱劳动和安定。他们的本性既不好斗，也不爱破坏，不过他们有充分健全的批判性的理解力，这是世界各国他们这一辈人所固有的。

这一代人对假话很敏感，有如芒刺在背。他们渴求的是真实、自然和自由的生活。他们相信现实，而不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其它的“主义们”并不吸引青年一代的头脑：“主义们”早已过时了。

如果我不回苏联的话，孩子们的生活也不会改变：它已安排得有条有理，三个人一起友爱团结，他们会继续工作的。他们的周围都是爱护他们的朋友们，他们各自的父亲也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的。

奥夏的父亲是莫斯科著名的国际法和外交政策专家。在我和他分手以后，他老想介入奥夏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子女；卡佳的父亲是苏联最大的大学之一的校长、生物化学博士。卡佳和他的父亲关系挺好，虽然他住在罗斯托夫，已另组织家庭，跟前还有一个小儿子。可是这一切并不妨碍这父女俩对精密科学的共同兴趣。不用怀疑，在她日后受教育方面他会助她一臂之力的。再说，孩子们能离开母亲展翅飞去，这样对他们好处更大些。我的心对他们是难以割舍，但他们却并非缺我不行。不过他们现在叫我回去……

还在卡拉康卡村时我收到儿子一封充满亲子之爱的信，他写信从来是如此的。他写道：

“好妈妈，亲爱的，你好！收到了你的信和电报。非常奇怪的是我打给你的那封电报你竟然没有收到。我想，它大概是在那儿给弄丢了……我们一切都好。你委托办的祈祷书我们已拿到手，别的事都算顺遂，就只一样：卡佳很想你，我也很想

你，希望快点见到你。在日常生活方面我们过得非常好……

我们这里是这么过的：卡佳放假时她和丹娘一起上别墅去了。我俩放假时我们上第比利斯的表姐家去了。这一段时间O.C.一直在此照顾卡佳。总的情况都很好，就是有一样不好，大家特别想你。没有你，日子特别难过。请快些回来吧！让上帝保佑苏莱士·辛格本人和他一家身体健康。紧紧亲吻你，迫切等待着你回来。吻你。奥夏。”

• • •

除了亲子之爱和对朋友的眷恋之情，没有什么东西使我割舍不下。

我整个一生只不过是枯萎而死的树根——这树根原本就不牢固、不实在。我不留恋那些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不留恋莫斯科这个我曾生长并过了一辈子的地方，不留恋那些我从小就生活在其中的一切。

我当时是四十岁。其中廿七年我是在沉重的压力下生活过来的，随后的十三年我才逐渐从这个压力下解放出来。在苏联，那廿七年（1926—1953年）被历史学家称为“斯大林主义时期”，是个人专制时代，是血腥恐怖、经济困难、残酷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反动时代。

一九五三年以后我们的国家渐渐苏醒并且缓过气来。恐怖似乎已成为过去。但是多年来形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仍然一息尚存，牢固地附着在党内，残留在千百万被奴役、被迷住眼睛的人的思想意识中。

我虽然说是生活在“金字塔的顶峰”，在真情最难上达的地方，但我的整个生活和全国的生活一样，也同样分成两个阶段：即一九五三年以前和一九五三年以后。

对於我，从精神囚禁中获得解脱的过程和其他人有所不同。不过这个过程顽强不懈地进行着，真理象滴水穿石，透过了花岗岩。

“水滴石穿，非力使然，恒也。”这句拉丁名言我在大学时就能背了。

否则我现在就不会在勒克瑙寻思我该怎么办，而是安稳地住在格鲁吉亚，在那里父亲的名字依然倍受尊敬，或是在哥里城的斯大林博物馆向参观者介绍他的“伟大的事业”和“成就”……

我出生和成长的家庭，一切都不正常，样样令人窒息，母亲的自杀就是这种走投无路的最雄辩的象征①。我周围是克里姆林宫墙，家庭、学校、厨房都有秘密警察。那个精神空虚、冷酷无情的人，被一堵墙把自己和老同事、老朋友、所有的亲人以及整个世界隔离，伙同自己的同谋将国家变成监狱，在那里凡有生命、有思想的都被扑灭，无一幸免，那个引起千百万人恐惧和憎恨的人——这就是我的父亲……

如果命运使我投胎在某一个无名的格鲁吉亚鞋匠的草房里，又如何呢？* 那我也会象其他人一样，也会极其自然而且毫无顾忌地憎恨那个远方的暴君，憎恨他的党，他的言行。何者为黑，何者为白，这难道不清楚吗？

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生为他的女儿，在童年时还是他

①在谈到过去、谈到我在苏联的生活和家庭的相互关系时，我不得不重复引用一些我在《二十封信》内所提到的若干事实。这是我在1963年8月写的第一本书。那时我写的只是家史，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会有可能离开我的祖国。不过这些往事却是日后的各种决定和事件发展的根据，这在当时无论是在书里或是生活中都是预料不到的。

* 斯大林的父亲为鞋匠。

最宠爱的的女儿。我的青年时代是在他不容置辩的权威下度过的。一切都教导我、强迫我信仰这个权威。如果周围有哀声的话，那我只能想，这是别人罪有应得。二十七年来我是我亲生父亲精神毁灭的见证人；我一天天看到，一切有人性的东西如何离他而去，他逐渐变成一座阴气森森的纪念碑……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却被教导说，这个纪念碑就是共产主义一切美好理想的体现者，它的活的化身。

我们几乎是从襁褓中就受共产主义的教育。在家庭、在学校、在大学里都是这样。我们开始是“十月儿童”*，继而成为少先队员，最后就是共青团员，然后就吸收入党。如果我在党内不担任工作（象许多人一样），只交纳党费（象大家一样），那我总归得投票赞成任何党的决议，哪怕我认为这个决议不正确。列宁是我们的圣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圣徒，他们的每句话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父亲的每句话——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是上天的启示。

在我青年时代，共产主义之於我简直就是中流砥柱，不可动摇。不可动摇的还有我父亲的威信，他的一切都绝对正确。可是后来我开始逐渐怀疑他的正确性，愈来愈相信他无缘无故的残酷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教条在我的眼睛里逐渐褪色、凋谢。党失去了它的正义事业的英雄、革命光环。一九五三年以后，当这个党笨拙地、无望地试图摆脱它的前领袖而与之脱离关系时，我进一步看到这个党和“个人迷信”之间的内在的深刻一致性，它在二十年来一直是支持这种“个人迷信”的。

我不仅逐步对父亲的独断专行有所认识，而且也对他亲手

* 指苏联过去预备参加少先队的7至11岁的儿童。

建立的、戕害了千百万无辜牺牲者的血腥恐怖制度看得更清楚了。我也渐渐明白，不管那些同谋犯如何煞费心机，他们也不能逃脱罪责。这时，那座建筑在谎言基础上的整个大厦，一下子从上到下散了架。

一朝看见了东西就不能再装瞎子。对於我来说，这个豁然省悟的过程并不是轻松的，也不是三下两下就完事的。它仍在继续。我们这一代人对我们国家、革命、党的历史太无知了，人们对我们隐瞒真情为时太久了。

我是在家里、在亲人群中了解我父亲的。他和大家搞不来，喜怒无常。可是我长期一直不知道他为了取得个人独裁的权力、在党内与过去自己的老同志进行的政治斗争史。我越知道得多——有时，消息来源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我的心一次比一次凉，由於恐怖而几乎要停止跳动，我真想毫不回顾地逃走，管它上哪儿……要知道这是我的亲老子，一想到这里，真情就显得更加可怕。

官方对所谓“个人迷信”的揭发在我看来并没有说清楚什么。这个愚昧的术语本身就说明：党并不愿也不可能对这个与民主为敌、与民主相悖的有害的基本理论作出结论，并且源源本本和盘托出。不是政治侈谈而是生活本身——以它的意想不到的反常的东西帮助我懂得了真理。虽然我的母亲早已不在人世，但是我应将一切首先归功於对她的记忆。

我六岁半以前的岁月在慈母温暖的怀抱中度过，这有如和煦阳春的童年将使我终生难忘。我记忆中的妈妈非常美丽，落落大方，浑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虽然我完全由保姆和家庭教师教养，但在我童年生活的全过程中，处处都是妈妈慈祥的关怀。她认为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文化教育和道德观点的培养。诚实、劳动和正义她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真理的结实而又棱角分

明的晶体是她性格的基石，这性格要求人不能“单凭面包”活着。她不到三十岁的时候，还在学习，想成为一名纺织工程师，她希望摆脱她的“高位”，“高位”只能使她感到压抑。

妈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对革命的态度充满了诗人般的浪漫主义色彩。她相信：人在首先改善自身以后，才会建立一个美好的未来。她的老朋友们——波林娜·莫洛托娃、朵拉·安德列耶娃、玛丽亚·卡冈诺维奇、叶卡捷林娜·伏罗希洛娃以及阿什罕·米高扬都这么说她的。她还有许多和她更亲近、趣味更相投的女友，都是她过去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但是在她死后我就没有见过这些人了。我只知道她过去的音乐教员普赫里亚可娃，一个非常有才能、有风趣的人。事隔多年这位老师又教我音乐，她谈起妈妈时总提起她奇妙的演员禀赋。

我的外婆到老还是一个有血性、嘴巴把不住关的人。她常念叨说：“你妈是个笨蛋！”她一开始就怪她不该和我父亲结婚，这种一针见血的“评价”反映了现实主义者对浪漫主义者和诗人的看法。我的姨妈和舅妈们说，我妈是个稳重、端庄并且有些忧郁的人，和我外婆的急脾气全然两种秉性。她们说在她这个年纪，她太“严厉和严肃”，太“循规蹈矩”了。凡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在后期是不幸、幻灭和抑郁的。

当我父亲成为她心中的革命英雄时，她才十六岁。成年以后她才明白，她错了。她立身之道和我父亲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以及凶残发生了冲突。周围发生的一切完全不是按着她认为正确的轨道运行，而我父亲也并非她心目中描绘的那个理想的化身，倒不如说刚好相反……

据她的姊姊说，她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有一天她把孩子带上，到列宁格勒去了，打算从此不回到父亲身边，可是后来

还是回来了。后来她又想上乌克兰去找她的姊姊，然后在那里工作。她和我父亲争吵，对镇压表示抗议，可是这都没有用：她根本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她自杀时才卅一岁，是因极端失望和无法改变现状而绝望致死的。

这是在一九三二年，可怕的饥馑年。这一年正逢竭尽全力完成五年计划，实行强迫性集体化；这一年在党内要求撤掉我父亲总书记职务的呼声也很高。

妈妈在死前给父亲留了一封遗书，里面全部是政治性的指控。这封信当时只有最亲近的几个人得以读到，后来很快就被销毁了。它的政治性远比党本身对当时发生的情况的看法要重大得多。

一九五四年我的姨妈和舅妈才从监狱里放出来，她们告诉了我这封信以及妈妈自杀的事。当时父亲已死，我也已成年，她们经过这么一场大变故之后是不会对我说假话的。她们说，当时这件事如此使人惊骇，以致大家只有张皇失措的份儿，一心只想到如何掩盖真象。故此遗体未经医生检验，没有医学结论，讣告中只神秘地提到“骤然死于十一月八日深夜”。在出殡以前也不让对尸体作防腐处理；谁也不许进门。

对父亲这位大人物的反感、恐惧和仇恨在这一年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以致关于谋杀之说很快就传开了。这一说使许多人认为比自杀之说——一个这么年轻、健康、大家都喜欢的妇女哪能去自寻短见——似更近乎情理一些。我不止一次地听过关于谋杀一说的各种版本，尽管多种说法自相矛盾，但归结到一点都是说死者是父亲杀害的。

与此同时，照我姨妈和舅妈（妈妈的姐姐安娜·雷登斯和她的嫂子叶芙吉妮亚·阿里卢耶娃）所说的，当时父亲对此事比谁都震惊，因为他完全知道，这件事是对他本人的挑战和抗

议。他都未能强使自己去参加葬礼。他心力交瘁，六神无主。他一向把母亲看成可靠、忠实的朋友。她的看法和意见，凡与他相左的，他一概嗤之以鼻并加以贬斥，这只不过因为他看待妻子、家庭，从来是"亚细亚"方式，即从这个字最庸俗的涵义上来行事的。打这件事过后，他就变得更凶狠了。一九四八年他竟不惜让姨妈和舅妈去坐十年牢，仅仅是因为她们"知道的事太多"。至于在党内，后几年里存在一种铁定不移的官方说法，即妈妈原本是个"神经病患者"，有关她的事有失体统，不值一提。我是在一九四八年——一九五〇年间在日丹诺夫家听到这种说法的。

凡认识妈妈的人都喜欢她。她的亲近朋友中有布哈林和基洛夫。毫无疑问，这两位的自由和民主观点较之我父亲的暴躁对她更亲切些。布哈林和基洛夫乐观地认为，可以使父亲"近朱者赤"。妈妈则失去这种乐观的信心，因此终于绝望而死。她倒是比两位有经验的政治家更有先见之明。

妈妈、布哈林以及基洛夫这三位亲近的人的惨遭不幸，深刻和无情地向我说明了"斯大林主义"的实质。他们三个人都曾以各自的方式反对这种制度，可是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他们竟然败北阵亡……象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其它同谋者，他们曾胆小怕事地给父亲撑过台，而在父亲身后却又希望逃脱罪责，这些人能同我说得清什么问题呢？！

妈妈死时我才六岁，因此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知道真象。在随后的十年中，我只能看到，她亲手努力培育的一切如何连根毁掉。家里的家庭教师和佣人都给赶走，儿童教育制度全部搞垮，作为这种教育制度的象征——别墅里的我们儿童游戏场地也给平掉了。妈妈的一些简单家具和小玩意也搞不见了。她的笔记本、私人用品全部收起来上了锁，钥匙放在国家安全部派

来的警卫队长手里。现在整个房子都有军队把守，佣人也是国家安全部派来的领工资职员，头头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大尉。妈妈生前住的房子不复存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住房、我们的老别墅以及父亲现在去住的新别墅开始有了官方称呼："某某号项目"。

母亲死后的十年我过着单调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住在克里姆林宫里就象住在碉堡里一样。我跟前唯一的好心人是我的保姆。那些年里我还不明白国内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即便是我家也逃不了残酷的悲剧。一九三七年我父亲第一个妻子的哥哥、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阿列克赛·谢·斯瓦尼泽和他的妻子玛丽亚一起被捕。他的姐妹玛丽科也被捕。接着我的姨父、波兰共产党员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也相继被捕。斯瓦尼泽家三口和雷登斯瘐死狱中。禁止姨妈来看我们这些孩子。我的舅舅巴维尔死于心力衰竭，原因是他对亲人和大批朋友被捕一事感到骇然。尽管他在父亲面前力陈这些受害者的无辜，但到头来也是枉然。也禁止他的遗孀同我们会见。我的外祖父母实际上也不能见到我父亲，因他不愿听这些人追问有关"失宠亲属"的下落，而这批人之死，毫无疑问，除了父亲本人，别人是无权批准的。

一个十二、十三岁的女学生是不能全面思考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怎么也不能设想，"阿廖沙舅舅""玛露霞舅妈"和"斯塔赫姨父"就是那些"人民公敌"——这是当年的官方宣传，连对中、小学生都是这么说的。我只好退一步想，他们一定是卷到同一桩悲剧性的误会里面去了，"就是爸爸本人"也搞不清。这件不限于我一家，而是遍及全国的事情，不能不和父亲的名字联系起来看，但等我顿然醒悟过来，这已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在那些年里我想都想不出来，他居然能把他相

识的正直的规矩人无缘无故地处死。只在稍过了几年，等我已成为青年的时候，某些意外发现才使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

我十六岁时才知道，妈妈是自杀身死的。这对我是一次非常痛苦的发现。当时正在打仗，那年冬天我和姨妈、外婆一起住在古比雪夫。我一问起她们一些情况，我马上就明白妈妈是非常不幸的。她和父亲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分歧：从政治到子女教育。我从来喜欢我的妈妈，虽说她并不娇惯我们。我这才感觉到，父亲是太不对了，母亲的死他是不能辞其咎的。他的绝不动摇的威望晃动得厉害了……

对我的教育是：对父亲绝对服从和尊敬。无论是在家、在学校里、在一切地方，他的名字从来是和“伟大”、“英明”这些形容词连在一起的。我知道，他爱我胜过爱两位哥哥，看到我学习好他挺满意。我很少见到他，他独自住在别墅里，不过从妈妈死后到战争开始，他还是尽力多多关心我。在长成以前我对他是十分敬爱的。

可是“青春造反期”来到：在这个期间，一切权威都受到批判，而首先是父母的权威。我忽然觉得妈妈这个形象里有某种绝对真理。我记忆中的妈妈、别人口中的妈妈也都有这种绝对真理，而父亲身上的这种威信却忽然消失得一干二净。以后情况也愈来愈朝这个方向发展：我知道妈妈的事越多，妈妈在我眼中的形象就越高大，可是爸爸却失去了他头上的光环。

没过一年，又发生了一件新的打击事件。我那时是一个十七岁的中学女生，有一个比我大廿岁的人爱上了我，我也爱上了他。这种天真无邪的恋爱无非是在莫斯科大街上蹓跶蹓跶，看看戏，看看电影，两个类型不同却又心心相印的人含情脉脉的相互眷恋，如是而已。可这么一来居然使我周围的“代理人”

惊恐万状，而父亲也十分震怒。

这位年事已长而且成熟的人心里明白，他的罗曼斯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是明摆着的事。于是他打算离开莫斯科。可是他忽然被捕，被控犯有间谍罪，流放到北方五年，随后又送去劳改营呆了五年。毫无疑问，他的被捕是奉父亲之命执行的，我后来知道了：是他授意的。毫无道理的专横到如此程度使我很久都不能镇静下来……要救这个人可说毫无办法，父亲从来不肯收回成命。

这一年之内我的两次发现，使我和父亲永远离心离德，后来几年我们之间裂痕更深了。

战后父亲几乎绝足不到克里姆林宫的家中来，只住在别墅里，因此我们很少见面。我再不是他的掌上明珠，我对他的女儿之爱和尊敬也象云雾一样消散了。但是我对父亲“政治发家史”的理解还不甚了了。我和他疏远，在开始时还只是和他这么一个人疏远而已。

克里姆林宫和俄国其它地方中间隔了一堵墙，真理根本进不到这里来。在这堵墙内，我象生在没有水源的悬岩绝壁上的一株植物，渴望阳光，以空气中一点什么东西为养料。这片峭岩就是我的家，我老想离开它，朝外生长。小学、中学、大学是我散心遣愁的地方，光线和清风从那边过来；我的朋友们不在克里姆林宫里面，而在那边。

我这一辈子在朋友当中总是格外幸福：他们坚决把我本人和我的姓氏分开。他们把我当成同龄人、女大学生、年轻妇女——总之是人就是了。我小学和大学的朋友们和我终身为友。赴印度前最后一天我见到了他们。书本、艺术和知识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父母亲或亲属被捕，我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对我的态度并未改变。可能是妈妈给他们

留下的好印象使然。

一九四〇年我班一个女孩子的父亲被捕。她和我很要好，一天她带来一封他母亲写给我父亲的信，请求挽救自己的丈夫。吃晚饭时我把这封信交给他。那晚有很多人在我家吃饭，于是自然而然地大家都讨论起这封信来了。莫洛托夫和其它一些人记得这个人。他名叫斯拉乌茨基，曾任苏联驻满洲公使，后来一段时间还担任过苏联驻日大使。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奇迹——他获释了，几天之后就回了家。可是后来绝对禁止我再转交类似信件，为此父亲训斥了我很长的时间。不过这件事就足以说明了：一个人的命运就只取决于他几句话。

有时候父亲突然对我说："你干嘛老和那些父母遭镇压的子女来往？"看来，人家已向他汇报了。这种不满情绪的结果经常是：学校校长把这些孩子从我的班调到一个平行班去。但是时间一年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彼此来往，他们对我的友情仍和以前一样好。

到大学以后，熟人圈子就扩大了。我常到女朋友的家里去，看到他们住的无人管理的公用住房。很少有人到克里姆林宫我的家里去。我也不愿叫他们去。来此必需先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口登记"入门证"，我为这些规矩感到难为情。

大学时代我们的"俱乐部"是莫斯科音乐学院。我在那里总可以碰见旧日的同班同学。音乐是最伟大的赏心乐事之一，它提示人们，那美好、永恒的东西是长存的。战后那些年知识分子的生活越来越暗无天日，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稍有一点想独立思考的苗头就会严惩不贷。人们到音乐学院来为的是吸一口新鲜、清洁的空气。

在大学我修完了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摘录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然还有斯

大林的话。学了这些课程以后，我只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所研究的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与苏联国内现实生活毫无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义就其经济意义说来象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关系方面这是某种奇怪的杂交品种：官僚军营式的制度，其秘密警察有如德国的盖世太保，而我们落后的农业使人想起十九世纪的农村。马克思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这样的事。进步一说早已置诸脑后。苏维埃俄罗斯和她历史上一切革命的东西脱离关系，她仍旧走大国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老路，将廿世纪初的自由代之以伊凡雷帝* 的恐怖……

我虽然和克里姆林宫圈子里许多青年都熟，但我和他们搞不到一块。这里普遍的情绪是从克里姆林宫挣脱出去，大家的朋友都在克里姆林宫墙的另一面，这是规律，而不是例外。

我喜欢温柔敦厚的知识分子。可是，不容我选择的是，这些对我非常热情的可爱的人们常常是犹太人，学校里、大学里都是这样。我们要好又彼此相爱；他们才华出众而又诚恳待人。父亲对此极为愤慨，在谈到我第一个丈夫时，他说："这是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他硬塞给你的。"简直无法让他相信事情并非如此。

战后那些年反犹太人运动成了杀气腾腾的官方意识形态，尽管对这一点尽可能加以掩饰。哪儿都知道，在录取大学生或招收工作人员时还是情愿挑俄罗斯人，给犹太人的名额只不过是按百分比规定的而已。这是沙皇俄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借尸还魂，当时对犹太人的态度一直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反动官僚的分水岭。在苏联，只有在革命后的头十年，反犹太

* 即伊凡四世·华西里耶维奇，1530—1584年。他在位期间巩固了专制政权的俄罗斯国家。

主义被人遗忘。可是随着托洛茨基的遭逐，随着大“清洗”年代的大批老党员被消灭（他们当中有许多是犹太人），反犹太主义在新的土壤上，首先在党内，又重新孳生。对此父亲不仅多方支持，实际上他本人就是始作俑者。在苏俄，反犹太主义在小市民和官僚制度中间本来就根深蒂固，这么一来，它就更以瘟疫传播的速度向深广蔓延开来。

一九四八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几乎成了一件蓄意谋杀事件的见证人。这是党内开展反对艺术领域中所谓“世界主义者”的黑暗时期，那时矛头所向是向西方影响哪怕沾了一点边的人。正象过去常有的事，这只不过是藉以收拾那些不顺服的人的口实。在这一次，其“斗争”却具有公然反犹太主义的性质。

莫斯科那时的气氛异常沉重，大逮捕再度开始。莫斯科犹太剧院封闭了。当时的院长是米霍伊耳斯。宣布这个剧院为“世界主义者的温床”。米霍伊耳斯是位著名演员、知名社会活动家。战争期间我听过他的演讲，当时他以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刚从英美回来。他带回美国毛皮工人送给我父亲的一件礼物——一件皮大衣，在皮袄的反面，每一小块毛皮板上都签上了赠送者的名字。（这件皮大衣我没有见到过，它和其它礼物一起保存在不知什么地方，不过我这是听父亲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说的。）

当时我极少机会和父亲见面。在偶然一次和父亲在别墅会面时我走到他房间里，正好听见他在和什么人打电话。我在旁边等着。电话里是别人在向他汇报，他听着。后来，他象下结论似的说了一句：“好吧，汽车车祸。”我清清楚楚记得他当时的语气：不是提问，而是肯定语气，是答复。他不是问，而是提建议：汽车车祸。打完电话以后他就和我打招呼，过了一阵

子，他说："米霍伊耳斯因汽车车祸撞死了。"在第二天我到大学上课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她父亲在犹太剧院工作了很长时间——哭着告诉我，昨天在白俄罗斯，坐在汽车上的米霍伊耳斯惨遭杀害。各报的报导也写的是"汽车车祸"……

他是遭杀害的，根本没有发生任何车祸。"汽车车祸"是我父亲在别人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建议的正式说法……我的头脑里轰的一声。我太知道了，父亲处处杯弓蛇影——"犹太复国主义"和阴谋。不难猜出，为什么人家要向他"汇报执行情况"。

过了几天之后，我获悉姨妈和舅妈被捕的消息。这两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和政治毫无干系。不过我知道，父亲对我姨妈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雷登斯的回忆录非常震怒，同时对巴维鲁沙舅舅的遗孀不久后即再醮，下嫁犹太人工程师这点也极为不满。于是他和她同时一起被捕。"知道得越多，也说得越多。这对我们的敌人有利。"父亲这样给我解释他们被捕的原因。

他仇恨全世界，再也信不过任何人。"你本人就发表反苏言论，"他当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和他简直没法说话；我开始避免和他见面，他也不怎么想见我。后来几年我们几个月才见一次面，有时还隔得更久一些。我一点不想亲近我父亲，每次会面以后我都急着要走。一九五二年夏天我终于带着孩子们搬进城里的住宅，他们现在就在那里等待着我。

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的冬天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一段时期。由于"犹太复国阴谋"罪名遭到逮捕的已有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前外交部副部长罗佐夫斯基，林娜·施特恩院士和许多其它人。还捏造了一个"医生案件"，这些医生们似乎也卷入了反政府的阴谋。共青团书记尼·亚·米哈依洛

夫* 的妻子那时对我说："我恨不得把所有的犹太人统统赶出莫斯科去。"看来，她的丈夫就是这么想的。这正是当时的一种官方情绪，究其根源，根据我的猜想，还是在最上头。可是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召开的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还在侈谈什么国际主义……

所有的蠢事之外还加一件：剑拔弩张。因为一件芝麻大的事竟把美国大使乔治·凯南逐出莫斯科。当时有一位炮兵上校、我哥哥们的同事用信任的口气对我说："咳，现在**开始干**正是时候，**战而胜之**，趁你父亲还活着！我们现在可真叫所向无敌哪！"如果认真琢磨一下这些话，实在可怕，不过看来这种思潮在政府里面也有。大家都不敢说话，这是惊雷之前的万马齐喑局面。

就在这当口我父亲死了。闪电向山巅劈下，隆隆雷声响彻大地，预示着温暖的沛霖，预示着拨开云雾见青天……一切都在期待着无云的万里晴空。所有的人呼吸、说话、思想、走路都觉得轻松些。这其中也包括我本人。

我在父亲的病榻旁度过了三天，我亲眼见他死去。我当时既痛楚，又恐怖，因为这毕竟是我的父亲。不过我还是意识到而且也知道，在他死后随之而来的是解放，我懂得，这也是我自己的解放。

在出殡前那些日子里，我曾长久地站在灵柩旁，看着那些通过圆柱大厅的人流。人们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很多人哭……有的拿着花，有的带着好奇心看着，想搞清楚一下——是的，他真的不在人世了。有时我的眼光和我多年不见的学校同学的眼光相遇。我最感到害怕的是我自己的感情也是矛盾的。我又

---

*1906年生，十八、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及《共青真理报》总编辑。

悲痛、又觉得松了一口气，我责怪我自己不是个孝顺女儿。和遗体告别时理应吻死者的额头，我周围的人都望着我，等我这样作，可是我就没有让自己吻他。日后我一次也没到过克里姆林宫墙边父亲的坟墓。

那些日子莫斯科是一片惊慌，再说也不仅限于莫斯科一地。有一部分人真心真意地哀哭，另一部分人同样真心真意地诅咒和高兴。我收到几十个陌生人的唁函和唁电。监狱里和劳改营的几百万人却大声高喊"自由！"，因为他们知道，自由的钟声终于敲响了。

通向圆柱大厅的莫斯科的各条街道，人群拥挤，以至秩序大乱。进入圆柱大厅内我必须先经过一个小房间，一些部长、政治局委员、将军和元帅们都在此等候轮到自己守灵。这时我听到一位将军激动地对另一个说："外面的人群真不象话。"他刚去了一趟，以便"采取措施"。赫鲁晓夫刚好也在，他听见了这些话。可是他的反应完全是另外一种声调："我去走一趟，和老百姓谈一谈！""人群"即"老百姓"，怎么说，是在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政府呢，对任何预见不到的麇集的老百姓都畏如水火，张皇失措，找不出比使用警察手段更好的办法。

民警和卡车包围了中心区，以阻止涌向这个方向的人群。于是发生了惊慌，混乱，造成伤亡事故。"和遗体告别"变成另一次血腥恶梦……

那个春天，当爱伦堡象征性地称之为"解冻"的时节，大家都在期待着，认为全国脱掉脚镣手铐之日终于盼来了。人人都知道，非变不可而且马上要变。希望当然是寄托在独一无二、非它不可的党的身上，因为，遗憾的是，国家除求助于它之外别无他途了。

党内许多人——从上到下——都明白，党这时需要的不是对偶象和教条的崇拜而是民主化，是已禁锢得发僵的内部力量的解放。农村在等待着从毫无成效的、坑害人的集体农庄制下面解放出来。工业则热切盼望能从中央的官僚主义紧箍咒下解脱。工人们等待的是老早向他们许了愿的工人参加生产、参加劳动收入的分配。由于意识形态的禁忌而落后于全世界的科学也必须着手进行国际性知识交流。艺术家们想自由而纵情地写、唱、创作，按艺术家只能那样的方式工作。使每个人免于时时刻刻为自己的生命、为亲戚朋友的生命而提心吊胆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从套子里取出来的自由旗帜忽然在大家头上飘扬，那些“领袖们”，就如同班里没有老师看管着的小男孩一样，互相抢这面旗，为了要把旗抢到手，不惜相互以拳头相向。每个人都想成为“伟大的解放者”。

在这个权力之争中，贝利亚和他国家安全部的同谋们首先吃了枪子，“揭发”他们是“国际间谍”。再就是布尔加宁给踢了下去。然后代表进步的马林科夫被控和保守分子莫洛托夫及卡冈诺维奇结为“反党集团”。他们被指控为颠覆分子。新的“替罪羊”接二连三地物色到、发现到……要知道，国内和党内都没有别的招儿，因为五十年来在极权制度下，它们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民主自由之于这代人简直是海外奇谈。

正当千百万人民在屏息等待着，并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在克里姆林宫里，在“集体领导”的掩盖下，宫廷政变一个接着一个。一切都按往前跳一下，又往后拽一下这样进行的。进一步，退两步。开大炮轰麻雀。让“替罪羊”去上绞架！可是最重要的是别让人民发现由他们自己开始来统治自己的国家的时刻业已来到。如果什么诗人和知识分子

们要提醒老百姓这件事，就封住他们的嘴！让他们一劳永逸地记住，在苏联只有克里姆林宫才有权利去思想、去说话、去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别瞧是血腥历史，克里姆林宫和党一贯“英明”、白璧无瑕，出污泥而不染，有如贞洁的处子……

赫鲁晓夫捞着了解放的旗帜。这面旗原本也可以同样成功地落在马林科夫，或是布尔加宁，或者甚至那个贝利亚的手里，因为消灭多年的恐怖制度本是国家的头等要事。

二十大以后的那些年里，成千上万的无辜者从监狱和劳改营回到了生活中，消灭了警察恐怖，开始了与国外缩手缩脚的接触，作了一些解除工农业集中化的尝试。紧张缓和了，战争威胁延期了，取得可靠的和平的希望开始生根。科学、艺术、意识形态在试图从教条主义下解放出来。可是也就是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匈牙利的血腥事件，格鲁吉亚的大学生和诺沃切尔卡斯克的工人遭到枪杀。

一九五六年三月，几百个格鲁吉亚的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在第比利斯党中央委员会门口，要求澄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关于这件事的传闻刚刚传到这里，正象在苏联通常的情况一样，这件事什么人都毫无所知，只知道这一次是把斯大林的“照片取下来”。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吓得要死，赶紧调来了军队。游行是和平的。为了表示对“俄罗斯压迫者”郁积多年的反抗情绪，人们手里举着斯大林的画象，也就是命令规定要取下的画象……这一切主要是出于人们感到他们的民族尊严受到了践踏，这是格鲁吉亚人特别敏感的。这些本来是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平息下去的，要不是军队把国家机关大楼包围起来的话。

当一群学生向莫斯科拍发了电报、然后走上街头以后，就给抓了。同志们去援助他们，混战一场，军队于是开了火。人

行道上遗下了数十具尸体，其余的人给驱散了，亲人不得前往收尸掩埋。因为当局害怕，葬礼可能形成反对格鲁吉亚党中央和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的示威游行。学生的遗体在护送下被送往别处，这引起了整个小国的愤慨。大学生向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扔石块——当火车抵达时，玻璃已一块不剩。对莫斯科的仇恨与日俱增。

莫斯科对这些事件的官方解释是——当然不是在报刊上披露，而是中央委员会例行的秘密信件中指出——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分子试图脱离苏联”……

二十大开过以后不久就发现，那批“个人迷信”的前制造者和共谋者极不情愿、也不可能说真话，他们也不让任何其它人说真话，不管这些人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家还是诗人。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成长和培养的党和国家的机构，不愿向自由主义和民主化让步。赫鲁晓夫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处处碰壁。对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受害者的每一次昭雪都是花了大力气才在中央委员会“推动”过去的。巴库老共产党员沙图诺夫斯卡娅在牢狱和西伯利亚流放中度过十七年。二十大以后，她获得释放并恢复了名誉。此后她就在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专门搞大清洗中受害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平反工作——更多的案子是死后昭雪。虽说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很支持，但是她在那里工作了几年之后，还是被当年送别人蹲监狱或逮捕别人的那些人排挤了出去。沙图诺夫斯卡娅告诉我，她的工作极受掣肘：党中央机关暗中抱怨非斯大林化。

如果说，最忠实于过去的保守分子之一、米·安·苏斯洛夫从一九三七年起就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现在仍象从前一样，在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把一帮子对抗“新政”的反对分子团

结在自己周围，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赫鲁晓夫摆脱不了党的机构——如要摆脱的话需要大力破旧。可是他害怕这么做。临到末了他还是付出了代价——党僚们把他收拾了。

赫鲁晓夫不敢公开宣称，当年党本身曾在各方面支持“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以致将全部统治权力拱手让给此人，它本身反而沦为斯大林的独裁制度的唯命是从的执行者。赫鲁晓夫害怕承认党在这方面的责任，他把全部罪责归到暴戾的死者头上。他这么一来不仅证据确凿地搞臭了自己，也把党给搞臭了。党是饶不了他的。全世界都知道，极权制度从不谴责或改造它自己，它生就与自杀无缘，它只能杀别人。

这样一来，行之有效的宫庭政变这个方法再度启用，而新总理柯西金和新“领袖”勃列日涅夫则一起向那个专制传统宣誓：老百姓免开尊口，克里姆林宫说了就算数。

可是，要求从旧制度摆脱出来的势头锐不可当，“在下面”尤其来劲，尤其勇猛。当上面进行着丑恶的争权夺利的混战时，进步潮流沿着它自己的道路在前进。它不断增长、扩大，象一股热蒸汽，由下而上，直逼当权者，以致后者不得不时而让步，时而顶住。挡是挡不住的。它象石板缝里长出来的劲草，到处伸出头来。

我的灵魂深处也经历了一段要从过去——大家共同的过去以及我自己的过去——解放出来的缓慢然而顽强的过程。

这个过程走的路是不一样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这方面对我起的作用不大，也不算特别意外的事。我和我的知交们在此以前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要变。

这篇讲话全文是一九五六年二月末米高扬拿给我看的。他派车来接我上他家去。他说：“看看这个，如果有必要的话我

们再讨论一下。别着急，好好想一想。我们在楼下等你吃晚饭。”

我在他位于列宁山上家里的图书室里一连耽了几个小时。最可怕的一点是我相信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简直无法不相信……一边读，我一边想起我姨妈我舅妈讲的那些事，她们这时已从监狱回来。妈妈的姊姊安娜在监狱里疯了，这时已是个病人。舅舅的遗孀叶芙吉妮娅·阿里卢耶娃什么罪都遭遍了，可是她对我说，对她宣布的一切指控她都签了字，这包括：间谍罪、谋杀亲夫罪、里通外国罪等等……她说：“在那里你什么字都会签，只求不要活受罪就行了！囚室里的喊叫声吵得夜里大家都睡不成觉，那喊叫的都不是人的声音了，乞求给予一死，不如一死……”她单独囚禁六年，不得与家属通信，这期间家里人怎么样了她毫无所知。一九五四年承认对她的指控纯属不实之词，于是她就回家了。

我想起了斯瓦尼泽家几个人以及雷登斯的命运，我想起了那些熟人们的悲惨遭遇，我的心就象掉进了一片虚幻之中……要是我能反驳、不相信并且叫出声来：“这简直是污蔑！他没干过这些事！”该多好哇！可是我不能。我想起了和朋友们的谈话和来源于非正式途径的一些事，因为正式途径总是另说一套的。我还想起了战后那些年以及五二到五三年间那个暗无天日的冬天，我亲眼看到许多事是按父亲的指示干出来的。

我终于走进餐厅，米高扬和他的妻子正在等着我。他们两个人都以极不安的心情看着我。“遗憾的是，这一切都象是真事……。”我说道。米高扬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很可能他担心我会哭泣或是和他争吵起来。

“我早就知道你会理解的，”他说道。“上桌吧。我们想，不要让你在会上突然听到这些。再过一周这个文件就会在

各级党组织传达。”

我对他说，我很感激他的用意。那天晚上我们再也没谈赫鲁晓夫的报告，而只回忆我母亲，阿什罕·米高扬曾和她处得不错。

几天以后我出席世界文学研究所党的会议时听到了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讨论。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尽量想沉住气，可是大家谈的和要求的都是要变：要使国家生活改变，要从教条主义下解放出来——而这一切却是党中央所害怕的。我坐在那儿，听的和想的都和周围的人一样。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后，人家对我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我的朋友们对我和以前一样，在此后的那些年里，我丝毫也没有觉得他们对我有什么不友好的表示。

尽管最后那些年我离父亲很远，但只是现在，在他死后，才开始从我意识中逐渐清除掉那些神话、理想化的东西、被奉为准则的谎言，清除掉那灌输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脑子里的一切——“英明的领袖”这个虚假的形象，虚假的党史，全国在“胜利发展”这种虚假的描述。

在苏联与周围世界全面隔绝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找到一本国外出版的苏联历史。这是严加防范的“禁区”，不许越雷池一步；这种书在苏联只收藏在大型国家图书馆内，只有作研究工作时才能凭特别借书证借到。不过即便是用这种办法借来看的为数不多的书，对我们也是一个启示。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些客观事实；不过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它们比当年苏联出版界搞的那些针对“个人迷信”的不能使人心服的、哗众取宠的所谓揭发要意义重大得多。

就这样我于一九五四年读完了两本美国出版的苏联文学史，一本的作者为马克·斯洛尼姆，另一本为格列布·司徒威。图书馆把这些“内部书”借给我，只是因为我要在讨论会

上就这两本书作一报告。在这两本书里，我偶然发现一个对苏联文学研究者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有关二十年代文学的观念。那些年被称为俄国文学的全盛时期，直到一九三四年正式宣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前，这个阶段的文学一直是自由发展的。那时候，体裁之丰富，流派之多，加上新人辈出：如“塞拉彼昂兄弟”*、“西南学派”、皮尔尼亚克、巴别尔、扎米亚京，还有与那些意欲垄断艺术的“无产阶级作家”进行的斗争……高尔基所起的作用完全是另一种，他挺身而出，反对“革命的非人暴行”，他压而不服，坚决反对人家滥施刀斧。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还是那位党的“总书记”，俨然保护斯文、扶植文艺的大佬**，而实际上正是他把艺术赶到一条死胡同，使其不得轻举妄动。后来便是一长串被捕、被杀的作家名字，这些人曾经讴歌过革命，讴歌过红军、新生活，这些人曾用自己的笔和心为党服务……

一九五七—五八年世界文学研究所一小群年轻研究员——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我也在内——着手编廿年代和卅年代《文学大事记》：这使我们有可能研究当年的报纸和杂志。看了一九二二年的《消息报》的合订本和一九三四年的《真理报》的合订本以后，我有了不少新发现。

在一篇托洛茨基谈到当时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里，宣布了自由发展体裁，宣布艺术家完全自由。卢那察尔斯基*** 也

---

*为廿世纪廿年代初苏联国内一个文学小组，名称借用霍夫曼同名作品。成员有左琴科、龙茨等。

**原文为米岑纳特，纪元前一世纪罗马政治家和作家，曾卫护一个诗人团体并给予物质援助。

***1875—1933年，苏联著名文化建设者之一，曾任十月革命后俄罗斯苏维埃第一任教育委员。其美学观点曾受到批判。著有历史剧、文艺理论多种。

是这么写的。从国外回来的高尔基在《论俄国农民阶级》的一些文章（苏联出版的高尔基全集的各种版本中都没有收这些文章）中，激烈地谴责了革命的血腥暴行。在俄国还审判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十月革命的前同盟者受到谴责，他们的党遭到禁止。全国各地的出版社愈办愈多，不久前还宣布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给私人主动性以若干自由。一九二二年的文艺生活真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丰富多彩。我们修《大事记》时把那些淹没无闻、被人遗忘的作家名字和作品发掘出来，几十年来，这些人的书早就从各个图书馆中清除掉了。我们那时还收集了一大批新材料，不过都已经过我们党内编辑和书刊检查者的严格删节，有一半事实和人名已删去，其中也包括高尔基《论俄国农民阶级》那些文章；“亵渎圣像”是不允许的。

如果说在一九二二年全年的报纸里，斯大林的名字我一次没见到的话，那么，一九三四年的《真理报》每页上都有他的名字。

就在一九三四这一年，召开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从此结束了体裁多样化和创作自由，而会上通过的是一剂统一药方：即空洞无物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究其实这不过是意味着让文学为党服务，也受党的管辖，以如总书记之所愿。当我看到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速记稿时（这也是直至那时尚被图书馆排斥在外的），我第一次读到了布哈林在大会上作的有关诗歌的报告。这是一个政治家对作家所作的一个极为出色的报告，他以平等对人，谈的是诗歌创作的实质。日丹诺夫的官样文章相形之下则显得苍白无力、庸俗可鄙。

在同年党召开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亦即所谓“胜利者

大会”上，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之词可说无日无之，篇篇皆是。似乎全国的经济即刻就能好转，和平及民主眼看就要实现。但是，就在同一年的十二月一日基洛夫被刺，民主被接踵而来的恐怖、逮捕、审讯以及“清洗”所代替，其中横遭冤死的有“胜利者大会”的代表们，有布哈林，还有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父亲不仅没有去营救那些老同志，看来还下决心把党内、军队里以及艺术界的有才华、有思想的人一股脑儿斩草除根，其目的是要把一切能吸引有识之士并且深得民心的卓越伟人搞得一个不留。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是第一个谴责这一事的人，并暗示父亲直接参与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虽说暗示了，可又怕得要死。他在作出要进一步调查暗杀事件的神秘经过的保证以后，却不让任何人再提及或报道此事。

我想了很久：这可能吗？这可能吗？要知道基洛夫是老朋友，他那一年夏天还和父亲一起在索契休养……可是令人可怕的回答自己就来了。布哈林又如何呢？他不也是老朋友吗？妈妈在世时，他在夏天不也和我们一起住在别墅里吗？如果父亲有可能控告布哈林并且把他处决，那为什么他不能迫害基洛夫呢？这一切是那么教人恶心，真恨不得大声嚎哭，跑到哪里躲起来，不让别人看见，也不让自己看见……

一九五七年九月我把“斯大林娜”这个姓改成“阿里卢耶娃”，根据苏联的法律，子女可以用父母任何一方的姓。我再也不能用斯大林这个姓了，它那铮铮的钢刀声* 刺痛了我的耳鼓，我的双眼和我的那颗心……

---

* “斯大林”一字在俄文中是由“钢”一字转化而来。

我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提出来。那时担任这个职务的是伏罗希洛夫，是我家的一位老朋友，他非常喜欢妈妈；主席团办公室可以把层层上报的冗长程序搞得更迅速些。此外我还想听听伏罗希洛夫本人对此事的看法。他一点不奇怪，只说了一句："你作得对。"

从我上完中学进大学时我就想用妈妈的姓了。我那时曾同父亲说过这件事，因为"斯大林"只不过他党内的化名。他什么也没有回答我，不过看得出，这伤了他的自尊心，我就没有再说什么了。现在我可以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在苏联许多人因此而批评我。看到我新证件的头一个官员，吓了一跳，很同情地问我："啊，原来他们竟强迫您改了姓，是吧？！"他拒不相信这是我自己请求这么做的。

一九六六年我得到一本一九四九年在英国出版的《斯大林政治发家史》，作者是伊萨克·德伊彻。奇怪的是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窥见党内的长期斗争史，窥见俄国共产党人的党是如何逐步变成自己的对立面的。这可又是我的新发现……

我获知在列宁生前最后几年父亲和列宁之间的尖锐分歧。在苏联的各种资料和政治宣传中他们两人的关系多少年来都给描写成理想的友谊。那时我已经知道，在"列宁遗嘱"里他要求把我父亲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下来。可现在看来，在这以前，他们两人之间在民族问题上已存在长期的分歧。而且，还发现集体农庄的思想——我父亲一直把它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 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和列宁毫无干系，他们的观点在这上面也是分歧的。当我往下读这本书时，我看到了这么一幅情景：有步骤地大权独揽，巧妙地撇开过去的老同事——亦即

* 指列宁在《论合作制》（1923年）及其它著作中所制定的合作社计划。

日后的死对头。我看到了用以干掉可能的竞争者时的无与伦比的犬儒主义和残酷毒辣，从而对党的变质和堕落有了一个明确的看法。由独夫通过恐怖手段实行对党的全面奴役。这一切的一切，正是当初列宁警告过的。

我了解到托洛茨基在党内和革命中间所起的巨大作用；因为我太知道父亲的脾气了，我总算搞清楚了他反对犹太人的来由。不用说，这种排犹主义是多年来与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争夺权力所造成的，后来它便逐步由政治上的仇恨变成对所有的犹太人一无例外的种族情绪。只要数一数父亲在通向独裁的道路上整掉的那些人的名字就足以使一个人发疯……

那时我也看了米洛万·德热拉斯* 写的《和斯大林谈话》。这本书是澳大利亚出的英文版，不知谁带到了莫斯科，于是大家就传着看。同德伊彻写的那本书一样，我都是从朋友那里搞到的，而不是从图书馆借到的。德热拉斯笔下的我父亲的写照既传神，又可信，无论是父亲的一举手，一投足，他讲的话以及气氛都无不酷肖。这些细节越可信，斯大林在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就愈见其真，这些甚至表现在他和"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就是不能让那些深得人心的领导太露头角，不管他是季米特洛夫还是铁托，为的是绝对权力不致旁落他人之手。为达到此目的，"兄弟般的国际主义"完全置诸脑后，苏联的所作所为常和俄罗斯帝国毫无二致。而且，苏联的秘密警察，当然，对每一位"兄弟党领导人"也保有持久的警惕！

---

* 米洛万·德热拉斯（杰拉斯），1911年生，前南共领导人和作家，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南游击队领导人，铁托密友；战后曾担任政府要职，后卒因反对南国内政策曾数次下狱，1968年获释，著有历史书、回忆录，自传《没有公平的土地》等书。

一九六五年后，在莫斯科重新发行了约翰·里德* 写的有关十月革命的书《震撼世界的十天》。这本书曾于廿年代在俄国出了俄文本，但在卅年代又遭禁，这和许多别的情况一样：凡是没有提到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的都要遭到禁止。新版中保留了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前言**。他们俩都认为：这本书极其可信地、准确而又生动地描写了事件的情景。这次出版时出版者又加了自己的前言。其中写道，约翰·里德是一个美国记者，对俄国许多情况不知道，不了解，也没有亲眼见到，因此此书不可信云云……

可是，约翰·里德所讲的的确是客观事实：谈到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作用，谈到当时作为布尔什维克同盟军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作用。这一点可是与苏联通常对此事的官方说法大不一样。甚至于在二十大开过以后，还认为对列宁的前言有“修改”的必要！

父亲在三八年校订、改写并且增补的《苏联历史简明教程》***一直是而且仍然是歪曲历史的样板。（该书初稿是一小批作者写的。）他之所以需要这本“教程”，首先是想把那些碍他事的，那些实际上创建了党并且干革命的人从历史上一笔勾销，首当其冲的是他的主要政敌——托洛茨基。其次要删去的是那些曾当过反对派或对他持异议的人。把这些人都叫作外国帝国主义代理人。这些帽子也扣在那些根本没当过反对派但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遭到“清洗”的人头上，因为这是要把那些政治活动家当着人民的面搞臭的最简单可行的办法。

---

*约翰·里德（1887—1920），美作家及政论家，1920年因伤寒病死于莫斯科，葬于红场克里姆林宫宫墙旁。

**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40卷48页

***应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10月出单行本。

这本《简明教程》是用来给人民在今后几十年当教义问答使的，怪不得父亲将它如此经心改写。经过他本人改写的党史中，他自己的形象竟成为列宁忠实的、始终不渝的朋友和战友，而除他之外，读者竟找不到其他的革命大人物的名字。赫鲁晓夫报告已过了十年，但客观的党史和革命史至今没有写出，再说在苏联它不会很快就写出来……

可是，比所有的书和文件都重要的是周围的生活本身。这些年来，我交了一些比我年纪大得多的新朋友，在卅年代时他们已是成年人，他们身历其境地“研究了历史”。

这些人来自几家知识分子家庭。世交情谊和亲属关系把他们连结在一起。这些文学批评家、音乐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记者、画家被创作生活和俄罗斯文化——他们的祖父和父亲传下来的俄罗斯文化——联结在一起了。这是一些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是一些归化了俄国的德国人、荷兰人、意大利人的后裔，曾几何时，俄罗斯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来者不拒，这些从小就处在可怕的破坏环境中的人，自己却成了文化的创造者和捍卫者，他们的一生就是举着这个烛炬，给别人以光明。

玛丽娜在监狱和流放中一共度过了十七年，虽说是她和政治完全没有关系。她年轻的时候当过外科护士，她第一个丈夫是画家。这位纤细的、弱不禁风的妇女，高高兴兴象百灵鸟一样，比我同年龄的一辈要乐观得多。可是天晓得，她走过了一条什么道路呵。她认为最可怕的是她第二次遭到逮捕：好不容易捱过了十年，心想生活有盼头了，可是又是蹲监狱，又是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在那个四面是大草原的荒村里，她给别人治病，教书，帮助别人活下去。在那里她找到了朋友，那些人和她一样，是一些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妇女；一批从英文、

法文、荷兰文作翻译的人，仅仅因为是外裔才给送到这里来的。这些人谁也没有灰心丧气，二十大以后她们才回到莫斯科来，我在玛丽娜家里见过她们。她们仍旧对生活充满信心，对人们不失望，不怀恨在心，对谁也不狠毒。每当看到她们时，我心里就想，不是外部的困难使人心死，而是心里的一条蛀虫，如果这条蛀虫是与生俱来的话。可这些健康的心灵还尽自己一切可能帮助那些贫穷的哈萨克村民，就像被沙皇尼古拉一世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样……

可是，为什么苏维埃俄罗斯会重复中世纪的专横恣肆，而重复这种作法的人不是别人，却正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呢？难道俄国已经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以致任何进步的开端在这里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不是这样。这里谁也不这么认为。这些人相信人民当中蕴藏着巨大的健康力量，他们会脱颖而出，把国家身上的枷锁打掉。

我的新朋友们挺喜欢我，当着我的面他们也毫不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她们对我说：“你是我们工会的！”这对我是最大的夸奖，我知道，我在这里不是“独裁者的女儿”，而是一个人。

玛丽娜的丈夫是一个记者，他也在监狱里过了不少年。他常在国内四处走，到过一些大工厂和大工地。他四处看到的是经济破坏，一团糟，胡作非为，偷盗。他这个人心眼特别好，对别人的不幸最为同情，他总会想办法帮助别人，他一天到晚到各种官方机构去替别人求情或是要求什么，在苏联的官僚主义制度下干这些是很困难的，而且要费大力气的。

有一天他把我带去采访，去到那远而又远的北方，他想要我看一看，那里的生活起了些什么变化。飞机接连几个钟头在冻土地带、白雪覆盖的草原上飞。那些地方走也走不过去，逃也

无处逃。极圈外的诺里尔斯克是一九五三年以后在叶尼塞河下游兴建起来的，那里一个为囚犯而开的可怕的煤矿刚关了门。许多人在城里都以自由人的身份生活和工作，北方赚的钱要多一倍。诺里尔斯克是一个现代化城市，有商店、剧院、旅馆、游泳池。煤矿旁边是新房子，在过去工棚所在地建起了俱乐部、剧院、电影院。不过矿工村还保留了原来的名字——凯耶尔康，在当地语中就是“黑死神”的意思。是的，只有在我父亲死后，正常、自由的生活才来到这里，这点比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明显些。

正是诺里尔斯克我特别想看看，因为我的舅舅巴维尔曾于一九二二年左右和乌尔万采夫的考察队一起到过这里，结果发现了这里蕴藏量极为丰富的煤和铁矿。巴维尔舅舅和地质学家乌尔万采夫怎能想到，他们的发现日后会变成劳改营，变成黑死神呢？……

我还结识了与我同一辈的新朋友，不过他们有批判力的头脑比我自己的要开动得早得多。这是一批文学家、诗人和数学家。我把自己同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这位俄罗斯艺术通的结识，当成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安德烈从不宣传鼓动，从不劝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但是他的形象就会使凡认得他的人思考问题，寻找真理。

这些年轻人早就有所发现了，而我只不过刚开个头。

“你只要看一看党作的这一连串自我暴露！”他们对我说，“要知道四十年来这些野兽们就是这样互相厮咬，就象陀思妥也夫斯基在《魔鬼》这本书中写的一样。除了列宁以外，所有的其他领导人都或迟或早要受到指控和谴责。原来这四十年，这个国家是由一批无赖统治着！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政党达到过这样的自我毁灭。”

陀思妥也夫斯基和他的《魔鬼》常常令人想起，陀思妥也夫斯基用真诚、狂热的虔诚的宗教式说教，用他对社会主义的憎恨抓住了青年的心。五十年的苏维埃革命为这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国家在血泊中浸得如是之深，以至作为一种平衡力**高山布道**忽然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震响。青年们之所以上教堂是因为这是和国家对着干的又一种方式。

一九六二年五月我在东正教教堂受了洗礼。这次受洗之于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大事。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基督教的教条，不是仪式，而是**永生**，而是**永远的善**。洗礼的仪式就是祓除不祥，从邪恶、谎言中解脱出来。我相信“戒杀”，相信没有暴力和流血的真理。我相信**至高的智慧**会统治世界，而不是由虚荣的世人去统治。我相信，真理之灵胜似物质财富。当这一切进入我的内心以后，我从小受到的马列主义教育的残存物，宛如过眼烟云，消失殆尽。我现在知道，不管一个有罪的强人是如何想确立自己在人间的权力，真理迟早必胜，昔日的虚名终究会灰飞烟灭！

在那个时刻，我父亲的整个一生呈现在我面前，他如何为野心而抛弃智慧和善，如何将自己整个置身于恶的主宰之下。要知道我曾亲眼看到他怎样缓慢地一天一天地被恶所毁灭，亲眼看到恶又如何杀害了与他最接近的人。他日益沉沦于谎言、暴戾和骄矜的黑暗深渊之中而不能自拔。他终于呛死在这个深渊里了。

我受洗礼以后并在洗礼的强烈影响之下，写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这些信里，我试图把他灵魂日益沉沦的过程写出来。我写作的第一次尝试也是我本人的忏悔，它帮助我洗涤过去的记忆。

当我写《二十封信》的时候，我的耳边响起了给我施洗礼的

神甫的话："不要指责自己的父亲。上天已经对他作出审判：他生前把自己抬得过高，昔日的浮名今已荡然无存。上帝改正一切虚伪的事物。但是你——不可以。你是——女儿。"于是我尽量不去指责他，而只把一些事摆出来给大家看：看他终身孜孜以求的那些东西是如何使他身败名裂的。在他处于荣誉和权力之巅时，他既不幸福，也不满足；无尽头的恐怖折磨着他，他清除了自己的左右四周，他把那些继续盲从他的人引入死胡同。

历史会审判，生活会审判，最高公理会审判。而天主赐给我们以力量，让我们理解并且承认判决的公正。

但是谁也不能剥夺我对所谓"斯大林主义时代"有自己的看法的权利。我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取得这看法的，它是经过苦难和痛楚才获得的，它是经过泪水洗涤的……

许多人在监狱里和流放中得以保全生命并且活下来是由于他们笃信宗教，是由于他们坚信真理必将战胜。还有另外一些人，甚至于在那种场合下也仍然相信："斯大林是错了，但是党是正确的。"我不能赞同那些共产党员，他们从监狱里出来，仍然继续狂热地相信"党的正义事业"。试问这些"正义事业"究竟在哪里？！

千百万不开化的劳动者多少世纪来被教育要遭罪，要相信沙皇万岁爷的正确，要在牛轭和鞭子前俯首贴耳。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曾辛酸而又讽刺地这样写道：

老实的黎民百姓们
望诸多保重！
人家说：
奴隶们何需赏赐自由？
对付他们

可只任意宰割、剪毛。
带响铃的牛轭，外加鞭子，
让他们生生世世以此相传，永无止休……

在一个世纪以后，另一位诗人马克西米里安·伏洛申* 于一九二二年写道：

祈祷吧，忍耐。
快把皇帝宝座朝肩上扛，
快把十字架往颈上戴。
我们不能实现的梦境——
那海底世外桃源**
居然隐隐地在心灵深处现出来。

当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打赢了以后，我的父亲真心实意地感谢俄国人民的忍耐。

任何一个其它的民族都会受不了这个新牛轭，受不了这位新沙皇。你怎么能不感谢呢？

“牛轭加响铃”……人造卫星，联欢节，周年纪念，浸泡在伏特加酒中的意识——只要有什么事由就狂饮：“我们是最伟大的！”“我们比谁都好、比谁都快、比谁都远！我们谁都能赶上，谁都能超过，我们要战胜一切人！”

如果这个党需要一颗原子弹或一个人造卫星，那么它会不惜一切代价，而尚未在俄国绝迹的有才华之士，也就会什么都能搞出来。这时就会饶恕他们，忘掉他们是犹太人、法国人或是贵族出身，领袖就会赏给他们不花钱的别墅、汽车、奖金。但是这些“受重赏的”就会在警察严密监视下生活，发明者的

---

*1877—1932年。俄国和苏联诗人，水彩画家。

**传说中的水下圣城琪泰城。

名字向自己人民保密，也向全世界保密，而形同囚犯的发明家却了无生趣，按说这种乐趣应与他们当之无愧的荣誉俱来的。

我认得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的情况在以后也并未改善。这些有才华、有魅力的人们，他们给国家带来了光荣和实力，可是却生活得象隐士一样。他们不但不能出国，甚至和象印度人这样无害的外国人交往也不行。周围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数不清的秘密奖金和勋章，随便一个什么官员都可以盛气凌人地不把他们当回事，尽管他自己心里也明白，在这些人面前他应该脱帽鞠躬。

如果需要的话，政府也剥削智力。中央委员会机关里没有一个犹太人，因为这是领导岗位。可是如果需要经济、外交和哲学方面的参考资料的话，那么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些工作照例交给犹太专家去完成。他们只提供参考资料，但并不邀请他们去参加讨论或决定问题。他们经常用俄国假名为杂志撰稿。当然，较之一九五二年，那时打算把他们通通送出莫斯科，这已是一大进步。不过，这就算是今天苏联采取的进步措施了。

有一次准备聘请一个有才华的、受过专门外交教育的年轻人到苏联驻美大使馆工作，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否决了他的应选资格，唯一的理由是：犹太人。这可是发生在一九六六年，而不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我个人在党内的生活是乏善可陈的。一般说来，我和政治积极性无缘，在苏联这种积极性更多表现为“貌似在活动”和会上言之无物的磨嘴皮。一九五一年我被强令入党，在这以前长时间指责我，说“这样一位人物的女儿留在苏联共产党行列以外是不光彩的”。我于是入了党，交纳党费，在会上一言不发，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这一段期间我只有两次想发言。

第一次在一九五九年(那还是二十大以前的事)，党由于伊

利亚·爱伦堡写了中篇小说《解冻》，故此对他的批评劈头盖脑而来，因为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提到苏联的镇压以及一九五三年以后到来的“解冻天气”。爱伦堡受到谴责，说他把苏联生活描写得太阴暗了，说他“模仿西方模型”。我在会上发言说，既然党的刊物现在也承认过去搞错了，那些横遭不白之冤的人们也业已从监狱出来，那爱伦堡何罪之有？

米亚斯尼柯夫教授、一位著名的高尔基作品的党的“解释者”，把我的发言称为“不负责任的、政治上不成熟的”。米亚斯尼柯夫写的有关高尔基创作的书是“修改历史”的典范，这种作法在苏联是司空见惯的；高尔基对革命、对布尔什维克以及对列宁本人的批评，读者在他的书里根本看不到。

第二次发言就更糟了。这是一九六六年，即二十大开过以后的十年，正当往后看的复旧运动已经略见端倪的时候。对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无耻审判已经举行过，这两位作家分别给判处五年和七年劳改。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和党委会开展了一场运动，专为反对那些胆敢即便不是抗议、但却不愿举手赞成判决的人，反对那些以某种方式对被判刑的人表示好感的人，反对那些认识西尼亚夫斯基多年、并承认他是一个有才华的评论家的人。对那些拒绝在致《文学报》的正式公开信中签名表示同意法院判决的人也进行了陷害。一个研究生，由于这几天向西尼亚夫斯基表示感谢他在工作中给予的帮助，结果竟从研究所开除，并清除出党。研究所的一些老工作人员说，此刻的气氛与一九三七年何其相似乃尔。

我在党的会议上发言说，这样作践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实在太可耻了；我说审判是错误的；我说，和作家说话就应该设身处地地谈他们的专业问题，可是他们写的书根本就没让我们看过，这如何能做到；我说，我们没有权利毫无根据地给自己的

同事定政治罪，我说，每个人签不签任何声明都有他的自由。

这次会议开得很热闹，一直开了两天。许多人支持我的意见，可是研究所的所长，伊·伊·阿尼西莫夫教授却指摘我们大家“政治上不成熟”。在文学圈子中，这位“政治上成熟”的伊万·伊万诺维奇·阿尼西莫夫以其“万卡·该隐”* 的外号著称，这是因为还在一九三七年时他就出卖了和自己共事的笔友……

最丑恶的是没完没了的装假和两面三刀，这是苏联人从小学起并深得其中三昧的。非党员的话谁也不听，也不叫他们发言。至于党团员则非发言不可，并且已经成为惯例：想的是一套，嘴里说出来的是另一套。同是一个人，过半个钟头以后，他在会场以外和朋友们谈的才是他的心里话。

这次内部审判以及四周的环境简直是一次猖狂的反攻倒算。我再也无法在研究所耽下去了，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夏天我终于完全离开党组织，遂了研究所首长的心愿。

现在我留在家里，没有了“集体”，和我一起过的有孩子们，还有那一病不起的辛格。

这个人把印度的现实的明智带进了我的生活，这种明智是我过去在书上看到过的。圣雄甘地的一生久已令我折服，对于他，非暴力和“坚持真理”不仅仅是信条——印度哲学为此宣讲了若干千年——而是每日的实际生活。当活的印度进入了我家以后，我才真的知道，什么是不与人为恶。这使我又一次想到那两位共产党员：勃拉哲士·辛格和我父亲。

还有什么比这两种对生活不同的观点差距更远呢？一个是

---

* 万卡系伊万的卑称，“该隐”源出旧约，为杀害胞弟者，后该名字被引申为下毒手者、凶手之意。

宽厚容忍，另一个是教条；处之泰然和恐怖；信赖和多疑；朴实和虚荣；宽恕和复仇；善良和凶残；灵魂的力量和武器的力量……辛格的性格，他的生和死不仅是苏联官僚主义国家的对立面，也是对它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要奋起反对这个无害和平和的人。他死了，可是他战胜了。

在我的心目中，在他那些莫斯科熟人的心目中，他永远战胜了他们。不，赫鲁晓夫什么也没有给我说清楚，他不能把我从过去种种中解脱出来。印度善良的智慧把我从精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了。现在只需要切断一切肉体和形式上的联系了。

对于苏联说来，最可怕的莫过于在赫鲁晓夫去职以后的开倒车运动，退到当权者惯用和得心应手的准则上来。我又再次听到"您父亲是个伟人！等着瞧吧，到时候还得想起他来的"这一类话。政府忽然对我生活得怎样感兴趣了，柯西金和苏斯洛夫坚持要我"回到集体中"去，并且说"今后对您会另一种态度了"。而我对这样的"另一种态度"却畏之如水火，因为对此我一直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在我到印度以前不久的时候，格鲁吉亚斯大林博物馆的馆长上我家去了，她引为骄傲的是勃列日涅夫批准重新开馆。我对着这位可怜的女馆长真感到很窘，她心里美得不行，可我却无法分享她的快乐。我明白，如果勃列日涅夫也来"恢复斯大林的功绩"，这对于苏联来说可是大难临头，更何况不仅仅是对苏联呢……

女馆长乐滋滋的，还邀请我上哥里她家去，我可以身历其境地想象得出，那时我周围会搞出一些什么名堂来。我真可怜她和那些格鲁吉亚人，他们至今沉醉于谎言之中，这种谎言貌似冠冕堂皇，因此朴实的心很容易接受它。中央委员会那些保守分子心里很有数，因此就想钻这些空子。

遗憾的是不光是保守分子。最令我奇怪的是米高扬，就是那位把赫鲁晓夫的报告给我看的米高扬，他这会儿忽然把他自己在二十大的会上讲的都忘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他把我和孩子们请到他的别墅里去，吃饭的时候他不止一次用温和的、息事宁人的语气提起我父亲。当我们要走的时候，他拿出一大卷东西递给我的卡佳，对她说："这是送给你的礼物——挂毯。把它挂在墙上。"回到家里我们把挂毯一打开，上面织的斯大林的像……卡佳挺不好意思地望着我，当我把挂毯仍旧卷起来拿开以后，她挺高兴。在她的心目中，我父亲既不是作为"外公"，又不作为"伟大领袖"存在的。这些事没人教过她。

昔日的"战友们"对往事实难忘怀。后来被称之为"个人迷信"的东西是他们一起搞出来的。他们一块儿掐死了反对派，闭眼不顾自己旧时的同志惨遭杀戮，他们支持"迷信"是因为这也是他们的权力，剥夺权力他们是不干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还党的历史以本来面目：它会是一幅彻头彻尾自我暴露的图画！

他们扑过去捂索尔仁尼琴*的嘴时是多么齐心啊！他们怕的只不过是一天，伊凡·杰尼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他们多么害怕全世界会知道那些千百万受苦的人所过的其余的成千上万的日子！

赫鲁晓夫统治的十一年将会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这是因为他曾想还事物以本来面目。通过小心翼翼而又有始无终的尝试，这位生气勃勃、性格乐观但又执拗的人打破了多年来万马齐喑的坚冰。冰块移动了，往前走了。这会儿谁也挡它不住了。透

---

* 索尔仁尼琴，苏作家、持不同政见者，1974年后定居西方，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第一圈》等书作者。

** 索尔仁尼琴在该书中写了苏联劳改营中一个苦役犯一天的生活。

过日益扩大的裂缝，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下面翻滚的怒涛……

对于我来说，要摆脱各种神话和谎言比起一般的斯大林主义者要困难得多。这个政治术语所包含的意义确实与我从来就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我的困难之处在于要相信我父亲究竟对俄国干了些什么，只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一条实在太可怕了。真情知道得愈多、理解得愈深，我就愈加觉得可怕。直至当我已经知道很多情况以后，我还久久地以为他只是这一恐怖的牺牲者，而不是始作俑者和推动者呢。

不，牺牲者是别人，是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的人，其中也有我的妈妈……我用自己的姓氏给这种血腥独夫专政命了名。他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他并非精神病患者，也不是误入歧途者。他最怕失掉他不露声色、步步为营地巩固下来的权力。故此他首先专心致志的事就是清算他的敌人和竞争者，然后再收拾别的人。他在革命后的俄国恢复了专制主义、恐怖和监狱，官僚制度和警察，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在一个民主在一九一九年后即成为历史的流产儿、出生后即告夭折的国家里，这些都有助于巩固他的权力和荣耀。在英国、法国和美国，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出现的。

当我一旦明白了这一切，已无后退之路。我不能对周围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仅仅谴责一番，然后洗手不干是不够的。要把斯大林主义作为历史现象和历史时期来谴责并不难——它实在太没有诱人之处了。不过我自己应当有所为，要换一种方式生活。在苏联时，昔日的阴影将我包得密不透风。这会儿在勒克瑙我心里明白，如果我能找到自身的力量拒不回国，那将是我的获救，只有那时才能谈到另一种新生活，命运将选择它，摆在我面前……

我懂得，这将是我与共产主义义无反顾的决裂。那样更

好！我的立场会比在苏联更坦率些。那里有“集体”在等我；如果在那里和党公开决裂、批评、抗议，那样会毁了我子女的生活。另外，我对搞秘密地下活动、搞阴谋、双重生活从来都是反感的。

不，我只能光明正大、自由地生活和行动。我要我的孩子们完全脱离我，不为我承担任何责任……

要作到这一切只能在苏联国外……

唯一出路

轻便飞机从勒克瑙飞往德里，在坎普尔停了一下。飞机场离城很远。旅客走下飞机活动活动腿脚，在枯干发焦的田里散着步。我独自信步走着，打量着这些旅客，心里捉摸着我怎样去美国大使馆——不过去还是不去，我觉得把握不定。

三月八号班机开往莫斯科，今天是五号，在德里还要停两天……我可以给孩子们买些什么——眼看着回家的事指日可待，我想见到孩子们的心情就愈加迫切了。整整两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可从来没有分开这么久过！可是想到我要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想到一切要照老样子，实在感到可怕。这两种极端矛盾的心情似乎同时都在增长，旗鼓相当。我好象觉得我这个人被劈成两半，已经麻木不仁了，不过谁也猜不出在平静的外表下面我内心的极度紧张。我感到好象全身的肌肉都紧张起来为了向前的一跃；只须轻轻一推，只须添上最后一根稻草，就会影响天平的起落，左右最后的决定……

这最后“一根草”在次日终于添上了，那就是我与德里苏联大使馆，亦即与我已经生疏的苏联世界的短兵相接。

迪内希到帕拉姆机场来接我，这在他来说可真是优遇有加。见到我过两天就要走了，他是那样高兴，以至摘下了他那不可接近的土邦大君的面具，又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年轻人了。此刻他一再对我保证，明年他一定安排邀请我和我的孩子们到印度探亲。他还建议我回国前耽在他家小住，不过我拒绝了，因为下余的时间我想一个人耽在一个什么中立地带，镇静一下，打定主意……一旦主意打好，苏联大使馆招待所离美国大使馆

最近，谁也不会来问我要上哪儿，我去干什么。

不要有任何人知道或怀疑我要干什么，这件事越瞒得久越好。我关心的就是这个。现在我要绝对依靠我自己，不要让任何人妨碍我听到内心的声音。我知道，我一旦作出决定，就万无回头之理。

三月五日下午我是在迪内希家度过的。晚上我和考尔一家吃晚饭。考尔和迪内希一个腔调，说什么我应先回莫斯科，然后他们再安排邀请我和我的孩子们访印。看样子他简直巴不得我快些走，在我留在德里的剩下两天的日子里，他恨不得了解我每一步行踪。

“明天晚上再上我这儿来吧，”他说，“我要出席苏联大使馆的有萨哈罗夫将军参加的宴会；普丽蒂会去接您，我会早点回来。三月七日——最后一晚我要为您举行告别宴会。”

忽然他问我：“那您的手稿呢，在身边吗？”一种本能的自我保全的感觉命令我回答：“不在啦！我把它寄到巴黎去了。”考尔闷声不响地抽着烟斗，我连忙转了话题。我害怕大使馆的人知道手稿的事要把它没收。我也惧怕考尔猜出来我打算干什么，他这就要一眼把我看穿……

晚上我回到迪内希家时大家都睡了。三月六日早晨我们刚吃早饭的时候，苏洛夫就来了。迪内希请我第二天参加告别午宴，于是我就和苏洛夫一起回到大使馆招待所。

我刚一坐进苏洛夫的汽车并开始用俄语对话，就感到难以形容的沉闷乏味。再说，又是那个招待所，又还是那个带乌克兰口音的女管理员，她是我十二月份来此后见过的。在那里她又把我交到另一个胖胖的乌克兰女人手里。食堂里熙熙攘攘，正准备国际三八妇女节的晚会，从挂在这里的布告可以看得出来：大报告，文艺节目。苏联使馆在这里是别有洞天，它和印

度之间有一堵不可逾越的屏障。

对此种生活我已经生疏。这号食堂、这个俱乐部、这个老一套的“国际妇女节”——一个狂饮的好借口——使人觉得丧气！一到晚上大家都唱，大家都苦闷得要死，老死不相往来。

我走到院子里。使馆人员的老婆孩子们都坐在长凳上。一张和气亲切的脸都没有。一丝微笑也没有。大家都吃横了。她们的穿着可都比在莫斯科强：她们正是因为这个才出国来的，她们猛买东西，然后带回苏联在黑市上转卖，口里还直骂资本主义。咳，你们这些假惺惺的人！估计都是党员。肯定是，要不怎么能出国，怎么能买这些穿戴呢？到了夜里可又咬耳朵，嘲弄这个党了……

我越来越觉得心情阴郁。在百无聊赖中我出席了大使举行的午宴，应邀出席的还有苏洛夫和他的妻子。午宴设在别涅季克托夫大使家中。那些又贵又俗气的公家摆设，到处是地毯，镶在镀金框里的次等画。样样都阔气，样样都排场，可就让人看不上眼。和这一样阔气的是别涅季克托夫大使的重量级夫人。一脸公事公办的微笑。还有，高高的大块头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涅季克托夫，一张象石头雕象一样毫无表情的脸。在莫斯科我和他缘悭一面，这次是初次幸会。大家都分外礼貌。为我终归要回莫斯科去了，大使馆可以向上级报告它顺利交差了，大家都感到莫大幸福。别涅季克托夫朝桌子一挥，作了一个大大的邀请手势，桌子上满堆着各种小吃、酒瓶和各色食品，应有尽有，都象是要压垮了似的。这么些吃的可真让人眼睛都看花了。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一直满足于简单清淡然而可口的印度饮食，外加一杯井水或浓的喜马拉雅茶，就相当可以了。我一直没有吃肉，因为偏远的农村里根本没有。清淡的素食对我的肾脏更有好处。再说，我总在不喝酒、不吃肉的时

候反而觉得身体更舒服些。烧酒加腌鲱鱼我不爱，因为我哥哥吃这号东西过多，后来成了酒鬼。向我敬的酒食我差不多都没尝。别涅季克托夫简直掩饰不住他的火气："咳，您可别太随当地的习惯了！"他咕噜一句。"吃点鲱鱼吧，照我们俄国习惯吃点吧！"

"说实在的，我们还真的离不开俄国饮食！"别涅季克托夫夫人唱了这么一句。"没说的，我们吃得可是真多，真多！"苏洛夫和他的夫人有滋有味地使劲撑。大家都像饿牢里放出来的，拼命吃。

苏洛夫年轻的老婆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但她的眼睛里却射出一股冷铁般的寒光。这双眼睛有意躲开我的眼光。我在村里瘦了不少，我心里倒挺高兴，可是这里的人可能把我看成"饿坏了"。

"唉呀您吃吧，吃吧，瞧您瘦成什么样子了！"别涅季克托夫夫人用带点绝望的火气喊道。

"不啦，谢谢您。"我冷冷地说。我真想离开这些人！

"今晚来参加我们俱乐部的晚会吧！"苏洛夫忽然没话找话说。"我夫人要作一个关于国际妇女节的报告，然后是文娱晚会。"

"我们这里文艺节目可有两下子呐！"苏洛夫的老婆来劲儿了，看来是个党的积极分子。

报告！文艺节目！难道没有这些虚假的集体活动，人就活不下去了？

我对这一套已完全失去兴趣，而又何等地快呀……两个半月来我都是独来独往，自由呼吸，我周围的人也不是那种机械零件。他们又穷又饿肚皮，他们有一千样事要操心，但他们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有自由去挑选他们所喜欢

的。

印度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解放了。在这里我再也不认为自己是在苏联当了一辈子的那种“国家财产”的一部分了。虽然我很清醒地理解，对于印度政府来说，我仍然是这么一种“财产”，在这方面我不抱任何幻想，不过从我自己内心来说，我已从这种永远没个完的奴隶制度下彻底解放出来了。

饭桌上话不投机半句多，别涅季克托夫夫妇是印度的匆匆过客。我在乡下耽了两个半月，却比他们看到的和懂得的多得多。他们所想的是“混掉这些日子”，买上一堆穿戴，然后就启程回家。对于别涅季克托夫本人来说，出使印度不啻是充军，这是赫鲁晓夫把他从农业部长的职位上撤下来才把他送来当大使的。这个异国可丝毫没有打动他，他在这里又嫌热，又觉得了无意趣。

吃喝半天之后总算进了客厅。大使说：“这下，我想，您该觉得此行不虚吧?！您瞧，给您作了让步，您比规定日子多耽了些时候，人也休息过来了。我觉得，您再没有什么好生气的了！”在有意强调最后几个字时，他用那双不友善而又狡猾的眼睛使劲盯着我。

我咽下了这篇训词、这种眼光，我隐忍没有发作。我此刻只希望一点：赶紧把我到德里的头一天就收走的护照发还给我。除了护照我没有别的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我请求现在就把护照还给我，不过我自己认为能否如愿把握也不大，因为按规矩护照只能在上飞机前一刻才发还。可是别涅季克托夫对我要回国一事这样喜出望外，以致他这一高兴就把别的深谋远虑推到次要地位去了。他兴冲冲地命令苏洛夫把护照取来，亲手交给了我，并且说：“我们会给您的子女发电报，让他们去接您。”

这纯属多余之举……我故意不给他们拍电报，不过，当

然，这时要与别涅季克托夫争论不合时宜。

他请我参加俱乐部的晚会，我谢绝了，理由是晚上我要上考尔家。别涅季克托夫皱了皱眉头说：

“这个考尔是个英国探子！”他脱口而出，就象老早就知道了似的。我勉强忍住不笑：印度报纸把考尔叫作“苏联政府的左右手”。

“我在莫斯科就认得他的女儿了，她会来接我。”我这样解释道。不过大使只一笑置之，这最后两天我爱干甚么就干甚么，他不在乎。

我同样不在乎大使和他的夫人还会说些甚么，他们尽力想掩饰对我的言行举止所感到的忿恨。我拿了护照，和他们告别后就上招待所去了，好不容易只剩我一个人，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这是下午三点钟左右。

我怎么办呢？

如果我后天飞往莫斯科，那么就应该休息，晚间如约上考尔那里去，明天再买点东西。如果不的话……如果不的话……

我忽然起来，我把大箱子里的东西腾到那小一点的箱子里。我总不能拖着个大箱子上美国大使馆吧。再说可以叫一辆出租汽车上美国大使馆。是的，这样好些，谁也不知道我上哪儿去。谁都可以叫出租汽车，这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我忽然丢下一切跑到大门口去，那里有一个看门的印度人，他大概知道怎么叫出租汽车。缠着头的守门人告诉我电话号码：75—777，并且指给我，另一座楼的楼梯上有电话。

我又走回房间里，把那放手稿的夹子放在箱子的顶下边，然后很快把其它东西码在上面。就这样，明天一大清早，吃完早饭我就叫出租汽车。他们知道我明天要上迪内希家，手里提

个箱子也没什么要紧。我的大箱子和另一半东西放在房间里，他们相当长的时间会猜不出我在哪里……就这么办。现在我先休息一下。

可是心里总是七上八下。我又起来烧电熨斗，不知道为什么想起要把那条绿色印度头巾熨一下好带走。这条头巾是普拉卡施送我的。她还给卡佳织了一件套头毛线衫。所有给孩子们的礼物都放在大衣箱里，这时我的思绪又回到奥夏、卡佳和莲诺奇卡身上去了。这些礼物作为对印度和对我的纪念，他们能收到吗？大使馆未必能把属于我的东西仍然送回莫斯科吧，虽然他们有义务这样作……

我坐着，眼瞪瞪地看着那盛了礼物的衣箱，我的决心一下子又凉下去了……这些叮当响的手镯，是我给卡佳和她的好朋友冬妮亚在勒克瑙的纳济阿巴德的小铺子里挑的，还有那两双给奥夏和莲诺奇卡买的绣金的家用便鞋，还有我在贝拿勒斯给儿子买的那滑稽逗笑的小水烟筒。

我呆呆地坐着，一筹莫展……

熨斗烧热了，嗞嗞作响。我熨着那条丝头巾，这使我重新想起了那件大衣、箱子，想着出租汽车来了我怎样拿这些东西。右手提着箱子，另一只手腕上搭着我的长大衣……傍晚天气凉，可以穿在身上。

是的，断黑时分走最好。我干嘛要等到明天早晨呢？白天很显眼，现在天已渐渐黑了，亮着的灯还不多。对，应该在今天，马上就走，干嘛还要拖呢？应该当机立断，干嘛非得再上考尔家吃上一顿晚饭呢？普丽蒂什么时候来接我？我记不清了，是七点还是八点？不记得了。如果她来了，我就非得和她一起去不可了。不，一定得在这以前就走。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六点刚过。天渐渐黑了，应该现在就走，决不可耽

误。忽然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敦促我，催我：快，快，就在此刻，就在今天。明天不行，事情要变卦的。早晨到处是人——现在就走，快！

我走出去叫了出租汽车。楼梯转角平台上挺黑，我摸着拨了电话号码。印度人听不明白上哪儿，问道："是上俄国大使馆吗？""不，不，上俄国公馆！"我一再照大门口那个守门人解释给我听的那样说。

我走到大门口，问那个守门人，叫了以后会不会很快有车来。他说，相当近，因此车很快会来。我站在大门口，在原地一趟一趟地来回踱着。来了一些汽车，客人们各自下车上俱乐部去参加晚会，听报告，看文娱节目。谁也没有注意我：一个人站在大门口等什么人，这原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的神经一阵紧似一阵。要是普丽蒂开车先到呢？每逢看见一辆车的车灯亮光我就一哆嗦：谁来了？是普丽蒂还是我的出租汽车？出租汽车还没有来。

我看着表，不知究竟过了多少时间，不过在大门口大概站了廿分钟，可能还长些。出租汽车就是没有来。普丽蒂也没有到。感谢上帝，我可有一股子牛脾气！我又上电话机那里，又打了一次电话，然后又回到大门口。

五分钟以后左边拐角的地方驶过来一辆老旧的小汽车，这就是德里的出租汽车。开车的是一个微笑着的缠着头的锡克族人，旁边坐着另外一个。他们给我打开车门。"等一小会儿！"我说，然后跑回自己房间取了箱子和大衣。

出租汽车没关马达，车门开着，我钻进去坐在后座上。

"您知道美国大使馆在哪里吗？"

"知道，就在不远。"

我们拐进旁边一个黑胡同——抄一条近路，出租汽车司机

真是个聪明人。我们开过了苏联大使馆后面，绕过美国大使馆的侧面，然后过了分把来钟我们就拐进了大使馆灯火通明的正门。两个锡克族人帮我把箱子拿出来，我给了他们几个卢比，然后两脚微微有点发软地走上宽而又长的台阶。我刚一迈过门槛心里就如一块石头落地，松下来了，忽然间一切变得那么容易和简单……

一张小桌子旁边站了一位高高的、非常年轻的碧眼海军陆战队卫兵。开始时他向我解释说里面没有人，后来当他看到我红皮的苏联护照时，似乎明白点了，很快就把我带到过厅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面。我坐在靠墙的椅子上，把箱子放在地上，上面放了我的大衣，开始等待——我不知道等谁，也不知道等什么。我反正无所谓，怎么都行。

我象一个泅水的人，好不容易泅到了彼岸，脚踏上了土地，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这是一块我不了解的土地，我也不问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能活着而且不损毫发地到达对岸这是多么好啊！那些细节没有必要去操心——总不会比过去的事更坏吧？未来的事总会愈来愈好，总会比我永远脱离的那一岸要好。

行，让我们到另外一间房里去谈谈，去说清楚，去写下来。我没有甚么好瞒人的地方，我此行既不带盾牌，又不带脸甲*，我的心是开诚布公的。我本人是下了决心了。现在该由你们选择、下决心了。

* 指中古世纪骑士在打仗时所戴一种保护面部不受剑伤的、连在头盔上的面甲。

二　间奏曲

和西方见面

德里美国大使馆那扇玻璃门是通向我从未涉足的那个西方世界的入口，我还拿不准这个陌生的世界会怎么迎接我。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对我一点也不了解。三月六日的傍晚我们惊奇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笑脸相对，可又莫名其妙。

这以后的一个半月是我们相互了解的时间。我原来渴求的好心和帮助现在都找到了，我打最初一刻起就觉得：会有办法可想，会"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可不必为细节操心，只须听凭事情的进展。

我敲这扇玻璃门可算是敲对了。我踏进一条水流，它平稳而快速地将我带走，四月廿二日我来到了肯尼迪机场，在这短短一段时间内我在美国找到了乐于助人的朋友，我得到一张为期半年的旅游签证，找到有经验的律师，和手稿的出版者，这份手稿是我放在箱子里带来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已习以为常的无休止的禁令、秘密、压力和对人的尊严的侮辱，现在好象是有一位什么护身天使将我驮在他的翅膀上飞翔。

当我在印度读切斯特·鲍尔斯的《大使报告》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象它的作者是这么一个人，他能理解我，并且能想法子帮我的忙。我不知道是怎么个帮法，我对外交手续和我们正处在其中的政治困境毫无概念，只知道要找个出路罢了。大使六日晚上身体不舒服，当通知他关于"苏联叛逃者"的事时，他正在家躺着。我在德里一直没有见到他，直到过了四个月之后，在七月份我才终于和他在他康涅狄格州埃塞克斯的家里相

见。我们两人都难以忘怀的德里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们谈了多少啊！……我之能获得新生，毫无疑问，首先要感谢切斯特·鲍尔斯大使的信赖和同情心，他当天晚上当机立断、敢作敢为地作出了决定。

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面临三种可能性：甲）拒绝帮助我，不给我避难权，但是基于美国的传统和他自己的信念，这样作不可能；乙）给叛逃者安排在德里的罗斯福收容厅，将此事通知印度和苏联政府，等待法院判决此案，这样可能引起报界轩然大波，并造成美、苏、印三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最后一种可能，丙）帮助我迅速、合法、静悄悄地离开印度，他决定就这么办。

由于苏联大使别涅季克托夫的稀里糊涂，我手里就有一张苏联出国护照，有效期为两年，这么一来事情就好办得多了。我现在只需要印度的出境签证，这样我就可以从德里坐任何一架班机飞往任何一个地方。最近的班机是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堪塔司"飞机，当夜飞往罗马。

切斯特·鲍尔斯躺在床上用电话和同事商讨了这个方案，这些人此刻正和我坐在大使馆的一间房子里，轮番走出屋去给他打电话。可是那时最使大家不放心的一点是：要是这位女士完全不是她自己说的那个人，只不过是个疯子，或者搞的这些名堂到头来只不过是苏联谍报组织的圈套呢？

我真得好好谢谢这四个人：乔治·休伊领事、二秘罗伯特·瑞尔、罗杰·寇克，当然，还有大使本人。他们居然敢冒险相信我所说的一切话，不等华盛顿的回话，就帮助我赶快离开德里。当他们已确信我到了罗马，确信这一切并非圈套、而是真的时，他们是怎样如释重负啊！

当海军陆战队卫士把我领到厅旁的小房间时，我头一个看

到的是乔治·休伊，他高高胖胖的个儿，穿一件不扎在腰带里的花衬衣。然后又进来两位年轻人——戴眼镜的二秘瑞尔和一位穿天蓝色夹克的黑发男子罗杰·冠克。他们的模样就是那些典型的美国人，主要是我在电影里见过的那些美国人……

我把护照交给了他们，很快说清楚了我是怎么来到印度的，我说，我不愿再回苏联去了，请求他们帮助我。他们依次看了我的护照，上面登记的是女公民斯维特拉娜·约瑟佛夫娜·阿里卢耶娃——休伊领事于是便问道："您说您的父亲是斯大林，就是那个斯大林吗？""是的，"我答道，"是的。"我丝毫没有觉得他的询问中话里有话。

我们用英语交谈，他们对我亲切、有礼，我压根儿想都没有想过，我出现在这里不啻是火星人突然自天而降，也没有想过我个人身份会引起甚么怀疑。

他们建议我写一份声明，讲明我的动机并加写一段我的简历，写明出生地点、年、月、日。我们于是就上了二楼，走到一个空办公室里，就在那里写起来。

首先，为了不引起任何人怀疑，我请求让我给普丽蒂·考尔打个电话，用随便什么借口向他解释我今晚爽约的原因。普丽蒂已回到了家。她特别奇怪的是这天晚上她在招待所大门口没有找着我，象原来约好的那样。我推说我累了，非常抱歉，并且说明天晚上再上她家吃晚饭，按原定计划进行。一切就绪。要是普丽蒂知道我从哪儿给她打的电话这才有意思哩！

苏联大使馆那边我没有什么好操心的：那里正在接待军事代表团，大家正在喝酒，没有人会想到我，剩下那些人在俱乐部喝酒以纪念即将到来的国际"三·八"妇女节，也没功夫想起我来。明天，等我已不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才会人仰马翻呢……

整整一天我经过的各种激动场面能顺利获得解决，这使我

头痛欲裂。他们给我送来了茶和阿司匹灵。房间里有嗡嗡的叫声让人听了心烦，我问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空气调节器。”他们告诉我，对我这种“老憨相”感到奇怪。

和这三位逗人喜欢的年轻人在一起我感到奇怪地平静，也很习惯，在我眼中他们全然不象外国人。看来，在印度住了两个半月我已习惯把一切人当成人。我过去在印度人身上，现在在美国人身上所寻求的，不是他们与俄国人之异，而是求我们大家之所同。而如今，他们似乎看起来就象我老早就认得的人。

唔，那么我给他们写什么好呢？我怎么说清楚我干嘛要到这里来？在喝了几杯茶，服了阿司匹灵之后，我用英文写了如下一份证件：

“我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生于莫斯科。我父亲是约瑟夫·斯大林；我的母亲——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我母亲殁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但我在十六岁以前一直不知道她是自杀身死的。她比我父亲小廿二岁，父亲和她的父母打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已相识；她的父母也曾参加过社会民主运动。我的父母于十月革命以后结婚。

我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他第一个妻子名叫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格鲁吉亚人，不久即死去，留下儿子雅可夫。尽管他比我年纪大很多，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比我同胞一母所生的哥哥瓦西里对我好得多。

我于一九四三年在莫斯科读完十年级，同年进入莫斯科大学。一九四九年我毕业于大学现代史专业。

在女学生时代我即和我第一个丈夫，当时也是大学生的格利高里·莫罗佐夫结婚。一九四五年生下儿子约瑟夫。我的丈夫

当时就读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一九四九年我们离婚，孩子跟我。格·莫罗佐夫改从事国际法研究，不久前曾发表了有关联合国的书，此书在美国已出名。他常出国和同行会晤，他到过加拿大、巴黎、华沙等地。我父亲从来不赞同我们的婚姻，因为莫罗佐夫是犹太人，故此父亲从不见他，不过也从未坚持要我们离婚。

一九四九年我嫁给了安德烈·日丹诺夫之子尤里·日丹诺夫。父亲对他极为热情，并希望我们联姻。可是婚后很不顺利，虽然在一九五〇年五月生了我们的女儿卡佳，但没过多久我们还是离婚了。

此后我就和我的一双儿女一起过。我做了一点工作，搞了一些历史和俄罗斯语方面的研究工作。后来我就为出版社搞些翻译。我的译作已出版的有：《慕尼黑密谋》，作者为安德鲁·罗特施泰因（伦敦），《人与进化》，作者：约翰·路易斯（伦敦）。我还给莫斯科儿童出版社工作过，从事英译俄。

自从父亲一九五三年三月份去世后我的生活并无多大改变。我那时已和他分开居住（近廿年来他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里）。我的生活从来是简朴的。父亲死后亦复如此。

我的长兄雅可夫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在白俄罗斯为德国人所俘。一九四五年，当我父亲赴柏林去参加波茨坦会议时，有人告诉他，说美国人解放集中营前夕，雅可夫给德国人枪杀。有一位比利时军官曾给我父亲写信说，他亲眼见到雅可夫被杀。很多年以后在一份英国杂志上登了一篇某苏格兰军官写的文章，也谈的是这件事。可是雅可夫家里始终没有收到他服役部队发来的正式通知。有时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有我都在想，他可能还活在什么地方：至今还有许多俄国军人俘虏留在各国。

我的哥哥瓦西里是个飞行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当了

将军及莫斯科军区的空军司令。父亲死后他离开军队，不久就被捕了。这是因为他曾威胁政府说，“父亲是给政敌杀死的”，还散布过诸如此类的言论，还有许多人听信了他，于是决定将他隔离。他在监狱关到一九六一年，当他已病得不行时，赫鲁晓夫把他放了出来，没多久他就死了。他的死是由于酒精中毒，使他的健康完全毁掉，当然，还有就是坐了七年牢。可是至今还有不少人相信，认为他还没死，还常常问我：他真在中国吗？

事实上，我现在已无亲人，唯一的只有我的子、女约瑟夫和叶卡切琳娜。

现在谈谈印度。

一九六三年当我在孔策沃医院住院时遇见了印共党员勃拉哲士·辛格，他是由苏联共产党邀请到莫斯科来治病的。类似这样的邀请每年都向世界各国共产党发出。

勃拉哲士·辛格属于印度古老贵族家庭。他的亲侄子迪内希·辛格现为外交国务部长。辛格于卅年代早期在欧洲加入印度共产党。曾多次去过英国、德国、法国，成为M·H·罗伊的密友和追随者。由于他受过良好的印度教的和西方的教育，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受其影响。

一九六三年他从莫斯科回到印度，然后又于一九六五年四月返回莫斯科到进步出版社担任翻译工作。从此他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住在我的家里，我们打算结婚。我们还想在他与出版社签订的三年合同期满后一起去印度。

不过苏联政府和柯西金本人极力反对我们的结合。虽说苏联法律允许和外国人通婚，但对于象我这种人却并不通用。人家不允许我们结合，因为苏联政府唯恐我一朝和丈夫去了印度就不回来了。

勃拉哲士·辛格在莫斯科过了一年半。他住在我们家，我们大家——我的子女以及我本人——非常爱他，他也的确是我家可敬可爱的成员。可是这一切阻挠和震动打击了他。他的健康状况本来就不佳（他多年来一直患气喘病），在莫斯科时日益恶化。一九六六年十月卅一日殁于莫斯科。我认为我有责任把他的骨灰送到印度去，撒在恒河中。

为了带着这个悲惨的使命到印度去，我必须取得柯西金的特殊许可；他倒是同意了，但只批准两周期限。不过我还是得以在印度多逗留了一段时间。我在印度和丈夫的亲属和朋友会了面，因此我开始认真地思考留在印度的问题。可是我发现这不可能，因为无论是印度政府还是苏联政府看来都不会让我这样作。

我应该说，我不愿返回苏联的原因还不仅在于此。我从小给灌输共产主义教育，象我同一代人那样，我相信它。但是，随着年事渐长，世故日深，我就不这样想了。赫鲁晓夫时代、自由权利的若干扩大、苏共二十次党代会等等对我们这一代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于是开始思考、讨论、争辩，我们已经不是那么自然而然地相信那些灌输给我们的思想了。

另外，宗教使我本人起了巨大变化。我生长于一个绝口不提上帝的家庭。可是当我长成以后，我发现，不心怀上帝就不能活。这个结论是我自己得出的，没有任何人的帮助或是向我布道。可这是我的一次巨大转变，因为从那时起，对我来说共产主义的基本教条已完全失去它们自身的意义。

我相信世界上理智的力量，这不管在哪儿，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世界和人类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为了整个人类的进步，人们应该同心协力，加倍努力，而不是去搞那些斗争和无谓的流血杀戮。我只热中于一样

东西，即教师、科学家、有学识的神甫、医生、律师等人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在全世界所从事的工作，尽管有国别和国界、政党和意识形态之不同。在我看来，并无资本家和共产党人之分，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老实人和不老实的人之分，不论他们居住在哪个国家——人民到处都是一样的，他们最美好的愿望和理想情操也是一样的。我父亲是格鲁吉亚人，我母亲来自复杂的民族血统，我虽说在莫斯科过了一辈子，但是我一贯相信，四海可以为家。我从小就爱上印度，这可能是因为圣雄甘地的学说比共产主义更符合我的观点。

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够重返印度，在此永远居留。

我的子女尚留在莫斯科，我知道有可能许多年我都见不到他们，不过我知道他们会理解我的。他们也属于我们国家的新一代，他们不愿意人家用旧思想愚弄他们。他们愿意对生活作出自己的结论。

让上帝保佑他们！我知道他们不会抛弃我，有朝一日我们会团聚的，我将等待这一天。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德里
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

我一口气写了上面这些，就象有什么灵感似的，我认为，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没有提问题。很明显，一切能经过大使、以及下一步经过正式机构的讨论。我有足够的生活经验来理解：也许已经请示过华盛顿了，虽然谁也没有对我说过这些。这对于我们这些坐在这间屋子里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清二楚的。

我们谈到印度。我说起了卡拉康卡村，说想在哪里办一所医院，最后又谈到我箱子里的那份手稿，我想在国外出版。我

一再重复，不管前途命运如何，这件事我是一定要做的。我还解释说，这份手稿是我的家史，不是政治文件。他们要求看看手稿，并从我手上取走一小会儿。

这个时候罗杰·寇克问我："您想把您的书名叫甚么呢？"

"我想用一个最简单的书名，能说明它的内容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您认为我有机会出版吗？"我问的是一件连我自己都觉得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当然。"寇克说，他面带笑容还补了一句："您会给我寄一本作者签名的书吧？"

"当然喽，"我说，一边觉得奇怪，怎么连我自己也信以为真……

最后还是弄明白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现在只有尽快离开德里才是上着。

别的什么也不用想。

我们这就到飞机场去搭乘到罗马的班机，这以后又如何，到时再说。有什么好说呢——这不挺好嘛！我已经满意了。还有，这个可爱的小伙子——使馆二秘——要陪我一起去，一直陪到等搞清楚我下一步何往为止，真太好了！再多的事我也不去想它了。"只管放心！"这是我们在俄国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不知道情况将如何、可是还挺有把握、满怀希望时，就这么说。

鲍勃·瑞尔在我身边坐下。"您知道您这一下可是破釜沉舟之举吗？"他严肃地问我。"您好好掂量掂量，究竟打定了主意没有？"

"我想过很久，"我说，"我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是的，我懂得。"

我们经过走廊，楼梯，然后乘电梯一直下到大使馆底层的

汽车房里，我身上穿着莫斯科的大衣，提着箱子坐进车里，头上系上了绿色的印度头巾，就是那条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使馆招待所时熨了一下的头巾……开车的人对我微笑了一下。他旁边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微笑。美国人干嘛老笑眯眯的呢？这是礼貌还是精神愉快？搞不清。不过这在我可是少见，但打心眼儿里觉得热乎！于是我们就来到帕拉姆机场，就是我从莫斯科来时下飞机的那个机场。

这一切简直让人觉得象假的，如同作梦一般；再说夜已深了。瑞尔是坐另一辆车到机场来的，他漂亮的妻子在候机室等他，脸上露出了紧张的神情。他和她只交换了短短几句话，提起了小箱子，就笑着朝我走过来了。我这才慢慢明白，美国人之爱笑就和结结实实的大胖小子老笑眯眯一样：是自然需要。我发现我自己也想回报以微笑。

一个穿纱丽的印度女人取走了我们的护照，五分钟以后我就拿到了印度的出境签证，一切都合法，谁也没有提出问题。

我们走到候机室，在沙发上睡觉的都是一些搭乘"堪塔司"班机的旅客。这个班机以澳大利亚为起点，作环球飞行：经新加坡到德里，从德里又经德黑兰到罗马，再往前飞往伦敦。穿青绿色衫裙、戴青绿色小帽的空中小姐在候机室踱步。

真是再巧也没有了，我刚好是今晚去美国大使馆，这架夜航机就象专为等我似的！要是明天白天那事情可能就要复杂得多了！

我们不得不在候机室的小沙发上多坐了一小时，因为飞机出了点故障，起飞时间只得推迟。我们一人喝了一杯咖啡。瑞尔和另外两位不时地向门那边瞟几眼，看看有没有苏联人来。没有，苏联人今晚在酩酊大醉之后，已颓然入睡了，明天早起他们该头痛欲裂，半天都不会搞清究竟出了什么事。奇怪的是，

我镇静到极点，我压根儿没有认为什么人会冷不防想起我来，我现在是乘幸运之风，展自由之翅，诸事顺遂，“只管放心”……

“您一点儿也不着慌吗？”瑞尔有点奇怪地问我。

“哪能呢！”我说，我觉得我在微笑，想咧嘴笑，而且确实笑了。我这是怎么啦？只不过今天早晨，前途茫茫的感觉还象我心上的一块石头。像别涅季克托夫、苏洛夫这号人，谁会冲着他们笑，再说凭什么要冲他们笑？我可离开了这些丧气的人，这些重量级的、满脸晦气的、受气的、却又拿人家煞气的那些人……我迈过了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一条把苛政世界和自由世界一分为二的界线。

在报告要起飞了。人们走上舷梯。敬礼了，印度，敬礼了。是你给我以自由。

谢谢你，勃拉哲士！这就是你为我作的事，这就是你给予我的，我要用什么才能回报你对我的爱呢？……

瑞 士 日 记

除了我自己在美国大使馆写的那个声明和一些关于我的极简单的资料之外，西方并不了解我的确实情况。在莫斯科，除了印度和阿联的两位大使，外交使节里谁也不认得我，而这两位又专门只会看苏联政府的眼色行事。苏联政府争分夺秒地给各驻外使馆发出指示。接着，消息就马上传开了：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是个半疯子，凡她所说决不可当真。我是一个月后才在瑞士听到这个的，在那里处理我这件事的官方代表对我极其热情、友好。可是最初他们都不知道该听信谁的。曾在莫斯科前后总共耽过九年的乔治·凯南* 接到华盛顿的电话时，十分惊讶。人家告诉他说有一个"叛逃者"叫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回答说。常驻莫斯科的任何一位使节也都会这么回答。因此，当罗马等待我们的是令人失望的消息时，原本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华盛顿的答复是清楚的：采用所罗门* 断案法：不必急于进入美国，先在中立地区待一段时候，仔细估量一下她的动机和计划。瑞士同意给我三个月的临时签证，在这段时间内完全可以从长计议。说不定阿利卢耶娃夫人冷静下来以后会改变初衷，要求重回莫斯科。……

这种答复使人感到失望；不过在德里美国大使馆本来就没

---

* 美外交官及历史学家。1904年生。1952年3月起任驻苏大使，同年10月以苏政府认为其有敌对言论而被召回。1956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61—63年任驻南大使，为著名的苏联通。

* 纪元前1033—975年以色列国王，以贤明和智慧著称。

有给我许甚么愿。我前途未卜，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我已作好一切应变的准备，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去都行，只要不在共产主义集团内或依附于它的国家。我对瑞士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清楚的概念，不过我认为，怎么都比回去要强。还有，他们答应我，到欧洲后，在把一切弄清楚以前，也不会丢下我不管。

鲍勃·瑞尔要回印度去了，真可惜，我和他在意大利等待转移到别国这段时期已经成了朋友。这个人的厚道和幽默给我帮助很大：我也尽可能对发生的一切采取寓庄于谐的态度。鲍勃·瑞尔的行为举止以及他这些天来所干的一切都最足以说明美国人的纯朴和友善，从我进到德里美国大使馆那一刻起，我就愈来愈对美国人产生好感。毫无拘谨、纯朴、民主作风和平易近人是多么得人心啊！要知道，瑞尔和我倒更象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人，可是他从不让我感到这一点。

我好奇地从飞机上俯瞰朝霞尽染的阿尔卑斯山。我的环球旅行中又添了一个新国家……近日来所发生的一切，对我这个自来就过着默默无闻、与世隔绝的生活的人来讲，真是太新奇了，我有时体会到一种是耶非耶的奇怪感觉，宛如从旁观看一部有关我自己的冒险影片。

有时其情节简直和侦探小说里的一模一样。瑞士签证是在驻罗马的瑞士代表的汽车里盖在我护照上的；我们各自的汽车绕着机场的花坛久久地兜圈子，一直到双方都确认没搞错，我这才坐到他的汽车上去。瑞士方面的代表非常亲切可爱，他的女秘书手捧墨水瓶和印章。我们高兴地开着玩笑，事情办完以后我仍回到自己的车上来。

我原以为瑞士大概象朱莉·安德鲁斯主演的影片《音乐之声》中那个样子，这部影片是一周前我在勒克瑙看过的。全世界的人都旅行，并惯于旅行；只有对于我们这些苏联隐士，第

一次出国、第一次和欧洲会面才显得几乎是超乎自然地神奇。

那又怎么样呢？这些不是挺有意思么？

• • •

在瑞士过的一个半月可真是一个喘息的机会。不过我无意改变最初的决定。好在我身边还带着一本日记本，是在勒克瑙送给我的，于是我就开始把这不平凡的“电影情节”记录在上面。故事情节的展开一天比一天引人入胜，一天比一天起伏跌宕，现在翻翻这个小本子觉得十分有兴味。

三月十二日 抵瑞士，同日见到外交部某司负责人安东尼诺·杨讷尔。他的英、法、德、意语都说得很流利，一度是瑞士驻梵蒂冈代表。我们立刻进行了接触，互抱好感，和他在一起丝毫不感到拘谨。杨讷尔首先对我说，旅游签证可以用来休息并且游历全国，但是不得有任何方面的政治活动。这样安排眼下最适合于我了。在日内瓦机场上，我已经不得不逃跑似的躲着那些新闻记者了，他们跟在我后面喊道：“您会请求在瑞士避难吗？还是回苏联去？”我这会儿最不想回答问题，这一点与瑞士当局的意图不谋而合。

杨讷尔当即问我，愿不愿意和苏联代表接触。不，不！相反，我正想尽一切可能避免这种接触。不过谁也没坚持要我这么干，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给我充分的自由去思考和作决定。

最初的二十四小时是在贝阿腾堡一家山间小旅舍里度过的。非常冷，到处是雪，这雪打十二月份以后我就没见过了……。从我住的小房间里往外看就可以看到神女峰。不过我从来不喜欢山，也不会欣赏：山让我看了心里难受，我更为喜欢的是开阔地带、平原和海。

天变冷了，开始下大雪，又刮起暴风雪。又回到这寒冷的

气候里觉得挺不是味。餐厅里那些人的面色不够亲切有礼，这时里面无线电正广播新闻，播音员用德语说我到瑞士来了。我极力只看我面前摆的食碟：听见自己的名字在耸人听闻的新闻里出现，我非常不习惯。

这一天杨讷尔用电话通知我说，印度外交部的代表贾帕尔从德里来了，要同我谈话。这就是那位里希·贾帕尔，在莫斯科辛格死前一天曾到过我家的那位。可是现在这些印度官员中的老相识并不唤起我的信任。我同意只有杨讷尔在场，我才能和他会见。

三月十四日我们三人在图内湖岸边一所私人住宅里面。贾帕尔的唯一目的是从我处取得正式证实：我不是由任何一个印度人协助"逃离"印度的。他带来一份他们草拟的我给迪内希信件的草稿，说不定还是迪内希自己起草的哩！这里面就是这么说的，印度人没帮我的忙，这倒是真的……很明显，迪内希需要这么作。以便向苏联大使馆表白自己，我于是在信上签了名。

贾帕尔没有告诉我他离开瑞士后到那里去，不过他提出，他可以通过印度驻苏大使把信转给我的孩子们。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于是将一封长达十五页的长信交给他，里面和我的孩子们讲清楚了，为什么我决定**永不返回**苏联。我给他们写道，现在他们最重要的是三人抱成一团，继续各自的学业，尽可能保持已安排好的生活秩序。我详详细细地和他们谈了家里的事该如何安排，以便他们明白：这是极其严肃的事，这不是玩笑，我是决不改变我的决定的。报纸上已出现奥夏和卡佳的照片。他们的神情忧郁，我认出了我家的客厅，我的心为之一阵紧缩。

我深信贾帕尔是会将信转交的，但杨讷尔只是怀疑地摇摇头。他不幸而言中：这封信一直没有转交……

同一天我只好又挪到离弗利堡不远的、位于圣安东尼的修道院栖留所里。因为在旅馆是待不下去了：新闻记者在全国满处跑。当我在贝阿腾堡一家商店里买滑雪裤的时候，有人把我认了出来，立刻通知了新闻记者，因此不能再回那儿去了。所以当杨讷尔通知我，最安静、最避人的躲藏地点是修道院时，我甚至禁不住要笑：我想起了朱莉·安德鲁斯，电影《音乐之声》，修道院，以及其它电影场面。我的冒险电影脚本发展了——修道院就修道院吧！

“那儿有电灯吧？”我问了一句，心里想到了俄国的那种黑咕隆咚的地下经堂。杨讷尔哈哈大笑，说道：“那里有电灯、卫生设备、还有热水供应。”

我们深夜才到圣安东尼，说老实话，我双膝都一个劲打颤。在寺庙、修道院或圣墙前面我总有一种迷信的诚惶诚恐的心情……天主教修女身着黑长衫，头披白帽巾，把我领进了一个洁净的小室。里面有十字架、洗脸瓷盆和铺有松软鸭绒褥子的整洁的现代化床铺。要不是墙上的十字架，简直会以为是置身于一家很好的收价低廉的小客店里呢。我对外的正式称呼是卡伦小姐，一位来自印度的爱尔兰女人。

三月十五日是一个安静的大晴天。栖留所在一座小山上，眼前风景如画，十分幽静：四周是纵横的阡陌，远处有滴翠的森林，山脉连绵起伏，间有尖顶小房舍点缀其中。这栖留所只有六名修女，它实际上是天主教修行者一处休养所。胖胖的看来很舒适的茀洛伦汀娜修女招呼我们到餐厅吃早饭。我小时候学过的德文又复活了，那不多几个简单的词汇用来和修女打交道居然还够用。我自己收拾碗碟，把它送到厨房里去，茀洛伦汀娜满意地微笑了。我心里又觉得轻松好受了一些。一切“只管放心”。

事情就是这样：傍晚杨讷尔打电话来，说到美国去的希望还是有的。国务院声明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瑞士政府向全体记者宣布，说我不愿和新闻界会见，请求记者们不要再四处找我或是强求会见。

三月十六日弗利堡州两位穿便衣的警察建议陪我在附近游览。我们乘汽车观光，十分愉快。我动用了我的德文，还有大学里学的法文，居然能在海拔二千米莫莱松的缆道上（他们带我去坐了游览车）向他们说明，我头发晕，更喜欢不那么惊人的风景。我们笑着，说俏皮话，在滑雪者众多的小咖啡馆里喝咖啡，他们说，下次带我到平原上去玩。后来他们还让我开一种小型车，分手时我们已成了朋友。

回到住所时看到来自出版商的首批信件，他们希望和我一起合作出版有关苏联的回忆录。他们还不知道，我已经有写好了的书，虽说并非回忆录！柳芭·达斯迪埃也来了信，她说她有一位侄女在弗利堡州，他们常上侄女这儿来，我们可以很快见面。

同一天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报道，美国国务院代表拟前来瑞士和我面谈。同时，瑞士联邦行政院将讨论关于提供避难条件的可能性以及延长签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在这里的身份是“旅游者”。

三月十七日杨纳尔像平常一样打电话来，问情况如何，情绪怎么样，等等。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好消息：下星期乔治·凯南要来。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杨纳尔大为奇怪：“凯南在莫斯科住了很久，他曾任美国驻苏大使！这可是你的大面子和大造化，能和这么一位人物见面。他是最内行的俄国通！我这就把他写的书带给你看。”我真是非常难为情。我过去过的是一些什么日子啊！我甚至连莫斯科的事、连自己鼻子底下

的事都一无所知。

我想着这即将来到的会见。这两天心里一直不踏实。我会听到什么？有什么新闻？自从突然拒绝我进入美国以后，我不知道前途将如何。我想要什么？我自己首先应该知道我要什么。迄今为止我只是随波逐流，也不想一想，波浪会将我送向何方。现在人家该问我了，可我就知道一件：不回苏联。可是我老担心孩子们。驻莫斯科美国记者亨利·夏庇若给他们照的相片上，他们的神情多么凄楚啊！……他干嘛要上他们那儿呢？干嘛要去盘问孩子们，折磨他们，揭他们的疮疤呢？多不人道啊！他们收到我托贾帕尔转交的长信没有？

我没准儿要留在瑞士长住了，这里安静、可爱。可是这里不会让我出书，我不得不缄默。我甚至不能解释我离开苏联的原因，因为这原因是“政治性”的。凡我要说的或要写的，都会看成“政治活动”，政治活动在这儿是禁止的。……要在这里当哑吧，我当初又何必离开祖国呢？

三月廿日这一天我可真是心力交瘁。我在种满了侧柏树的小院子里踱着步，心里记挂着孩子们，为前途未卜苦恼着。在这些天里我看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本书是鲍勃·瑞尔在旅途上给我的，读这本书时真是心胆俱裂。我禁不住捧书失声痛哭。我已分不清是书里的话还是我自己的话，是书的哀伤还是我自己的，我为自己哭，为儿女哭，为我所热爱的、受苦受难离去的故国一哭。我无法掩盖我的情绪，这可把弗洛伦汀娜修女吓坏了，她跑来安慰我，并且对我说，她会在

* 1890—1960年。苏联俄罗斯作家和诗人，《日瓦戈医生》一书的作者。该书以“对革命持否定态度及不相信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的理由在苏国内受到激烈抨击，作者卒被开除出作家协会。此书1957年在苏联国外出版，1958年获诺贝尔奖金，后作者拒绝接受。

小礼拜堂里为我及我的孩子们祈祷。那一天我流了不少眼泪，第二天早起觉得轻松一些。

三月廿一日来了许多信。赫斯特公司建议出版并且“帮助”我写我的回忆录。小伦道夫·赫斯特提起一九五五年冬天在莫斯科的采访，还给我寄来一份剪报。这是我首次读到关于这次访问的报纸记载，在这次采访前莫洛托夫对我作了不少指示。

许多信表示了同情，希望帮助一个“没有祖国的女人”。一种帮助的方式是求婚，以此取得另一个国家的护照。第一个建议来自英国的一位已退休的海军军官，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跟随舰队到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第二个求婚者是苏联马戏团过去的一个演员、驯兽师，他留在国外后取得了澳大利亚的国籍。第三个是西德科隆的。还有一封可爱的信，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发动机工人写的，他对美国没有立即发给我入境签证表示愤慨，他建议我到他家住的小房子里作客。他写道：“请把我这封信交给驻瑞士的美国大使，让他看看！”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位富商、俄国老侨民在信中给我详细制定了取得美国入境签证的方案，假说我是他的女秘书。他告诉我他在瑞士联系极广，如果我同意的话，他会将一切安排就绪的。

这些信都没有地址，只写一个“瑞士”，于是都转到杨纳尔那里，由他带来或是寄给我，还把我的邮件寄出去。我往莫斯科寄了一张明信片，要孩子们给我写信寄到联邦行政院；从国外寄往苏联的明信片要快得多——对信件检查人省事些——我盼望收到回信。

三月廿二日我在瑞士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说印度议会曾

* 位于苏联欧洲部分之北部。

就我“叛逃”进行质询。反对党最好斗的领袖之一——罗希亚指摘政府在苏联面前奴颜婢膝。外交部长查格拉正式声称，说我“一次也没提过我有留在印度的愿望”。罗希亚说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在罗马时我就接到印度外交部要我返回德里的邀请。不过当然我拒绝了：我知道这是别涅季克托夫大使的主意。现在我决定给罗希亚博士写一封信，感谢他拆穿谎言。我详详细细地和他说，我怎么和迪内希·辛格谈起我不想回苏联。我引用了迪内希的回答，这在我看来，可算是来自政府和它的总理的非正式答复。要赖掉我们曾经说过的话实在是伪善怕事到了极点。

几天以后罗希亚博士在印度议会宣读了我的信。这引起了印度新闻界的轩然大波，迪内希和查格拉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简直无地自容。共产党员们则支持迪内希，讥笑罗希亚的“骑士风度”；他们的报纸写道，我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劫持”的。

三月廿三日一整天我都在看凯南写的《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俄国与西方》。这本书是杨讷尔给我看的。我老在想象明天我将要会见的那个人的模样，看来，我前途如何也将取决于他。

从这本书来看，他特别了解俄国，而且不仅仅是了解，他还深知这个复杂、矛盾、残酷而又不幸的国家。他对共产主义是毫不留情的。他对我的父亲以及他的政治制度也是如此。可他对我又将如何呢？他能不能将我的生活和“伟大的阴影”区分开来呢？这个“阴影”是人人一眼就看得见的，这么一个可悲的事实，难道我注定一辈子要为它背黑锅不成？我唯一的感觉是：明天我要见的这个人是个有经验的外交家，是个严肃的历史学家。要按杨讷尔的话说，这是我的大造化，因为在这种

若明若暗的情况下，恰恰是凯南本人亲自上这儿来。在等待过程中我感到我是沉不住气了，因为我知道，往往是有很多情况取决于第一个印象，它能在一眨眼之间决定全局。

三月廿四日我的便衣“保镖”之一驾着小车把我送到伯尔尼。那里我换乘了杨讷尔坐的那辆车，于是我们开到了图内湖岸边的一所小房子，这里我们曾经来过一次了。杨讷尔显得很活跃，看起来很满意的样子。

“我已经和凯南谈过了。”杨讷尔说，“他看完了您的手稿后认为应该出版，他喜欢你写的这些东西。”

这我可真没想到。看来我离开印度以后，手稿的副本就送到美国去了。不过连我自己也觉得有些难以置信，这居然真的是一本“成型的书”，象我那些在苏联的朋友所说的那样。难道凯南真的认为值得一读吗？这可能解决我的一半问题，如果不是全部问题的话。难道真的在甚么时候我能在卡拉康卡村盖起一所医院？只不过三个礼拜以前我还觉得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哩！……

乔治·凯南身材修长，淡蓝色的双眸，举止文雅。后面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他讲了几个俄文词，但由于照顾到在座的其他人，接下来我们都是用英语交谈。我们坐在他对面的小沙发上，包括杨讷尔在内我们三人交谈了将近一小时。

谈了这一个钟头我才知道，梦幻和理想也有时候可以变为现实。他真的看了我的那《二十封信》的手稿，并且认为，可能而且应该出版。如果我真的想上美国，而不是到别的甚么欧洲国家，那就有可能在美国找到出版者。我绝对必要有律师（这一点我暂时还摸不着头脑），他们将和出版商作出安排，并处理签证和其它一些实际事物。他接着解释说，西方的生活和苏联完全两样，我只能慢慢去习惯。我想不想住在英国或者法国

呢？那里也能出版书呀！不，决不，一旦决定了的事，如果这是件可以实现的事，我决不翻悔！是的，他希望我不久以后能持旅游签证进入美国。在这以前我必须和未来的律师见面，并同他们一起决定一系列实际事务。

凯南非常亲切有礼，处处为我着想，这一点我感觉得到。我只有说“是，我愿意”、“是，我同意”这些话的份儿。我的脑袋嗡嗡叫，就象那天我走到美国驻德里大使馆那样；我自己都不相信，一个行动就这么完成了。现在也是一样，经过一小时愉快的谈话以后，我觉得我的神经已劳累不堪，当凯南建议我散散步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谢谢，我就在这儿等着，在凉台上坐一会儿。”

这是一个暖和的大晴天。残雪在消融，四处一片晶莹。草丛里露出了早春的水仙花的嫩芽。凯南散步去了。他一来就冻病了，好多天没出房门。奥伯霍封紧挨着山坡，下面是群山环绕的图内湖，光可鉴人。丛林密布的山坡上只见一片蓝色的浓荫，山顶上白雪闪着银光。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醉人的春天气息。我坐在凉台上甚么也想不了。最好就是这么坐着，呼吸着，眯缝着眼睛朝着太阳……

后来我就和屋子主人一起吃晚饭。凯南精神抖擞地走了进来，说他自我感觉极佳。大家的情绪都很好。饭桌上再没有谈正经事物，只在午饭以后凯南才说，我到美国以后将和他的一群朋友会面。他的两个成年的女儿带着孩子将邀请我到他们的宾夕法尼亚的农庄里去，那是他们从小最心爱的老房子，“就象您的祖巴洛沃一样”，他微笑着说。是的，我明白了，他非常仔细地看了我的手稿。

说也奇怪，就这么一个人，不久之前我和他还素昧平生，现在居然对我了如指掌，我命运的安排也包在他身上了。甚至

他的女儿们也知道我，在遥远的美国，有一所房子，“象祖巴洛沃一样”，叫我去……

凯南没过多久就走了。我也要动身回栖身的住所去。不过我们仍然坐在砌着壁炉的舒适客厅里欣赏音乐。我们不约而同地都挑了巴赫。杨讷尔非常喜欢巴赫，和我有同好。大家情绪都很好，这对巴赫的音乐十分相宜：它激情迸发，直泻而下，抑扬婉转的乐声那样完美，那样和谐。

一连两天我都保持着这种情绪。

三月廿六日 星期天，这是天主教的复活节，我想纪念这个节日，因为我个人的心灵充满着节日气氛。

我和我的“便衣”警卫一起去到圣尼古拉大教堂。他是个天主教徒，和大家一起唱法文和拉丁文的赞美诗。弗利堡的教主用法文讲道——用的是有关爱和博爱的永恒和全人类的语言。响起了庄严雄壮的管风琴声，合唱象银色江河一样倾泻而下，到处是鲜花，到处燃起了蜡烛……大家都跪着。

我也在祈祷，朴素的祷告从内心奔放而出：感谢我主！感谢你为我所作的一切、一切。感谢你向我伸出了恩惠的手。帮助我的儿女吧！帮助他们，保佑他们，安慰他们，让他们强壮起来吧。保佑他们，安慰他们吧……

我闭目合掌跪在一条木凳上面，旁边是那位穿便衣的警察。四周都是人。警察也是人，他膝下有六个孩子。无论是东正教教堂，恒河之岸，还是天主教大教堂，其实都没有差别，普天之下众人都祈祷爱，祈祷对亲人的帮助，祈祷平安。我感谢上苍所给予我的一切，请求赐给我儿女以慈悲和恩典。我从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象今天在弗利堡的复活节礼拜里这样热情地祈祷过。眼泪盈眶，使我眼前发黑，我没法抑止泪水。复活弥撒金碧辉煌、时间长而隆重，人们多次下跪，这一切都

是我目前最需要的。

三月廿七日 该从云端走入尘世来处理杂务了：和我日后的律师见面，他们是爱德华·格林巴姆和亚伦·施瓦茨。我觉得我已经稍微明白了一点我干嘛需要律师。可是当谈到版权以及在我这种情况下它的复杂性时，谈到和出版社订合同时，谈到出版后获得的一大笔版税，谈到建立慈善基金机构和其它具体事务的时候，我就象乡巴佬进了城一样……我特别窘，因为谈的事我听不大懂，即使用俄文谈我也听不懂。我觉得，有些事没法懂，很可能做错事。不过也别无他法，只好边走边学，将自己从一个山村隐士变成一个现代城里人。杨讷尔今天也象是心事重重，会面以后我们连巴赫的音乐都没有听。

略去一天，三月廿九日 我们又见面了。这次还有两位瑞士律师也在座——威廉·施泰赫林和彼得·哈夫特，他们这两位也和那一对美国律师一样：一个是上了年纪的、颇有资望的商行所有主，另一位是个令人愉快的年轻人，前者的同事。两位年轻的，即哈夫特和施瓦茨，我更理解他们一些，不过事情总归还是办好了。这种活动在苏联根本没有，因此，我很难想象。

这一天事情可办得不少。我签署了好几个文件，这种文件言明我委托律师办理各种有关出版书、金钱、签证等事宜。很明显，这本书要在很多国家出版，在美国则由哈泼和罗埃公司出版发行。这个公司名称、还有翻译者的名字，对我来说都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哪个名字我都不熟。我只不过是把一切拜托给那些在我有难时助我一臂之力的人们。我就象和善良友好的船员坐在一条船上漂游很久，船员要干什么我还用得着打听吗？他们要干什么比我清楚。我只应该说谢谢他们让我上船。

亚伦·施瓦茨是一位三十四岁的年轻人，头发略见斑白，

有一张孩子气的脸。他把他儿子们的照片给我看：一个是红头发的，红得象胡萝卜一样。爱德华·格林巴姆的妻子是个雕塑家，她把自己的作品目录给我寄了一份来。感谢上帝，不是那些现代派的，人有个人样，女人头象，儿童全身雕象，还有富于表现力的动物。这我可又认得两家美国人了，我知道，我会通过人、通过家庭、通过孩子来“发现”美国的，而不是通过参观风景区。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了解各国的方式。

就在这同一天我获悉，我可盼于四月起程赴美。

余下几天过得都很平静。

一切都决定好了。只要等那神秘的政府机器“一开动”，从里面抛出一张纸来就行了。这张纸就是我的命运所系——我的入境签证。

我读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信。这简直是太怪、太不同寻常了！在苏联的时候，达斯迪埃寄自巴黎的信我都收不到，从印度寄出的明信片要走一个月，这都得看信件检查是如何决定的：什么信放行，什么信不放……现在我正读来自澳大利亚的俄国人的信件，人家请我去，为我出点子，告诉我在瑞士移民局该和谁联系。复活节的明信片象雪片飞来：来自西德、瑞士、法国、美国。好心人祝我顺利、幸福、平安，想我之所想，急我之所急。

明尼苏达的一位年轻人请我上他那儿去。他写道，他的学历是五年大学和商业学校，他的生活水平略低于中等，他愿意和我共享有三间卧室的房子、柴油暖汽设备、冰箱、电气化、无线电和录音机。他说他在四十八个州都曾住过，到过加拿大、墨西哥，他认为，他住的这个小村里，闲话肯定不会比别处多。他认为，在政治观点上我们可以相互补充。他相信神。他家门前的树和水渠特别美丽动人。他学俄文，可是暂时还不

懂俄文。

有一位瑞士公民，一个店铺的老板，坚持说，我只应取得瑞士国籍。为此他建议和我结婚，“然后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请相信，除了有心帮您一把以外，我别无所图……”

纽约侨民报纸——《新俄罗斯言论报》的米哈依·阔里亚柯夫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还寄来他写的有关我的文章，文章很感伤，但却很友善。

最后，我日也盼、夜也盼的卡拉康卡村的信终于来了。苏莱士·辛格在信中说，我现在获得了自由生活，还可能再次去印度，他一家为此十分高兴。他用诙谐的笔调有滋有味地写道，三月十日苏洛夫如何跑到卡拉康卡村来，一心以为能在那里找到我；正好碰上无线电广播说，我已到了罗马，这时苏洛夫是如何哭笑不得……接着他又写道，他的家里记者们蜂涌而至，哪个角落都拍了照，现在简直不得安宁，看来还得闹腾一些日子。为了看一看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是个什么样子，他特地到勒克瑙看一场朱莉·安德鲁斯主演的《音乐之声》，因为他从未出过国门。

杨讷尔邀请我到伯尔尼他家里和家人一起吃晚饭。这是一个热情洋溢、富于家庭风味的夜晚。安东尼诺·杨讷尔的妈妈是瑞士的意大利人，他的父亲是德国人。他的德语、法语和英语都说得一样流利。可是在家里他对妻子安德莉雅娜和儿子马尔柯只说意大利语。八岁的马尔柯早就听爸爸说了，“有那么一个可怜的阿姨，哪个国家都不想收留她，她也见不着自己的孩子”。这是他爸爸这么说的，因为当时儿子正发高烧，不想放他走。听到这样一个忧伤的故事，小马尔柯才放爸爸去看我；但是后来他开始不断地打听这个“可怜的阿姨”，问她现

在怎么样了？他很可怜我，逐渐喜爱我。当我到他家的时候，他一把抱住我的脖子，使劲亲我，我难过得差不多要失声痛哭起来。后来整个晚上他都给我画图画，写俄文字母，这是他从俄文书里描下来的。他送给我一个用红纸包的小盒子，里面有他的宝贝：铅笔头，彩色粉笔，巧克力糖，旧园规，两枚钱币，小象模样的杏仁软糖。我把我知道的全部意大利语汇都使出来了：Caro bambino, mio piccolo bambino, grazie,〔亲爱的孩子，我的小乖孩子，谢谢，〕为了怕哭出声来，我使劲吻他……。

安德莉雅娜是个安详、落落大方的妇女。我们吃番茄汁的意大利面条。我们又听了巴赫的音乐，杨讷尔送了我一张唱片：序曲，是罗马尼亚钢琴家迪诺·利帕第演奏的。

四月三日我不得不从圣安东尼的栖留所迁往弗利堡的修道院，那里我可以更自主些。大嬷嬷玛格利特—玛利亚交给我三把钥匙，要是我晚上迟于八点回来，我就要用它们锁三道门。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每当我上伯尔尼回来，我就蹑手蹑脚地摸着黑，用手电照着钥匙，免得弄错，更主要是怕吓着修道院的养老院的什么人，因为我必须穿过那儿的一条长长的走廊。

白天我就去弗利堡大街上走走，上银行，上商店（出版商预支给我一笔稿费，我立即把从德里到这里的路费还清了）。可以在公园里散步，这个公园建筑在江水碧绿的萨林河陡峭的河岸上。没有谁监视我或盯我的梢。我的手提包里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明我是爱尔兰的卡伦小姐，从印度来。除俄罗斯以外，印度是我稍知一二，能谈上几句的唯一国家。

古老的弗利堡风景如画。狭窄的街道，萨林河上的拱桥，现代化的大学，还有双层桥的轻便桥拱；这一切和哥特式的大教堂协调有致，构成一幅十分动人的图画。一座座舒适的小教

堂几乎到处可见，使人们禁不住想进去，肃立片刻——那里的门总是敞开的，我一直在想念我的孩子，等待他们来信或是什么的，每次在散步时走进小教堂，我总在默祷："帮助他们吧，保佑他们吧，安慰他们吧。"

我的住室有窗临河，外边境界开阔，很安静。我开始工作——我老想写。我想写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事，我想献给帕斯捷尔纳克这位伟大的诗人一些什么，写日瓦戈医生，写拉拉*失去的爱情，写苦难深重的俄国，写我的孩子们。这是**哀歌**，民间口头创作有这种形式，可是文学中却没有。我现在什么也写不出，除了这无法抑止的哀声……我终于明白这无情的现实：出于我自己的选释，我正在把昔日的爱和情感上的联系永远地割断。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礼拜，好容易儿子的信来了。

"亲爱的妈妈，你好！

三月八号我们到飞机场去接你扑了个空，我们觉得十分奇怪。我们开始不相信你是没有回来，在那儿傻等了三个钟头。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是无线电广播，一连几天我们都不知道该想些什么。直到报上发表了塔斯社的声明，说你已获准在国外耽下去，愿意待多久都行，我们这才多多少少放下心来，于是生活又重新进入正轨，只有卡佳至今怎么也不能进入这个轨道，说实话，我们懂的事也不多……

我们最奇怪的是，你离开印度以后音讯全无，我还给瑞士大使馆打了电话，请求它帮助我和你取得联系。我至今还没收到任何回音。更使我惊奇的是你在印度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二月廿三日）中写道，你三月八日回国。

---

*《日瓦戈医生》一书中女主角。

终于收到了你的明信片，你写到你不知道怎么和我们取得联系。你能不能说明白一下，为什么我们一定得把信寄到部里呢？我们非常想给你直接写信，最好是用电话和你通话。我们尤其想知道你日后的计划是什么，你要在那儿耽多久，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你的朋友们都在打听你呢。你最好在信里写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回答他们。

再见。吻你。奥夏，卡佳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

这就是说贾帕尔并没有把我的信转给儿子。

他们什么都没搞清楚，什么都不明白。可是我怎么能在印度就通知他们关于我自己的“计划”呢？就连我自己在最后一刻也不清楚呀！

我把一切都和杨讷尔谈了，他理解我的感情并且说，最好的办法是叫通莫斯科的电话。

我们到了穆尔滕一家小旅馆，离弗利堡不远，借了一间带电话的客厅，叫了我莫斯科家里的电话，用的是瑞士假名。我足等了廿分钟，真等得我火冒千丈。

房间里有一个鸟笼，黑八哥它象鹦鹉学舌一样，每隔五分钟问一句：“Comment ça va？”（怎么样？）这简直让人受不了，我们就把鸟笼挪到外边走廊上，从那里还不时传来沙哑、奇怪的鸟语声。

铃响了！莫斯科。儿子在接电话。“奥夏，这是我。”我真象在作梦一样，我儿子慌里慌张地回答道：“老天爷，我的上帝……”

我们约莫谈了半个钟头。奥夏当即告诉我，他什么解释的

信都没有收到，我开始语无伦次、慌里慌张地对他说，“我在瑞士不是旅游者”，“我不回去了。”……我觉得无法把一切都讲清楚——因为我老害怕人家要把电话掐断，所以我急于把话说完。我只一个劲儿说：“我不是旅游者，你明白吗？”“我回不来了，你懂吗？”奥夏压低着嗓门——他一下子全明白了——说了又说：“是的，是的，我听得见。”他没有问任何问题，而我呢，上气不接下气，说的老是那几句话。我甚至不敢问：“那你们的情况怎么样？”因为不说我也知道，他们这会儿是什么情况……我没说我在等美国的入境签证，这对他们毫无意义，我既然**不回**家，那么我**上哪儿**又有什么关系呢？卡佳不在家，这倒好，我不知道要是我听到她的声音会怎么样……我们的谈话完了，因为人家把电话给掐断了。

这天晚上我发烧，我和儿子的通话怎么也不能使我平静下来。杨讷尔对发生的事情也很激动，其程度不亚于我……

要谈我这些日子的感觉如何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把自己的心血通通化作哀歌，这歌是奉献给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这几天我把它写完了，将手稿寄给了乔治·凯南，他对俄国文学体裁的理解可说到了入微的地步。我那时只请求他翻译出来，希望能发表在一份能传到苏联去的刊物上……

四月十四日我再次想和莫斯科通话。我们又把那只能作人语的八哥请到走廊上去。我莫斯科家里的电话没人应，电话接线员问我，我还想和别人说话不。我决定和伯莎通话。

这次谈话更使我心情低沉。伯莎说：“孩子们的处境将非常困难。”“你明白今后他们将会怎么困难吗？”她严厉地问道。“我都懂，你们理解我吗？”我问道。伯莎提起了我俩共同的一位女朋友以代替回答：“萨娘在哭。萨娘老哭。你在那儿和谁在一起，你怎么样？”“我有很多新朋友。”我说。

“什么朋友？怎么样的朋友？你说什么？”伯莎不相信而且很生气地说。“你那儿都是些什么朋友？”“是的，是的，这里有好人，这里有好多好人。”我竭力想说服她，可是她不信，也不愿相信。

这次谈话使我震惊，因为我从来认为伯莎是个合乎现代潮流的进步人士。然而——她居然不相信我在苏联国境以外能找到朋友。莫不是她心里有话不能说？最好不要再打电话了。真痛心啊；听到了可爱的声音，但是想痛痛快快谈一次话都办不到……

后会有期

可能我对友谊的概念与众不同。我并不重视频繁的会面、晚会和定期的集会。有这样一些人，我和他们极少见面，只不过有过几次个把钟头的谈话，可是这些短暂的会见却在我心灵上留下了多少印象啊！在困难时刻听到的热情话语是永远铭刻在心的！某一个晚上，与人共坐在厨房里喝上一杯莫斯科清茶，有时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事——你毫无保留地谈到了自己，作为酬答你也会听到对方对自己的艰难困苦的生活的自白……不过，话说回来，在苏联，又有谁的生活是轻松、简单的呢？可以说没有这种人，特别是与我最接近的知识分子圈中没有。

在苏联没有“社交生活”，没有那种和某一特定社会圈子所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定时的交往。我们只是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小说里读到过这些情况。革命毁坏了老的社交准则，可又不曾创造新的来代替它们。由于领教过大逮捕和“大清洗”那些年的滋味，人们已经不习惯和别人交往——心有馀悸。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不过社交的基本方式仍限于二三知己一起喝喝茶，或是咸鱼下烧酒，而且这个小圈子里的人要作到决不会把别人“给卖了”，或者彼此完全可以推心置腹才行。从老早以前就传下来这么一种具体的条件反射：“走吧，咱俩散散步去！”这就是说，你想对党或政府发泄一下怨气了。

所有的人，无论其社会地位高下，都是这么过来的。这种社会地位说到底也只是半斤八两——沉默与屈从，不过有些人拥有别墅、冰箱和汽车，有些则没有。苏联的上流社会由高级党政官僚以及那些在他们面前奴颜婢膝的艺术活动家们组成，

他们可以接触外部世界的代表，外交和文化的。对于其它人，这样的接触是少得可怜的，只能通过偶然的机会。我的朋友和我就属于这些其它人。这还得提起赫鲁晓夫自由化的十年——那时什么事情都简单得多，人们忘记了监狱，关于总理本人的笑话也敢说，人们开始相信过去是一去不复返了。那阵子人与人容易结识，朋友间来往也容易，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我和伯莎是在我朋友的家里结识的。这家人就是作曲家阿廖沙和他的妻子萨娘。萨娘是在莫斯科大学念书时认得伯莎的：当新莫大在列宁山上兴建的时候，这两位姑娘都在工地的广播站工作。伯莎刚从塔什干来，在历史系学习。她最喜欢帮助别人，一到莫斯科来就立刻将所有的莫斯科黑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他们多半是拍电影，或是搞翻译工作。他们很少有人能像她的父亲那样在工业部门工作，他原来是在塔什干种棉花的。有一个黑人居然能有幸在莫斯科郊外的大型经济企业里找到工作——他在那里养鸭子。这些都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一般说来黑人的生计都很难。第二代的女青年则找机会嫁给在莫斯科学习的黑人留学生，然后跟着丈夫回老家去。伯莎嫁给了一个非洲留学生，生了一个女儿。当我和她认识的时候她正等着丈夫返回莫斯科的消息。我那时正等辛格从印度回来，因此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我和她完全是两种气质，爱好也不相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相互了解。近两年来我没有比伯莎更知心的朋友了，因为她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和我许多其他熟人不同的是，印度人辛格和我愿意结为伴侣这件事她丝毫不以为怪。相反，她觉得这很正常。

她精通现代非洲的艺术、音乐、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要是在一个甚么新独立的非洲共和国里，她简直就是一块当部长

的料：她的眼界和精力需要在社会活动方面有一块广阔的用武之地。可是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外交部都不让她走出苏联国境，除非是到社会主义国家去。她是一个非党艺术行家，她这个半黑人、半犹太的奇怪混血儿把人事部门和民警局吓得要死，后者实际上在决定谁可“出国”、谁不可以出国方面是说了算的。伯莎的丈夫后来在非洲另外结了婚，那位妻子更适合他的伊斯兰习惯。伯莎是决不会同意深居闺阃的。她只好在莫斯研究非洲音乐，她利用唱片和录音带还写了论文。她就象一尾“飞鱼”，不是活在本来土生土长的环境里，而是不得不学会在空中飞。

她跳舞跳得多好、唱歌又唱得多好啊！她的节奏感是多么强啊！她和我儿子交上了朋友，他俩配对跳扭摆舞跳得多出色啊！她一来总是使我家满座生风。

她认得莫斯科的许多诗人、音乐家和作家，凡与非洲有些瓜葛的她全认识。她父亲是一位美国黑人，可是种族的声音仍然呼唤他们去探索自己的老根。她的小女儿比她黑得多——一块真正的巧克力。

伯莎的女儿是她的幼儿园里唯一的小黑人。每逢节日她总表演唱歌、诗朗诵、跳舞，大家都喜欢她，看见她就开心。可是有一天她问道：“妈妈，我怎么会是黑的？我想和大家一样是白的才好！”伯莎为此请了别的黑人小朋友去作客，免得小姑娘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这有些作用，但为时不久。伯莎气冲冲地告诉我说：“他们看见我领着她上幼儿园，就在街上喊：‘瞧哇，黑人来了！’”他们住在新稠李区，那里住的都是刚从棚户区拆迁的工人和新的苏联小市民阶层。这些人一看见黑皮肤就觉得是自然界的奇事。

她家住两间一套的套房，又挤又不舒服。伯莎的妈妈教

英文，学生总是穿过伯莎的房间来上课。厨房小得转不过身来。最惹伯莎生气的是，一些上她家作客的美国共产党员（她父亲的老朋友）常爱侈谈苏联的生活是如何美好。“我对他们说，我**知道**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可他们还一个劲给我说大道理！”她怒不可遏地告诉我说，“他们简直瞎了眼睛，他们根本看不见都变成什么、闹成什么样儿啦！他们不相信我要排队才能买到水果、牛奶和给女儿吃的饭！他们是又瞎又聋的教条主义者，还和我辩哩！”

一九六四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大会上，伯莎宣读了她的非洲鼓的报告。这次大会对她可是象真正过节一样，可谓是如鱼得水。可是大家都以为她是美国代表团的一员。她和瑞典以及德国的民俗学家成了朋友。美国来的一个女黑人对她说：“你们怎么老说我们美国黑人受到种族歧视呢？我有两所房子、两辆汽车。而你呢？你出版了几本书？”伯莎不知道如何回答她才好。

伯莎花了很大心血去收集材料，想写一本关于在俄国的黑人的书。她发掘出一些最早的有关买来的黑奴的记载，那些黑奴是十七世纪沙皇宫庭留着取乐的，相当于宫庭小丑。他们是由船运到黑海港口的。阿布哈兹山〔在高加索〕里至今还有黑人居民，这就是那些奴隶的后裔。伯莎到那里去过，找到了这些村子，她简直吓了一大跳。

阿布哈兹的伊斯兰教的黑人村落，其生活水准比他们在非洲祖先的好不到那里去：差不多全是文盲，一贫如洗。当地居民不和黑人杂居，把他们挤到土地贫瘠的山区。阿布哈兹共产党当权者被这位莫斯科来的黑女士唬得够呛：没有人知道她来是带着多大的权限的，要是她是党中央委员会派来的视察员呢？伯莎什么也没搞到手。当地黑人只说阿布哈兹语，从翻译

口中听到的是他们全都对生活心满意足。在当地首长的陪同下（人家不让她一个人单独活动）她到了一个村子里，那些女人们哭开了锅：她们以为要赶大伙走，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在高加索，人们对于这类种族灭绝的悲剧是太熟悉了，如：车臣—印古什人〔居住在北高加索的少数民族〕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人〔北高加索民族〕。……伯莎被这种无意之间造成的大恐慌吓坏了。她想问清楚一下，安慰安慰她们——可是还得通过翻译。后来来了一些懂得俄文的小青年，这才知道，她不是来制造灾难的。他们还告诉她，他们渴望受教育，说这里的妇女都是文盲，说一般讲来，他们的种族已濒于灭绝。伯莎和地方当局大吵大闹一顿，后来这些人答应将给青年人以帮助，可是她无权下命令，甚至不能在这里提出什么建议。这次外出的印象令她十分懊丧。把这个故事写进书里去决不可能——它肯定要遭到书刊检查的刀斧。

伯莎写的有关黑人的书最后成了一本专门对外的书，内容所剩无几，只是一些关于演员、音乐家、类似伯莎本人这样的科学工作者的情况介绍。原稿经过出版社编辑加工后甚至未给伯莎本人过目，故此她说，她现在对这本书概不负责，虽说署的是她的名。至于她那本关于非洲音乐的书，得见天日的希望就更小了——在苏联，没有什么人知道什么是非洲音乐。

我们常在伯莎的房里欣赏音乐。这间房既是过道、又是她的客厅、餐厅、书房和卧室。她收集了一大批非洲民间乐曲和歌曲。我在她那间房里听到过南非歌剧《金康》，全部取材于民间旋律（有点象美国歌剧《泊吉和蓓丝》）；听到过玛哈琳·杰克逊* 唱的黑人灵歌以及非洲土著的歌曲。这些唱片和录音都

* 美黑人女低音歌唱家。1911年生，她促进了黑人灵歌这一音乐形式的普及，故有“灵歌之后”之称。

是朋友们带给她的。可是伯莎本人连象在达卡举行的那种文化大会也不让参加，虽然她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出席这样的大会。

• • •

介绍我和伯莎认识的是阿廖沙和萨娘夫妇。他们住在列宁格勒。阿廖沙是作曲家，一位天生的富有抒情风格的人。他倒是更应该去写作室内音乐和歌曲的，可是靠这些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人，因此阿廖沙就只好去写歌剧。歌剧是一种过时的艺术形式，故此阿廖沙一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一个音乐家，他的诚实和真诚不允许他去谱写那些对党、对红军和“英明领袖”的颂歌，那他舍此而外又还能怎样生活呢？

阿廖沙的父母属于俄国贵族，属于这个阶层所代表的文化。他出生于柏林，那时他父母正作为政治流亡者侨居国外。后来，他父母再也不能忍受流亡生活，还是回到了已成为苏维埃的俄国，回到了皇村，现在这个皇村已变成“儿童村”了。阿廖沙学过德文、法文、音乐，至于他从小就背得滚瓜烂熟的俄国诗歌，简直成了他语言的有机部分。阿廖沙是个大块头，体态臃肿而欠灵便，还戴了一付眼镜。这是一位好得不能再好而又不讲求实际的人，读了一肚子书，非常聪明，简直是庇埃尔·别祖霍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的主角〕再世。如果要拍《战争与和平》这部电影，阿廖沙不必化装、不需要特别台词就能上镜头。他随便讲一句什么话就是庇埃尔的天然台词。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天才所在，他所创造的人物永远生活在俄国。这也是俄罗斯和她的文化力量所在，时光的流转和沧桑都不能使她归于毁灭。

我认得阿廖沙、萨娘和他们的家，是在举行阿廖沙的母亲

葬礼那天，这是当时列宁格勒文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革命以后叶莲娜·华西里耶芙娜〔指阿廖沙的母亲〕很少发表作品，这是因为她只能写一些属于永恒和美好事物的主题：写爱情，写大自然，写感情。这样一来，她就无法跻于新派知名苏联诗人的行列了。文学界之所以还知道这个人并且敬重她是因为她待人极好、性格开朗、品性高尚、为人慷慨，同时也因为她和列宁格勒的宫殿一样，是俄罗斯文化的活纪念碑。她被自己的丈夫——一位当时已“有名气的苏联作家”——遗弃后，便和自己的爱子阿廖沙相依为命，再未离开过列宁格勒，即便在它遭到围困时也没有离开过那里，就在那个时候她也继续在写诗。她还写下了非常有意思的回忆录，其中包括上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学生活，还有她侨居国外以及归国后的纪事等。其中一小部分曾在列宁格勒一份文学杂志上发表，受到官方的批评，这样，出版全书就毫无指望了。

她的晚年在贫病交迫中度过。那位“著名作家”有意在自己的遗嘱里剥夺自己亲生儿女和孙儿们的财产继承权。在双目全盲的情况下，叶莲娜·华西里耶芙娜还继续向心爱的孙儿们口授自己的诗作，歌唱生活、爱情和诗歌的永恒的美。

在铸工街一个大教堂里为叶莲娜·华西里耶芙娜举行了安魂礼拜。这样的礼拜堂在列宁格勒已寥寥无几了。

然后在作家协会的俱乐部里开了追悼会，参加者的悼词感人至深。但是她的回忆录至今尚未出版，连一本小小的诗选，她的遗作，也未能出版。

我特地从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参加葬礼，因为我早已认得阿廖沙的隔山兄弟，莫斯科的一位化学教授，并且早就知道他们对母亲的爱。我也听说过关于她的很多事，虽然始终未能和她见面。她那个家庭，由于错综的婚姻和不同情况下出生的

孩子，是很复杂的。就是这样一个创作环境，激励我、召唤我去从事创作生活。阿廖沙的隔山兄弟再三敦促我："写吧！写吧！你能写。这么着吧，你就好比给我写信似的开个头，然后一封、两封接着往下写，试试看吧！"就这样，他硬是从我身上"拽"出了廿封信，是我那份手稿的第一读者和评论员。

然后阿廖沙和萨娘又介绍我认识了叶莲娜·华西里耶芙娜在列宁格勒的朋友，一位文学家、俄罗斯诗歌的行家。他为我把我的手稿打了字，对我说这是一本"成型的书"。他自己留下一份拷贝，把它视为己有，爱给谁看就给谁看，也不征求我本人的同意。

他是一位爱书成癖的收藏家，他宣称死后要把他的大量藏书遗留给一所乡村学校。在一所大的公共住宅里他住的那间房全堆满了书，后来再也塞不下了，他就把书架放在几家合用的大洗澡间里面。他本人还是一位老资格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史专家，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西米兰·沃洛申的材料，打算写书，可是始终未能打通出版社的关系。我在他那里第一次读到约瑟夫·布洛兹基的诗，在当时尚未在苏联出版。他家里还有许多有意思的书，像在牛津出版的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传记，是伊万诺夫的女儿寄给他的，他和后者有通讯联系。

有一天他看我的手相说："您的生活里将发生大变化。您的下半辈子将比上半辈子过得有趣、有意义得多。"我那时笑起来了，现在我常常想起他的话……

阿廖沙钢琴弹得非常好。欣赏他献给母亲的《浪漫序曲》简直是一种享受。他为母亲的诗谱曲，他最好的作品要推室内音

*1866——1949年，俄罗斯诗人，戏剧家。被称为俄罗斯印象派第二代理论家。1924年流亡国外，一直至死。

乐。阿廖沙和萨娘夫妇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歌唱家、音乐家、画家。这是一个门庭若市、宾至如归的家庭，可是我知道，第二天早晨他们家早饭都开不出来，只有咖啡和扁豆糊糊。在苏联，手里缺钱是司空见惯的事。大伙儿不都是这么过嘛！一套西装，穿坏为止。由于付不起电话费电话常常被掐，可是一旦手里有钱，他们还是忍不住要和莫斯科的老朋友们打长途电话叙旧。

阿廖沙家里有俄罗斯老式家具，十八世纪荷兰大柜，精美的绘画，这是他母亲的财产。可是这些老家具已经到了那步田地，使你不敢往椅子上坐，深怕把它压垮。女朋友们多次劝萨娘把这些“老掉牙的破烂”卖给古董商——至少他们能有些钱。但是总舍不得奶奶留下的床、扶手椅和她的壁镜。每一样家什都能勾起珍贵的回忆，所以仍旧摆在老地方。而我们则照旧在厨房里吃烧扁豆加洋葱，坐在一只雅致的金漆腿的小沙发椅上。

我喜欢上列宁格勒他们家去。他们领着我去参观爱尔米达日* 或者到某一位现代派画家的画室里去，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虽说列宁格勒也有我的一些远亲，但我还是情愿上阿廖沙家或是他的朋友那儿，这样心情比较舒畅而且有意思得多。

阿廖沙和萨娘有时也到莫斯科我们家来住住。于是我家一下子就显得挤起来了，我的孩子们傻呆呆地听出了神，因为阿廖沙讲得那么引人入胜。可是他每次来总是因为什么倒楣事，比如说他想出版一些自己写的乐曲，但十有九成总是搞不成。阿廖沙一心想到巴黎去，他的父母在那里住了多年，他想

---

* 即列宁格勒美术博物馆，于1852年开放，为世界著名美术博物馆之一。其名称源出法文 ermitage（遁世居所）。

见见大的音乐世面。当斯特拉文斯基* 访问苏联的时候，人家请他到阿廖沙家作客。那时叶莲娜·华西里耶芙娜还在世，故此列宁格勒作曲家协会决定，在这样的家里待客“不会给苏联音乐界丢脸”，这才将年轻的作曲家介绍给斯特拉文斯基。可是阿廖沙只破天荒去过一次保加利亚，至于巴黎，依然是远不可攀啊……

* * *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中，许多是和文艺界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如诗人、戏剧家、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记者、翻译家、编辑、电影评论家和电影剧作家。这都是一些不大知名的人物——我从来不趋附大人物，可是他们精通本行业务，对艺术有敏锐的鉴别力。

其中有些人曾和我在世界文学研究所共事；另有一些人是苏联作协的，我们常上那儿去开会或是参加讨论。许多人每逢夏天都到莫斯科郊外的茹柯夫卡村歇暑，正好和我家的别墅紧挨着，我们常在那里见面。

莫斯科只有一个作家组织，出版社很少，因此任何新闻、新诗作、讨论中新冒出来的俏皮话无不是一下子就尽人皆知，党对艺术所作的任何新决定，甚至有可能作某些决定的小广播，也都是这样。莫斯科就象个大村子，任何风传都是不胫而走。何况近十年来在文艺中又如此变化多端。

难道可以忘掉那些在我们“文学村”——茹柯夫卡村河边

*1882—1971年，伊哥尔·费奥多维奇。俄罗斯作曲家。是继柴可夫斯基以后最著名的芭蕾舞音乐作家，未受过正式音乐专业训练。1907年就学于李姆斯基·柯萨科夫。在廿世纪其音乐造诣与德彪西、里查·斯特劳斯齐名。1945年起加入美国籍。

陡岸上的散步吗？

我们当时是五个人：一个是德国文学行家，一个是美国文学行家，还有两位西班牙文学翻译家，再加上我自己。这里还住着一位莫斯科唯一的一份电影评论杂志的编辑。还有一位从波兰文和捷克文译成俄文的诗人，有时来作客。他的朋友翻译爱沙尼亚文。他们可不是什么“名士派”。在他们的文学癖好方面，他们也未必能称为“左派”，虽然一涉及党的监督，他们就肯定无疑是左派了。他们尝够了这种监督的滋味，现在他们想，终于到了——不是指出版自由，哎呀，决不是——有可能出版哪怕是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安娜·阿赫玛托娃* 的诗的时候了，终于到了有可能写当代我国人们生活的真实情况的时候了……

他们曾历尽艰辛。那位德国文学行家曾在集中营里服满刑期，就是在那里和索尔仁尼琴结识的。这位诗人隐瞒了自己的犹太姓氏，用了俄国假名开始出版诗作，否则不会给他出版的。至于他当大学生时就上前线为俄国打过四年仗这件事，未必能使出版者相信他确有爱国心。

那位美国文学专家心里明白，要把现代美国作品的译作塞进出版社那是难上难。

两位西班牙文翻译者深信，他们此生不仅见不到西班牙，连拉丁美洲也见不到。而允许他们去的古巴，对他们却又没有吸引力。

可是他们无论对苏联政权或是对党都并不抱敌意：他们只想按照自己对这个政权、这个党的理想化的、拔高的概念使

---

* 此系笔名，原姓戈连柯。1889—1966年。俄国苏联女诗人。著有《誓言》、《英勇精神》、《没有主角的诗》等作品。

它更臻于应该达到的完善程度。他们深信不疑而且满怀希望，认为这一点是会慢慢作到的，每一次“转暖”的新兆头都使他们觉得越来越有奔头。可是党以惊人的犟劲儿破坏这些原本是它自己播种的幻想。

如果政论家伊利亚·爱伦堡，或者诗人叶夫图申科，或者剧作家施泰因，或者电影导演施维莱·加拜依和塔尔科夫斯基，散文学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或亚·雅申敢在国外对苏联内部生活吐出一点真情的话——这可还是党“号召”他们这样作的——那可就了不得了：那“上头”就又是喝，又是敲后脑勺，又是打嘴巴，全来了。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刚刚在作协的一次态度鲜明的发言中胆敢去揭露害死人的苏联官僚主义，弗·杜金采夫胆敢就这个主题写一部长篇小说*，康·西蒙诺夫刚刚批评了党对文艺所作的决议——他们就一个个依次挨了一顿不轻的拳脚。

正当青年和几百名莫斯科人欢迎自美返国的雕刻家埃里夏的作品展览之时，这一回挨拳脚的轮到埃里夏本人。正当年轻画家们信以为真，以为以各种形式进行创作的时刻终于到来，认为臭名卓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没有号召在创作中必须千人一面、而在展览会上居然出现了法里卡和涅伊兹未斯内的作品的时候，“上头”马上把他们喝住了。这令人想起早先的农奴主家里的戏子，只让在老爷家的戏院里给老爷唱戏……

自由化的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由于宣称要在一切生活领域内实现非斯大林化，曾给文艺界带来了希望。现在却居然跟诗人玛格丽特·阿利格尔及安德烈·沃茨涅先斯基、跟雕刻

* 指《不只是为了面包》这本书和因而受到批判的该书作者。

家涅伊兹未斯内、跟电影导演米哈依·罗姆在与文化艺术活动家所谓“接见”和“会见”的场合上，干起仗来了。

米·罗姆带点讥讽的口气向他指出：“我很难以和总理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争论！”——可是赫鲁晓夫却没有觉察对方话中带刺。

雕刻家涅伊兹未斯内提醒赫鲁晓夫说，他曾上过前线，在德国集中营里待过，可是总理坚持说，他不是爱国主义者，看样子还象个鸡奸犯。

玛格丽特·阿利格尔，这位著名女诗人，极力向他证明“她一直是跟党走的”，可是总理承认，他从没读过她写的书，她的名字对他丝毫不说明问题（他只觉察一点，这就是她的名字不是俄国名字）。

类似这样的与文艺界知识分子的“会面”从一九五七到一九六四年还举行过几次，都是总理本人建议的。客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莫斯科近郊我父亲过去的一所官邸里。餐桌就摆在花园里，有的划船，有的散步，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和政府成员们“交谈”。葡萄酒和烧酒流成了河。伏罗希洛夫和肖洛霍夫大唱其民歌。在这种“会见”之后并无任何决议——无疑，第二天早起好些人头痛欲裂。

赫鲁晓夫原本想详详细细地“摸清”文艺界的思想倾向。可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那批专家加之他本人才疏学浅，他能看到的只有一点：文化艺术界的知识分子是老百姓中最“不安份守己的”……作协、世界文学研究所、几个剧院和电影制片厂所属的那个区党委会发牢骚说：“我们这个区最不好办，瞧有多少个文化艺术团体！在生产单位可要容易得多！”

有时《新世界》的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或伊利亚·爱伦堡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宴会或是直接找到赫鲁晓夫那

儿。那以后一阵日子就好过些，《新世界》也就按部就班地安然发行各期杂志，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其它短篇小说就会赫然刊出，直到下一次挨拳脚，给掌嘴。

赫鲁晓夫从来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专门自己给自己拆台。他开头向知识分子拍胸脯，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可到头来他又象老爷一样地颐指气使，出口伤人，毫不讲理，于是那批本可赖以与官僚主义斗的知识分子对他只好敬而远之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官僚主义和他毕竟是亲不亲、自家人嘛！

苏联的报纸从不报道新闻。中央报纸一共只有两份，即：《真理报》和《消息报》。流行这么一句玩笑话："《消息报》内无真理，《真理报》上无消息。"总理和作家的谈话也和其它新闻一样，都是茶余饭后，在茹柯夫卡村的茶藨子小树丛里或是在河边散步时，作为小道消息传播的。

"您知不知道，爱伦堡最近会见赫鲁晓夫时说什么来着？回忆录将继续出版。"

"您听说了吗？在招待会上沃兹涅先斯基怎么还嘴的？"

"听人说，阿利格尔差一点昏过去了，是柯斯佳〔即康斯坦丁的爱称〕·西蒙诺夫用两只手扶着她才把她从桌子边弄走的……您知道吧，一年多以后在第二次接见的时候，赫鲁晓夫把她认出来了，对她说：'我喜欢牛性子的人，我自己就是个牛性子！'"

"您听说了吧？米高扬的儿子到了古巴，在海明威家作客。国家文学出版社终于发排《丧钟为谁敲响》这本书了。看来出版还是有希望的！小心点，别踩着了，傍晚母牛总是从这条小路到河边去的。"

"母牛？！得，咱们还是到那边去，绕着庄稼地走吧！是

的，是的，我在听着呢。这事我可一点不知道。米高扬的儿子终究和文学毫无关系。”

“这有什么要紧。人家还请他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和海明威见面的情况，您在文学报上见到了吧？出版社希望这样做能起点作用。”（什么作用也没起，小说就是没有出版。）

“咱们坐在这里吧，坐在这台阶上。”

我们就在小草房边坐了下来，伸开两只满是灰尘的脚。这所小房是两位西班牙翻译租的。这连小房子都算不上，是个半棚子，不过夏天倒没有什么。村子里都知道，就这号小房子，文学家们也舍得出钱，要价多少都成。这里非常安静，可以工作，到莫斯科有电气火车相通。在巴掌大的房里，桌上摆着一架打字机。一位西班牙文学专家正在写一本关于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的书，他于内战时期阵亡。

“您知道吗，托洛茨基对墨西哥画家迪埃戈·里维拉*说什么来着？墨西哥都怀念托洛茨基，他在那儿交了不少朋友。”

“您看过埃马尼埃·达斯迪埃写的有关斯大林的新作吗？挺有意思，但好多事不象真的。斯维特拉娜，您干嘛自己不写点回忆录呢？您也有好写的嘛！”

又来了！看来大家都商量好了似的。这种话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我嘴里支支吾吾一阵就算是回答。我不想说我已经在动笔写了，就坐在离这儿不远的我的阳台上。

《加西亚·洛尔卡》也要在茹柯夫卡村脱稿了。这会是一本很好的书。俄罗斯作家们对西班牙内战是记忆犹新的！那时候从各个国家和苏联有多少浪漫主义者涌向西班牙啊，许多人就

---

*1886—1957年，曾在法、意、美等地创作，为墨西哥大型画派创始人。

死在那里。死去的俄国人更幸运些，对于那些生还的，等待他们的是监狱和法庭。

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的共产主义在苏联早已过时，可忽然在西班牙冒头了，怪不得好多人都上那儿去。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浪漫主义的共产主义被完全镇压下去，它只活在一些死不回头的人的心里，这些人是连监狱都奈何他们不得的。这种共产主义变成一种狂热，因为再也没有什么现实根基……可是西班牙内战的尾音在事隔卅年之后仍在浪漫主义者的心里回荡。这些人瞎了眼睛，因为共产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

“您知道吗，那瑞姆·希克梅特原先决定留在波兰。可现在听说他又想回来。可怜的那瑞姆，多么好的一个人，真可怜他！”

那瑞姆·希克梅特是土耳其的记者、作家和诗人，是浪漫主义的共产主义最典型的代表，他在安卡拉的监狱里蹲了十年。被救出狱以后他跑到苏联，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二十大的决议使他和别的许多人一样在心里燃起热切的希望。那时他写了一个妙不可言的讽刺剧《有伊万·伊万诺维奇这个人吗？》，该剧是讥笑苏联的卫星国，很明显，指的就是匈牙利和拉科西。接着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希克梅特不幸而言中。

这个剧如此真实，如此辛辣，以致苏共中央在它初次观摩演出后不得不立即下令禁演。那瑞姆一气之下去了波兰，在哥穆尔卡执政早期，当时的波兰看来还是共产主义自由化的中流砥柱。后来希克梅特仍旧回到了苏联。他死于一九六三年五月，没能见到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利的审判。要不然的话，他肯定是抗议者一派的。

“咱们喝茶去吧！”我们走进这所虽然原始、但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小屋的另一个房间。就着照例都有的香肠和乾酪喝

茶。开它一听鱼罐头。乐在其中。听听新闻可真是一件快事。我到哪儿能在一个晚上听到这么多新闻？我们一位熟识的诗人曾说过：“茹柯夫卡村住的是进步知识界和反动派中的最优秀的代表。”他这是指我说的。

* * *

西班牙内战的馀音在它结束后还袅袅不绝：因为一九三六年从西班牙回来的苏联军人和作家都给投入监狱了。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许多家庭都收养了西班牙的孤儿。和我同坐一张书桌的小男孩忽然有了一个“西班牙小弟弟”，使大家羡慕得要命。我们都戴有穗子的西班牙帽，还会说两个字：“No pasarán！”〔意为“不许通过！”〕在伏罗希洛夫的别墅里举行的有许多人参加的新年枞树晚会上，主客是两个西班牙小女孩：查莉塔和露丽。她们站在钢琴旁唱西班牙和俄国歌曲，每个人都想送点什么给她俩。

后来，“西班牙儿童”已长大成人，成为苏联公民，可是祖国语言他们并未忘掉，只想回自己的国家去。我在大学时认得不少这样的人：何塞·加西亚和埃萝薏娜·兰塔依都成了历史学家。他们都得习惯于俄罗斯的严寒、毡靴和皮帽。真可怜哪，这些偶然飞来的鸟儿啊！

当佛朗哥准许他们回国时，他们立即回祖国去了。可是在“苏联混过”的很难在那里生活和找职业；有许多人请求回苏联，这里他们的运气也不见得就好。他们头上的光轮早就不见了。

对西班牙内战的感情随着新的一代的成长而发生变化。我知道莫斯科有这么一家人：父亲在西班牙战死，他在那里以将军身份化名指挥过一个国际纵队。这个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浪漫

主义者。他是一个匈牙利人，一九一四年作为战俘来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也没有走，开始写一些生动、辛辣的短篇小说，廿年代在莫斯科领导过一个左翼的青年剧院，娶了一个俄国女子，不久就成了一位著名的苏联作家。他们生活不错，女儿进了莫斯科最好的一所学校，一心只想当戏剧演员。

西班牙内战一开始，他就丢下一切，上了那儿，“为革命一战”，因为在莫斯科就缺这个。他素性渴望冒险，人又非常勇敢，故此不久后就擢升将军。他的死完全是偶然的。他死后半年妻女还在莫斯科继续收到他的信，因为当时的军邮要经过其他国家，时间照例是很长的。

他给家里的信写的都是战争，写得极好，这是他的志向。女儿塔玛拉和母亲感情很深，是在父亲这些信的哺育中长大的，对于她来说，父亲就是最美好、最光明的化身。

她进了戏剧学院，本可成为一名导演，可是一九四一年对德作战开始了，她立刻向母亲声明，她要到前线去当护士。妈妈差不多要吓昏过去，可是女儿志不可移。因为她非这么干不行：对父亲浪漫色彩的回忆促使她去冒枪林弹雨之险。

塔玛拉在战场上当了四年护士、政工人员，在战争间隙时间里为军队组织演出，一切最需要她作的她都作了。在战场上她嫁给了一位军官，在战壕里举行了“军事婚礼”。后来他们回到莫斯科，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长大了，成了我儿子的伙伴。塔玛拉成了我的朋友。

我们的儿子差不多是同年。他们根本不想到什么越南或是刚果去“捍卫革命”，还可能把这号志愿者叫成疯子。斯塔细克法文很好，还学西班牙文，还能写点相当不错的短篇小说。他学西班牙文是想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有朝一日到西班牙去，了解那里有关自己外公的一切情况。他写的短篇小说是谈爱

情，再就是谈父母如何不理解自己的儿女。

他认为自己的父母实在是守旧到了毫无办法的地步，特别是那位当上校的爸爸，最喜欢对儿子进行军事训话，要求儿子绝对服从。儿子把爸爸的训诫叫作“报刊社论”，不同意他的观点，不愿毕恭毕敬地当孝子贤孙，不久就离家出走，声称“不和这种市民阶层”厮混在一起。

有一个时期他住在同学的房间里，没有床铺，只在地板上铺了两床褥子，墙上挂了一张大的海明威照片。在莫斯科要当“嬉皮士”可不容易，因为没有可供住宿之地，民警会很快把你交还给你的户主家长。斯塔细克绝不是“嬉皮士”，相反，他很注重自己的外表，他的衬衣和长裤是他的朋友、大名鼎鼎的斯拉瓦·扎伊采夫亲手给他缝制的。斯塔细克只不过不愿和父母亲的“落后思想和幼稚的党性”搀和在一起罢了。

斯拉瓦·扎伊采夫现在是在巴黎、伦敦和美国都有了名气的服装设计师。他和我儿子同属一代人，他们不要战争，不愿对什么“理想”付出代价。

斯拉瓦·扎伊采夫不向往甚么赫赫战功，他从小喜爱的却是漂亮的衣着。他出生在一个地下室，一个看院子的人家里，长在地下室。后来父亲在前线战死，母亲又死去，他于是成了孤儿。他由一个好心的妇女——也是院子看守人——收留并抚养长大成人，这位妇女也象所有看院子的人一样，住在地下室里。在那种居住条件下，小男孩怎么会产生漂亮衣服的想法呢？要知道当年生活在“底层”的高尔基也曾向往美呀。作为一个男性他原可以当工程师、当军人，什么都可以当，但斯拉瓦什么都不想，他只想把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

艺术学院毕业以后，他设计的首批日常穿的朴素、方便的衣着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受聘到一家工厂去工作，那里一

些保守的、肥胖的女设计员把他当作仇敌；因为她们立刻发现他是自己的劲敌。可是斯拉瓦的设计式样每次都拿出来展览，每次都能选上，于是外国记者就来采访他了。和这位年轻的设计师在哪儿谈话都行，可就别上他家。要把斯拉瓦·扎伊采夫的住房让外国人看见那可不行。他和年轻的老婆及孩子住在一间小得可怜的房间里。他自己把墙涂成各种颜色，有一面墙涂成了黑的。在这面墙上他钉上各种新设计的服装式样草图。住惯地下室之后住这么一间也不错，至于人家西方的著名服装设计师住什么样的房他可猜不出……也许如今他也有了自己的一套房间了吧？

父亲辈和祖父辈的“战功”已成过去。

新的一代渴望生活得自由和美好。

他们不愿杀人。

• • •

多么令人难忘的茹柯夫卡哟！这个包括“茹柯夫卡站”在内的莫斯科近郊的小村子是一个多么奇怪的混合物啊！星期天傍晚在单行铁路线旁等候电气列车的是形形色色的居民……

组成这一切的基础是老茹柯夫卡村，那里还有一个家底很薄的集体农庄。不过大部分居民每天到莫斯科郊区的工厂里去上班。每到夏天，那些没有上下水道的小木头房子（厕所设在菜园后面的小木棚里）就租给大学教授、评论家、电影导演和诗人们，租给那些还没给自己挣来私人别墅的人们。看来这些人以后也未必能挣得到。

一九四六年政府把一批别墅“赠予”原子弹和第一个回旋加速器的发明家们，这些别墅就盖在茹柯夫卡车站附近的小松树林里。就这样出现了一批“保密的”和不保密的学者的别

墅，名义上它们是属于科学院的。这个地点既方便，风景又好，木头的二层小别墅都是国家掏钱盖的，就象雨后春笋一般从地上冒出来。继“原子弹制造者”之后过了几年又添了“卫星制造者”，从别墅增加的情况来判断，苏联科学成就是很大的。这个村子也因此出了名。遗孀们又把别墅卖给其他苏联富翁：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当中又出现了大提琴家姆斯提斯拉夫·拉斯特洛波维奇和作曲家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要精简臃肿的国家机构这类话不知说了多少，可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弄清楚，国家机构反而更庞大，因此消夏别墅不够用了。于是又盖了三个别墅村，都是清一色的标准木头房，还有暖气，每个村都用公共围墙围住。其中部分别墅给了部长们的遗孀和领养老金者，我和孩子们也分到一所。

我们每年夏天都到这里来住。十年之后，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我宣称我们已经不需要别墅了。这引起他们的愤慨：“我们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别墅还不要的事。”部长会议的一位官员这么对我说。“相反，人家还求之不得呢！你们这是怎么啦？这造成一种印象，就象用这种形式向新政府提抗议似的。”（那时赫鲁晓夫刚被赶下台。）“当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再向你们收回别墅好了。现在你们尽管用，再别提这个问题了。”我们于是又住了下来。

茹柯夫卡村三个组成部分，即：农村部分、“科学院士”和“部长会议”，都是自立门户、互不交往的。

村子里有一个普通食品店，一到夏天队就排得老长，都伸到公路上去了。要在这里组织农村市场吧，民警又不同意。他们有自己警察式的、别人摸不着头脑的考虑。

可是在“部长会议”的领域内却设了专用的食品店，供应最好的商品，为了使“村民”不到这里采购，给在别墅休养的人

都发了特殊通行证。为此还设了特别门岗(大门有五处之多),检验那些携款来此购物的人的护照,否则不允放行。门岗是村子里的妇女。她们站完岗就去给自己的乡亲们买面粉和砂糖,一边咒骂"该死的部长会议"。"通行证制度"的主要牺牲品是科学院士们的老婆和厨娘,她们本也应该享受这个"通行证待遇",但不知为什么通行证直到夏天完了才发给她们。科学院士们的老婆可是煞费心机地去张罗一切,因为家里要做饭,难怪在门岗附近和商店周围常可听到娇声叫骂。

每逢节日这种冲突就到了白热化,喝了几杯下肚的农村青年和那些"部长会议的人"在电影院里寻衅斗殴,那里各阶层的居民免不了要碰到一起。在夏天平静的普通日子里,月台上总站着那些乘坐早班车上莫斯科的人,穿布衫的举止文雅的外文女翻译们站在月台的一头,而穿绫罗绸缎的部长太太们站在另一头。

我在茹柯夫卡村的生活,同往常一样,也是不合常情的。"部长会议"的那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的朋友们夏天住在村子里,后来我又结识了一批"科学院士们"。

有一天我的卡佳牵着一个火红头发的小姑娘上我家来了,这就是她的新朋友。后来又来了一个小男孩,名叫尤拉,是她们的朋友,还有她的一条白毛狗,是一匹狮子狗。从那以后他们就难舍难分,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而红头发的冬妮亚·扎略斯卡娅的父母亲也成了我家的挚友。这是一对年老夫妇,德高望重,两个儿子已结婚,还添了孙子,但精神上却完全是年轻人。每逢冬日的周末我们就到妙不可言的郊区树林里去滑雪,我们这一帮子人搭配得非常奇怪:有小孩子,还有扎略斯基一家的年逾花甲的朋友们,也象他们一样,是些会寻快活的、有风趣的人们。这热热闹闹的一帮子人,玩够了之后,脸上红扑

扑的，胃口奇佳，一下子涌到我家或是到扎略斯基家没有生火的厨房里。把什么都掏出来吃——面包、肉饼、香肠、炸鸡蛋，再喝上一瓶烧酒。冬妮亚的父母和她家的朋友们都是些发明家，他们都得过许多奖和勋章，可是从未上过报。他们的发明是国家机密。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群会寻快活的人，成为诗歌、音乐、体育和纵横字迷的爱好者。吃饱喝足之后，大家就上车站赶火车，谢明·阿历克山德罗维奇就会一路走，一路大声朗诵谢里文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和叶夫图申科的诗。

夏天他们在别墅里打羽毛球和乒乓球，我们的小女孩们和尤拉敢于和成人们一决雌雄。孩子们过早地迷上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他们看的都是一样的书，都学英文。女孩们都不到十五岁，我就发现她们在看爱因斯坦科学传记了，后来就看大学物理课本。不懂得的地方她们就请教谢明·阿历克山德罗维奇，而他也乐于给孩子们讲解。尤拉比这些女孩子们还懂得多些，他的爷爷是位化学家，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家里很娇宠这个小男孩：他很有才华，书读得不少，脾气不好。

他还有一位外公也“发明”了一种什么东西，但说都不能说。这个外公住在一个什么新建的城市里，地图上都找不出，也没有具体通讯地址，只有什么“某某号信箱”，怪不得尤拉说，“外公和外婆上箱子里去了”。外公在那里给自己的“发明”进行试验，一试验全世界的地震学家就都知道了，可是在苏联那些人还故意装成别人都不知道似的。

卡佳和冬妮亚的爱好，除物理、运动和狗之外，很快又增添了一项骑马术。两位小姑娘发了一个吓人的愿，宣称终身不

---

*1899—1968年，俄国—苏联作家。

嫁人，这辈子就只从事物理学、体育运动、骑马和收集各种书籍。冬妮亚还为此给她爸爸写了一张条子，她爸爸一笑置之，将条子锁进了书桌抽屉。我的卡佳可没敢签署这样的文件……

近年来我的别墅里出现了辛格、黑皮肤的伯莎和出出进进的印度客人这件事引起了茹柯夫卡村的一片慌乱。“部长会议”的太太们一看见伯莎带着女儿在小路上散步或是上商店采购时，就把脸孔拉得老长。加之伯莎和她的女儿讲的又是英语。她们倒没见到辛格，因为他不能长久散步，可是对上辛格那里作客的穿印度纱丽的妇女，她们却感到奇怪，使劲地盯着看。

“科学院士们”一天看见我家大门口的使馆汽车后就再也不上门了。“我不想明天被迫给自己写声明。”谢明·阿历克山德罗维奇阴郁地说。他就没说出来，要是他自己不写，那别人也会**“给他写”**的。

没有特殊许可，尤拉和冬妮亚的父母不得与外国人见面。为什么要订出这种毫无意思的规矩，只有那些订规矩的人心里明白。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些姓名不为人知的人物，是他们不顾一切法律和宪法，硬性规定苏联公民的生活准则。

冬妮亚·扎略斯卡娅的父母和他们愉快的同辈人从小就在心里保存着二十年代浪漫主义共产主义的残余，始终难以忘怀。

他们的共产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毋宁说是对革命后最初几年的回忆——那饥饿和愉快的学生生活、马雅柯夫斯基的诗朗诵、梅耶尔霍里德* 的剧院、政治和艺术中的自由争论，以及当时对“世界革命”所抱的希望。现在，我猜

---

* 1874—1940年，苏联导演及演员，此处指以他命名创建于1923年的剧院，后因曾上演小仲马《茶花女》，遂以“严重脱离苏联现实”的理由于1938年遭到查封。

他们可能最希望那个被分裂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有可能慢慢地接近起来。从学生时代起他们就对共产主义十分信仰，他们不想和“青年时代的不良行为”一刀两断。

可是他们的两个儿子——都是工程师——看问题却不一样，他们认为父母亲都是迂腐过时了。至于冬妮亚、尤拉和我的卡佳就再也不会去正经八百地研究马列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列主义老掉了牙。再说这些女孩子们这么早就走上了客观的、数学思维的道路，她们无疑不会把人类分成阶级和政党，而是把它分成两大类，即：同意相对论观点的和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她们早已知道，人类和宇宙的共同语言将是数学公式的语言。

• • •

利沃夫夫妇是一对天文学家。

我简直无法掩饰我对敏捷而优雅的莉蒂雅·尤里耶芙娜的折服、赞叹的心情。她不仅在干一件有意思的工作——编辑有关天文学的科学出版物，还有时间去采购、照顾外孙子、护理生病的婆婆，到晚上还和上大学的儿子去看电影。

这一家人住在一所小小的老式木头房子里，从外表看就象一所普通的木头农舍，这是老莫斯科的真正文物。在房子里面，他们费了不少心血，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现代化的方便设施：煤气、暖汽和洗澡间。房子里保留了老式的俄国家具、图画、银器等。在客厅里——兼作主人的书房和卧室——敬茶的茶具特别精致。到了晚上，劳累一天的家人团团围坐在一张不大的圆桌旁边，有天文学家夫妇的父母亲，他们的儿子——物理学家，女儿和女婿——画家。

这里没有人谈论共产主义。对这些人来说共产主义是不存

在的。他们的祖先是画家和物理学家，曾为科学献身，为人类进步不遗余力。革命使这些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后裔贫困潦倒、孤陋寡闻而又受尽凌辱。可是他们仍然继续埋头工作，全然不把这个奇怪的制度以及这些不学无术的统治者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他们一身傲骨，但求自己的儿孙能象他们自己那样，继续为进步事业服务。

莉蒂雅·尤里耶芙娜的儿子睡觉的那个小沙发床上面，钉着一个摇摇晃晃的书架，上头塞满了书。她女儿的床头是一只祖母传下来的银色十字架。墙上到处都挂着非常出色的水彩画，是莉蒂雅·尤里耶芙娜的父亲在克里米亚画的。在圆桌上不讨论政治：这里没人喜欢它，也不愿谈它。这里谈的是小外孙、新电影和新书。

莉蒂雅手指上戴着一个大的印度蓝宝石戒指，是她第一个婆婆送她的。很久以前，那时她还很年轻，在普尔科沃天文台开始工作的时候，在那里认识了著名的印度天文学家钱德拉舍卡尔*，她早就想去看看印度了。在这个家庭里都喜欢印度，理解印度，可能正因为这样，我在这里感到非常愉快。可是迄今为止除了东德和保加利亚以外，莉蒂雅·尤里耶芙娜哪儿都没去过。

她有一双小小的、坚强的手。指甲没有经过刻意修剪。这双手操持着全部家务。蓝宝石的戒指和另外一只镶大块玛瑙的戒指并不妨碍她干活，这两只戒指已成为她手的一部分。冬天我上她的别墅去，那里很冷，她带着小外孙住在那里。她生锅炉、运木柴、作饭、洗衣、给孩子洗澡，什么都干，为的是给

* 1910年生，美天体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生于原印度拉合尔（现属巴基斯坦）。

学美术的女儿分劳，她眼看就要在学院毕业了。可是谁也不给莉蒂雅·尤里耶芙娜减轻负担，相反只给她增加工作，可是她都能干下来，而且仍旧是那样安详、文雅和富有魅力。

是什么力量促使她驱使那双轻巧、快捷的双足，成天价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跑呢？她不信宗教——这是泛指的意思，作为一位天文学家她对宇宙的看法过于理性了一些。不过，可能正是由于她高深的学问使她坚信确有这样一种能源，只不过其它人尚未知晓罢了……

我眼中的莉蒂雅·尤里耶芙娜是精神文化的楷模，她已超脱了尘世的污垢，超脱了腐蚀和玷污人类生活的一切。她谁也不咒骂，谁也不憎恨，她顾不上，因为她整整一天都要用来从事有益的工作。她不能让自己花些闲功夫在打嘴仗或是提抗议上面。因而她的生活饱满而富有成果。偶尔和她的一次见面都会使我带来安定，使我相信善和创造的力量。

她可能有些地方很象我同班十年的维拉。我们熟得不能再熟，因为我俩的母亲就是好朋友。维拉家里保持了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不过不是贵族传统，而是民主的、“非贵族的”的传统，这种传统把启蒙教育从首都带到穷乡僻壤，带到人民中间。她的父母都是教书的，在乡村教过，也在国民学校教过。他们的生活富有献身精神，清寒但具有坚定的目的。他们从来不知奢侈为何物，就连起码的温饱也不可得。他们的财富和珍宝纯限于精神方面，而日后又将它们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后人。

从外表看，莉蒂雅·尤里耶芙娜风度翩翩，而维拉则和她全然相反。她粗大、动作迟缓，四十岁上就显得很古板，和五十岁还依然举止优雅的莉蒂雅·尤里耶芙娜大不相同。维拉的发辫是盘在头上的，有时她又把它束拢在后脑勺上梳成髻，这是俄国亚麻色头发的妇女最习见的“农村”发式。她的微笑总

略带羞涩，还有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明亮、智慧和忧郁。怎么我觉得这两位妇女会如此相似呢？

答案在于维拉在我眼中也是灵魂纯洁、正派和诚实的楷模。象我自己这样一个罪孽深重和软弱的人，必须向这些崇高的榜样求得帮助和支援，以洗涤我自己的灵魂，并从他们之中汲取力量。

维拉是一位生物学家。她从事遗传学的研究工作，这给她生活添了不少困难，因为在一九四八年，遗传学者们面临染色体理论遭到党的禁止的情况。一个广阔的知识领域竟由党宣布为禁区。这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么？对伽利略的审判？施予乔·布鲁诺的火刑？没有，谁也没有烧死，不过“英明的党”宣布孟德尔——摩根的学说是**异端邪说**，而异端邪说在苏联没有存在的权利。

可是“异端邪说”却转入地下，继续生存，学者们继续作他们的实验，顶的是别的选题的名义。有时候只好把实验挪到家里来干，挪到公用厨房里或是数口之家同住的小房子里来干。维拉的许多同事就是这么干的。这样反而鼓了他们的干劲。

当许多年过去，染色体理论“恢复名誉”以后，这才知道这些年并未等闲虚度。在六十年代才得以恢复的遗传研究所里，维拉和她的同事们的工作获得了应有的承认。

一九五六年维拉派到巴黎参加大会，她花了四个月突击法文，后来居然能用法文宣读学术报告并回答问题。她学什么新玩意都有自己一套系统：如何很快掌握文法，如何很快学会打字；当时间不够用时，如何快速烹调；如何编排学术卡片……

家里只有她和一位老爸爸，她又瞻养他，又照看他，又心疼他。由于老父亲的缘故她只好放弃到英国出差半年的机会：当时莫斯科根本找不到女工和女护理人员。古巴请她去担任一

项很有利可图的工作：菲德尔·卡斯特罗忽然心血来潮，要创建一所遗传学研究所，由他本人充当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延聘了世界各地的学者，一心想指望他们兄弟般的帮助。给这些学者提供了古巴最豪华的生活条件。他们甚至邀请维拉把老父带去，但她只一笑置之。古巴不是她待的地方；这和她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

他们父女俩住在两间小小的、收拾得十分整洁的房子里，那里面除了收集的一批唱片和一台电唱机以外，再没有其它奢侈品了。这里也没有盥洗室。没有电梯、电话，虽说这里是莫斯科市中心。厨房小极了，也没有窗户。

维拉工资很高，但钱在苏联经济里并不起大作用。想装电话——希望甚少，想要一套单元房子更是没门儿，因为维拉是非党人士。一个党的积极分子，把他的一半时间花在会议上和待在区党委里，在分配附有电话的新单元房子的名单上总是排在最前；科学界的有功之臣，象维拉这样的人，在名单上却总是排在最后。她对此颇能理解，不发牢骚，她也不去乞求——这不符合她的性格。

可是她家多么可爱啊！到处是一尘不染！种在朝阳窗户上的盆景郁郁葱葱、一派生机，打开窗户望出去可见到湛蓝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天空，这个禁欲主义式的简朴蜗居竟这样使人感到温暖、亲切！

维拉住的那间小屋子里有两张桌子，上面堆满了书和信件。给她写信的有巴黎同行，有俄国各地的人，因为她已是这个学术范围内公认的权威。她墙上挂的都是年轻画家的作品，那些不能参加画展的画家的作品：有新象征派、印象派，有些像福楼拜尔的风格：色彩鲜明、结构平稳。除非是艺术领域和这个国家的生活剧变，除非是俄国走出它漆黑的死胡同，否则

这些画作永无展出之日。维拉很理解这一点，于是年轻的画家们就看中了她家的墙壁，认为那是最适合展出他们的作品的地方。

人家也把自己的手稿拿给她看：这些人还不是作家，只不过是一些想说、想写的人。她是一个严格的鉴赏家和评论家，但是人家相信她的判断，人们爱她。

我离开莫斯科前不久，她和我谈起一位年轻的美籍研究生，这位研究生就住在她的研究所里，他质朴、愉快的性格引起大伙的好感。毫无疑问，要不是老父亲在病中，她会很愿意再到法国去和同行见面，或是到英国去的；她的工作到处都会受到器重的。可是在那些能取得出国签证的人当中，非党人士维拉总是排在最末一个……莉蒂雅·尤里耶芙娜也是如此。

• • •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出生在察里津，在伏尔加河之畔。这个城市他们一直叫它察里津，尽管它数易其名：先叫斯大林格勒，后来又叫伏尔加格勒。

给城市和街道改名的这种病态嗜好最能说明苏联内部生活的不稳定性。彼尔姆改名为莫洛托夫城，后来又改回来，仍叫彼尔姆。乌拉尔有过一个叫作托洛茨克* 的城镇，后来又改回它革命以前的名称……在莫斯科，著名的沃兹迪维仁卡大街成了共产国际街；共产国际取消以后又叫做加里宁大街。列宁格勒的涅瓦大街是最后改回本名的，可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它一直叫作“十月廿五日大街”。

弗拉基米洛夫兄妹俩生于一个俄国医生和意大利女歌唱家

* 从“托洛茨基”一词而来。

结合的家庭。这个女歌唱家在察里津办了一所音乐学校。他们兄妹俩外表上有很多意大利的特征：深色的眼睛和头发，黑皮肤。在儿童时代哥哥拉小提琴，妹妹弹钢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卒业于音乐学院，可是哥哥热衷于政治，十七岁上抛掉了小提琴和实科中学*，到红军里当了一名政委。

内战以后他成了外高加索的一名党的干部，从事出版、文化和艺术工作。后来他的母亲和妹妹都迁到他居住的第比利斯。她们很快就习惯了那里的南方辣味饭食，毫无保留地爱上了格鲁吉亚，全家在那里度过了他们最美好的年华。格鲁吉亚的演员、作家和画家常在他们家作客；他们组织各种音乐晚会。二十年代是艺术自由的时代。这位青年“政委”熟识而且理解这个圈子里的人，他自己也参加拍电影，不惜屈尊扮演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马赫诺老爹，这是后来那些年一个党的干部死也不会去干的事。

那时还有可能看到这样一种场面：有一天，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迈进当时外高加索的党的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的办公室，就看到他面前跪着一位妇女，她风尘仆仆，双手合在前胸，嘴里说着激动的言词。这就是女作家玛利艾塔·夏金娘**，她刚从外地跑来，来哀求奥尔忠尼启则保护一位大建筑工地上的无辜的工程师，此人被指控有破坏行为。她的话起了作用。在当时这样的事还是可能的。

三十年代初期弗拉基米洛夫一家迁到了莫斯科。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和亚力山大·法捷耶夫以及列昂波里德·阿维尔

* 指不教授拉丁和希腊语，主要教授自然科学、现代语言及绘画的学校。

** 生于1888年，亚美尼亚人，俄国—苏联女作家，两次列宁勋章获得者。

巴赫一起成了“无产阶级作家组织”（拉普）* 理事会的成员，也是当时最拔尖的文学和电影评论员之一。他常常见到高尔基，与我的父亲不止一次见过面。

他告诉我当年高尔基对党骤然取缔作家创作小组的决议是多么地不满。虽说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人常去探望高尔基，但他对这件事的意见却被忽视了，直到已成定论后他才知道。高尔基只好安于由党封赠给他的“苏联文学的族长”这一荣誉角色，虽说他本人极不同意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为所有作家的唯一风格，不同意取消各种创作组织。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在一九三四年召开的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敷衍塞责地宣读了一篇正式报告，这次大会标志了“文学事业”已完全置于党的臣属地位。

在这件事发生以后，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就退出作协，到最北部地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去工作。他知道这次转折是来者不善，艺术作为艺术而言已被废除。与他曾在“拉普”共事的亚·法捷耶夫倒挺能适应新形势，此人遂于高尔基死后在苏联作协执牛耳。一九三七年法捷耶夫出了一把力，将当时许多“普罗作家”以及自己的老伙伴列·阿维尔巴赫送上了断头台。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则被开除出党，撤销工作，等待着逮捕法办。

他倒是没有被捕。可是他没有工作。抛头露面是危险的。从北方回到莫斯科以后，弗拉基米洛夫在家以制作手工染印的花布为生，他的审美力是极好的。就这样一直混到战争爆发。

---

* 原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是1925——1932年间文学团体。1932年4月根据苏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被取消，随后就成立了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战争期间他的工程技术修养还能有点用处，于是他就去修建防空洞。

战后他回到电影界当脚本编辑。电影脚本是作家写的，作家属于作协，而作协又还是由那位亚·法捷耶夫领导。弗拉基米洛夫深为忧虑。一九四八年当党对所谓“艺术领域中的世界主义者”大张挞伐的时候，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以“反爱国主义分子和世界主义者”的罪名被撤职查办。他的“罪过”在于否决了一批毫无可取之处的脚本，那都是些奉诏应制之作，把炫耀苏维埃生活的谎言描绘成真事的东西。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只好又干他的老行当：染印花布、修表、修灯并且静候逮捕。

时代终于变了。二十大以后弗拉基米洛夫又回到文艺界，又当上了作协会员，又恢复了党籍。那些幸而能活下来的“普罗作家”也从监狱回来了，但已所剩无几。法捷耶夫在自己彼列杰尔金诺的别墅里躺在床上开枪自杀身死，床头柜上摆着斯大林的照片……“萨施卡〔此系亚力山大的蔑称〕的良心让他不得安宁，我并不可怜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这么说。

我是这个时候才认识弗拉基米洛夫的。当时他正把O·亨利* 的《白菜与皇帝》改编为电影剧本。这家人慢慢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当中来，可是健康、岁月和精力都已一去不返了。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依旧是一名党员，不过远不是年轻时代那位刚直不阿的党员了。对于艺术、国家和他重新隶属的那个党本身的前途，他是深为悲观的。他出席作协的各种会

* 1862—1920年，美国短篇小说作家，以故事结尾往往出人意表的写作技巧见长。

议，但是他在那里却再也找不到“意气相投”的人了。他既不同意理想主义者的自由化希望，也不赞同左派诗人们的大声号叫。象从前一样，作家协会理事会仍报之以白眼。积重难返。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认为就创作方面来说作协这个组织是没有希望的。我原先工作的那个世界文学研究所想搞出一部苏联文学史这件事，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同样也认为没有希望。

他的悲观主义和当时大家的欢乐希望形成截然对照，但那是有其深刻原因的。一九五六年世界文学研究所想“还文学史以本来面目”。他们要安德列·西尼亚夫斯基写一篇介绍帕斯捷尔纳克诗作的文章。到了一九六六年西尼亚夫斯基已经锒铛入狱，而开除出作协的帕斯捷尔纳克也已告别人世，这期间出的三卷《苏联文学史》奉上谕需要重新审定修改……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和子、媳及孙女住在公家住房里。父子二人都擅长烹调，他的妹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是这样。就在这可爱的家庭中，我和他们成了朋友，学会了作饭。我的烹调技术主要就是在这挤得难以转身的公用厨房里掌握的。每个人在这里都是身系围裙，各显神通。谁也没有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煮咖啡、做色拉、调克留霜酒〔一种混合酒，即白兰地加糖，或白兰地加鲜果〕的那种本领。要给这些美食癖者挑选一块称心的干酪真是难上加难！而用他们的“家制”酱汁来浇腌鲱鱼是多么美味可口，这都是兄妹二人轮流研磨出来的。每逢家庭生日喜庆时，这家人做的格鲁吉亚食品“煞奇味”和“乐比偶”简直令人大块朵颐！当那间天花板都被油烟熏黑的小厨房菜香扑鼻时，女邻居们简直七窍生烟！

我跟这家人不止学会了做饭的本事。

我在这里听了多少故事！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在一九二四年时曾见过托洛茨基，托本人当时在高加索休养。他在内战

期间就认得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还和他们一起在第比利斯共过事。他和斯大林谈过文学和电影；他领米高扬参观过北部电站的施工现场，当时他正在那里工作。他了解党和它的领袖们的历史，但不是通过教科书，而是通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应该写回忆录，不过他可太知道作家协会的脾气了：手稿不但不能出版，放在抽屉里搞不好有朝一日还可能不翼而飞。

我们一块儿上音乐学院听演奏会。兄妹二人早已不摸提琴和钢琴，但他们二人的音乐修养可说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第比利斯音乐学院学习时，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是帕利阿施维利①的学生。他们一生都生活在艺术的世界里，认识爱森施坦②、巴别尔③、巴格里茨基④。他们是美学家，他们的知交都是戏剧界的知识份子。其中很多人被捕，还有很多人死了；有一些人生还。我在最后几年结识的所有较我年长的朋友都属于生还者，都是在弗拉基米洛夫家的熟人圈中遇到的。我从他们那里重新了解到国家、党、革命、内战的历史。我了解的这个历史是五十年来的官方苏联历史学家无法写出来的。

• • •

可敬的女长辈们有时请我到家里喝上一杯茶，聊聊天。我爱年老的人就象我爱苍劲的古树一样：它们的浓荫给人以安详和凉爽，你可以欣赏它们，树底下又是如此平静。

玛尔塔·拉扎列芙娜和她的成年儿子住在一间房内，因为

①1871—1933年，苏联作曲家，格鲁吉亚古典音乐派最大代表。
②1898—1948年，苏导演，艺术理论家，列宁勋章获得者。
③1894—1941年，俄国—苏联作家。
④1895—1934年，俄国—苏联诗人。

他们别无他房。儿子是一位有才华的工程师，他和一批同事共同获得了列宁奖金（秘密的），这种事从不在报上披露。他和他母亲有权得到两间一套的单元住宅（多了他们无权要），不过他们不想从中心区搬到莫斯科郊外去。他们宁愿要那间安静的大房间，中间以一排书架隔开，而不喜欢那天花板低低的一点也不隔音的新式公寓房子。

说实在话，他们不愿离开这所一间厨房要挤上六名家庭主妇、厕所外面得排队的公用住宅，另有其更主要的原因。这就是玛尔塔·拉扎列芙娜生于斯，长于斯，这所房子原来是属于她父亲的。房子非常大，革命后这里每间屋都搬进一家住户，而给房主留下的也只是一间。就在这间房里他们度过了漫长而艰辛的一生，要离开它可真是依依不舍。

玛尔塔·拉扎列芙娜搞英译俄技术翻译。她的儿子维塔利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他还收集有关艺术的书籍和唱片。他们就这样把一点钱都折腾光了，要不然可买一辆汽车或是一架彩色电视机。他们还搞到一些少见的国外超现实主义的版本，美国民间歌曲的录音：莫斯科的“黑市”上应有尽有。在商店里要想买到美国出版的毕加索新版作品简直不可能。

出国是他们从未梦想过的，虽说维塔利工作的那个研究所常派人“出国”。究其主要原因有四：第一，维塔利是犹太人；第二，没娶老婆；第三，英文说得挺好；第四，非党人士。这样的条件搭配在一起，从发出国签证这个角度来看是最糟糕的。他们宁可把那些依靠党、依靠翻译、有家留在苏联当人质的人派出国去。

妈妈和儿子相依为命，相处十分融洽。坐在他家摆着书架（架上满满的都是书）的房间里，在小小圆桌旁喝上一杯茶，

多么惬意！那高高的老式写字台上，神情泰然自若的佛象眯缝着一双黄铜眼睛。这间房的住客安静而温和，甘心蜗居于斗室，满足于公用厨房，习惯于把大衣直接挂在门背后，安于每天坐上一个半钟头的火车去上班，深知这样生活以外，别无出路，日后也盼不到出路，这就是命中注定。

这个家庭如此安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可能是因为在玛尔塔·拉扎列芙娜的兄弟身上曾发生过真正的奇迹吧，不过这是一次好运。

当一九四一年十月他拿起枪参加民防、保卫莫斯科的时候，已是一位颇有资历的工程师，在莫斯科某部工作。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百姓、知识分子，没过多久就陷入敌人包围圈，当了俘虏。从此以后他的音讯杳然，家里人以为他已经阵亡了，何况作为犹太人，要是落在德国人手里，活下来的可能性是极微小的。说也巧，事隔十二年之后，即一九五三年，他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不过不是打从西面来，而是从另外一面——东边——从西伯利亚来。

我在玛尔塔·拉扎列芙娜家见过他。这位“奇迹”是个高高的个儿，看起来一点不显老，——他现在已六十出头了，眼神里流露出诙谐的神情。他仍旧在原来的部里供职，谈起自己的“历险记”时，他象法国人那样发出好听的卷舌音，象说着玩儿似的。

他法文讲得很流利，这一点救了他的命：在俘虏营里他居然能假装成法国人。他被解送到德国，象其它几百个俄国俘虏一样，在一家工厂里作了三年多工。然后就解放了……

对于苏联的战俘，“解放”意味着装上闷罐子车，象牲畜一样，一径开到西伯利亚，在那里继续服苦役。他从德国的军工厂一脚来到西伯利亚森林中的伐木场。从德国的押送下脱了

身，又受到自己苏联部队的押送。想写封信告诉家里说自己还活着也不行：凡在德国俘虏营里幸而活命者一律当成政治罪犯，罪名是苟且保全了性命。

他象我的朋友玛丽娜和她的丈夫纳覃一样，他也是属于那批活着回来、身心依旧健康的人，经过琢磨淬火，他们象金钢钻一样，更加皎洁晶莹。这批人遇事寓庄于谐，宽宏大度，绝不将伤心失意事和怨恨郁悒带回家中来。他们一般都不喜欢回忆自己艰难辛酸的岁月。偶尔谈起这些事的时候，只提那些难友中的好人，只回忆好事、英勇之举，或是一些引人发笑的情节。

我想起一位上了年纪的西班牙古典文学翻译家。她被捕后关进哈萨克斯坦的妇女劳改营。可能她的罪名就是和丈夫一起出过国吧。一九五四年她回到莫斯科后说，劳改营的“劳动和简单的食品”增进了她的健康。她仍旧搞她的翻译。丈夫已去世，给了她这个孤寡老太太一间房，房子是近几年在莫斯科近郊新盖的公共住宅里面。这是五层楼的标准设计住房，一无电梯，二无电话。与她为邻的都是一些劳改释放的刑事犯，对这位“老奶奶”非常好。可是在发薪的那天她不得不把房门锁上，因为小伙子们要她请客“喝一瓶”。他们守在门口，苦苦哀求，还跪在门外边，一直等到她从门下边缝里塞过去三个卢布为止……首都的熟人们大惊失色，问她道：“你住在那里难道不害怕吗？！他们会把你打死的！”可是她笑着答道：“他们都是些好小伙子。我原来待的地方**就是和这样一些人混在一起。打这以后我什么都不怕了……**”

我看到许多从劳改营回来的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是过来的人**，什么也吓不住他们了。现在他们充分享受人生快乐，谁也比不上他们。

在维塔利和玛尔塔·拉扎列芙娜家里我们经常听唱片。维塔利对现代爵士音乐的兴趣不亚于古典音乐，他听起音乐来那股认真劲儿，只有数学家才有。音乐在他们与众不同的意识中产生形象、节奏、人物，有助于他们创作，使他们能在一转念之间找到意想不到的答案。

数学头脑与一般头脑是迥然有别的。怪不得古时候数学和天文是祭司们干的事，因为这象做法事。从那时起，虽说过去了许多世纪，但数学思维是一成未变的。数学家的头脑是与各种永恒的范畴打交道的，如政府和总理的更迭这种不足挂齿的琐事不过是最小可变数，根本引不起它的兴趣。

当我置身于数学家当中时，我不止一次地发现：他们话说得少，即或说了话，也都说在点子上。连篇的废话往往使他们火冒三丈。假话——也是如此。还有什么比客观真理更美的事物么？真理是靠许多代人、许多世纪、许多国家发展起来的，日趋深入的。真理是印度、日本、俄国、英国的数学家们毋需借助翻译就能接受的。他们中间的一位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宇宙中其它文明星球送来了信件的话，那首先只有数学家能看懂它，因为它一定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

在数学家群中我听说起亚力山大·叶谢宁·沃尔平，一位诗人的名字，当时他在莫斯科大学哲学数学逻辑系讲课。这个人的才华和独创性谁都承认，只除了警察当局以外。他不止一次被捕，因为他老愿意打抱不平。可是对他的指控从来不足以将他送监狱，于是他就常关进精神病院。有这样一些医院——特殊的，警察当局办的。如果这个人很健康，没有任何理由把他圈在里面，那么诊断书上就会写上"主观妄想狂"之类的字样。这可不是笑话，这是真事！在那里待过的人都谈起过这种诊断。玛尔塔·拉扎列芙娜家里都喜欢阿力克〔亚力山大

的爱称〕·沃尔平，都了解他的才华出众，根本不认为他有什么病。

我最后一次去玛尔塔·拉扎列芙娜家时，正值亚力山大·叶谢宁·沃尔平再次被捕，所以那天晚上谈了他很多事情。他们说，他向法院告了"最高机关"，要求对官僚主义者和警察举行公开审判。不用说，没有下文，并未起诉。

阿力克并未犯法。相反，他只不过想**执行**和**实现**苏联的法律和宪法。看来，就是因为这个，警察当局才认为他是神经病患者，才要把他送去治疗"主观妄想狂"。

· · ·

我对在著名悲剧女演员芳妮·涅芙斯卡娅家的厨房里的茶会充满美好的记忆！我上她那儿总带着儿子一道去，她特别喜欢他。她是个孤寡人。她姐姐从巴黎来和她同住，姐儿俩就住在简朴的两间一套的住房里。

她姐姐许多年前就和丈夫一起出国去了。弟弟住在罗马尼亚某个地方。姐夫是位教授，也死了，孤身一人的姐姐就决定回祖国来。她知道芳妮已是苏联戏剧界和电影界的著名演员，在她想象中，芳妮一定有新大住宅、郊外别墅、几辆汽车、珠宝首饰……她已四十年没回苏联了。

芳妮不愿使姐姐的幻想破灭，可是她渴望分担姐姐的寂寞。她给姐姐寄去邀请的信，并办好了各种证件。

可姐姐一到就发现她的套间只有两个小房间，巴掌大的房，没有使唤的佣人，没有餐室，没有银器，没有水晶玻璃器皿，没有大别墅，没有汽车，没有司机。不过，在大街上，出租汽车会停下来，当他们看到这位著名的女演员行走在路上时，总想用车送她一程。电影观众把芳妮·涅芙斯卡娅当作

“滑稽老太婆”，他们可没想到，芳妮这个喜剧演员也和卓别麟一样，能引起人们的欢笑和眼泪。商店里的女售货员爱之若狂，而她呢，一边买乾酪，一边“演戏”，逗她们开心。她买东西是不要排队的。

按莫斯科标准，两间一套的住房对于一个单身妇女简直是豪华阔气到了头，哪怕这位妇女是全国大名鼎鼎的大演员。可是这却把她姐姐吓坏了。芳妮本人倒无所谓，她对这种没有佣人、甚至没有一件象样的好衣服的生活方式丝毫不计较。她站得比这个高。

在电影里她逗观众笑。在剧院，在陀思妥也夫斯基《赌徒》这出戏中，她深刻的悲剧演技使观众为之骇然，竟至毛骨悚然。

她的知交有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安娜·阿赫玛托娃、加琳娜·乌兰诺娃，这都是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她桌上摆着这些人亲切签名的照片，完全是平起平坐的关系。

她是个实心人。你不能向她说长道短或撒谎，在她面前你会像在神父面前忏悔时那样地说话，而她从来是直言无讳地把想法告诉你。有一位莫斯科的女记者，她奉谕写了几篇文章，谈的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共产主义的正派作风”，结果有一天芳妮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丹卡（塔姬扬娜的蔑称），你是条母狗！”

她能发现某些可笑的现象并且非常风趣。不过她承认：“有时一想到这一切是多么可怕时，就恨不得跑到街上去嚎啕痛哭一场！要嚎啕痛哭是因为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最后一次碰到她是一九六六年秋天在孔策沃医院，我正去探视辛格。她在外边散步，又高又胖，身穿病人穿的条纹长袍，更象女囚犯。病人看见她都嘻嘻笑起来——著名的喜剧演

员嘛！芳妮对我谈到刚在《莫斯科》这份杂志上刊登的布尔加科夫* 写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她把这篇作品称作“天才的讽刺”。

“要不要我把您介绍给辛格？”我问她。芳妮半天没说话，好象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她用她的男低音嗓子说道：“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这是我记得的全部英语，亲爱的……”她象平时一样，说了这么一句，把忧伤和欢乐混在一起。

她喜欢古怪的作品，这是她的风格。很少有人理解她，怕她那逆耳的直话，也听不懂她那有意渲染夸大的玩笑话。可她终身与艺术“结了不解缘”，她在自己身边看到的是真、善、美、爱、正义的奇形怪状的漫画象……她重使这些漫画象再现，她就地创造了各种形象，受震惊的小市民们避她唯恐不及——这当然不是她本人的初衷。谁也不知道，在她心里究竟有多少柔情。孩子们是不会受骗的，他们对她的抚爱作出强烈的反应。

医院的收发简直来不及转给她各种电报：她当时正满七十岁，各地贺电如雪片飞来。在这所政府医院里还没有一个国家大官象她收到那么多贺电，她都一一作答了。别人不要她这么做，劝她在报上登个“对个人及机关的鸣谢启事”就行了。然而她说这样不行，她“不是部长，不能通过报纸向各界鸣谢”，

---

* 1891—1940年，俄国—苏联作家。1925年写的《怪兽》一剧引起激烈争论。生前许多作品未能出版，戏剧亦遭禁，上面提到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是1966—1967年才在苏联国内出版的。

** “一天吃个大苹果，医生见你就要躲”，指苹果有益于健康，医生从此可不上门的意思。

并给所有致贺者拍了复电。

在医院时我把我同辛格的一切情况都和她说了，当时他已难望痊愈，辛格死后，她曾给我打电话。我还记得在她那哽咽的、压低了的男低音嗓子里充满了哀痛之情。虽然当时我周围的朋友很多，但是，不认得辛格的人在那些日子很少有象她这样同我说话的。

• • •

我们很喜欢自己的学校。这是积累知识、友谊和令人终身魂牵梦萦的地方。几年以前我家里聚集了十二个同班同学，他们当时已成为医生、教师、工程师、翻译家、律师。这批人都是一九四三年中学毕业，都能进入大学或高等学院。战争期间这原本不难。我们全班同学都受了高等教育，就是最不行的学生也不例外。我们的孩子要进高等学府可就难了，特别是女孩子。录取时男孩子们总占些便宜，我们那会儿可不是这样。

我同班同学中，有些人的命运是十分离奇的。

班里最棒的一位女运动员，过去连扣子掉了都不会缝，现在却成了一位贤德的家庭妇女、模范母亲和主妇。她给孩子们缝制衣服，连大衣都会作，饭也做得好吃。她和丈夫一起修理整治，要是给予机会的话，他们真连房子都能用自己的手建造起来。他们结婚以后不得不住在东德，因为莲娜的丈夫在军队里服役。她告诉我她一辈子得感谢那位好心的德国女人，他们在她家租了房子，还跟她学会操持家务。这位中学前届冠军生了一个孩子，由于她从小对实际事务无知，差一点连命都送了。她跟我说，她对德国人的概念一下子就变了！战争、政治什么的都靠后站了，她们一起侍弄小孩、一起在厨房里忙活，于是

两个女人近乎起来了。可是莲娜在学校里是最不好说话、最刺儿头的一个！如今她变得多温和啊，真是前后判若两人。

许多年以后我们又重逢了。莲娜成了“巧克力工程师”，她专门设计糖果厂的机器。她的独立性一点也没有失掉，可是听到她谈起用什么办法贴壁纸最好时真不免有些奇怪之感。她在学校时可是言必称马雅柯夫斯基的。

我们班上最有才华的女学生之一成了英语教师，而本来以为她会前途无量的。学得比谁都糟糕的那个小姑娘成了成绩斐然的生物学家，正在写副博士论文。成绩平平的一个小男孩变成一位出色的律师，而曾是聪明的那个男同学却成了一个很一般的新闻记者。

我离开莫斯科那天把自己有关印度的最好的书给了我过去同班同学米沙的女儿。米沙和我才八岁就在学校里成了好朋友，后来生活把我们分开了很久、很久。我们两个都成人以后又碰到了，因为米沙记得我们学校，我们班上的每一个人。

米沙现在在建造大型运动场、堤岸、桥梁，然而他本来是想当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他造了鲁日尼克运动场、莫斯科河新堤大街、莫斯科街道下面的地下通道。

他谈起这个建筑工程的设计完全是出乎意料的。有一天赫鲁晓夫和莫斯科一位党的领导一块儿乘车，看见街上人挤人，要过马路特别慢，故此非常生气。于是决定：要在这里修一条地下通道！

新阿尔巴特的命运也差不多是这样决定的，根本没有考虑人民的真正需要。为了要在老式胡同里“打通”这条新的莫斯科大街，不得不拆掉许多本世纪初盖的高质量的好房子。居民被迁到郊外，他们提出抗议。于是答应他们把新阿尔巴特的新住宅首先分给他们，让他们住进多层的现代化摩天楼里。可

是摩天楼盖起来以后，政府改变了主意，决定把这些房子分配给各机关。代替现代化住宅区的是盖在市中心的一条官僚主义的大街。米沙说，当在摩尔恰诺夫卡拆旧房子的时候，那些干活的人心里十分难受：大家都知道，这种房子再也盖不起了，拆除房子完全是一种野蛮行为……

米沙和妻子、两个孩子以及他的祖母住在一间房里。要是他能给自己盖一所房子的话，他一定会设计得尽善尽美的！可是他只能享受这一间房子。这房子的面积不比规定的“标准”少，因此调房一说万无希望。

不过米沙还是想出了办法：他把天花板很高的老式房间加了第二层，孩子们就住在阁楼上。这样的改建工程是和各种委员会吵了很久以后才得以付诸实现的，因为它们连这种“改善”居住条件的变通办法都多方阻挠。与此同时政府各部门的房屋却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米沙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树起了多少花岗石座的青铜象啊！一会儿是“伟大的契卡工作者捷尔仁斯基”，一会儿是“伟大的诗人”塔拉斯·谢甫琴柯。他干过各种各样的建程工程，有一回竟是为大教堂周围设计铸铁栏干。但是他的建筑工程中最迫切需要、最派用场的一处，看来还是他房间里的小阁楼……

我学生时代的老友阿莉雅有三个女儿，丈夫是工程师。她在出版社工作，编辑东方的历史、经济和艺术这一类书，虽然她同我一样，都是从大学的美国史专业毕业的。学非所用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的。阿莉雅很知足，因为她能在莫斯科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工作。

在学校时她脸色不好，又瘦，看来是班里身体最差的一个。可是她心比天高。还在当大学生时就结了婚，然后和丈夫一道上一个最大的水电站建筑工地去了。对于她这么一个在城

里住惯的人，爱的又是音乐学院、古米略夫* 的诗和奥列沙** 的散文，生活一下子翻了个儿，变得既可怕，又粗俗。工地上干活的大多数是劳改犯。气候严酷，缺吃少喝。阿莉雅过去常写信告诉我，她必须“从头学起”，要摆脱“知识界的先入之见”又何等困难。可是她有一种本事，能看到那些外表村俗粗鲁的人内心却有着好的、善良的一面，所以她并不失望。在工地生活这么多年，她变成了一个成熟、聪明和深思熟虑的人。

几年以后她回到莫斯科时，健康情况特佳，与过去没法比。在两间房的小单元住宅里，她和丈夫住一间，三个女儿另住一间。阿莉雅桌上总是堆了一堆稿子或校样长条。她一有时间就喜欢工作。她还要去采购，给孩子们做饭，定期到编辑部去等等。她怎么还能有时间看新书，参观展览，看意大利和波兰电影——我简直难以想象。但是阿莉雅说，她“永远不会放弃工作，因为那就等于精神死亡”。她宁可由于力不从心的工作而造成体力上的过累，决不要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造成的精神死亡。哪怕就在建筑工地上，刚生完孩子，她也总要找点事干干：哪怕是在图书馆或是搞内部报纸的出版工作。

在学生时代，阿莉雅、莲娜和我最喜欢在春天绕着克里姆林宫散步。我们一边走，一边聊：谈我们的一些平平常常、没啥了不起的事，谈书，谈艺术。后来我们大家都有了大儿大女，有了“女大娘难做”的问题，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那样悠闲地在沿河大街的菩提树下散步了……可是我们仍然彼此相爱，阿莉雅成了我孩子们的密友。

---

* 1886——1921年，俄国诗人。《诗人行会》文学小组的组织者，后因卷入政治事件而被处决。

** 1899——1960，俄国—苏联作家。著名作品有《三个胖子》、《樱桃核》等。

她的大女儿给自己挑了一个很不好搞的职业：教聋哑儿童的书。这要有满腔爱心和耐性，这正好是阿莉雅和她全家的精神所在。

阿莉雅和我谈起，由于出版社同仁的坚持，有一天居然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请来谈文学。“这个人给人的印象是绝对真实。”阿莉雅说。我还没有听到一个人象他那样说话：丝毫不矫揉造作、自然、强烈而又有说服力。这就是诚实正直。他不妥协。你要是能看到他如何紧紧抓住听众就好了，虽说按演说家字面意义来理解，他完全不是个演说家。可是谁都知道，他写的都是实情，说的也是实话，现在能作到这一点可真不容易。这就是最大的功劳。

• • •

有一个小小的、友好的家庭，一共只有两个人，我和他们都处得很好。

丽莎和他的丈夫——一个残废军人，不用说，住在公共住宅的一间小小的房子里，一张沙发床就占了房间的一大半。可是他们那张小小的方桌旁，也就是丽莎放咖啡、乾酪、或简简单单的色拉的那张方桌，给人以温暖和舒适之感。

他们的那个大窗子有着老式宽窗台，就在盆景之间夹着牛奶瓶、盛了汤的锅、乳酪和黄油。书架上是谈艺术的好书。丽莎读完了大学，但是没有去工作，因为照顾残废丈夫要占据她全部时间。柯斯嘉还在大学时代就上了前线当兵，他受了伤，一根神经打断，现在整条腿截掉，拄着拐杖勉强可以走一走。柯斯嘉是评论家，诗歌和古俄罗斯艺术的行家。他房里摆了很好的古代圣象，还有现代青年艺术家制作的、在风格上有所模拟的圣象。

柯斯嘉病得很厉害，健康日益恶化，工作也很难支持了。他领的残废军人抚恤金不够维持生活，因此他还得继续工作、继续写作。

丽莎生来就是给别人以温暖的。她只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但是这个“只是”里面有多少含义啊！她没有从事任何“社会公益”活动，这可能是因为她认为这种活动并无益处。她对待别人的一颗好心才真是社会公益。因为丽莎是阳光，是心灵的光明，这才是使人们受益的东西，这才是传教士活动的本质所在。每一位智慧的真正的牧师能找到最合适的话语来给绝望的人以鼓励。这在各种宗教中都是一样的。可是有这样的人，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一生从事的却是这种牧师工作，安慰、帮助、劝慰别人。或者更简单一些：拿起别人的手，深深地望着人家的眼睛，使他免于恐惧，免犯错误，免于陷入绝望的深渊。这种人在世界上是很多的，比牧师神甫还多，那些牧师神甫常常假仁假义，用宗教仪式代替发自肺腑的真心话。心灵和爱情的力量则不畏艰难险阻，奋力打开一条通到别人心里去的道路。

“这是真的吗？”我赴印度前在莫斯科最后的一天，丽莎在电话里只问了我这么一句话。她不能相信我真的要走。随后她半天没说话。

可爱的聪明人哪，她脑子里和心里当时闪了一个什么念头呢？她能未卜先知我的命运吗？

• • •

我和文学研究家、评论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是在世界文学研究所认得的。一九五六年我才进这个研究所。安德烈只比我大一点，也是大学毕业生，可已被看成苏维埃文学组最有

才华的研究人员之一而崭露头角了。他评高尔基、评巴格里茨基*、评赫列布尼柯夫**、评战争年代和革命最初几年的诗歌，他的文章显示成熟而精辟的技巧、鲜明的风格、令人难以忘怀的个性。

安德烈擅长言辞。在苏联文学部〔指世界文学研究所内部分工的部别〕的会议上讨论研究人员的新作时常有这种情况：对这些作品没有多少可说的，而人们却还在说着，流于形式罢了。可是安德烈，说话样子很羞涩，讲话不多，但全都在点子上。他间或用他那窄窄的白手作着富有表现力的手势。细软的亚麻色头发朝前搭拉在额头上，他就把它们甩到后面去。

他那富于表情的脸的轮廓很粗，很难说他长得漂亮，加之还有一把宽而密的大胡子——完全是一副庄稼汉的模样。但他的额角表现了智慧，他的眼神十分柔和，在那张美好而充满灵感的脸上，内在思维跃跃欲动。

打他开始每年夏季都和玛莎一起到北方度假以后，他就蓄起了大胡子，肩背背包，泛舟去那遥远的乡村。北方的庄稼汉都蓄大胡子，因此安德烈也只好把胡子留起来，否则那里的男人都会不愿和他打交道，会称他为“娃子”的。

他们拍摄了乡村的木结构建筑，收集了农民的服装和绣花制品、家什、一切的一切，凡是这个边区至今保存的北俄罗斯的生活、习惯和手工业品他都采集。安德烈和玛莎是俄罗斯古董的真正行家，他们的家里满是稀奇古怪的北方手工艺品：有木头的、骨制的、还有桦树皮做的。在那里他们还收集了圣象，然后由玛莎加以复制。他们还搞来了古老的、用古斯拉夫

* 1895——1924年，俄国—苏联诗人。曾翻译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的作品。

** 1885——1922年，俄国—苏联诗人。许多诗作生前未能出版。

文写的经书。他们的房间里有一个十六世纪的大圣象作为装饰品。这是伊果利亚（胜利者乔治）的骑马象，玛莎把它弄得乾乾净净并且修整得很好。这个圣象曾在特列基亚科夫美术馆的北方艺术展览会上展出过。他们是在一个仓库里找到它的，它已被遗忘——成了一块涂了颜色的木板。

玛莎是艺术研究家，专门研究古俄罗斯艺术，她要找到工作很不容易。再说玛莎的性格不允许她去迎合官方的观点，可是不这样就休想找到工作。所以玛莎就给那些在小作坊里专事复制古俄罗斯手工艺品的年轻艺术家们画草图。他们按北俄罗斯的风格用骨头、木头、金属来制造装饰品、串珠、耳环、手镯等。

安德烈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强烈的宗教感情。他身上那种天生的、纯真而富有诗意的宗教性与尖锐的评论家的智慧共生，这种智慧毫不容情地剖析一切：诗人的艺术也罢，遣词用字的细微差别也罢，甚至他本人的感情和感受也罢。安德烈是位绝不心慈手软的批评家，但他批评的矛头首先是针对自己、针对自己的弱点和过失。真正的宗教意识的本质全在于真诚地相信“我本尘芥”，在于对全能的上帝的绝对温顺。圣雄甘地就是一位恭顺的“尘芥”，这位使印度奋起的甘地，深信他所做的一切是执行上天的旨意。凡真诚笃信宗教的人都作此想。

安德烈说起自己时都是带着自嘲的口气，痛下针砭，这一点可从他写的《突如其来的思想》中看出来。那些害怕深究自己、故意装扮成美和高洁的人们，见了这种书就退避三舍。再说甘地的《自传》正是按照这种无情解剖自己的精神写的。这两位笃信宗教者都“严格反省”、力图通过忏悔和揭露真象以洗净罪恶，我们在这方面也找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

可是他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感觉多么敏锐啊！他对帕斯捷尔

纳克、阿赫玛托娃、巴格里茨基诗作的分析十分细致而具有说服力。西尼亚夫斯基能在年轻诗人的作品中立刻捉住他们有发展前途的特点和令人惋惜的不足之处。谁也不能象他那样深入到叶夫图申科那具有两重性的作品中去。他的嘲讽是异常刻薄的：他只用了五分钟就论证了所谓诗人安纳托利·萨弗罗诺夫，说到底其实并非诗人……安德烈的这一特点是使“知名的”苏联作家们不会宽恕他的。

安德烈写起阿赫玛托娃来是充满激情的。他准确地抓住了发自内心深处的那些诗作的社会意义并且把它揭示出来。他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解释”真是美妙极了，在他笔下即便是一片醋栗浆果的叶子、雨、暴风雨、室内布置都变得意味深长。他对伊萨克·巴别尔这位怪诞、可笑又可悲的艺术家的了解是十分敏锐、一点即透的。

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不仅是位评论家，也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家。他最得心应手的表现方法是讽刺，是怪诞作品。在《柳比莫夫》这本小说里，苏联地方上的生活被夸大渲染，就象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和果戈里的作品一样。这本小说通过苏联一个小城镇，使人同时看到了《格鲁波夫城的历史》**和《死魂灵》。

很奇怪的是，写于一九五六年的《开庭》这本书竟成了十年以后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本人不可免地遭到逮捕法办的谶语，虽说这本书里谈的都是过去的事，都是不应在苏联重演的事……然而它们毕竟重演了。

这些经过犀利的笔触刻画出来的法院侦察员们、肃反委员

---

*1826—1889年，俄国作家，创作了政治性讽刺体裁，对当时俄国先进文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即谢德林著名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格鲁波夫乃该城市长。

会的契卡们、告密者们、细作们有如沉滓，重新在社会上泛起，死劲箍住那个人，直到他除了去蹲监狱以外别无出路。这个人的错误只有一条——他千不该万不该去当作家。

还有一些小短篇，如《薄冰层》、《蒲亨茨》、《写作狂者》都是幻想故事，可是故事中夸大渲染之处却来自莫斯科住宅内的现实生活，那有如梦魇一般的生活，其可怕程度远远超过任何文学幻想。

那篇《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深刻揭示了苏维埃政权置艺术和文学于一种什么样的条件中：在这种条件下创作要末是窒息而死，要末是走向自己的反面——为统治力量歌功颂德，就象十八世纪女皇御用的俄国古典主义一样。西尼亚夫斯基是一位哲学家。他对苏联社会中艺术命运的思考是以极其深刻的研究和知识作为基础的。

安德烈是一个富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他闹着玩似的（和别人一起）写了一本谈毕加索创作的书，即便在这里也显示了他的细腻的艺术分析能力。安德烈喜好怪诞作品和艺术中的渲染手法。我不止一次听到我在苏联国内的熟人说起：“难道这种疯狂的、不正常的现代生活可以用古典作品里四平八稳的形象来表现吗？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千奇百怪：人是脑袋顶地，人脸变狗面，一切都变成可怕的丑剧……”

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的创作，包括他的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就是从上述观点出发的。

在他受审判时，他们不是列举罪证，而是列举“引文”——每一个形象都是令人可怖的夸张漫画——据此法庭立案并作出裁决——七年有期徒刑。

而安德烈本人呢，还是那么文静，他斯斯文文地说着话，他的俄罗斯语言美极了，你不由得要听他讲。他爱玛莎，他爱儿子。

这是一位安详、温柔的人。法庭上给他罗织的罪名何止几种：反犹太主义，淫书，参加神秘的地下组织！斯米尔诺夫法官在我们研究所里整整花了两小时设法说服大家，说“这里有社会革命党人的臭味”，可是又拿不出证据，拿出来的还是那些怪诞的引文。

他有时上我家来，我们总是一起坐在我家的小厨房里。他老爱凝视我们院子里的小教堂，只要有一杯咖啡喝就行了。“您家里真安静啊，”他说。“真好哇，孩子们也是安安静静的，令人喜欢。”从他住的那个“公共住宅地狱”来到我家换换空气，看来是愉快的。

他在离莫斯科一百公里的农村住了几年。小木头房里有一张火炕，但没有自来水。那里可以安安静静地工作，没有女邻居的尖声叫骂。他有时直接从那里到研究所参加会议，他照例是戴一顶深蓝色的贝雷帽，裹一条红色长毛围巾，脚穿一双厚靴子；农村的泥泞路是很不好走的。

安德烈能这样强烈地影响和他交好的人以及和他接近的人是不足为怪的。他素性腼腆，脸孔因常年熬夜、缺乏睡眠而面露倦容。安德烈一般都是夜里工作，坐在玛莎为他“改装”成为工作室的地窖子里。他们的公共住宅里口舌多，挤在一堆的那些贫苦和失望的人们彼此憎恨；霍夫曼式的漫画和假面具在这个卑微的人窝的日常写照前黯然失色。要搞创作就只好躲到地窖子里去。

西尼亚夫斯基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在苏联从未出版过，因为在苏联，讽刺社会生活的作品是不许可的。米哈伊·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廿八年没有出版过。左琴科* 为官方批评所

* 俄国—苏联讽刺作家。1895——1958年。为“塞拉彼昂兄弟”文学小组（见前注）成员。1943年写的《日出之前》遭到严厉批评。

摧毁。西尼亚夫斯基的作品在国外出版了，于是转瞬之间他就变成了“政治犯”。

他们用审判把他变成政治犯，他的漫画式描写吓坏了他工作的那个研究所党的领导人，这些人怕他远胜于怕氢弹，因为在俄国多少世纪来对真话都是害怕的。

这位作家只不过笑了笑，说了几句挖苦话，夸大了那些冥顽不灵、愚蠢可笑的方面，可是他一次也没有号召过要推翻苏维埃政权。但是法院指控作者犯有“反苏活动”，判处他七年劳改营苦役。他的朋友尤利·达尼埃利也未能幸免。两人都未服罪，也不可能服罪：他们是作家、艺术至上者、艺术家、评论家，而不是政治活动家。

然而，他们现在都在劳改营里。安德烈仍然从那里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和亲人谈文学。什么都不能压垮他的创作灵魂，深厚的宗教感情使他在苦难的考验中变得更坚强。只有一个小儿子留在家里。

这种状况不会长期继续下去。有朝一日你会回到家里来，回到你儿子和朋友身边来，安德留沙〔安德烈的爱称〕啊，那些审判你、判处你的人会送进劳改营代替你。这种事在俄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而这段历史多么象一篇悲惨可怖的怪诞作品啊！

• • •

我真幸运：我飞出了牢笼。

可是笼子里还关着我的儿女、亲爱的同班同学、女友们、熟人们、儿时的朋友以及新交。还有对我说过——哪怕是一次——热情可感、令我没齿难忘的话语的那些人。

我知道，他们日子难捱；我也知道，将来苏联究竟还有没

有轻松、自在的好日子过，还很难说。可能——每况愈下，适得其反。我们彼此之间不能通讯，不能通电话。苏联警察当局的脾气我们太了解了，它的手段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它只不过韬晦一时，心里可知道还有出头之日，那时它可就要原形毕露了。十四年前“废除”了斯大林主义，不过社会制度仍然是换汤不换药，谁也不敢改变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权的基础。一个莫斯科新闻记者还在赫鲁晓夫当权时、西尼亚夫斯基受审前就曾对我说：“要知道这种自由化只是权宜之计。斯大林亲手培养、创立的政权机构只是暂时关闭——您知道，就同从插销座上把插头拔出来一样。这个国家机器仍然完整无缺，只要一通上电，就立刻又转动起来……。”既然我摸熟了苏联警察当局的脾气，我就犯不上再去和我的朋友以及孩子们取得联系。因为这样一来很可能给他们招祸……

无论是我的子女或是我大部分朋友都不得出国，甚至旅行也不行。再说这样的旅行他们也花不起钱。我只得寄希望于日后的变化，到那时苏联公民也许有权自由迁徙。这种权利在自由世界简直视同家常便饭，甚至都不能想象，没有这种权利还算什么生活。

到那时我们将重逢。现在虽说是音讯断绝，毫无接触，我仍然知道而且全身心都感觉到，我的朋友们是深知我的，他们不会忘记我的。他们也在期待重逢的一天。

到那时，伯莎终于可以用她自己的眼睛亲见非洲的浮雕和塑像，那些她目前只能在书本上见到的东西。阿廖沙和萨娘将前往阿廖沙的诞生地柏林，他们将在双亲住过的巴黎逗留，然后前来美国，听费城交响乐队的演出。列宁格勒的藏书家将探望他在巴黎和罗马的朋友，他和这些人目前只偶尔有书信往来。塔玛拉和她的儿子斯塔细克将踏遍西班牙的故土，找到塔

玛拉父亲在内战期间阵亡的地方，那时的斯塔细克将说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利沃夫夫妇俩将接受天文学同行友人的邀请，一定会饶有兴味地看到世界各地最大的天文台。我的文学研究者朋友们会有机会和他们书里写的人物见面——和德国、西班牙、美国的作家们见面，到目前为止，这种特权只有叶夫图申科和沃荻涅先斯基才享有。那时维拉将和英国、法国、美国的遗传学家见面。那时人家会"放"维塔利到国外和他的同行见面，虽说他是非党员，也决不肯把妻子留在莫斯科当人质，那时会放他们两人一起走的。芳妮·涅芙斯卡娅可以见到欧美的名演员，而他们也会发现她伟大的悲喜剧天才，她会同样地引逗巴黎的出租汽车司机发笑，就象她现在在莫斯科那样。阿莉雅和丈夫领着三个女儿可以上底特律的姨妈家作客，所有的孩子们将热热闹闹地一起玩。

而安德留沙·西尼亚夫斯基将和读过他的书的、读过俄文版和其它译本的千千万万的读者见面，结识他的出版者。也许他会写一本象《安德烈·多纳托维奇〔西尼亚夫斯基的名字和父名〕的一天》这样的书，写被捕的作家在斯大林身后的劳改营里的生活。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我们后会有期……

命　　运

到四月中就已知道我可望于四月廿一日飞往美国。经过这么久的悬而不决，事情却又如此快捷地安排就绪，真令人觉得奇怪和惊讶。

我漫步走遍了全弗利堡，不止一次地拜谒过圣尼古拉大教堂，泛舟穆尔滕河上，在涅芜莎苔湖边散步，瞻仰了巨叶城堡，到过苏黎世和伯尔尼，参观过孟特略和魏维。在魏维我远远地望见了卓别麟的别墅，他是当代伟大的演员和人道主义者。苏联的电影界当局不止一次地邀请他访问苏联，可他每次必定问道："为什么苏联是唯一不放映我近作的国家？"邀请者不得不承认，《舞台生涯》和《一个皇帝在纽约》他们只是在香港、罗马或是伦敦看到过。

这些日子埃马尼埃和柳芭·达斯迪埃从巴黎到弗利堡来探望我。这是我在欧洲唯一的熟人。我在他们姪女家和他们见了面。

这次会见可真叫热闹而又手忙脚乱。一下子说起了俄、法、英三种语言。客厅里满是人，简直无法回答问题，因为问题一经提出，提问的人马上把它忘了，紧接着又提一个。要问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有一点很明确：达斯迪埃来看我是胸有成竹的。

总括他的意见，就是要说服我不上美国去（"您只是从一个监狱去到另一个"），把出版书的期限推迟一年（"现在出版将引起苏联政府的强烈反应"），而且就待在瑞士（"您可信赖我姪女的殷勤招待"）。我谢谢他的好客之情，不过我解

释说，我首先要出书，我说去美国的签证已一切就绪，至于苏联政府的“反应”我不把它当回事，因为我同它、同苏联早已脱离关系。

在瑞士我感觉到与我接触过的人们对我都是同情的，我相信有可能在这里找到许多好朋友。不过，如果还要缄口不言四十年的话，我完全可以在苏联嘛，又何必当初呢……瑞士可以提供政治避难，但是条件是任何得到这一权利的人不得介入政治。那样的话我就无法在这里作公开声明，谈清楚为什么我要与共产主义世界决裂。这一点我是无法接受的。

我相信我的命运是另外一种样子，虽然说不清这么想的原因。

• •

自我离开莫斯科以后，我就反复思索命运这件事。寂静的恒河岸和瑞士安静的生活有助于这种思索。我觉得，我还不能完全理解现在在我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巨大转折。

向命运迎头走过去，它也就会来帮你。这一点我早就知道。可是我在苏联的生活是这样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看样子我永远无法离开它运行的轨道。

在德里我自己迈了决定性的一步。谁也没助我一臂之力，谁也没给我想主意，谁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可是我相信，我们一切意念和行事均在上帝的手中。我知道，要是没有上天神助，赐我以灵感和不可改变的决定，我是没有力量走这一步的。

上帝——我的光明和我的救星哪！我还能怕谁呢？

上帝——我的牧者，我什么都不需要……

依靠上帝吧！振作起来，愿你的心灵健壮。

在此困难时刻，没有任何事物象宗教感情那样帮了我的

忙，它是我处理每件事的支持力量。

在危急时刻、在内心生活处于锋口上的时刻，人的宗教感情觉醒了。这感情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而我对它的解释也必然如我的生活一样，是独特的。

人生下来就具有各种生理禀赋。有的人有数学才能；有的人则无法抽象思考比X和Y更深一层的东西；有的人有音乐听力，能听见细微的音调差别，记住复杂的乐句，在庞大的交响乐中能分得出各种主旋律；有的人不辨曲调，唱不出一支简单的歌，不会用脚踏节拍，可是没有这些他照样过活，而且过得很好；有的人对颜色很敏感，他在漆成冷色或刺眼的色调的房间里没法过；另一些人对绿色和褐色都辨别不了，对于他们，树木、花草和大自然只不过是黑白照片。可是这种人在其它方面的精神生活也许很丰富，很有趣。

宗教感情和音乐听力一样，是天生的。它可以加以发展、培养、丰富，可是如果这种感情在他身上天生缺如，那么什么理智的努力、什么诡辩论和"见证"〔指宗教上信徒相信神确实能显灵的证明〕都不能唤醒这种感情。人可以过着长寿而高尚的生活、乐善好施，但他可能根本没有宗教感情。甚至一个人可以每天早晨上教堂、念经文，自认是笃信宗教的，但这无非是一种智力诡计，或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可是他的心是沉默的。

在世界各大宗教派别里有一种它们所共有的最高道德准则：所有的宗教都要求戒杀，不偷盗，行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贪求荣华富贵，富贵于我如浮云，转瞬即逝。要知道，只有灵性才是永恒的。保持心灵的纯洁吧。

世界上信奉这种诫条、这种永恒真理的人数比大家设想的要多得多。善良的心也比想象的要多些。永恒的真理，不是我

们有时想象的那样似乎已从现代化的星球上消失。令我们大家感到欣慰的是，**永恒的东西**并未消灭。

许多人从小就受到这种教导。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从婴儿起就接受了的不容置辩的真理，除此以外他们不知尚有其它。可是象我这样的另外一批人，受的是无神论教育，这个永恒真理是突如其来、不通过普通途径得到的。这只能是天生的宗教感情使然。

我是从祖母和外祖母那里继承了这种宗教感情的，她们笃信宗教。在我尚未领悟到这一点时我并不知道，我身上原本存在这种宗教感情，就好象一个人，在没有听到音乐旋律之前，他是不相信自己有音乐听力的。

宗教感情的旋律就是生活本身的音乐。我很难对那些听不到它的人解释它发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声音，让他们就此打住，别再往下看这本书好了。如果内心之火烧得不旺，那怎么努力也休想打出火来。水是不会燃烧的。如果内心有阴燃的火，那么一朝在环境的影响下，它会成为熊熊火焰喷射出来。

看来，我的情况正是这样。

我清楚记得一九六一年在莫斯科的那个春天和夏天。我当时是卅五岁。孩子们还在上学，我在世上已略识忧患。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一年总有半年的学业要荒废。那时我有严重的神经性心脏病，由于经常感冒引起的支气管炎和鼻炎，心脏区莫名其妙的神经性疼痛。我非常忧郁、易怒，陷入不能自拔的悲观情绪中，我不止一次想到自杀，怕黑暗的屋子、怕死人、怕雷雨、怕粗鲁的男人、怕街上的流氓、怕醉汉……我觉得自己个人生活如堕黑暗深渊，意趣全无，前途堪虞。我不会自己给自己寻快活，不会参透世事。内心的不安感折磨着我，无法使它平息。我无论对教堂礼拜、对宗教书籍、对圣象都毫无兴

趣，它们之于我形同虚设。不过当时我已知道有几位年龄和我相仿佛的人，他们也是信宗教的。我对他们既惊且敬。

于是春天来了，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春意盎然，使我全身为之一振。万物苏醒，欣欣向荣。莫斯科人行道旁流过解冻后第一道浑浊的水流。城里的阳光反射在电车、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的玻璃上让人眼睛都睁不开。

经过漫长而酷寒的严冬，莫斯科的春天终于步履维艰、姗姗而至。二月末的一天，严寒未消，天空忽然变得湛蓝湛蓝。"风自远处带来了隐隐的春天的歌声，天空绽开一小片，如此深邃，如此光明……"我最爱的诗人勃洛克*的这几句诗，比平常更加响亮地唱出了春之声。于是我身上发生了一种变化：我特别清楚地感到生命的脉息在搏动。

这一年春光似旧，流年依然。我的生活和周围事物并无丝毫变化。在往年视同平常、不起眼、未以快事目之的事情——活下去，听到、见到、吮吸这晚来乍暖还寒的春天的空气，在街上漫步，目睹生机勃发的景象——忽然向我扑面猛冲而来，我陶醉其中了。

三月积雪消融，汇成溪水奔流而去。四月土地初露，展现出片片田地，由润湿而干燥，树枝饱含浆液，柳树枝头再绽新花。白天耀眼的阳光晒人，柏油路上扬起了首批灰尘，晚上小水洼里结上薄冰；空气清新，乍暖还寒，淡紫色的天空一弯新月闪着银光。

五月花开。稠李、紫丁香、铃兰相继吐艳，其芬芳令人陶醉。花开又花落。但这年却和往常不一般。这一年夏季温暖多

* 1880—1921年，俄国诗人，原属象征主义派，十月革命以后开始以政治题材写诗。

雨，彩虹绚丽，雨打树叶簌簌作声，蘑菇和醋栗的香味处处可闻。

生活以它的丰富多采和慷慨赐予从各个方面向我显示了它的活力。在这以前我从来不喜欢雨：可是在这会儿，当某一天在莫斯科大街上遭到倾盆大雨混身淋得象落汤鸡之后，我倒感到幸福。为什么？由于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把阳台门开得大大的，看着斜斜的雨丝落在参天的杨树上，落在我们院里的小教堂上，通过雨帘太阳发出璀璨的光辉，莫斯科河上空豁然开朗，明媚的雨后晴天一直延伸到沃罗别依山。十年来我从来都是隔着窗户望着外面的景色的，可是现在它为什么变得这样明媚旖旎？

第一次感到活着是幸福的。我幸福是因为我看到、听到、并且闻到了周围无法以言语表达的美色：雨丝、院中碧草、河堤和莫斯科河。我当时还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像一个瘖不能言的人，我不知道要用什么字眼、什么语言来表达我此刻的感受。

那些日子我偶尔同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谈起自杀的话题。他说道：“自杀者只想到杀死自己。可是他杀的只是臭皮囊，灵魂却遭到沾污，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引渡灵魂。上帝赐给了生命，上帝复将生命取走。自杀违反生命规律，因为自杀是最可怕的罪孽，它不能使人解脱，它只能加重灵魂所受的折磨。”

当时我们坐在离克鲁泡特金门不远的一家小店铺里，不知为什么提起了这个话头。可是这次谈话是一次启示，因为它表达了我不久之前才翻然领悟、身历其境的新道理。

谁也无权破坏或夺走生命：不论是自己的还是人家的生命，还是任何其它生物的生命，因为生命不是我们给的。我们

无权夺走。**戒杀**——这是尘世间人类行为最主要的法则。生命是永恒的、浩瀚的，它象彩虹多姿，象甘霖普降，象春满人间。谋杀生命是大罪。尽一切力量帮助生命——这是莫大的幸福。意识到自己是从地球到遥远的星球之间的这个伟大生命中的小小微粒，以此生命为乐，祝福它，感谢它，这就是所谓宗教感情。宗教也者接引之谓也。如果一个人感觉不到他自身只不过天地间一沙鸥，听不到宇宙脉搏在自身的跳动，那说明他并不笃信宗教。一旦听见过这种声音，他就永远听得见，他的生命将从这个象太阳一般永恒的、强大的、永不枯竭的源泉逐日汲取力量，充实自己。

我寻找词句来表达这种新的感受，后来在那个夏天我找到了：她们就在大卫王的诗篇* 中。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比这诗篇的语言更能表达最高、最永恒的生命，它磅礴于天地之间，沛乎塞于苍冥之内，而我卑微的生命之从属于它宛如一粒微尘。

大卫王歌颂上天，他的心敞开，他的心象绷紧的琴弦。他的语言象奔放的真实的火焰，它既未被理智冷却，也不曾被哲理的凉水浇透。他热爱周围的生活，在生活中他看到了上帝。当他的力量用尽时，他求上帝帮助。他向上帝吐露自己的弱点、错误认识和罪过。他忏悔自己的无知、卑微，把自己当成拜倒在宇宙广大智慧前的一粒尘埃。他自始至终感谢上帝，赞美上帝，感谢他赐给人以世上财富，感谢他救人于危难，感谢他点燃了灵魂的真理之光。

我再也没有能在别的地方找到比诗篇更强烈的语言。这种火热的诗句使人灵魂洁净，给人以力量，在黑暗的时刻予人以

---

* 指圣经旧约全书的诗篇，传说是古以色列王大卫写的。

希望。它使人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谴责自己，用眼泪冲刷自己良心上的谬误。这是爱、思、谦恭和真理的永不熄灭之火。

从现在起，我用另一种心情来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书了。《魔鬼》这本书以及那卓西马长老的教导向我们揭开了更深一层的意思……托尔斯泰离我更近了。我现在明白了这是什么缘故。

一九六二年春我在莫斯科东正教教堂受了洗礼，因为我想接近那些信宗教的人。我感到这是我内心的需要；教条于我无大意义。感谢我的朋友们，我得以有幸和莫斯科最好的神甫之一相见。他今已不在人世，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第二个人象尼古拉神甫讲道讲得那么透彻，那么深入浅出，象他那样和教民谈话的。

他非常严厉，但并不掩饰这一点。他用闲话家常的语气谈到生活，不伪装神圣，不千方百计地文过饰非，不设法和良心作交易。你不高兴的话你走好了。你上别的人那儿去，你上能为你的罪孽开脱、能原谅你一切、能使你的良心免受折磨的那个人那里去。尼古拉神甫可不这么好说话。他的目光一眼能把你看透。他非常严厉，就和宗教本身一样，他不能容忍卖乖耍滑，他的慈祥和伟大的恩惠也就在于此。你休想逃过他。

莫斯科教会当局对他很不好。甚至在他身后都不许将他埋葬在顿河大教堂附近他所主持的那个小教堂的旁边。看来他对权贵是从不低头的。他非常清楚，我接受洗礼是违反党规的，这对我和对他都非常危险，因此没有把我的名字登记在教堂的本子上。

我永不忘掉我和他的第一次谈话，那是在礼拜后人们都已散去的礼拜堂里。我非常激动，因为我这一辈子从未和神甫讲过

话。我从朋友们那里了解到，尼古拉神甫很朴实，没有架子，他在施洗礼前总要先谈话。快步走过来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他的脸象巴甫洛夫、谢琴诺夫、庇罗果夫这样一些伟大的俄国学者。他的脸既普通，又富有学识，充满内在的力量。他很快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就象我们已是老朋友似的，他往靠墙的长凳上坐了下来，脚搭起来，请我也坐在他旁边。我有些慌张，因为他的举止太一般了。他问到我的孩子，我的工作，我忽然把满腹心里话全都告诉了他，我不知道这就是忏悔。最后我承认，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同神甫谈话，我请他原谅。他微笑了，说了一句："就象同普通人一样。"这句话很严肃，很诚挚。可是，在临走之前，当他伸出手来要和我作一般握手时，我由于一种冲动，吻了他的手。他又微笑了。他的脸很矜持、严肃，这样一张脸上露出的微笑是意味深长的……

给我施洗礼的那天他异常激动，他坐在长凳上，让我在他的身旁坐下，说道："当成年人受洗后，他的生活可能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个人方面，或是其它方面，有时还会朝坏的方面发展。您好好想一想，以免日后后悔。"我回答说，我已想过很多，现在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他看了我一眼，笑道："您可知道，没有顾虑的只是那些特殊人物。"

他给我取了一个希腊教名：福汀娜，他说，这就是我的真名。施洗以后，我说我能否向教堂捐献我带在身边的耳环和戒指以表示感恩，因为那时我没有钱。可是尼古拉神父坚决说："不用。教堂有钱，您自己来了，这就是最重要的。"

他的言论，他的行为举止何等高尚，他言语不多，但说起话来极有份量，令人信服，他并不有意献殷勤或故作温柔，他也不一味扮笑脸。他谈的都是尘世间的生活、纷争和关心的事，而不是谈非非之想。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戈鲁布采夫非常了解生活，他是在俗卅年以后才成为神甫的。他过去是一个园艺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年长以后才接受圣职，为什么他要步自己兄弟——两位神甫——的后尘；可能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使然。正因为如此，他给凡是认识他的每个人所留下的印象，却是不可磨灭的。

他给我施了洗礼，给我一本祈祷书，教了我最简单的祷告词以及在教堂里的规矩、礼仪。他把我算在尘世间千百万善男信女中的一个了。作为一个个人，他是令人难忘的。礼拜以后，信徒们排成长队留下来和他谈话。他和每个人谈话，倾听他们的各种怨声。有一次我在这种行列里站了一个半钟头，因为我前面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在他们家庭生活中发生了不融洽的事情。他的心脏不好，发过两次病，可是他病后仍然继续布道，礼拜完了之后还要一连站几个钟头和信徒谈话。他终于在第三次发病时死去。

他死后我再也没有去过教堂，因为谁也不能象他那样布道，谁也不能象他那样和人们谈话。教会中世俗、虚伪的一面处处可见，而不是真实的宗教感情。“装的！装的！”有一次尼古拉神甫就这么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女人说。这个女人十分虔诚地跪在他面前，可他就是不同她说话。看来他知道她一些事。

他讲道时决不装样子。教堂很小，没有唱诗班，只有几位修女念祷告词。我最后一次到这里来是一九六三年六月三一节〔每年夏季在耶稣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以后，在万灵节那天。教堂里还装饰着鲜白桦树枝，地板上铺着新刈的青草。人们排着老长的队等候尼古拉神甫祝福，他和每个人谈了话。

他又问我身体好不好，孩子怎么样，家务安排得如何，等等。然后，他沉默了一阵，严厉地问道：“你怎么样，还是孤

身一人吗？身边有个人没有？”我当时被这个率直的问题弄得有点手足无措，我只表示否认地摇了摇头。“别性急，”尼古拉神甫说，“你总是太性急，因此个人问题老是不称心。等一等，别忙，会有‘外邦王公’来的……”他朝旁边笑了笑。

我既不对他这种说法感到奇怪，也不对他这后面的古语产生惊奇。“外邦王公”离我的意识和我的生活方式如此遥远，我的确没把他的话当真。可是，对尼古拉神甫这番话本应认真看待。谈过这次话以后过了两个月勃拉哲士·辛格就到了莫斯科，而十月份当尼古拉神甫已与世长辞后，一切幸福的机缘和巧合促使我们会面并成为相识。其它的事都已清楚了。尼古拉神甫说话不是凭白无故的。

在最后一次谈话中我记住了他放在我头上的园艺家所有的大而有力的手，工人的手。他的法衣象平常一样，不带金银的装饰物，他讲道时只穿朴素的黑袍，夏天穿淡色的。上街的时候换成西服和风雨衣。有时在教堂院子里就有人等着他，他就站着和人谈话，一谈就是好半天。那年夏天，当我开始写《二十封信》时，我经常想到他。

他殁于一九六三年九月。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观和我本身就发生了很多变化。

小时候人家教我的好与坏现在交换了位置。战争和革命的英雄气概已一钱不值，人家教导我要把他们当成伟大的那些人物在我眼前垮了。恶势力的权威已不复存在——无论他打的是什么最崇高理想这一类旗号。变成好人的是那些默默无闻、善良、真诚、正确、不出人头地和隐姓埋名者，而不是靠镇压和战功起家的铁胆英雄。政治和党的生活里的谎言和虚伪使人不能忍受。一切秘密、地下活动和偷偷摸摸的念头都极可憎。对人、对动物、对任何生命形式所采取的暴力行为都是不能容许

的。野心勃勃、尔虞我诈的人们，自我欣赏的搔首弄姿者，冷酷的无耻之尤，趋炎附势的小人都比我现在已不复感到的对身体施行暴力的危险更可怕。我已不怕死、不怕黑、不怕肉体上的暴力。但是那种即便出于良好愿望、为了要达到崇高目的的撒谎者会使我惊恐万状，想撒腿就跑。

我身体好了，精神也乐观了。我的身体比廿年前要好得多。我有幸冷眼观察并聆听大自然，要是廿年以前，我躲之唯恐不及，虽然我身居田园远比居住在城市的时间长。我以前只不过是一叶障目罢了。我对儿童、对病人、对老人的态度也变了。我对别人经受的心灵痛楚和精神创伤就如同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一样。人家的眼泪也会引出我自己的眼泪。我学会了尽情地哭、纵情地笑，我原先紧缩的心忽然开窍了。大自然的美，色调、声音、形状的美变得更鲜明、更绚烂多姿，我就象重新恢复了视觉和听觉，就象刚从黑暗的地窖走到新鲜空气中来一样。

从此以后我到过许多教堂，看到许多次礼拜。伊斯兰教徒在清真寺前面大广场上露天作祈祷是十分壮观的；他们不承认偶象和上帝的形。印度教徒的宗教仪式是多种多样的：从膜拜“猴神”到对着火焰默念。天主教堂管风琴的声音象真的雨声淅沥和雷雨交加的声音。那人人随时可以进去的小经堂里的冷烛光温暖着人的心。只需将心向真和善开放，这才是唯一的真理，为此并不需要镀金饰银的华贵教堂、讲究的法衣，最冗繁复杂的宗教仪式也于事无补。

我在各种寺庙里看到宗教感情的真挚和礼拜的虔诚，每次都引起我内心的共鸣。我还可能到许多寺院去，还可能看见许多东西，但是我自己觉得最好的不是寺院，而是头顶上的星空。整个大自然就是我的庙宇，整个我的房间和我的小小的心

也是，只要它还在跳动，一息尚存。

“赞美你呀，主啊！你使我振作，你没有让我的敌人得势。”

“上帝，我的主啊！我向你呼救，你医治了我。”

“上帝啊！你把我的灵魂引出地狱，你使我复活，使我不再进入坟墓。”

“你使我的悔恨变成欢欣，你除下了我身上的褴褛衣衫，使我的心欢快。”

“我的灵魂永远歌颂你的荣耀。上帝，我的真神！我将永远赞美你。”

我重新获得力量，它帮助我看到真理，少走一些虚伪的步子，即便走了，也使之纠正过来。这种与宇宙生命融为一体，与最高理性融为一体的感情，使我欢欣、虔诚、顺从和幸福。我象可怜聋子、瞎子、穷人和残废人一样地可怜那些人，他们对永恒的源泉和强大的脉搏掉头不顾而去。可是和他们争论是没有用的。

虽然此刻我一想到我必须与之长久分离的朋友和儿女，心里就觉得难过和痛苦，但是，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认为自己做对了。我做了自己应该作的，此外别无它路。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轻快、舒畅而心无挂碍。

我知道，我的生命和命运掌握在上天手里。

三　新大陆

在另一块大陆上

在苏黎世的那天早晨阴雨绵绵，有些寒意。此刻天放晴了，我们脚下是闪耀着蓝光的大西洋，它将两个大陆——新大陆和旧大陆——截然分开。

这个蓝色的海洋是两个世界最雄辩的分水岭。我觉得这也是我本人的分界线，我们只那么一下子就跨了过去。时针应当往后拨，因为我们是朝西走。

这次飞行和那次到印度去飞过兴都库什山脉的情景可大不一样！这会儿我可知道，这下面深蓝色的平静海面不仅是空间，也是时间；这是长而又长的时间，这是我要从头开始的第二次生活。我不为什么具体的东西耽心，我只觉得我重生了一次，而且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我还是我。我希望飞行的时间能长一些，我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考虑这一切。可是在现代世界中一切都是加快速度，因此要思考简直没有时间。

总的讲来，世界如此之小，最好是从很高的地方、从喷气式飞机飞行的高度来看它。世界小得真可怜，还有这些海洋呀、陆地呀、“旧”大陆和“新”大陆啊……当你脚下看不到陆地，而只有浓密的云雾，当你头上只有烈日当空、浩瀚无垠的苍穹时，人类思维的相对性和短视就愈来愈明显了。

可是，早饭送上来了。我尝了尝这一辈子没吃过的螯虾。俄国革命以后就没人吃牡蛎和螯虾了，我只听我的老保姆说过，“那会儿彼得堡常有卖的”。

早餐丰盛极了。亚伦·施瓦茨先喝的是马提尼酒，然后又

喝葡萄酒，最后又喝白兰地酒。然后他蜷着身子在座椅上睡着了。我只喝了两杯茶，外加阿司匹灵。我头痛得很，因为这发生的一切简直太"迅雷不及掩耳"了。

到纽约机场后还得在扩音器前和新闻界说点什么，这也是我这辈子头一遭。我还要干多少次这"头一遭"的事啊？一想起"扩音机前面的讲话"我就好笑；所有访问莫斯科的"贵宾"，什么总理呀、部长呀、国王呀、总统呀等等都是这么干的。我凭什么要这么干呢？难道我是为这个才来的？

我过的每一天总是早晨开始，我从不提前计划我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不会、也不想预见什么未知的东西。有的人有先见之明，而且总设法给你解释并且帮助你，凯南就是那样。现在我正重读他的信：

"……您将受到一次沉重的考验：在纽约机场和新闻界见面。我原想使您免除这次会见。但是我无能为力……

"……您在这里将不免要遇到困难和不愉快的事，不过我们中间一些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您；我认为，您在我们这里的生活中同样也会得到不少快乐和感到称心如意。①

"……要在远离故国的地方适应生活这样一个问题并非等闲，因为和您父亲血缘联系的这个阴影会到处追踪您，不管您到了什么地方。因此，为了克服这个干扰，您必须具有比常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耐性和信心。"

后来，事过若干星期、若干月以后，我还多次想起这些话来。可是此刻我对它的含义还未能完全领会。我原以为我已和我的过去一刀两断，我在这里再也不会想起它来了。难道我们现在正飞越的、脚底下的大洋，不正好证明我的感觉吗？

---

① 摘自1967年4月16日信。

这是美国的岛屿和半岛。亚伦看着下面说道："现在马上要飞过一个小小的岛屿叫南塔克特岛，我们全家每年夏天都到那里去休息。您今年八月份一定要来。好吗？您瞧，就在那儿！""好的，我一定来！"我说。这时只见岛屿星罗棋布的大洋正向一侧飞逝，原来飞机正在转弯。

当然，我是一定要上南塔克特岛施瓦茨家去的！这是第二次接到邀请去作客了。第一次是请我上宾夕法尼亚凯南家的农场去。我心里觉得轻松自在。什么困难？我这一辈子全是困难险阻。再也坏不到哪儿去了。

这下面一长条陆地就叫长岛，飞机场就在那上面。多好哇，这个机场就叫作肯尼迪机场。美国用这个名字迎接每一位新来者，这多令人愉快。亚伦对我说，声明会直接交给新闻界，现在只消简简单单说几句话，再顺便提一下说很快要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可以回答问题。

咳，行啦！"亚伦，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我说道，因为我看见他那副不安的神情。新闻界、声明、困难——所有这些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此刻这么轻松。他们不止一次飞越大西洋，走过了半个世界，都是些见过世面的人。他们体会不到什么叫作在压力下生活又突然象鸟儿飞出樊笼、任意飞翔。他们并不珍惜自由，因为他们在自由中生，在自由中长，就象天天呼吸空气的人不知道爱惜空气一样。这位可爱的施瓦茨完全是个孩子，他哪里知道什么叫作生活在俄国然后又离开她？凯南知道，他什么都明白，因此焦急不安，可是我现在不能想到"困难方面"。我太轻松自在了！

哪知扩音器和记者们就在飞机的舷梯下边。我走下舷梯时双脚直发软。

"你们好哇！我在这里多么幸福！"我说道，这完全是发

自肺腑之言。

照相吧，录音吧，写吧，要说我什么尽管说吧——我知道，你们现在是不理解我的。没关系，到时候你们会理解的，要对全世界说的心里话还多着呢。

• • •

从肯尼迪机场出来，我们就驱车到了司蒂华·约翰逊先生在长岛的家。这是我的书的翻译者普丽斯希拉·约翰逊的父亲的家。是她建议我先到那里住一段时间再说。

我对美国的第一个印象是长岛宏伟的公路。在小而舒适的瑞士耽过以后就发现这里大而宽广，令人想起俄国……这是我意料之外最奇怪的一点。一抹平川的开阔地带和这一天一眼望不到边的阴霾天空。四处随便丢弃的垃圾（在瑞士连一张纸屑都见不到）。有许多斯拉夫型面孔的胖男人和女人。可能这是我自己一种独特的方式，我随便到哪儿总是先求同，而不是求异。

不，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不拘形式，自然和朴实是美国人和我们的特别相似之处。在瑞士我看到了良好而不拘礼节的举止。在印度讲究礼节和尊敬，各种繁文缛节。而美国人对什么礼数和规矩全然不注意，就象我们俄国人一样。可是他们更不拘礼仪、更自由些。他们又多么爱笑啊！

第二点，我在驱车前往洛克斯特维利的路上发现许多女人开车。我是一个开车老手，喜欢好的公路和好的汽车，我一眼就看到这里有许多新汽车，开车女人年龄不一，这一点使我惊异。有的是非常年轻姣好的姑娘们，几乎是些小女孩，有举止优雅的女士，老老少少的女黑人，穿皮大衣的女人，带奇形怪状、象花丛一样的帽子的女人……还有白头发的老太太，要是

在苏联，这些人唯一的坐乘是轮椅，而这里却开的是汽车，驾驶得灵活而满不在乎，一边抽香烟，一边和邻座聊天。

十九世纪时一位社会学家就曾经说过："健康的妇女就意味着健康的民族。"开车的妇女看来都是车主，显得特别有魅力，有的是剪的短发式，有的披着长长的头发，带着光鲜、有点俗气的装饰品。没有统一的风格，谁爱打扮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有的还带着两、三个孩子，衣裙就用衣架挂在汽车里，免得放在箱子里弄绉了。在路上度过的一小时，我看到这个年轻的民族所显示出来的健康、自由和独立精神。

在苏联，由于历次战争和革命死了那么多男人，以致妇女成了人民的大多数。因此她们大部分当上了医生、教员和售货员。那里的妇女负担了各种应由男子担任的重劳动。她们的模样能象这些妇女吗？莫斯科出租汽车那些倒霉的女司机为什么要开出租汽车呢？因为从军队里回来的时候她们就是开车的，她们没有别的地方好去工作，她们诅咒这种可憎的劳动，它迟早会毁坏她们的健康。除了几位有名的电影演员以外，哪个妇女都没有自己的小汽车。

我们的车开进一所两层楼的木结构房子，房子是白色的，有黑色的百叶窗，面色红润、淡蓝眼睛的约翰逊先生到台阶上来迎接我，当然也是笑容满面。看起来他不过六十岁。而实际上他已七十四岁了。我对美国人的外貌显得年轻因而与实际年龄不相符这一点看来还有一段习惯过程。这也是健康的原因。

我们走上二楼，这里的老式陈设使我惊讶。原来美国人喜欢一切他们认为"古色古香"的东西。苏联人习惯地认为，在美国所有的房子都是混凝土和玻璃的，都是摩天楼或是单层的"牧业农庄"。当我见到墙上的花墙纸、小窗户上挂的带波纹贴边的浆得硬挺的白窗帘、五屉柜上铺的小台布和花花绿绿的

瓷人象时，我忽然觉得我在欣赏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的老奥斯特洛夫斯基* 的话剧……其实这也说明我在大学时对美国“研究”得还不够，可以说了解相当粗浅。整个这一天，就是我躺在吱吱轧轧作响的木头床并闭上眼睛以后，我还忍不住感到奇怪：“维多利亚式”的室内布置我决没有想到还能在美国见到。

头一个半月我是在这所房子里度过的，我终于习惯了这种古式的舒适环境并且打心眼儿里喜欢上了好心的主人。藏书室里生着壁炉，傍晚约翰逊先生照例在这儿喝上一杯马提尼酒，书架上放着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作品的英译本，摇摇晃晃的茶几上摆满了已故女主人的照片，这里是我最喜爱耽的地方。壁炉旁边舒服极了；约翰逊先生谈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掌故，非常自豪地将他收集的温斯顿·邱吉尔的书和图画拿出来给我看。餐厅吃晚饭时照例点蜡烛：这是美国人奇妙的习惯。墙上镶着玻璃镜框的刺绣、上过浆的、带波纹贴边的桌布再也不使我感到别扭了。家里保持了不久以前过世的女主人定下的各种规矩和秩序，现在的管家叫玛利亚，一位干干净净的德国女人，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规矩。吃晚饭的时候餐桌上一定要摆上花和点上蜡烛，象举行仪式一样，其中自有一种令人感到安慰的陶醉之处，因为周围发生的一切每天都使我惊讶不止。

抵美几天以后，我遇到的第一桩困难就是在纽约普拉沙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再则，因我对这种事情毫无所知，故不免掉以轻心。我完全忘了摆在很远的地方的电视摄影机，一心

---

* 1823—1886年，俄国剧作家。著名作品有《大雷雨》、《无罪的人》等，至今上演不衰。

只想尽快找到英文字眼来回答问题。可能正因为如此一切都很顺利，从反应来看，还说我“神态自若”云云。而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这次电视在欧洲都可以收看。由于时间的变化，对所发生的事情存在的不现实感较之在欧洲增加了，这也因为美国人白天也敞开用电，使你搞不清究竟是白天还是夜晚。

我的心情仍象头天到来那样轻松愉快。我一直在微笑，什么事都不想。大家都祝贺我取得了成功，当天晚上我奇怪地看到自己在电视新闻里出现，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好象是别人的。

我们被堵在普拉沙饭店的电梯里，就象赫鲁晓夫来此时被堵一样。但事后摄影记者还是放过了我们。雨中的夜纽约灯火辉煌，和莫斯科的夜景非常相象：所有大城市的夜景都是一样的。

第一次重大考验——凯南打过招呼的那次——总算过去了。多可惜：凯南一家到非洲去了，然后还要到欧洲去，我们要到八月才能见着面。

临走以前，乔治·凯南和安奈丽莎·凯南到洛克斯特维利来辞行。这是一个温暖的春日，我们在无人照管的美丽的公园里漫步，谁也不想谈正事。事情一开头就这么顺利，实在教人奇怪也令人难以置信。凯南又对日后可能发生的困难预先打了招呼；他唯恐有令人失望的事会突然发生，他对自己的国家抱着又爱又恨的心情。他希望我明白：

“你就是不能把我们的社会当作整体来判断。必须加以区分和区别。实际上这并非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大战场，事关全人类的重大问题都在这里交锋。它的外表常常会引起您的反感——它在我们眼中看来也是如此。可是不要忘记，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竭尽所能来和一切丑恶现象和谬误作斗争。

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我们是您的兄弟姊妹，您应该这么看待我们——同情我们的困难……”①

安奈丽莎是个文静的人。她真象我的莫斯科女友玛丽娜——一位矮小、结实、精神集中的女人。安奈丽莎是挪威人，她有一张北方人那种表情严峻的脸，蓝色的眼睛。她穿一件黄色的春大衣，身材很好，手上带了一个大戒指，她的举止不卑不亢，不常露笑容。在她身边我很放心：不用说我也能看出，她什么都明白，也能提出很好的忠告。她不是大学教授，不是作家，不是历史学家，只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可这比什么都强。

他们再次邀请我到他们宾夕法尼亚的农庄去过夏天。我还能认识他家的一个成员——女儿琼恩，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儿子住在普林斯顿。

暂时我仍留在长岛约翰逊的家里。应该开始着手翻译《二十封信》并看看工作进行得如何。这些事看起来都很简单，因此我还搞不大清楚为什么凯南那样耽心。可是，这以后的几天和几周的时间就说明凯南的预先警告绝不是凭白无故的。他实在太理解苏联和它可能作出的反应了。他也非常了解自己的国家。再有就是——他懂得人的本性，他生怕最初几天幸福的沉醉过去以后，接踵而来的将是酒醉后的头痛。

① 摘自1967年4月22日信。

惶惑不安

在普拉沙饭店开完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我非常疲倦，劳顿不堪：头天实在太紧张了。我坐在约翰逊先生的客厅里，惊奇地看着那每过半个钟头就有人送来的邮件、花篮，又是信、又是花篮，源源不断地送来。开头我一封封地读信，后来就只是浏览其中的一些，最后就没有力气了。

“Welcome to America”〔“欢迎到美国来”〕；“我们希望您能在这里找到平安和幸福”；“别失望，您的孩子会和您在一起的”；“上帝保佑您！”“我们是四十年以前到这里来的，现在这是我们的祖国。您将有许多朋友。您的孩子会理解您的。愿上帝祝福您！”

在我住在约翰逊先生家中那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当中，信是接二连三如雪片飞来。

也还有一些别的信：“滚回去吧，红狗！”“美国不是为红色瘟疫和斯大林家属的！”“我家的猫比你还强呢，它会照看自己的孩子！”“您不会说英语，滚回俄国去吧！”……

不过这样的信很少，一百封友好的比三封。

我真没想到我的行为、我的话会引起这些反应。开始时我很吃惊。后来每接一封可爱的、好心的信我就要哭一场。后来我感到绝望。我不习惯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人家指指点点；我也不习惯我个人的命运和生活被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去想、去议论、去写，现在每当我走一步，这些人都要好奇地打听，想躲都躲不脱。

这里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几十份请柬寄来邀请我到各大专

学校去“说”、去“谈”、去“回答”有关苏联的问题。还有各种宗教组织邀请我去“谈谈您如何找到上帝的经验……”，还邀请我参加电台和电视台的专门宗教节目。访问妇女俱乐部，谈谈苏联妇女。还邀请我去参加东正教礼拜、天主教礼拜，浸礼会礼拜、长老会礼拜、教友会礼拜，到各种宗教的庙宇里去，到西海岸的吠陀精舍去。这些邀请都是极其热忱好客的，带有最真心诚意的好感和极大的兴趣，想知道苏联人究竟是如何生活的，想知道我是如何能抛儿别女、脱离共产主义、脱离自己的祖国的？

我自认在记者招待会上把什么都说清楚了。我知道我一定还要写一本书，里面凡能涉及苏联生活和我干嘛不返回祖国的原因都写上。但一想到我会变成一个有关“苏联问题”的巡回报告人，“出席各种会议作演说”，真使我不寒而傈。另外，要在电视上谈我的宗教感情，我觉得是对我内心深处意念的亵渎。谈政治，谈苏联生活，一方面可以说是自我吹嘘，而另一方面，这种事应该由历史学家、职业演说家去作，而不是由一个从来不把政治当成生活的主要兴趣的妇女去作。

我明确肯定地对所有这一类的邀请坚决谢绝。我最不善于当众讲话，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没有在莫斯科大学教书。我愿意作为个人留在这个社会生活极其活跃、自由、丰富的国家里。作为社会活动家我非其人。可我也知道，如果我拒绝了这些邀请，那我等于违反了这个国家风俗习惯中某些必要的东西。我如果闭门谢客，与社会公众不相来往，我就是无意地伤害了所有这些好心人的感情，他们相信我，向我敞开了好客的大门。

在这些信和关切之情的影响下，我忽然感到我无力做到我自己先前已经做过的。我不能对这些呼唤和拥抱作出回答，我

不能胜任这种脚色。我实际上等于把无力胜任的重担挑在自己的肩上，这副担子迟早会把我压死的。我好象是在歌剧院广大观众面前登台演出，可又没有一副好嗓子，结果就是唱不出来……

“嗡嗡声已寂然。我走上舞台。
倚着门扉，
我从远处缭绕的余音里
将此生经历的事细加玩味。
四周的深沉夜色将我重裹，
千百架望远镜的焦距对准了我。
苍天哪，要是可以的话，
你能不能端着这杯苦酒
绕过我……”

这摘自《哈姆雷特》一诗，出自日瓦戈医生* 的诗篇……

最使我心乱如麻的是大约与此同时儿子通过瑞士寄到纽约来的信。这是插在我心上的一把尖刀。

儿子对上次电话里的谈话感到震惊，他明白我是不会回去了，于是立刻给我写信。他感到更可怕的是过去我们从来是互相信赖的。我和他谈话都是平起平坐，象大人与大人之间的谈话，现在他感到自己被遗弃了，被出卖了，被出卖的有他、卡佳、莲娜。他不能原谅我事先一点儿也没和他们打招呼，害得他们受到了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他象平常一样，根本未触及任何可能的政治动机，对于他来说，我们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他字里行间的怨愤之情是真实的：

“……当我在电话里和你谈话时，听到你说的那些话，我

* 帕斯捷尔纳克写的同名书中的主角。

方寸都乱了，真不知如何回答你才好。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思考这一切，因为事情完全不象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可以相信，我明白了你对所谓‘旅游’的论题，我决不想说服你回国，特别是我们上次谈话以后……

要知道，你干了这些事以后，还打老远的地方劝我们勇敢地振作起来，抱成一团，不要垂头丧气，不要撇开卡佳不管，这多少有些奇怪吧。我们这里有许多亲近的人，他们总给我们出些好主意，而且不仅仅是好主意，而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认为你以自己的行动造成了我们彼此离心离德，既然如此，那你就让我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好了……

我再强调一下，你干什么我不想加以评论，不过，既然对你干的那些事我们能相当坚强地挺过来的话，那我希望日后我们自己也定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你把这些好好想想，也要正确地理解我们才好。

奥　夏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

在我眼中这信里的每句话都包含更深一层的意思。我理解我的儿子，我想象得出他们三人在我家厨房里的情景，他们要忙于接电话，忙于回答熟人们的各种问题，要干好多事，要应付考试……他们三个人谁也不是懒人，他们都习惯于勤奋工作。我完全可以放心，他们谁也不会发神经，不会成酒鬼，不会荒废学业。不会，他们不会干这种事。可是字里行间那么多怨恨和痛苦，我简直受不了啦。

“你打电话来以后，卡佳直至今天情绪还没转过来，她比我们的心情更沉重……”

我放声大哭，不能自已。我只想一件事：抛弃一切出走，

恳求上帝饶恕我对儿女所犯的罪行，回到瑞士的修道院去，到哪儿都行，到哪儿都行……我只要逃避好客之情和好奇心理，只要躲开那些认为我现在心情轻松愉快的人们！

我的新朋友吓坏了。凯南的预告不是无缘无故的。我在绝望中给他写了信，他当时正在非洲的约翰内斯堡，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象平常一样，他遇事总是站得高，看得远：

"（首先）决不要动摇你对自己的信心……您在德里的所为是您的天性使然。倘若那时您回到苏联去，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您不仅是作为这个制度的敌人，而且也是作为您自己的敌人回去的。这样对您的儿子一点好处也没有。

面对这么深重的悲哀和不幸，请相信您的勇气和信念终于会被证明是对的，虽然无论是我还是您都难以设想这将以何种方式来证明。对您的儿子也会证明的。"①

• • •

在洛克斯特维利，整个五月都是在惶惶不可终日中过去的，不但不能译书，就连安安静静思考一些问题也不可能。

记者们来到大门外，从直升飞机上往下照这所房子，从灌木丛后面窥探我和约翰逊先生，我们当时正带着他的狗散步。意大利电视台的一辆汽车停在门口不少日子，最后他们采访了老园丁，一位波兰人。胖胖的匈牙利兄弟俩是我私人便衣保卫人员。他们轮流坐在厨房里，把那爱整洁的玛利亚女管家和厨娘都搞乱了套。普丽斯希拉的妹妹带我去商店买鞋，结果第二天就在报纸上看到我们正在试鞋的照片。一个劲儿要采访我、采访普丽斯希拉、采访她的丈夫、采访玛利亚……当地警察局

① 摘自1967年5月11日信。

还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设了昼夜值班车。这原本没有什么必要，但警察怕出意外。

看来苏联大使馆无意组织“劫持叛逃犯”……莫斯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迄今为止，他们仅仅要求正在纽约访问的安德烈·沃茨涅先斯基公开谴责我的行动。沃茨涅先斯基没这么干。他给诗人和大学生读诗，他的诗里写道，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所有的人民都需要和平和友谊，所有的政府却只会碍手碍脚。（因为这件事，夏天的时候就没再让他上美国来。）

每天继续有各种信件寄来。约翰圣芳济主教寄来了他亲笔签名的书。C·K·马如姆达尔教授寄来了他所作有关瑜迦的报告。素不相识的俄国人向我祝贺东正教的复活节。素昧平生的天主教徒写关于加拉邦达尔和法蒂玛显灵的事。他们都寄来热情的祝福，信尾照例附上一句：“我们为您和您的儿女祈祷。”这些来信我边读边哭，我觉得我欠缺当个“知名人士”的力量。

没有任何人帮我答复这么多的信。因为我没有女秘书。普丽斯希拉本想干这个，可这样一来她就没有时间译书了。她也和我一样，心慌意乱。我那时对一些事情考虑不周，匆忙中我答应在这本书出版前两周在报纸和杂志上分期连载。人家告诉我，经过我本人同意可以登出一章或两章，以便增加读者对此书的兴趣。我倒是同意了，尽管我觉得在报纸上登载家庭的事有些庸俗。

我的儿子和女儿都是五月生的，女儿生于四日，儿子生于廿二日，我分别给他们发了简短的贺电。收条我都留着，可是在后来我儿子答记者问当中我才知道，莫斯科的邮电局并未将这些电报交给他们……

我大部份时间是耽在拨给我专用的普丽斯希拉的房间里，或是楼下的客厅里。我不想在便衣保卫人员的陪同下出去散步，在瑞士时我对此就十分腻味，当时心想以后再不会有此必要了。

这家有许多俄文书。人们继续从邮局寄书给我。我在美国的第一批“财产”，就是这种用极快速度收集起来的藏书。我终于能够读遍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以他光华夺目的文学风格所写的全部文章。另外他的勇气也给我以鼓励。在莫斯科凡是在国外出版的书，就连我们，作者本人在研究所的同事，都读不到。我们都得“谴责”他，尽管什么都不了解！每当我一想起安德烈现在正在劳改营服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权利口出怨言，我只能感谢命运，它赐予我的不是监狱，而是自由和独立自主。可是不幸就在于：樊笼里长大的人不知自由为何物，对它还需要有个逐渐习惯的过程。挨饿的人不能让他过于饱食：他会撑死的。

慢慢地接待我的好客的主人们、他们的乐天精神和朴实、新朋友们的同情心和好感以及春天本身使我复苏，重新返回生活。我首先是通过半年多来接待我的各种家庭的日常生活，我才开始象哥伦布那样“发现美洲”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历史我在大学就学过，现在对我也没有什么吸引力。要全面了解这个国家和社会我认为通过家庭生活更有意义。我在美洲大陆上最先熟识的一家人是约翰逊一家。

七十四岁的约翰逊先生每天和隔壁三个年龄差不多的老头打网球，晚上照例和我一起喝一杯马提尼酒，他就是我眼中的这个国家的“总统”。他体现了这个国家的健康、幽默、善良、好客、淳朴和自然。他把停在他家门外值班的警车当笑话说。有一天他狡狯地对我挤了挤眼睛，建议我“溜掉”。于是

我们坐上了他的“雪佛兰”牌汽车，他带着我在洛克斯特维利风景最好的地方四处转，还到了牡蛎湾、密尔内克，后来又把我带到海边上，他象淘气的小男孩一样为这次“偷跑”感到乐不可支。在家里他连上楼梯都有困难，因为他的膝盖不容易打弯，可是他硬说在网球场上他好受得多。他高高兴兴地自愿每天去邮局取信，因为他家邮箱盛不下寄给我的这么些邮件，这件差事使他十分开心。他家里真是门庭若市，女佣人们啧有烦言；当我离开的那天，他说从此以后他家又开始冷清无聊了。

他的小儿子在纽约市当教员。每逢星期天他就来，还带着三个小不丁点的孩子，他侍弄两岁的、最小的那个女儿非常在行。离家不远有一处荒弃的儿童游戏场，那儿有秋千架，孙子们就上那里玩。我常和他们一起坐在沙箱旁，看着孩子们作“烤甜面包”游戏，或者由我帮他们坐上摇摇欲坠的秋千，我觉得我似乎和这位好心眼的教员、和他的三个浅色头发、胖得象小天使的娃娃早已相识。这个儿童游戏场使我忆起了逝去的童年。总的说来，这个半荒芜的农场，它那空着的马厩，杂草丛生的牧场，以及丢弃的割刈机，使我想起莫斯科近郊无人照看、荒弃了的田地……这位胖胖的教员和我谈起了孩子、学校，谈起了他是在这个农庄里长大的，谈起他曾在池边玩，那里还保留了他爷爷和曾祖父住过的房子。这些房子还在那里，连玻璃都没有了，眼看就要倒坍，但还是舍不得拆它，约翰逊先生情愿任其自生自灭。

这位教员看见我还有些惘然若失的样子。于是我向他倾诉道：

“我觉得看到这里生活的一切，真象看电影一样。我看见它，也喜欢它，但是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并不能进入这个电影场面。我恐怕永远也进不去……”

“不，不，一切都会过去的，”他说道，极力想使我相信自己的力量。“这会过去的！我知道。我知道您一想起女儿心里就难受。可是您要相信，您将在这里结交许多朋友！”

他从纽约给我带来一套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在客厅里安了新的电唱机，我们默默地坐着听音乐，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我们听了莫扎特、舒曼、还有巴赫序曲。他不知道怎么让我开心才好，给我买了拉维·香卡演奏的锡他琴即兴曲，还给我找到一张我想要的纳特金果的歌。

约翰逊的长女、普丽斯希拉的姐姐已经出嫁，和她当医生的丈夫及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她身材苗条，穿着黄色长裤就象小姑娘一样。她的家是现代化的，又朴素、又雅致、又舒服。她脸上总是笑眯眯的，这是自然的笑，不是装出来的笑。这是当地妇女最了不起的素质，她决不用自己的问题和不幸来跟你罗嗦，虽说每个人都各有自己的麻烦事和不幸。她带我到当地商店去，后来又亲自给我买衣服和一些零星用品——我最好不要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

她飞来飞去象一只灵巧的蝴蝶，已经快四十的人了，可是一点都看不出。她非常亲切，但什么也不打听。看来这是当前对我最善意、最良好的态度：不打听。

我曾两次去纽约，上亚伦·施瓦茨和他的妻子宝拉那里作客。还在电梯旁边，记者就立刻给我们照了相。宝拉看样子才十八岁，其实她已三十岁了。她非常文雅、聪明，能灵巧地驾驭两个顽皮儿子，应付一应家事和年轻的丈夫，看来是他的脾气传给了两个调皮淘气的儿子。

我到底见着了阿育，就是苏莱士·辛格的儿子，那个和荷兰妻子一起住在西雅图并在波音公司工作的阿育。一天我们通了电话，然后他又写了信给我，最后他又飞到长岛来了。

阿育原来是一位十分可爱的年轻人，他有东方人那种温良谦恭，也有西方人的洒脱和自然。我和他整整在约翰逊先生客厅里的壁炉旁坐了一天，谈到他父母，谈起卡拉康卡村，谈起在那边建医院的可能性。

当约翰逊先生家里人知道我的一位"印度亲戚"要来看我时，玛利亚就问道，他要吃什么，并且小心翼翼地打听，他是不是要坐在地板上，他头上是不是缠着头布、还留着大胡子〔这是印度锡克族人的装扮〕。这位漂亮的、彬彬有礼的年轻人真把她迷住了。他夸她作的饼干，还和她以及厨娘聊天，然后还跟她们以及全家人一起摄影留念。他走的时候玛利亚说："这才是真的君子人哪！"

五月末的一天，当我躺在那"维多利亚式"的床上时，忽然在半夜时分醒了过来。黎明前的清新空气从窗户透了进来。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了狗吠声，可以闻到被冷露浸湿的草的气味。从窗户里透进来一种醉人的紫丁香的芬芳。这种香味如此馥郁、浓烈，以致盖过了其它一切气味，使人沉醉，使人透不过气来。草里长的是铃兰，屋里也到处是铃兰，房子旁边长着一大丛丁香正开着淡紫色的花。

不，这不是莫斯科郊外，不是茹柯夫卡村，不过完全可能搞错，因为在那里此刻正是铃兰送香、丁香开花时节，还有子夜的狗吠声……

这个奇怪的一九六七年，它自恒河之滨始，用三次春天迎接了我，大概是对我过去的辛酸血泪作的补偿吧。

第一次春天的到来是在二月末的印度，不过，那是很难觉察的。就象那里的"冬天"一样，玫瑰和唐菖蒲继续盛开着，到夜里知了还在鸣唱。可是有那么一天，当芒果树暗绿坚硬的叶子下又长出了不易发现的扫帚形的花蕾时，这就是说：春天

来了。

一下子繁花遮满了整片的树：那怕是一枝一叶，无不着花。常绿树的树冠上萌发了新叶，陈叶就纷纷落下。那里不象北方，不是秋风扫落叶，而是春风把落叶扫成一堆。春天，阳台上但闻乾叶的簌簌声。这里没有北方自然景色中所看到的那样：春天万物苏醒、欣欣向荣，因为这里的生生息息，终年不断，有如恒河的流水，冬天也不凝固静止。万象更新是在仲夏时分，正值季候雨过去以后。印度的春天象一位脚步快捷的小姑娘，她一边跑着，晃动的手镯叮当直响，可是炎夏却象酷热的沙漠，它的烫热的鼻息已吹在小姑娘的背上了。

第二个春天是在三月末来到瑞士。这里春天的万象更新情景我似曾相识。在小小的、太平的瑞士，春天的到来也是四平八稳、不慌不忙的。她慢条斯理地踱了过来，对把雪片撒在深紫色的紫萝兰和雪花莲上的大风雪毫不畏惧。她知道她迟早要得手的。半天之后雪化了，太阳暖洋洋地照着，黄色的连翘花若无其事地开放了，风信子也从地底下探出头来。夜来乌云密集，风声大作，可一到早上依然是青天一抹……这阻挡不住的自然界的周而复始使人心旷神怡，使心灵和它一起获得甦生。

我四月份离开此地时，春意正方兴未艾。在最后一次前往苏黎世的路上，景色美不胜收：玫瑰色的野樱桃花，繁英满枝的杏树，还有那宛如白色泡沫的苹果花。这是瑞士向我告别，祝我一路顺风。一路上花团锦簇的树木就象路标一样矗立在道旁，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可爱的、小小的国家。

可是四月末的长岛依然寒意料峭，到处枯枝秃树，更见不到花朵。一直到五月中，春天才出人不意地打扮得光华照人，骤然光临。

美国的春天象这个国家一样：丰饶、富足，象奔腾的潮水滚滚而来。今年寒冷的四月把春天拖迟了。经过几下耽误，却在一夜之间，群芳齐吐，宛如梦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杜鹃花刹那间如火如荼。白色的山茱萸在林中亭亭玉立，犹如新娘。这些玫瑰色、大红色的树木在我眼中分外新奇，因为欧洲没有这样的树，也不能将它们移植到别的大陆上去。白色和粉红的玉兰、略带黄色的杜鹃花和丁香花以及铃兰——俄罗斯春天的象征——一起生长得非常好。这里就只没有稠李，谁也不知道它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春天在全世界开花，春天在全世界散发馥郁的气息。

"……——哪怕在城市里，春天也照旧是春天。……植物、鸟雀、昆虫和孩子们全都高高兴兴。可是人呢，那些成年的男男女女却仍旧在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自己而且折磨别人。人认为神圣的、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不是上帝的世界的美丽（这种美丽原是赐给一切生物享受，让人们的心倾向和平、亲睦、热爱的），却是他们为了逞自己的威风，奴役自己的同胞，而想出来的种种花样。"*

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就是这样开头的。这本书的红色山羊皮封面的英译老版本正放在约翰逊先生的书架上。

* 根据汝龙所译《复活》译文。

闷人的夏天

六月初大家便都离开了洛克斯特维利。普丽斯希拉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城她丈夫那里去了，以便继续翻译。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没有机会一起看一下她的译文。我们从此就没再见过面。

在这段期间我认识了琼恩·凯南，现在正上她家农场去。随后琼恩和拉利就要到太平洋上小小的汤加岛去参加和平队的工作。这是一对漂亮的年轻夫妇，我很高兴能和他们一起住两个月。

我们驱车驶过了宾夕法尼亚的绿野青山。汽车里的收音机正大声报告埃以开战的消息。这是我最后一次和那对匈牙利兄弟一起旅行。农场上就不需要什么“保镖”的了。这对胖子一个劲儿吸着粗大的雪茄烟，一路上一直听收音机。我的箱子里有一样他俩合送的临别纪念品——一枝自来水笔，上面刻着：“斯维特拉娜留念。祝您幸福。厄尔和乔治赠。”

绿色的、处处是农场的宾夕法尼亚看起来非常富饶肥沃，有些象乌克兰或库班，只除了最主要的一样，那就是苏联还保留了象“村庄”这样的东西。农场主家白色或深红色的房子很象舒适而现代化的别墅，房子旁边都停放着汽车。人们坐在自动车上剪草坪。房子周围既无围墙，也没有矮篱笆。这是这里的规矩；谁也不避着谁，不隐瞒自己的生活，不藏起来。编织的家具就放在房旁的草坪上或是台阶上，面朝大路摆着。这造成一种人与人之间互相信赖的感觉。横木条钉的矮篱笆只偶尔可见，那也只是为挡牲口用的。

凯南家的大房子出人意外地酷似俄罗斯的地主庄园。特别是叫作“进正门”的地方：那里有宽宽的石头台阶，有瓶形的花坛，有柱廊还有大柱子。可是这家人走的不是正门，是从另一面、纯美国式的那面进，一进去就是厨房和客厅。这种奇怪而协调的混合风格也反映在内部布置上。凯南从俄国带来一些古色古香的版画、绘画作品、瓷器、费多斯金式彩画茶几。还有一张克里姆林宫沿河大街的大照片，我心里一怔，想道：

“莫非又是克里姆林宫墙？！”

琼恩和拉利向我解释说，这所房子是在十九世纪初盖的，后来又经过一个俄国移民翻修改建，故此建筑风格很象俄罗斯式的。由于过去的房主是犹太商人，因此所有的门的一侧都镶嵌了一种“梅素萨”——一根小指头那么粗的管子，里面放了一张载有《圣经》文字的纸卷。琼恩说，多亏这个他们才能“家宅平安”：“梅素萨”是辟邪去恶的。

第一天我在这里到处走了走，就象一只新来乍到的猫在家具上和各个角落里东瞧瞧西闻闻似的。这所房子很适于居住，也很舒服，特别是到处都摆着木制的或带弹簧垫的摇椅。房子是集欧洲、美国、俄国数种风格的大成，外加“梅素萨”。我样样都喜欢，因为我从来倾向于各种传统的综合。

每个房间的布置都不相同。这里有挪威的小人象和克里斯蒂安桑——凯南太太之父母所居的地方——的版画。客厅的壁炉旁边铺着一块熊皮。每个房间都有点从俄国带回的小玩意：盒子啦、玛特略施卡娃娃〔一种农妇装束的玩偶〕啦、茶几啦等等。到处都是大量的俄文书。

三楼宽敞的工作室阳光充足，投射在黄色镶木地板上象方方的图形。房子比较空，这是最好没有了。房子的一面墙是漆成白色的书架，上面满是书、俄文报刊和杂志。（我在莫斯科

的家中也正是这样的白色书架……）文件夹里面收集了关于俄国的资料和剪报。还有一张大的、没有上油漆的木头桌子——很轻，没有抽屉——用来工作特别方便，使你不由得想占有它。窗子旁边照例有一张摇椅，它又旧、又硬，由于年代久远，已经磨得光溜溜的。这里还有卡片和立灯。凯南最喜欢在这里工作：他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想想又写写。一架老式打字机放在几块粗木板钉的架子上，这是教授亲自动手钉的。琼恩告诉我，她爸爸要休息时就干活，农场上有啥活他就干啥。至于经营农场，她家没人感兴趣。一家佃户就住在隔邻，地就是由他来种的。

到傍晚我们三个人就坐在后面柱廊的石级上。房前草地那边就是浅绿色的麦地，远处小树林依稀可见。由于从这里望出去见不到任何美国式建筑，风景完全是中世纪俄国式的……

后面的柱廊是一家人最喜爱的用作傍晚时分聊天的好去处。在这个闷人的夏天里，暴风雨时作，萤火虫在枞树丛里飞来飞去，我们在这里度过每一个黄昏。

在这庄园里有一种忧郁的俄罗斯情调。琼恩非常喜欢影片《日瓦戈医生》里的插曲，每次她放这张唱片时，就更加深了这种感觉。描写拉拉〔《日瓦戈医生》中的女主角〕和瓦雷金的冬天的那段主旋律的确好，它一会儿是圆舞曲，一会变成回忆，听起来真教人心碎。

还好，我们还听了别的：有琼恩·巴叶茨、朱迪·柯林思、彼得·锡格唱的民歌和米奇·密勒合唱团唱的合唱等等。我们听了格里格和巴赫。琼恩总是趁作晚饭我们都在厨房的时候放唱片，或是当我们坐在后面石级上喝鸡尾酒时放。

这里没有佣人。谁愿意做什么饭食就做什么。我有一天做了一次真正的咖喱食品。礼拜天琼恩就做油炸馅儿饼。拉利每

天晚上都在院子里烤肉。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卤汁，就连格鲁吉亚的“恰合比利”——茄汁童子鸡——大家也都爱吃。晚饭后我和琼恩洗碗，把唱片放得响响的，以便在洗碗池旁也听得见。

我们有半天在厨房度过。这里每天是以在窗旁长木头桌上喝咖啡开始的。桌子的一头靠窗，长的那面靠食具架（就象我在莫斯科的厨房一样……）。孩子们在这里吃饭。晚上大人在有纱窗的游廊上进餐，孩子们就去睡觉。桌子上摆着蜡烛，半明半暗。四周是萤火虫，在草丛里和空中闪烁发光。

我和这对比我小十岁的年轻男女主人在一起，感到十分自在。他们没有经受过我那种心灵的创伤，可是这个友好健康的家庭十分成熟，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他们相传下来的家风。他们象对小妹妹一样看待我。一切种种的安排都足以说明这点：从楼上我住的那间房就可以看出——陈设非常简单，没有维多利亚式家具、没有那些波纹窗帘贴边，方便适用极了。琼恩知道，现在最好不要同我一起去商店，为此她亲自给我买夏天的衣服、内衣、帆布鞋、游泳衣、化装品。很久就没有人这么关心我了。每次买的东西都经过仔细考虑，完全适用。拉利给我买了蓝色劳动布裤，在农场上没有这个不行。他看见我把针线放在一个瑞士巧克力盒子里，有一天就给我带了一个小小的针线盒。这不是普通朋友，两个月亲密相处使他们变得象我的亲手足了。

琼恩异乎寻常地漂亮——高身材，长长的腿，苗条，具有林中小鹿那种天然文雅风度。她的主要魅力在于天生自然。她模样长得像年轻时候的凯塞琳·赫本〔好莱坞著名女影星〕，天生丽质、弱不胜怜，但性格中自有其果敢、忧郁之处。她的微笑总带几分凄楚，完全是毫无原因的。我常问她道：莫非是生

病了？还是累了？还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她向我保证说没有，她完全健康、幸福，一边静静地晾衣服、烫衣服、给孩子们做饭。我发现我老喜欢盯着她瞧。早晨她穿的是短裤，晚上总换上一件可爱而雅致的裙衫。这位年轻的少妇知道如何管理家务，我有时想，如果让她掌管一个大家业，而不去操持洗衣做饭等家务，悉心待客，那么所有的人都会乐于与她为伍，并欣赏她本人的。可是她要操心的事太多了，再加上我又在这里住。每天她去给我取来一大批信件，这些信件常把我闹得六神无主。

我要的不是三个律师，不是文学代理人，不是出版者和译者，而是一个能干的女秘书！可是我没有……象从前一样，写来的信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同情的、能理解我的。许多人对我写的那篇题为《献给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作出了反应，他们理解我写这篇东西的初衷。这个时期各国都有人成了我的书信朋友。有一天我收到了辛格太太〔指勃拉哲士·辛格住在伦敦的前妻〕的伦敦来信，她和廿八岁的儿子住在那里。听到勃拉哲士·辛格的独子的消息我真是高兴极了。

凯南家农场的农活都是住在隔壁的佃户一家来干。我到农场的头一天就看到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开到车房前，里面出来一位妇女，发式入时，穿一条白色短裤。

“琼恩，这是来看您的吧？”我问道，心想这准是她的朋友来看她了。

“这是璜妮塔，佃户的妻子。”琼恩回答说。

我沉默无言了……

佃户的老婆？这是——她的汽车吗？她看起来就和苏联著名的电影演员一样，说实在的，那些人还没有这样的汽车哩！而这家佃户的房子哪点儿比苏联著名的科学院士的家差

呢？……

很快我就和璜妮塔成了朋友。她一家人从早干到晚。用电给卅头奶牛挤奶，她九岁的儿子在一个大棚子里饲养出来了全区最好的小猪娃。每天早晨牲畜棚传来了奶牛的哞哞声，公牛刺耳的叫声，还有棚子里小猪尖声尖气的吱吱叫。全部牛奶都出售，这是这家农户的收入的一部分。他们终日在田间劳动，刈草、收乾草，然后收玉米、再收小麦。所有的工作都用机器来做；棚子后面摆着一整套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再晚些时，到了夏季，凯南的儿子和侄子来了，他们也会帮助干些地里的活。

当我问璜妮塔她怎么忙得过来，她眼睛朝上一翻。她有四个孩子，总得设法对付，再说全家都在出把力。

她常问我，苏联的农民是怎么在地里干活的，有没有农业机械，地是属谁所有。我告诉她，在苏联土地、产品和收入都归国家所有，农民除了自己的住房和房前一小块自留地以外不拥有其他。他们在集体农庄的劳动报酬是用现钱和实物支付的，不过报酬的多寡取决于集体农庄的总生产额。至于集体农庄则依赖国家指示，它本身无权决定该种什么东西。农民丧失了主动性和兴趣。青年们流入城市。乡村里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每到秋天，城市必须派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下乡收割庄稼。明知道干多少都是归国家，那谁还想干呢？因此苏联的农村完全不是璜妮塔家的样子，也许更象宾夕法尼亚州百年前可能见到的情景。

璜妮塔直摇头。

“可能我们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啊，”有一天璜妮塔这么说。“我们还直抱怨生活越来越不好过、越来越贵哩……”

“可不是，您们最好看看苏联北方的农村是什么样子，或

者看看印度的，那您就会明白，您们的造化大着哩！”我回答说。

到了傍晚，璜妮塔、她丈夫和孩子都显得很累、但也很满意的样子。干完活以后，洗完澡，全家就坐在电视机旁。琼恩的孩子们也上那儿去看，因为凯南家没有。夏天播送赫鲁晓夫采访记时，大伙儿全上璜妮塔家去了。

有时他们还放映自己拍的家庭的彩色电影：孩子们在玩耍、骑小马，亲戚来家作客等等。

这就是——庄稼户！这就是——庄稼户！这个思想一直在我脑子里转。苏联把描写这种生活的小说叫宣传，可这是我亲眼所见……贫穷而不幸的俄罗斯啊！如果农民能高高兴兴地在地里干活，也为自己干活，那你会变得多么富饶和昌盛啊！

我想起了苏联作家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 的话：“地里的劳动带来快乐。如果农民的这种乐趣被剥夺的话，那么对于他劳动就完全失去意义……。”

这年夏天预告有好收成。常有暴风雨，白天赤日炎炎。我们每天吃鲜玉米。琼恩的几个儿子和农户的四个孩子晒得乌黑，显得很健壮。我们全都到小池塘去游泳，拉利在那里还安装了低低的浮板。拉利整天都干活，他什么都会。全家准备作太平洋之行。他们已把在普林斯顿的房子卖掉了。

他们两人的性格里有很多浪漫主义的成份，而琼恩更是急公好义，古道热肠。她读完了护士学校，想到一个遥远的海岛去工作。对于生活即将由舒适转向原始这一点他们毫无所惧。他们一再说：“那儿的气候对孩子们大有益处。”虽说可能发

---

* 1924年生，苏联作家。作品多以怀念故乡、大自然以及童年回忆为题材。

生热带病或肠胃病——那也没关系，他们自带药物就行了。每当看到这对精力充沛的夫妇时，我禁不住想：他们到哪儿都不会没出息的。他家两个调皮鬼将因每天在有珊瑚礁的海面上游泳而日益健壮。琼恩忧郁的微笑决不是软弱的表现，她那双湛蓝的眼睛有时燃起的那种光亮和力量，使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小妹妹”。

在这个闷人的、雷雨交加的夏天，我得以在这个可爱的家庭里作客，享受到一段不算长的宁静的生活。

• • •

莫斯科方面很久都没明白过来，也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对付这位“叛逃犯”。我可以生动地想象得出，党的内部和克格勃如何开会商量对策；中央委员会内部如何“定出决策”。

六月廿五日总理柯西金在联合国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阿利卢耶娃是个精神上不稳定的人，她有病，对那些企图在政治上利用她的人我们只能表示惋惜……”

当无线电里转播记者招待会时，我们正在农场吃晚饭。桌上点着蜡烛，杯子里斟的是红酒。我从总理的语调听得出来，他在强行抑制自己——他多么想把话说得更重些啊！译员在翻译，不过，他以他的遣词用字，使同样一些话显得更有礼貌，更得体得多。即便如此，琼恩和拉利还是笑起来了。我们呷完了酒。我对那些话没有特别在意。可是别搞忘了，党有机器设备，现在那个“输入了思想程序”的机器转动起来了。这只是重炮武器的第一次打击。

第二个月内我从报刊上了解到关于我本人的许多新事。原来是我一辈子都在精神病医生的监护之下；我有特别强烈的性欲；我身上戴的是罗曼诺夫王朝的钻石，吃喝用的是这个王族

的金餐具，我住在过去罗曼诺夫王朝的宫殿里——克里姆林宫，我出席过一九三九年与里宾特洛甫〔当时纳粹德国的外长〕签订的条约，而且那时已是成年人。还说什么我父亲什么政治问题都和我商量，我替他管理一家事务，没有我点头什么事都办不了。说我到瑞士去是为了提取我父亲存在瑞士各家银行里存的钱等等……这些都是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刊登的，一些不相识的人把剪报寄给了我。还有一位女读者在信里附寄了一份她寄给报纸编辑部的抗议信抄本。

《妇女家庭杂志》和《麦科尔杂志》写道，勃拉哲士·辛格"说服"我信了印度教和素食主义，还说在印度时我每天都去拜湿婆庙（古代生殖器崇拜），还行各种宗教礼仪，包括每天在"神圣恒河"里洗澡。

莫斯科的《文学报》写道，我从来就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和偏执狂"，而莫斯科大主教皮缅说，他"一点不知道阿里卢耶娃受洗礼的事，她这个人不是基督教徒，但对一切宗教全都感兴趣。"伦敦报纸的记者、苏联公民维克托·路易斯对大主教进行了采访。

然后维克托·路易斯取得了苏联政府的允许采访了我的子女，给我家里全部房间拍了照，把一些物件按他的要求重新布置了一番，拿走了家庭照片，这些照片原本锁在我的书桌里，拿了我那份手稿的复写本，然后将这一切加上自己的评语卖给了伦敦的报纸。（我国内的朋友手中还有《二十封信》手稿的复写本，到那时为止莫斯科已有许多人看过这份东西。）

没过多久伦敦的《每日快报》就以"斯大林的秘密像册"为题刊登了从我书桌内偷走的照片，加上了维克托·路易斯的按语。这里面人名、日期、事实都搞错了。维克托·路易斯将这些一点意思也没有的照片、自己的文字以及对我写的手稿的转

述一齐掺和起来。甚至汉堡的《明星》画刊也以《斯维特拉娜回忆录》的专栏刊登了这些东西。原拟在十月底在伦敦、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出版的《二十封信》，现在却遭到严重威胁：维克多·路易斯到处向出版者兜售他自己搞的那套东西。

他在汉堡告诉记者们，这些照片和手稿是他在莫斯科从“阿里卢耶娃家里人”那里搞来的，其实我的子女根本不知有手稿一事，而且家里也未存有这份手稿。书桌里锁的照片除非是当局的命令，否则他们当然是不肯交出来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泰晤士报》径直把维克托·路易斯叫作“早已知名的克格勃特务”。

七月中旬亚伦·施瓦茨到农场来了。他简直让人认不出来了——又苍白又瘦。我们为了保护版权，在欧洲到处打官司。必须赶快出版俄文版的，哪怕先出二百份也行，那样的话作者的版权就确定了。哈珀和罗埃公司决定比计划提前出版《二十封信》，日期改在十月初。可是又出了新障碍：莫斯科当局对美国大使、对国务院、对许多有影响的美国人施加压力，扬言“阿里卢耶娃的书必须推迟出版，该书若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前夕出版势必损害苏美关系”。可是出版者们拒绝延期。

看来莫斯科的算盘是：在全世界都有机会一读维克托·路易斯搞的那个附插图的版本之后，对我的书就会失去兴趣了。此外，他的版本和评论使莫斯科宣传的主要论题有所发展：“一个性欲旺盛的女疯子和乃父的亲密助手。”我和卡普勒尔的那段纯洁无邪的宿缘被吹成一部“沉缅于酒精和性欲的恋爱史”。小时候我父亲赏给我的“带烟草味的亲吻”被加上耸人听闻的标题：《我父亲是个好人》……

我四年前写的手稿里根本没提到要离开苏联的这个最后决

定，于是莫斯科当局决定别出心裁地“解释”这个事实。有人建议亲共产党的意大利记者恩措·毕阿季去采访我的子女、姪女和他们精心选择的所谓我的“朋友”。当然，在苏联的西方记者是决不会获得允许去找我真正的朋友们的。“朋友们”只翻来复去说这几句话：“她父亲死后以及二十大开过以后她很不幸，老朋友们离开了她，昔日的光荣化为乌有。因此要离开这种黯然无光的生活的唯一出路就是逃到国外去，至于发表手稿这是她想公众重新注意到她……”恩措·毕阿季甚至恬不知耻地采访卡普勒尔和他现在的老婆。人家还使劲盘问我的儿子：“她还有多少个丈夫？”我唯一能引以为自傲的是，可怜的孩子如何不失尊严地经受住了这扑向他来的各种考验。

可是我的姪女古利娅在接受采访时却胡扯了一些辛格的事，虽然她一次也没见过他。

不过恩措·毕阿季在文章里的语调还算是得体的。那个维克托·路易斯却净说瞎话不知道脸红：他说他采访了我那早已亡故的姨母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他还引证了我从前两位丈夫的谈话，虽说从文中可以看得出，他根本没有见过他们。他把尤利·日丹诺夫所在的罗斯托夫搞成敖德萨大学。他把莫罗佐夫写成“德国问题专家”，虽说他从未研究过德国……可是别人还是相信了维克托·路易斯的话。

我知道并且感觉到，这散布到全世界的谎话人家反而比对我自己说的和写的要相信些，因为这是社会行为的心理规律。我父亲的名声太使人反感了，我还活在它的阴影之下。社会的反应有其“运动规律”，关于这一点老于世故、下流无耻的新闻记者们是会巧妙地加以利用的。

苏莱士·辛格从印度寄了一封信给我的律师们，他焦急不安，因为他在报上看到，说我“受了”沉重的精神打击，现已

进了医院。他有一个多月没给我写信了。我写信告诉他我完全健康。后来才知道，那位在莫斯科和阿拉哈巴德都对我极友好的印共女党员哈芝拉·贝嘎姆逢人便告，说我进了疯人院。

我知道对谎话不能那么认真看待，那样太伤神了；我也知道，从今以后我一辈子都得和流言蜚语打交道。新闻自由的世界就象一把双锋利剑：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用一辈子的时光来辟谣实在太不值得。我的朋友们对我说："别理它。忘掉它。习惯这些无可奈何的事。"我知道他们说得对。从一个人们噤若寒蝉的苏联过渡到一个言论自由的世界，这个弯子未免转得太急了些，我似乎感到我的一把老骨头在转弯的当口都要裂开了……

幸好我这个人还不是那种自尊心特别容易受损害的人。更幸运的是，每过一天，每过一个新的早晨，我四周的鲜花、树木、可爱的人们还有他们对我的深情厚意，使我在读这些令人不齿的臭文章上面所耗掉的精力，得到百倍的补偿。

一天，农场上就留下十七岁的克利斯多弗·凯南、几个小小孩和一个照看他们的小女孩时，我把他们全叫到游廊上来，那里窗户上常常燃着一个小小的烤肉的用具，里面烧着煤火。我请克利斯多弗拿些液体燃料来，以便使火烧得旺一些。孩子们好奇地看着我。我说："克利斯多弗！你们都在场看到这庄严的一刻。我现在把我的苏联护照烧了以回答它对我的谎言和污蔑。"说完我就把护照扔在炭火里。克里斯多弗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护照熊熊地着起来了。佃户的孩子隔着纱窗瞧着我，小孩子们围着看，一句话也不吭。然后我拾起一团灰烬朝它吹了一口气。它就随风四散了……

琼恩和拉利随着和平队走了。八月中凯南从欧洲回来：人瘦了，也很焦急的样子。他四面八方受到袭击——信件、电

报、延期出版《二十封信》的要求等等。这是他代我受过，我看得出来。这一切他都预见到了，还在春天就已打过招呼。

到了我该离开农场前往纽约的时候了，我要在那里出席一次新的记者招待会。对全面展开的攻势我必须有所答复。

自由是无价之宝。

为它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

会见和事务

在宾夕法尼亚州度过的一段较为宁静的遁世生活结束了。

九月和十月这段时间是在繁忙纷乱中度过的：从这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结交新的人等等。如果不是下列两种情况的话，这种日子原本可以过得有趣和惬意的：一是不得在城里的街上或是商店里露面，免得让记者瞅见了；二是不断扩大的反对那本书〔指《二十封信》〕及其作者的运动，它象水面上的波纹那样一圈圈地扩散开去。

为了保卫“作者版权”在伦敦匆匆忙忙出了二百份该书的俄文版。很快首批书评问世了。有的人把这本书吹捧到荒唐的地步，拿它的风格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帕斯捷尔纳克相比，说它兼而有之。有些人则把这本书贬为一种想让读者相信“我父亲原本是个好人”的可怜的尝试……

八月十五日在哈珀和罗埃公司副董事长埃文·托马斯在长岛的家中，我会见了一批获得分期连载这本书的权利的报纸和杂志的代表。大约有十五个，是从欧洲、美洲及亚洲来的，他们都一致想知道手稿的情况，他们都被莫斯科的宣传搞得糊里糊涂，因而此刻搞不清他们买到的一份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花了两个钟头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在一块美丽的绿色草坪上，坐成一个圆圈。

要是他们知道我是多么愿意看到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奇和好心的面孔，那才叫好呢！可是他们一点也没往这上面想，他们一心想的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好家伙，他们一开始是怎么使劲盯着我瞧啊！我不知道他们原打算看见的我是一副什

么模样：是穿草鞋的俄国老娘儿还是黑头发的格鲁吉亚女人：蓄着胡子，口叼烟斗——象我老子那样？不过两个钟头以后他们的态度热情起来了。谈话很随便，也很有意思。他们真不知道我是多么愿意跟他们多谈几小时，向他们问长问短，和他们一起上馆子，和他们中的每一个倾心长谈啊！要是他们能理解我们这些与世隔绝、遭到禁锢的苏联人对外界的向往，那该多好啊！

我多么想让这些人——英国来的乔埃士·艾金顿、瑞典来的伯蒂尔·托尔库尔、芬兰来的萨卡里·马塔依、日本来的川端笃彦、以色列来的赫顺·雅各布森、希腊来的乔治·维尼塞罗斯以及巴西来的阿尔贝托·达·孔南——知道，我能和他们会见是多么愉快。

俄国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一怪，我整个一生都是些怪事凑起来的，不明白这一点脑子就会转不过来。在苏联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西方人是很难体会、很难想得通的。大战期间华尔特·李普曼谈起俄国时曾经说过，“这是欧洲最东方式的国家，也是亚洲最西方化的国家。”可能他的话我转述得不够精确，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个有比人家晚了一百年的民主主义，有尔后变成廿世纪最反动的反革命的革命的俄国，这个同时又能奇迹般地在自己内部保留自由、独立、博爱的胚胎和发面酵子的俄国，不是一怪又是什么？

从他们所提的各种问题，从那些围成一圈坐在草地上的记者盯着我瞧的情况来判断，我感到他们又相信我，又不相信我。不过大部分的杂志和报纸在这次会晤以后都写了善意的采访记，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批驳了维克托·路易斯的谰言，替我的说明作了应有的评价。

然后我就到南塔克特岛，也就是亚伦·施瓦茨从苏黎世启

程的飞机上指给我看的那个小岛上去了。我将和施瓦茨全家一起过两个星期。

南塔克特岛代表温和的色调。灰色阴霾的天，黄色的沙丘，海边沼泽地上淡紫色的帚石南，再加上无日无时不在变幻的海洋。这个大洋任性而多变，时而灰暗、时而湛蓝、时而墨黑，由于狂怒而白沫飞溅。这种乖戾而复杂的性格真是让人百看不厌啊！我们俄国人对乖僻多变的性格早已习以为常了。可能正因此，所有的俄国人都爱海，虽说这个国家本身是一个有田地、有草场、有森林的陆地国家。向往海，这在俄国是有其心理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所有的童话故事和传说，所有俄国的壮士歌〔一种歌颂壮士的俄国民间文学体裁〕谈的都是海的故事、那蓝色大海的故事。普希金、莱蒙托夫、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的散文谈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来到蓝色的海边，只见水天相连，一望无际，自由奔腾的海浪，阳光照耀下的大海银光烁烁，人们不禁为之陶醉而流连忘返。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
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
和闪耀着骄傲的美色。
……
我的心灵充满了你，
还把你的峭岩，你的港湾，
你的闪光，你的阴影〔本书作者引用时将“阴影”作“声音”〕

*原诗中译者注：指地、水、风、火四大原素。

译者按：此诗写于1824年，原名《致大海》。本书作者所引为该诗的第一节及最末一节。本诗中译文系采用戈宝权译本。

和波涛的喧响，

带进森林，带进寂静的荒原。”

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囚犯普希金常和大海对话。帕斯捷尔纳克聆听大海的话语。高尔基说：“大海笑了。”*

自由的元素——这就是大海，这就是它为什么吸引了千百万人的心！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渴望自由——因为她尚未降临俄国——我们通过对大海的爱来表现我们对自由的热爱。

八月份在南塔克特岛时我遇见了日本女画家松原直子，德国画家费利茨·艾亨伯格，美国女人——一位书籍版画家——琼恩·华煦·恩格伦德、儿童文学编辑玛格丽特·麦克埃尔德利、出版者凯丝·肯菲尔德和斯陀勒·兰特。我有时觉得，我不是在南塔克特岛，不是在马萨诸塞，而是在克里米亚的柯克特贝尔——苏联一个小小的滨海村子，那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画家、诗人云集，他们也象这里的人一样，在海岸上爬行着，拣拾小石子儿和贝壳。然后把这些收集品带到北方，带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到了那儿，这些五光十色的小石子儿和被大海磨光了的小玻璃片就被珍藏在匣子里，看见它们就令人想起海，想起太阳。这些小石子儿镶在戒指和手镯上，用它们作成串珠，因为柯克特贝尔的玉光髓和碧石是自由元素的象征。

这就是我在南塔克特岛的淅沥雨声中、手捧马提尼酒杯时所想到的。要是能让我们柯克特贝尔的人到这里来，让他们和南塔克特的人一起在海边散步，那该有多好！罗伯特·洛厄尔**和安德烈·沃茨涅先斯基实在说得太对了：各国政府只能妨碍

---

*按此句出自高尔基所作《海燕》一诗。

**美国诗人。1917年生。五十至六十年代其作品颇有影响，所写诗多与历史、现代及社会有关连。

人们和诗人们相互了解。“我们大家——美国和俄国的诗人们——组成了单一的诗人族。要是我们有自己安在轮子上的首都——火车，我们可以乘着它象吉普赛人一样，在全世界到处流浪，那该多好！”这是沃茨涅先斯基于一九六七年春天在美国时脱口而出的话。美国的南塔克特岛和克里米亚的柯克特贝尔就是诗人族的“吉普赛首都”。

在南塔克特岛我收到了两封琼恩·凯南从太平洋上的汤加岛寄来的信。她还寄来了相片：男孩子们站在珊瑚礁旁，努库阿洛法的主要街道就象农村一样。不过琼恩和拉利没有灰心，工作很多，当地居民非常善良好心，和平队也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

九月份我又从“诗人们的吉普赛都城”再次流浪到长岛，来到一个不大的叫勃里基汉普顿的村庄里，那里埃莲娜·弗里德有一所消夏别墅出租。她是来自俄国爱沙尼亚的一位作家和出版者的遗孀。客厅的墙上挂着尼古拉二世皇帝的照片，因为我的缘故，埃莲娜想把它取下来。我告诉她，照片一点也不碍我的事，我请求她不要对这所建在沙丘山的可爱的房子作任何改变。

这所傍海而建的单层小别墅满是大海的恩赐：有贝壳、石头，有象雕刻品一样的奇形怪状的打磨光了的木头，这都是若干年来在这里收集来的。

可爱的埃莲娜啊！我们也收集我们黑海的“赠品”，我们喜欢而且看重这样的收集品，如果您能走到黑海之滨的话，我们也会给您看这些赠品。我们会给您看皮聪大美极了的沙岸，那里很象你们这儿的海滩，可以一连几个钟头在那儿散步，拣拾多节的小木块儿。

在勃里基汉普顿的海岸上埃莲娜指给我看了杜鲁门·卡波

特* 的别墅。他在苏联早已知名，可我不是那种趋附名流的人，但愿杜鲁门·卡波特原谅，我没有想在海滩上见到他。

开首几天大西洋呈蔚兰色，十分温柔可亲。后来海就变黑了，白浪翻滚，咆哮终宵，狂风大作，我们把所有的窗子都关起来，大海于是便发怒了，可能是见我们谨小慎微、见不得世面……

在埃莲娜家里过的头几天可以算得上是享受和休息。后来，一次沉重的打击来了：九月十日《二十封信》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分期连载。当我打开第一份《纽约时报》时，我差点没晕过去。报纸上登的是我的家庭照片——就是今年夏天从我莫斯科家书桌抽屉里拿出去、尔后又由维克托·路易斯带到西方出售的那批照片。它们怎么会弄到这儿来、而且还和一些“引文”配在一块，而不是片断、不是我原先在五月份同意的、完整刊登书里的一章或两章呢？！

我这会儿想问已经晚了。我只能请求《纽约时报》从下一期在标题底下刊登一条说明：“照片未经作者过目或同意”。

标题也是揪心透了：“下期刊登：‘我的初恋’”，“下期刊登：‘我母亲是如何自尽的’，‘贝利亚玩我父亲于股掌之上’”。我写的书里根本没有这类标题，就是说他们不该用我的口气来讲。照片说明还是我在伦敦《每日快报》上看到的那些，有错误、也有不准确之处。这些照片和书完全没有直接关系，我想都没有想过要用它们来做插图。我等于完全由人摆布，就象已故的古典作家或是巴尔扎克一样……

驳斥《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没有用。有些照片不知从哪儿搞来的，全是假的：一个剪了短发的胖太太抱着一个瘦得象

* 1924年生。战后美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曾访问过苏联。

小鸡的婴儿，那根本不是我妈妈和我。把我女朋友带孩子的照片说成是我的。在家庭合照里把我的家庭教师说成是我妈。我辟谣的信登在《生活》杂志的"读者来信"栏里，可是究竟有多少人能看到这小号铅字排的一段文字呢？

在这次打击后我得到唯一的安慰是：几天以后我手里拿到哈珀和罗埃公司出版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最初一批书，有俄文本，也有英文译本。我在出版人凯丝和琴·肯菲尔德家里作客，在他们的离纽约不远的伯德福村度过了一周的时光。就在这里他们把书交给了我。由维也纳的弗利茨·莫尔顿出版的德文本此刻也在我桌上。看到这些出版的书我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满足。只不过半年以前我还在印度。那时认为要出书简直是无法实现的梦想、幻想……而现在书已经在我手里了。这可真是奇迹啊！

没过多久我就到了纽约，因为十月二号在书正式出版那天，我要在电视台答记者问。我原想，一定会谈到这本书，那我就有机会说明那些分期连载的"偷来的照片"与我本人无关。我指望电视采访能给我机会答复书评中某些误会。这些误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把此书当作历史回忆录了，而它实际上写的只是一个家庭的私人历史。

然而提的问题都是与书无关的事。这次采访可真是活受罪。在刺眼的灯光下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扶手椅上，脖子上挂着扩音器，脸上敷了厚厚一层化妆的油彩，这是专为彩色电视播放用的，我既不能看钟点，故此每个问题我可以花多少时间回答、还有多少问题，我心里一概没有数，我简直不知所措。电视记者保尔·尼文这个胖子满脸流汗，汗珠从额角顺着面颊往下淌，他也在神经紧张，而这种情绪也传给了我。

电视采访以后大批信件又涌到。这是我和美国人、和久住

此地的俄国人、和二次世界大战后离开苏联的那些人又一次激动人心的接触。大部分的信都表现了同情，并对我在书里想说的那些事表示高度的理解。其中许多人买了这本书，也看了。不带成见的读者们是按这本书的本来面目来接受它的——它是一本家史，并无作历史概括的意图。而且，他们从这个立场出发阅读了这本书以后，就理解了我为什么永远不回共产主义世界。他们祝我在这个国家幸福，谈起这里他们都是满篇热情和赞叹之词，他们希望我理解它，不要为外界不愉快的因素所吓倒，他们希望我象回老家一样。

一直到十月底我都在纽约，住在布鲁克林，在莫里斯·格林巴姆律师和他可爱的妻子的一所古老而舒适的房子里作客。房子座落在海兰林荫道的小山丘上，四周是树木，从那上面看海湾和远远的肯尼迪机场真是美妙极了。这有点像莫斯科的沃罗别依山，从那里居高临下，莫斯科全景尽收眼底。挺拔的小杨树就栽在厨房窗前和游廊前面，真象我莫斯科家里院子里面种的那些杨树……晚上当我们一块出去散步的时候，我忽然停下步来，说道："这里的景致象什么？"他们就笑我说："我们知道您要说什么！"真是没有办法，这个国家实在有太多东西象我留在俄国的那些。我也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我主观上想去求同而不是求异呢，还是事实上真的有许多类似情况？不管怎么样，每逢早晨在厨房桌子上喝咖啡、窗外杨树随风摆动的时候，我禁不住要微笑。这种相似之处实在令人高兴。没有乡愁，相反，心里更愉快，更温暖。

当然，事情不在于几株杨树。我是通过"厨房里的家庭餐桌"——我不止一次地在这种餐桌上坐过——进入美国的，家庭里那种不拘形迹、相互信赖和淳厚朴质的气氛处处皆是。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不必在美国的旅馆里过头半年，如果那样的话

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个旅游者了。而现在，我所到之处，无不让我感到象在家里一样。

在布鲁克林一所不大的房子里，主人把他家侄女——一个廿二岁的大学生——的房子让给了我。德比胖乎乎的、带着一对小酒涡的脸上以及一双柔和的褐色眸子里的表情，象我的卡佳一样：是一个善良、愉快的孩子的表情，就象随时准备要撒娇的模样。别瞧她外表象小孩，可是心可不小，和她聊什么都成。她什么都懂。我们谈到她日后要在电视或电影业工作，我和她谈起我的儿女。她是研究艺术和文学的，在希腊耽了一年，谈起这个国家她是赞叹不已。德比给我放她最喜欢的希腊唱片，我们一块儿去商店买东西。她给我剪头发，就象夏天琼恩·凯南在农场上时给我剪头发一样，她也象琼恩那样处处卫护我。

我见到她的男朋友们：两个大学生，一个希腊人，一个爱尔兰人，这年夏天他们以学生旅游者名义遍游了加拿大和美国。这里还有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姑娘，钢琴家，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受业于一位著名的教师的。傍晚过得很高兴，因为桌旁坐的是年轻人。他们的年龄和我的子女差不多，因此我和他们相处觉得非常自如，非常有意思。他们到了多少国家！我儿子呢？想获准去南斯拉夫旅游都不可得。

我此刻眼看着这几张年轻的脸，禁不住想到国界都是些蠢材杜撰出来的。对这些新的一代人，国界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到处都一样——这些人、我在莫斯科认识的那些印度大学生，如果有谁使他们聚在一起，他们会相互了解，不需语言。他们全都在睁大着眼睛看着这个世界。

他们对偏见和传统不感兴趣。他们对我的态度普普通通，既没有意味深长的话语，也不流露什么好奇。这可就太好了！

我没听见这些人说过一句有关我的过去，我的父亲，我在西方世界又将如何等俗套话。他们把我当朋友看待，坦率而自然，犹如他们对待任何一个人那样。这就是我和他们相处总是感到融洽的原因。

在南塔克特我看见了更小一些的少年——从十二岁到十六岁的。我看到他们内心纯洁、精神焕发，也看到在年轻的头脑中对严肃事物的明确看法——明确和实事求是。小女孩凯蒂有一双巧手，审美力也很强。她很会绣花，也会在骨上刻画。此外她很富有魅力。她哥哥尼古拉斯深夜给我开汽艇游玩——他想给我看看海湾，睡了觉的船只，只有孤零零的浮标灯亮着、漆黑如油的水面反映着繁星。谢谢你，尼古拉斯，这次在安睡的港口里深夜泛舟的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可知道，你带给我——一个儿女都远在天边，禁锢在一个国内的人——的快乐是多么大啊！无论是凯蒂，是尼古拉斯，还是琼恩·恩格仑德的孩子们都猜不出我在他们身边有多么幸福。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的卡佳、奥夏、莲诺奇卡以及所有的在莫斯科的他们的同辈人。语言不同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搭拉在眼睛上的额发是一样的。对刻板公式、对规章制度的不耐烦也是一样的。同样地渴望自由，同样的才华、同样的对不可战胜的真理的直觉：“你们这些大人们骗不了我们：我们什么都懂！”

我还想到了，要是我的子女来到——由于某种奇迹明天就到——南塔克特、布鲁克林、纽约时，那他们不消五分钟就会悠哉游哉，得其所哉——被放进可任凭鱼跃鸢飞的宽阔海洋里一样……

这段期间我还有过其它的会见。

我曾和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克伦斯基〔1917年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首脑〕通了电话。他正在病中，他说，他读了我

的《二十封信》，还看了我的电视采访记，在很多方面同意我的意见。这次通话时间不长，但很热情、很好。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位经历过悲惨的政治失败心灵纯正的人居然会对我本人和我的书产生兴趣。我们双方都想一见为快，互相谈谈，可是由于他在病中，这点作不到。我想到了克伦斯基可悲的遭遇，他至今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乐观主义和惊人的人的尊严，他原本可以当新生的民主俄国的总理的。临时政府比布尔什维克更能理解这个幅员广大、乱糟糟的农业国家的历史问题和需要。

十月十八日我会见了亚历山德拉·里沃夫娜·托尔斯泰〔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之女，在美定居〕。她非常可爱、非常亲切。不过她未必会理解，当我驱车前往纽约州威利农舍她家时，我一路上是何等地激动。这是我和整整一个时代的会见啊。我数次拜谒过列夫·托尔斯泰在雅斯纳雅·波梁纳的故居，我似乎对这位巨人的生活、观点和创作都很了解，他的小说我一直认为是无人能超过的俄国语言的典范，是朴素风格和形象思维的典范。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对我的意义太重大了。我前往和他尚健在的女儿会面时，如此激动，以致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当时我和她之间谈了一些什么……

中饭有俄国式红菜汤、荞麦粥、真正的裸麦黑面包、伏特加酒、还有咸鲱鱼。亚历山德拉·里沃夫娜多方帮助那些不愿返回苏联的人。她农场上的教堂的牧师是过去苏联的一位学者、化学家……最主要而且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还活着，很健旺，住在美国，她是美国公民，她已习惯于这个国家、爱上了这个国家，就象其他几百个俄国移民一样。她通过作报告，写书介绍托尔斯泰，介绍俄国，作了很多贡献。有多少次设法强邀她返回苏联，她却连来使的面都一概不见。这真是太好了。

在美国什么人见不到啊！有格鲁吉亚人和乌克兰人，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有亚美尼亚人和爱尔兰人，有塞尔维亚人和波兰人。他们在这里就象到了家一样。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克伦斯基偏爱纽约，喜欢在街头散步。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住在一个有些象雅斯纳雅·波梁纳〔托尔斯泰的故乡〕的农场里面。各有所爱。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不相认的人给我写信，谈他们的命运，他们希望我也能在这里过得很称心，就象在家里一样。“美国生活方式”就是每个外来人有充分自由按自己的口味安排其生活。其结果是形成了各种文化、各种民族的混合体，除了俄国以外，这种混合体在世界上哪儿都找不到。

这一切开始会使你头晕目眩、不知所措。纽约可以说是世界上十分独特、无法仿造的一座城市。开始给你的印象是有点不善、怪怕人的。然后当你的眼睛慢慢适应了，你开始领会它的细节。这里的人真是五花八门！各种肤色的女人们穿得花里胡梢。不过只要想一想，他们打哪儿来的，他们的祖先或者他们自己曾经从多少国家来到这里，那你就可以饶有兴味地想象得出这每一个过往行人的生活。

一开始曼哈顿把我吓坏了。格林维奇村——长头发的“嬉皮士们”游荡的街区——窄窄的小街道又脏又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和德比还上小咖啡馆来着。那里又脏、又没意思而且不舒服。空气也少，我不知道那些人在这里是怎么呼吸的。不过他们还是吸了点什么进去，只不过不是吸氧，而是吸毒罢了。这些毒品已达致命的剂量和后果。我比较喜欢那老式的布鲁克林，这地方的林荫道和公园还有点象欧洲的城市，人看起来也正常些、健康些，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国的大多数人还是正常、健康的。

“嬉皮士”只不过是浮起的沉滓，是大城市街道上的垃圾

而已。他不代表这个国家的面貌。

美国真正的面貌在小城市或是农庄，那才叫健康的外貌。这些胖胖的、使我为之惊奇的宽骨架妇女，能闹着玩儿似的一连开五、六个钟头的汽车，这些打网球的老头儿们，脸上红扑扑的孩子们和腮帮子鼓鼓的青少年，他们绝对不是吸毒犯。他们仪容整洁、衣冠楚楚，不留大胡子，没有又长又脏的卷发，没有黑不溜湫的光脚后跟。要思考和怀疑自己政府的正确性完全用不着这些。这半年来我接触到的美国人都曾大谈他们各自对本国以及本国政治的批评意见。他们的意见有时达到这样无情的地步，以致忘了自己的优点。

他们就象一群娇宠惯了的孩子，父母亲一个劲儿给他们吃巧克力，一个劲儿给他们送他们已经腻味了的礼品，他们于是就骂开了这“不懂人事”的两个老的，咒骂自己住的房子、家庭和生长的环境，可他们就忘了一样：象他们住在这所房子里所过的生活，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享受到……他们甚至还想说：“社会主义就是好！”还说“美国正以自己的方式逐渐走向社会主义”。

可是，还算万幸，他们搞错了。只要他们试着过上一年那个社会主义的生活，那种他们通过在苏联走马看花二周而喜欢得不行的社会主义生活，那他们这辈子也不会去大声疾呼要自己的国家“朝社会主义靠近”了。可能他们到那个时候心里才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象我一样——置祖国、儿女和朋友于不顾，忙不迭地躲开这个社会主义。而在这以前，遗憾的是，他们还是会一个劲儿问我：“请说一说，是什么促使您离开苏联的呢？难道您的儿女真的不能前来探亲吗？”

不要紧，不要紧，你们这么天真。这是因为你们一辈子生长在这个富有、慷慨而好客的国度里，你只能这么想。在这儿和你们一起我实在太高兴了。我已厌倦那些阴森悒郁的、疑神疑

鬼的、吓破了胆的、交头接耳的、心怀叵测、对谁也信不过、就连自己也信不过的人。我多么厌倦那些彼此间象乌眼鸡似的尔虞我诈、悲观失望、自欺欺人、不得不口是心非的东西。是的，我无条件地情愿要美国蓝眸红颊的赤子之心，而不要“普通苏联老百姓”那种体力和精神上的未老先衰，他们还在襁褓中就学会说谎，当小学生时就知道“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可是就甭和我们这些脱离俄国的人提什么近五十年来俄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至于“进步”嘛，恕我冒昧，我们知道得比别人清楚些。

关于这个“进步”真是每天连篇累牍，写了又写，因为这是俄国革命具有“周年意义之秋”* 。这真是既可笑，又可悲。我真想离开纽约躲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到一个电台和电视多半播当地内容的地方去。于是我欣然接收了前往新英格兰一个小城去作客的邀请，这个城叫布里斯托尔，位于罗得岛州。我还要到一家美国家庭作客，主人是一位在军队服役廿年的女士，现为退休上校。她一个人生活，有一所很大的房子，她将把第二层让给我。这所房子里只有我和她二人，外加她的狗和两只心爱的猫。

太好了！布里斯托尔就在海岸上，不远就是大海，是新港，是散步最好的地方。我将继续发现新大陆。请让我依我之所愿、按我之所能、凭我之所长去发现它。请勿要求也别指望我会写出什么历史政治性的文章或结论性的意见来。让我在这个国家里保持我的本色吧，这是我唯一有求于自由女神* 的。我只想在您的自由国度里给自己要求一种我通过千难万险、作出巨大牺牲后取得的东西——作一个自由人的权利。

---

* 按本书作者执笔时的1967年，正值十月革命五十周年。
* 指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象，1886年揭幕，为法国人民所赠，现作为美国的象征。

自食其果*

整个十月期间针对在美国和欧洲出版的《二十封信》的主要书评，纷纷出笼了。

人们都指望在这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前夕，从那位叛逃者那里听到异乎寻常的“克里姆林宫秘闻大揭露”。在这样的时刻，一部家庭纪事是太不足以满足要求了。这样一来，书的作者就给说成是“卫护老子的孝顺女儿”、“把什么陈年罪过都一股脑儿推给坏人贝利亚”的人。大家管我叫作“替魔鬼辩护的一位并不高明的律师”、“克里姆林宫的瞎公主”，一位深居克里姆林禁宫、既不知道国家的历史、也不知民间疾苦的人。

说真的，讲这种话的并不是所有的人。我最好的读者是妇女。在她们眼中看来，家庭和人与人的关系揭示了历史和时代，她们认为这种关系是能说明问题的。当我从读者来信中看到给她们印象最深的是我母亲和她的姐姐安娜姨妈的命运，我不由得感到庆幸……

可是更奇怪、更重要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当我执笔写《二十封信》时，我是要去摆脱对过去的记忆，去从童年的记忆里将我自己解放出来。它是一古脑儿倾泻而出的奔放的流水，我感到不能自已，事后，又感到不能加以改变或修订。我把它写出来了并且把它忘了。我觉得我已把我的过去“封存”起来，再也不想去碰它了。我只想把握现在、展望

* 标题原作“飞去来器”，这是澳洲土人制作的一种棒状抛掷器，抛出后经过复杂曲线运动仍飞回原处，故用来喻作“自食其果”或“咎由自取”。

将来，而不愿沉湎在对过去的回忆里。

可是现在突然之间，象什么时候抛出去的一个“飞去来器”〔见本章标题注〕，往事又飞回来了。我这里说出去的话又仍复从世界各国飞回到我这里来。我在《二十封信》中那轻声细语的知心话现在却变成了喧噪、刺耳的尖叫。柔声曼语经过别人在报章杂志和书评中一重复，就满不是那个味儿了。从这些信中生拉硬扯下来的片言只语听起来完全是另外一个调，虽说这的确是我本人的话，我决不想赖掉。四年前我写给我那知我最深、能体会我言外之意的朋友的话，已公诸于一个开放、咋呼、贪婪的世界，它常常是不了解、也丝毫没有想去了解我，此刻，这些话又飞了回来，声音已失真，意思也走了样……

“飞回来的飞去来器”每天敲打我，敲得我直痛。我对自己这本书想了又想。飞去来器迫使我去思考读我这本书的庞大的自由世界，迫使我去思考那我早就有心把它们忘怀的那些事。

看来要摆脱过去并非易事。它跟在你后头，亦步亦趋，要甩开它就像云影躲不开天上飞着的乌云一样。

在这个秋天的季节里，当各家报纸都在写俄国、写已满五十周年的革命、写共产主义、写列宁和斯大林的时候，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父亲身上来。可是我多么不情愿想这些啊！

• • •

在《二十封信》里我首先想谈的是我那不同于一般的、多灾多难的家庭，谈这个家庭的全体成员，谈如此悲剧式发展的相互关系。对于笔者本人来说，故事的主要中心人物并非我父亲。可是他是一个“黑圈”的圆心，凡是黑圈范围以内的都遭到毁灭或破坏；他是轴心，生活是环绕他旋转的。而我所写的家庭故事的主人翁是我的妈妈，她代表光明、创造性的起点，但

注定要死亡和毁灭，因为她无法在“黑圈”中生活下去……随着她的惨死，家庭离散，光明趋于毁灭，黑暗逐渐占了统治地位。父亲和从前一样，仍然是这个黑暗的中心，他已经把骨肉、亲人都赶走、害死了，孑然一身留在这个黑暗的真空里。

我笔下的父亲是我在家庭里、在家时看到的他的模样。孩子、佣人和亲戚都看到而且了解到他的为人和缺点，他的内心矛盾以及与此并存的有限的直率和一条道走到黑的禀性。他天生的这些素质正是他日后政治发迹史和个人发迹史的经线。那些只能从外部观察他的人，却只看到外部的历史传记，看到一大堆无法解释的史料，从而使许多人得出结论：此人精神不正常，这可由他当权时可怕的后果来“证实”。

把所有一切归于精神失常是容易解释，也好解释的，但是这样作不是实事求是，也不成其为解释。

还在苏联的时候，特别是在父亲死后，我曾多次想到父亲的问题，还有日后在国外，当我读到我过去不知道的、常是可信、有时又荒谬的东西时，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想起父亲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很明确，那就是要解释这些问题必须从天生的、实际上和心理上的根本去找原因，在具体的情况下，这些东西日后还必须和他的自觉意向联系起来看。总之都一样，我从未想起要“解释”父亲所有行为的动机，因为我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心理天才，他能“钻进”人家的心里，从“内部细心察看他的灵魂”。

说老实话，我还真不想从“内部细心察看”这个残忍的灵魂；我不想去看。

不过我看到，自由世界对斯大林的私生活极感兴趣，我也明白，《二十封信》不可能完全满足这种兴趣。在那本书里他的形象描写得并不完整。因此现在我甘冒某些地方重复之嫌，想

稍多地触及他的本性和他不寻常的生活经历。可能这能有助于仍然因他虚假“成就”的假伟大而障目的人们看透这一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可能澄清某些由于不了解情况而产生的错误说法。

总的说来，父亲的健康情况是非常好的。他七十三岁上由于动脉硬化和高血压以致中风，不过他的心、肺、肝的情况都极佳。他过去常说，他年轻时得过肺病、消化不良、很早牙齿就脱落、儿童时代伤残的一只手常常作痛。不过，总的说来他还是健康的。西伯利亚的干寒气候对这个南方人来说并不难适应*，他下半生身体反倒好了。怎么也不能称他是神经衰弱患者，相反，他倒有天生的很强的自制力。

他既不急躁，也不开朗；既不易于激动，也不多情；换言之，他欠缺一切标志着典型的格鲁吉亚性格的特征。格鲁吉亚人好冲动，心眼实在，动不动就流泪——由于感动、由于高兴、由于对美感到的狂喜心情。美感、音乐、诗歌、雕塑在他们的生活中起巨大作用。对漂亮的女人他们一见就欣喜若狂；为女士效劳是他们一大乐事。他们认为对家庭、对朋友、甚至对友人的亲属忠心耿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爱护幼者，特别是儿子，尊敬长者，敬畏死者。哪儿都没有象在格鲁吉亚搞的埋人饭〔指葬后举行的宴会〕那么丰盛：一条街上的人都足吃足喝，为的是要大伙儿都记得死人生前的好处，以后每年忌辰都要在坟边上喝酒。格鲁吉亚人的好客和不分生熟这一点在世界上是无出其右的：家门大开，赤诚相待，客人请进，咱们一回生，二回熟……

* 按斯大林于1903年曾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伊尔库次克州乡村。

披肝沥胆、赤诚相见这种格鲁吉亚人的本色使我父亲十分生气。“傻瓜！格鲁吉亚人全是些傻瓜！”他生气地说。这是在一九五二年他访问格鲁吉亚、那里的人整个村子上街迎接时他说这番话的。他没法让自己同这些真心实意的农民说心里话——可能，他怕这些事。他没有接受他们的吃喝、他们的敬意和问候，他把汽车一掉头，便扬长而去了。

最典型、最十足的格鲁吉亚人是格·奥尔忠尼启则、亚·叶努启泽*、亚·斯瓦尼泽——他们具有上述各种品质。可我父亲不是这样。他恰好相反，年复一年，他的工于心计、城府很深、清醒而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的品性反倒日见牢固了。

有时他和我谈起他的童年。在一个一家之主嗜酒成癖的、半文盲的贫穷家庭里，打架、相骂原本是常事。妈妈打儿子，丈夫又揍她。可是儿子爱娘，处处卫护她，有一天还将一把刀子朝老子身上扔了过去。老子于是大喊大叫去赶儿子，邻居把儿子藏了起来。父母双方都是农民，老子最大的能耐是在工场里当一名靴匠。妈妈的幻想和野心要大一些：她想让独子当神甫，这样她就可以从底层往上冒。她真心实意信神，很早就守寡，不停地干活，为的是让儿子受教育。

儿子是个普通的乡下小子：打架哪、干缺德事哪，什么都来。有一天他在房顶上把砖头从烟囱里往下扔到灶里，结果把别人吓坏了，还烫了人。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算术，后来就是数学。还会画点画。希腊文一直到老还记得。

儿子的野心、想往上爬、想出人头地这些东西看来是从他妈那儿来的。可能因为如此，他成了哥里城教会学校里最拔尖

---

* 1877——1937年。党内化名“金鱼”。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1934年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译延基泽。

的学生之一。可到了第比利斯中等学校时，他已经不是优等生了，于是他便中途辍学。教会学校教育是我父亲受的唯一系统化的教育。

我深信，我父亲总共上了十年以上的学。教会学校对父亲性格产生了终身的影响，加强和巩固了他天生的本性。

他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宗教感情。没完没了的祷告、强制的宗教教育只会对这位一分钟也没信过灵性和神的年轻人产生相反的效果：一种对"上天"、对"至高无上的神"所抱的极端怀疑主义。这种结果导致极端唯物主义以及因为对生活所持的"现实的"、"清醒的"、讲求实际的和降格以求的看法所带来的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他发扬的不是本身的"性灵经历"，而是另外一种东西：深得虚伪、假道学、两面派的三昧，这几种貌似信神、而实际上并不信神的不少宗教界人士所具有的特点……由于这位小青年的灵魂不洁，而像他不识字的母亲的那种真诚宗教感在他身上又告缺如，于是，他年方十九便是干另外一种"行当"的好苗子了，这一点却是他老娘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就是带着这样的"精神准备"参加外高加索的革命运动的：他既不象阿利卢耶夫家外公外婆那样对美好未来怀着理想和憧憬，也不是象高尔基那样，用浪漫主义的夸张笔法歌颂未来的革命和自由、以大喜若狂的心情参加革命，更不是以受过欧洲教育的理论家身份，象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那样进入革命行列的。大写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并未对这位看透世事、对生活持实用主义观点的青年产生什么巨大影响。他选择了革命者的道路是因为他对自己当时所处的社会憋了一股气，因他自己属于这个社会的下下层，而且还得终老于斯。他人穷心可不小，对于他，除了革命别无它途。

他信仰的不是理想，而是芸芸众生之间的现实政治斗争。

和人相处他绝不来半点浪漫主义：有能力强的人，这种人有用；有与自己不相上下的人，这种人碍事；还有些没有能耐的人，这种人委实多余。从他本人上中学时的经验中他得出一个结论：大都是偏狭粗野的，以欺骗自己管辖的教徒的手法来把别人捏在自己手里；他们机关算尽，欺世盗名，而通常弱点很多，好人难挑得出几个。

除了这条基本的处世哲学以外，他还有一股穷人身上的人穷志不穷的傲气，这股气一上来连挡道的山都搬得动；此外，他还有一股穷人的巨大耐性，从童年时代就知道，要过上一个美好的节日先得多干活。他更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为达目的必须不择手段这一箴言要比任何崇高理想给他带来大得多的实际好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政变的日子里，他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普普通通的组织者，可是到了六十，他就得到了一个格鲁吉亚穷小子所向往的一切：他独个儿统治着俄国，全世界都知道他。

可是，曾活到他光宗耀祖之日的她的母亲死前曾对他说："唉，真可惜，你没有当神甫！"她的梦想未能实现。可能，这位村妪觉得自己的儿子并非有神助，而是另外有人扶持……她自己仍是不改当年本色：诚实、清贫、信神。

父亲的内心和他离开中学时没有两样。他在性格方面没有掺进什么新的东西，而只是将原有的品质发展到最大程度罢了。从最初的时期起，在他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政治，政治的那种变幻莫测、残酷、狠毒的游戏。政治把他身上一切凡人的其它需求排在最后，他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对手和敌人一个个消灭殆尽。国家和党承认他的独一无二的至高权力。万马齐喑，似乎一切都服服贴贴。甚至苏联国境以外也向他焚香礼拜。按道理他本应福星高照、颐养天年、泽被众生的……然而他竟不

能。他并未以所获者为乐。他心灵空虚，忘记了世上尚有人伦之爱；他为恐惧所苦，这种恐惧在他的晚年竟变成真正的迫害狂——临到末了钢铁神经也顶不住了。这种迫害狂并非病态幻想，因他早就知道别人恨他，也知道人家干嘛要恨他。最后，权力、荣耀和对人生、对人们的半麻痹的意识使他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于是，在他弥留之际，他尽其所能地投给众人的是充满恐怖和仇恨的一瞥，以及表示威胁的手势。*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六十多岁了。当我刚达成年，他已进入七十的暮年。我能观察的只是他一生经历中的顶点。那时，那些熟悉他、真正了解他的人几乎都已不在了。在他死后，我的姨妈和舅妈从监狱回来，从她们回忆往昔的"狱中纪实"中，有很多事情得到了说明，这时谁都敢说话了。我从各种渠道听到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可怕，一个比一个更令人难以置信。

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神话是怎么编造出来的。正象我上面提到的，我的哥哥瓦西里于一九六二年死于酒精中毒，可是许多糊涂人却按自已的设想来想象我们的家庭生活，他们不相信他已死了。他们坚持认为：瓦西里去了中国，在那里指挥空军。我说的话谁也不信。甚至参加了他葬礼的他的亲生儿女也都说：您算了吧，**我们全知道**。棺材里躺的是别人。我们知道，"您不能吐露真情的。"

对我父亲的事也是这样。那种关于他杀了我母亲的说法很多人认为比我母亲自杀的真情更为可信，到现在他们也硬是不信。是他本身的存在驱使我母亲走上自杀的道路。她在那一刻抗不住了。要是她当时能在那极度紧张的时刻挺过来，也许她

---

* 参见本书作者写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

能事后鼓起勇气离开他，这是她曾不止一次地想要做的。是他驱使她去走极端，不用说，他是她的间接的杀害者。他从来是“借刀”杀人，过去，他借行刑者之手处决了千百万人，也就是这么干的。他只是掉过脸去，至于这些人如何死的，他早就置诸脑后了。

许多人认为他可能是一个粗暴的、生理方面的大怪物这一点较为可信，其实，他是一个道德上、灵魂方面的大怪物。这第二种情况更为可怕。可是这一点恰好是真的。

还在苏联的时候，我就听到各种故事，说到我父亲曾经在“短暂的精神失常时杀人”。比方说，有人硬要我证实一件不可信的故事：有一个冬天，斯大林从别墅中出来散步，忽然看见雪地上有脚印。他把警卫员叫来，问他这是谁的脚印。警卫员不知道，因他也才看见。于是斯大林当场掏出手枪将警卫员撂倒在地，他说此人“警卫工作没有干好”。无论我怎么解释说这不是我父亲的脾气所能干出来的事，可人家怎么也不相信我，相反，倒反而想说服我相信他们说的。

我父亲当然也会发火，还暴跳如雷，会说粗话。有一次气头上他还给了我两记耳光，瓦西里还是个毛孩子的时候就挨过他的拳头。他的脾气就是上来那阵子，发完就拉倒。瓦西里可是比他要蛮不讲理得多：他先后几个老婆都挨过他的揍，就象乡下的庄稼汉那样。他能下手打副官、司机、下级，甚至打大街上的警察。他什么都靠拳头解决问题。当时，他每回都得到原谅。后来这些都成了罪证。但我父亲的粗暴主要在一张嘴上。

我曾见过他有一次大发雷霆，双手抓起电话机朝墙上摔过去：原因是他要通话，可电话老占线。我的保姆告诉我，有一次父亲把一只烧鸡从克里姆林宫我家的气窗口扔出去。这还是

实行配给制的年代，因为一九二九或一九三〇年时正逢国内大饥荒。* 妈妈准备晚饭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这只鸡，可是他却吃腻了这样的“饭菜”。保姆一辈子都没想通，干嘛“把这样好的东西拿来扔掉”。这是急躁、暴怒的例证，但决不是什么短暂的精神失常。比起奥赛罗**的急躁和热烈爱情来，我父亲可是个过份冷静型的人物。

纯属个人感情和相互关系的范畴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极其有限。他把自己整个地置于政治感情和利益之下，可以说周身细胞无不渗透，至于人活在世上所需要的其他一切，在他心目中占不到什么地盘。

他领略过的、打从孩提时代就存在记忆中的温暖和爱心，都体现在他母亲身上，他这一辈子以自己的方式爱她、尊敬她。可是在心灵上和地理上他和她相距如此之远，他不会也不知道如何使这片孝心变得更实际，使她可以领情。由于母子二人相距遥远，这片人子之情始终未能到达慈母心中。她曾经用自己的双肩将他掮起，领他上了正道，在那种条件下倾其一切所有供儿子上学。她给别人洗衣裳，因她别无他长，也不知还有什么别的可做。我并不认为他以后曾或多或少报答过老母的劬劳养育之恩。我母亲曾劝说她住到莫斯科来，和我们一起过，可是她不干。她一辈子没离开过格鲁吉亚，除了第比利斯以外，她没有到过其他城市。在她的晚年格鲁吉亚政府设法让她住到第比利斯来，保证了她的最低标准的生活。他们让她住进

---

* 这就是在克里姆林宫内那座小住宅。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作家，共产党员，曾在那里采访过我父亲并且描写过一番。

** 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酷爱其妻但又因怀疑其妻不贞而将其杀死。

了过去的总督府，给了她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间，可能是过去的衣帽间，她就睡在一张小铁床上。外国记者在这里访问过她。画家伊·布洛德斯基给她画了一张极好的铅笔画象。一个年轻的格鲁吉亚女人、戏剧研究家曾告诉我："我小的时候常上她那儿去聊天。这位老太太和谁都聊得起来。她十分尊严，也极有天赋。和她一起挺有意思……"

她不时地把亲手做的核桃酱寄到莫斯科来给自己的儿子。有一次她还给儿子寄了一床用高加索轻软的羊毛制成的毛毯，也是她亲手做的。他能报答她什么呢？他不知道怎么报答，也不会。

他曾经爱慕过的或喜爱过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和他母亲有关连的。他的第一个妻子和他母亲同名，也叫叶卡捷琳娜。他母亲看中了这位美貌安详的妇女，由于她的坚持，两个人是在教堂结的婚。母亲并不是唯一的安排这次婚礼的人。他的新娘子是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亚力山大·斯瓦尼泽的姐妹，而婚礼和别的家庭喜庆一样都可被用来作为地下党员会面的场合。父亲婚后没多久就离开了，后来又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年轻的妻子很快就亡故，遗下一名独子雅沙，这个孩子继承了母亲平和的性格。是他的姨姨和舅妈把他拉扯大的。我父亲把他完全忘了，所以当他突然来到莫斯科时，父亲挺生气，于是照顾他的责任便由我母亲和阿利卢耶夫全家承担起来。

看来，和我母亲的结合也是他出于自己方便的考虑。他和阿利卢耶夫一家是廿年的老交情了。这都是他忠诚的至交，关心他，在他流放的时候给他往西伯利亚寄包裹。奥莉加·阿利卢耶娃，亦即他日后的岳母，对他体贴温情，也许这使他想起了自己母亲的爱怜。可是奥莉加对闺女的婚事感到不乐，她曾想方设法说服我母亲不干，而且迳直骂她是"傻瓜"。奥莉

加·叶芙吉妮耶芙娜自己尝够了和革命家一起过日子的滋味，认为她的一生给“毁坏”了。她内心一直不同意我母亲的婚事，总觉得闺女受了委屈，而且认为妈妈的自杀就是“这件傻事”的报应。

我父亲的家庭生活就是和我妈一起过的那十四年，可是他啥事也不闻不问，在这一段期间（一九一八到一九三二年）内，他正埋头致力于党内斗争和抢权的复杂过程中。这个家是母亲撑起来的，她是友谊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心人物：这是她的天性——创造、助人为乐、古道热肠。所有的亲人——斯瓦尼泽家和阿利卢耶夫家——都围绕在她身边。父亲党内的老同事都喜欢她，她还为我们这些孩子安排了有趣的生活。父亲把这一切看成理所应当。他首先是把她当成忠实的朋友，因为忠实的朋友他是需要的。他不理解、也没意识到，她是一个年轻的、有思想的活人，她需要独立自主，她有她自已的见解。她和他争吵，顶他，她认为自己和他是平等的，这一点和他那种对妇女、对老婆的纯东方式概念是大相径庭的。故此他十分生气。只有她死了以后他才充分意识到她的独立自主性、她的抗议、她对他的挑战，这更促使他变得更残忍。他不愿有人和他平起平坐，因为这种人会和他争吵，会碍他的事，顶撞他。他要的是愚忠愚孝，绝对服从。

当我还是个孩子、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很爱我，我是他的顺心丸。“你真象我妈，真可笑！她也是红头发、一脸雀斑！”他常这么说，可能这一点是他舐犊情深的唯一出发点。小时候我享受到最大的抚爱，凡他能给予的爱他都给了。后来，当我发现了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时，他就对我冷淡了。一九三八年他送了我一册《苏联党史简明教程》，这是第一版，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叫我读。可我当时就是不想看这本书，因为

实在太枯燥无味了。他知道以后特别生气。他想叫我专门攻读党史。

就在同一时间，有人劝我在他生日送他一张我自己签了名的照片。他的反应使人人奇怪：父亲把照片退还给了我，还加上一封气冲冲的信："一副傲慢的咀脸。"他用蓝铅笔写的瘦削字体这样写道："你从前的谦虚谨慎的表情更逗人喜欢些。"照片上是一个系红领巾的小女孩，张着嘴嘻嘻笑，这一点使他感到是一种挑战，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他一见就象触了电，故此称之为"傲慢"。他喜欢的是低眉顺眼、驯服恭敬——他管那种表情叫"谦虚"。

他何止一次谈起这种谦虚！他常说"谦虚是布尔什维克的美德"。他希望所有的人都低眉顺眼、默不作声地听他的话。

他最不喜欢别人自己有主见，因此，我醉心文学、我选择的朋友以及我的第一次结婚都使他十分震怒。他要我和高尔基的孙男孙女交朋友，不喜欢我和学校里一些无名气的女学生厮混在一起。高尔基的大孙女一直是我的女朋友之一，在我们同学时她常到我家别墅来玩，夏天她和我一起到索契度假，那时我俩同班。可是我和别的女孩子更谈得来，到大学时我的朋友完全是另外一批人了。我第一个丈夫是犹太人，他很生气，因为他希望我嫁给日丹诺夫的儿子。五年之后，安·安·日丹诺夫已经去世，死前已失去父亲的欢心，因此父亲对这次联姻也不大感兴趣，可是两年以后，当我离开日丹诺夫家时，他又生气了，他认为这种行为是任性。

当学生时我成绩很好，这赢得了父亲的欢心。他一天到晚骂我哥哥不学无术。但等我们长大以后，他的态度就变了。战争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要是对瓦西卡说，'瓦西卡，往火里跳！'他会不假思索地就跳进火里。而你呢，你就不是

这样。你就要思考一下。哼，瞧你这个外交家！尽转脑子，从不痛痛快快地回答问题！”

他倒是没说错：我哥哥倒真的是这么一个人，只要父亲一开口，他的确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父亲需要的就是这个。含有贬意的称呼“外交家”再加上那种含有贬意的所谓“转脑子”的说法，其实就是他心目中“不合妇人之道”的代称，他最不希望看到我身上有这种品质。

其实，他也没看出我哥哥身上有什么能耐，他只会随时坚决执行他的命令。一般讲来，他对两个儿子都是比较冷淡和疏远的。他对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舐犊之情。看来，他对儿子们很失望，就象日后对我一样：我们谁也没有继承他的事业。雅沙为人忠厚，寡言少语，没有野心，父亲因此认定他没有出息，特别是因为雅沙虽然寡言少语，但他并不那么驯服，也决不会去“往火里跳”。

至于雅沙在战争期间当了俘虏这件事，父亲认为这是在全世界面前给他“丢人现眼”。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这件事在苏联始终秘而不宣，虽说全世界的新闻界都报导了这件事。当外国记者正式问及他这件事时，父亲回答说：“……希特勒的俘虏营里没有俄国俘虏，只有俄国叛徒，战争结束后我们就要收拾他们。”问到雅沙时他回答说：“我没有一个叫雅可夫的儿子。”

根据雅沙当时在萨克森豪森战俘营的难友汤玛斯·库申的证词，当雅沙在为囚犯播送的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大为震动。许多人的证词都说明，雅沙被俘后的表现是不辱没他的军官身份的，他捍卫了祖国和它的军队的正义事业。可是在这一天他想寻短见，他扑在通了电流的铁丝网上，就这样死去了。

这种说法较之别的说法更令我相信。详细情况和细节没有

意义：不用说，雅沙对那次广播是感到很寒心的。另外一点，由于他深知父亲为人，他马上就能知道，这不是宣传界的想象，而的确出于父亲之口……

我哥哥瓦西里在大战期间开头在空军参谋总部服役，到一九四三年春天就指挥一个航空团，然后是一个师，后来就指挥西线一个军团。他的官运亨通有如直线上升，不同一般。战后他的军团驻扎在离柏林不远的地方，在占领军中服役，他感到腻味，于是便在一九四七年七月飞回莫斯科，以便“安排”自己调到首都。由于贝利亚、布尔加宁这号保护人从旁襄助，他居然如愿以偿。元帅们和将军们都惧怕他，因为他们知道，亚·诺维柯夫元帅* 就是他“搞”走的，因为诺维柯夫元帅对他很严厉，于是这位元帅便进了监狱。这位经过父亲首肯而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的瓦西里，竟不惜去占用诺维柯夫空出来的别墅，他把家眷和抢来的财产从德国运到了这所别墅里。我曾和他一起坐飞机到德国去待过十天，去探望他刚生了个女孩的妻子，然后又随原“专机”返回，里面都是他为自己别墅搞的“战利品”。

那是我初次欧洲之行，印象是极不愉快的。我坐汽车用一个星期游历了瓦尔内明德、罗斯托克，经过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到耶拿和魏玛，所到之处，满目疮痍和吓破了胆的、沉默的人。在库里茨我哥哥驻扎的这个小地方，有一所自行车工场过去的主人的房子，从它可以看出希特勒德国时代生活水平之高……

瓦西里调到了莫斯科，有一段时间父亲挺满意，因为人家

---

* 苏联将军，1900年生，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后曾担任空军主帅、远东空军司令等职。1956年因病退役。

夸他儿子“非常能干”。可是没过多久他才弄清楚，酒精中毒已毁了这位卅岁的将军，他于是不得不在一九五二年亲自将他从这重要军事职位上撤下来。这两个儿子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没有一个给他争光的。

他对八个孙子也没有多大兴趣。有一阵子他爱和小孙子一起玩。可是这会儿他把所有的亲人都推开，亲人也再不对他感兴趣。瓦西里知道，他的孩子挺害怕，可能会吓得大哭，因此他从未带他们去见爷爷。我的孩子和雅沙的女儿，父亲见过他们不过一二次，很满意，因为小家伙们总是高高兴兴，表现挺好。对他来说，有这两次见面很够了——对陌生人的孩子他也不过就是这样。

年轻时他有一阵喜爱捕鱼、打猎，喜欢狗。在西伯利亚流放时他养了一条狗叫“吉希卡”或“吉洪·斯捷潘诺维奇”，他爱带着它去大森林打猎，或是就这么样和它说话。他有时还会想起这位“吉洪·斯捷潘诺维奇”来。可是这会儿他已不愿在家养动物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失去与人热情相处或眷恋谁的能力。他也许会归咎于别人——其中包括我很少去探望他，可是他决不会承认，甚至不会内心承认，这种空虚寂寞是他亲手造成的。临到末了他周围只剩一些噤若寒蝉的、“忠实的”、害怕得两眼发滞的契卡们和那些随时准备“不假思索就跳进火里”去的“谦虚的”同谋者们……

政治考虑取代了他对人的感情。他懂得并且感觉得到什么是政治竞技，它的声音、色调，它的细微变化和差别，他对此可算是全神贯注。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全力以赴的就是抢权，抓住它不松手，是巩固自己在党内和在国内的权力，那么，除此而外的一切东西都要退居次要地位。

我认为，我母亲的死，把他心灵里仅有的一点点人类温情

也带走了。他把我母亲之死看作是对自己的背叛。他现在自由了，再没有人来使他变得温和些，使他感到掣肘和约束了。这会儿他愈加坚定了对人们所抱的多疑、不善的看法，这对于他那本来就不算多情的本性来说，原是很自然的事。

我不认为在妈妈和他共同生活的那十四年的岁月里，他曾经放弃过这种看法，可是，她死后，他对人们的看法就不加掩饰地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这一点是大家都领教过的。基洛夫被暗杀，对以前反对派的迫害，对党内和革命老同志的审讯和处决，对数百万与党内斗争无关的人们的逮捕。一九三七年父亲竟不惜杀害自己的亲属：斯瓦尼泽一家三口、雷登斯、叶努启泽（我母亲的教父）。一旦他怀疑这些人对他本人不忠，这些人的处境就比不相干的人更危险。对亲戚他更不宽容。

一九四八年我姨妈以及舅妈的遭遇也是这样。他认为她们有损于他是因为她们"知道得太多也说的太多"了。怎么也阻挡不住他要逮捕这两个历尽辛酸、健康堪虞的老年寡妇。不用说，关于这两位最了解我家里发生的一切、知道妈妈自杀的细节、知道她的遗书的这些事，我父亲是记得一清二楚的。看来，他也没忘记在战争初期，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他曾和叶芙吉妮亚·阿利卢耶娃谈过话，建议她带着孩子疏散到乌拉尔去。后来她和我谈起当时的这番谈话。

她说："我从来没见过约瑟夫这样灰心丧气、六神无主的。我上他那儿去原想他能帮我一把，给我鼓鼓气。那时诺夫哥罗德刚丢给德国鬼子，我是在那个城里生长的，所以心里非常慌。当我看到他也是这副慌张得和我不相上下的模样，我更是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他说道：'事情非常、非常糟糕！赶紧去吧，疏散吧。不能再待在莫斯科了……'我心乱如麻，心想，这下可真完了。"

他记得这件事，不愿让别人知道。因此叶芙吉妮亚·阿利卢耶娃被判了十年单独监禁，就这样关了六年，直到父亲死了才获释放。是的，我的姨妈和舅妈倾向于把一家屡遭缧绁之灾的罪责归之于贝利亚。她们俩都坚持这种意见，认为贝利亚是挟嫌报复,因为还在格鲁吉亚时这个人就与斯瓦尼泽、雷登斯、以及所有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都有隙，因为这批人害他当不上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叶芙吉妮亚·阿利卢耶娃说，贝利亚是饶不了她曾对他进行了人身侮辱的。她从来说话尖刻，一次当着我父亲和大伙儿的面狠狠地嘲笑了贝利亚好色成性。贝利亚当时狼狈不堪，大家都笑了，而贝利亚却记住了……

不用说，远在一九三八年贝利亚开始掌管莫斯科秘密警察大权之前，就和我家特别熟了。而且一有机会他就火上添油，给父亲提供一些捏造的“材料”，陷害他所不喜欢的那些人。不过，话又说回来，除了父亲本人之外，谁也不能批准象枪毙雷登斯、斯瓦尼泽，逮捕其他亲属这些事。贝利亚还没有这种权力。

在恐怖和秘密审判的制度下，象雅果达、叶若夫、阿格拉诺夫以及贝利亚这些人，对父亲说来是十分需要的，他真可说是知人善任。否则苏维埃国家就没有安全感，列宁为此而有捷尔任斯基。没有契卡工作人员就不可能实现集体化，就不能镇压反对派。对外政策离了他们也不行：因为除了大使之外还有秘密特使。其实,这些头目们的结局终不免被处决,因为他们实际上“知道得太多”。雅果达、叶若夫、阿格拉诺夫（他直接卷入了基洛夫被刺事件）就是这样被干掉的。贝利亚奇迹般地得以幸免，因为他太狡猾了，他能利用父亲的弱点，千方百计地拍他的马屁。这一点十分管用。雅果达反对集体化时代的普

行，为此他连命都送掉了。

贝利亚知道得很清楚，他的性命是危如累卵，随时都可能有危险。他主持了一九四八年的连坐大逮捕、“列宁格勒案件”，主持了对“世界主义者”、对医生、对过去的战俘、对逃出包围圈的军事小分队、对军队中的自由思想者、对外国共产党的迫害与镇压。他执行了整批的少数民族的迁徙和流放，诸如波沃尔什的日耳曼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保加利亚人、卡莱姆人、车臣—印古什人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人。他“知道得太多”，因此大家都看到，父亲死时，他无法掩盖他的高兴。

不过他还是给新政府匆促处决了。和他一起遭处决的还有他的助手柯布洛夫、梅尔库洛夫、杰康诺佐夫以及稍后一些时候处决的阿巴库莫夫。这都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会干的事儿也太多，生怕他又驾轻就熟地用这些手段来对付新的领导人。全部档案都在他手里。

对贝利亚的“审讯”也是演的一场戏：也是采取匆忙、秘密、没有证据、不遵守法律程序的方式进行的，就象贝利亚本人在掌握秘密警察大权的十五年期间所进行的审讯和判决一模一样。根据苏军外科主任医生亚·亚·维希涅夫斯基将军的证词，贝利亚被捕后在莫斯科军区参谋部的地下室里关了几天，“宣判”后十分钟就在那里枪决了。

看来似乎父亲相当倚重贝利亚，事事托付给他，但是这一点谁也不能十分肯定地说……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一九四一年六月战争初期父亲所说的一番话使我为之一怔。我在贝利亚的妻子的别墅里作客，父亲对我和她之间的友谊从来是很赞成的。他们留我住一夜。第二天早上父亲忽然怒气冲冲地给我打电话来，用最不堪入耳的话骂我，他使劲在电话里嚷道：“你

还不给我快回家来！这个贝利亚我信不过！”我稀里糊涂地就这样回了家。后来我再也没有听见父亲提起这件事。在这以后的十年我和贝利亚的妻子和儿子都处得不错，他们和贝利亚不一样，是很招人喜欢的人。可是父亲从来不会对任何人绝对放心，即便这些人对他唯唯诺诺、百依百顺，这是他的本性。他同秘密警察头子们一起、并通过他们之手干的丧尽天良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这些事使他寝不安席。

父亲待人异常跋扈，在对别人和党的政治要求上他是从无转圜余地的。布哈林曾有一次称他为“天才的药剂师”①。我不知道布哈林本人受到谴责和被处决这件事究竟是对这个定义的赞同还是反驳，因为这超过了任何的“服用剂量”……布哈林是一个耐心、灵活而心细的政治家，他觉得父亲会让步的，党会使父亲服从自己的多数的。而现实生活却适得其反，简直是一场十分恐怖的惨剧！

和布哈林的主张不同的是，父亲不赞成社会主义逐步与农民接近，他选择了更合乎他本性的手段：通过暴力来个大转变、消灭富裕农民的整个社团、施行迫害及镇压。我认为他性格中的这种不调和性、缺乏灵活性、那种听不得不同意见、何况显然还是正确的意见的特点是来自他在中学里读书那段经历，那里给学生灌输的都是狂热和偏执。同时，这种偏执也和他没有受到适当的教育有关系，他在日后也始终未能补充自己教育方面的不足。

就这样他从来没有领略过欧洲式的民主文明，也未领略过传统的自由思想。十九世纪格鲁吉亚自由化的贵族，他们通过法语接受了西欧式的教育，他们与普希金及十二月党人颇为接

①见鲍里斯·尼柯拉耶夫斯基所著：《权力与苏联上层》。

近，是具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二十世纪的“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创立的却是这样一种政权，它依靠的不是社会上受教育阶层的进步要求，而是千百万人的落后和无知，这些人多少世纪来一直与西欧民主隔绝，盲目相信沙皇老子的圣明，对“操蛮夷之语者”持不信任态度。

父亲深知这对他只会有帮助，他知道在俄国那些受教育的先进知识份子既撑不了他的腰，也帮不了忙。他不是这些人中间的一员，他们也不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可是那些一直把他当成“自己人”的是些什么人呢？是一些半文盲、半愚昧的农民和工人，是他的政权使这些人有机会成为工程师、党的官僚、将军、部长、（只会说俄语的）大使，是一些象苏斯洛夫那样年轻时“放过牛”、现在在党中央里面主事的人。这些人真的相信，那些被处决了的社会革命党人、被流放出国的托洛茨基、被消灭了的反对派、被枪决了的元帅们确实是“帝国主义的雇佣者”，相信十月革命果真是列宁和斯大林两人一起组织的，相信“斯大林引导着我们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

在苏联，斯大林主义并非人人都反感，父亲死的那天固然有人拍手称快，可也有人发自真情地哀哭。我曾亲眼看到罗柯索夫斯基元帅* 抚棺恸哭，连军大衣上都沾满泪痕。可是陶里亚蒂却四平八稳地坐在那里，不为所动。

“大清洗”所产生的群众性心理变态——孩子们对被捕的母亲掉头不顾而去；学生们“大抓间谍”——这是建立在无知之上的心理答案。启蒙学家和百科全书派学者歌德曾经说过，

---

* 1896—1968年。苏军事将领、元帅。原籍波兰。曾参加卫国战争期间各次重大战役，1946年返波当国防部长。1956年仍回苏联，曾任苏国防部副部长，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死后葬于红场克里姆林宫墙。

无知是最大的祸害。无知一旦当权，就会鼓励无知，依靠无知，就会产生希特勒主义、斯大林主义这样的历史怪物……

二十年代俄国拥有党内受过良好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者、外交家、自由化的艺术、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新经济政策）和自由化的农民阶级。俄国有意欧化，想学民主。我决没有意思要将二十年代理想化，贬低三十年代……可是在二十年代这个国家还未被隔断，仍想面向世界，并从外界引进文明的果实。随着"斯大林主义时代"的到来，国家就沉溺在"自己的"、"本民族的"之类的沙文主义的"夜郎自大"声中，一切"西方影响"均宣布为危险的和有害的。

父亲只是在技术知识方面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凡有关工业化和军备的事他都感兴趣，他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有关拖拉机、坦克、飞机、大炮、汽车的必要知识他都具备，他提出的一些专业性问题和掌握的专业性材料曾使一些部长、设计师、外国将军叫绝。在这方面表现了他的"清醒"态度。可是在现代史、哲学、现代社会思想方面他从来没有学到任何知识，一直到死都是个教条主义者，从本质看来，是一个落伍的人。

有一天他差点儿自己都承认这件事了。这是在三十年代早期，在马·高尔基的莫斯科寓所里。那时父亲想借重高尔基以赢得诸位作家们的好感。客人中有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作家们、学者们，都是高尔基家里的常客。他们坐在桌旁，讨论一些科学上的最新发明，当问起父亲的意见时，他说："咳，你们知道，在这些事上，我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就用这种方式避开直接作答。当时的气氛是无拘无束的，大家喝

* 1883——1945年，俄国一苏联作家，著名的作品有《苦难的历程》三部曲，1946年追授斯大林奖金。

着酒，年轻的物理学家、阿·托尔斯泰的继子费·费·沃里肯施泰因忽然冒出了一句俏皮的双关语："为落后的斯大林干杯！"在座的人一下子都楞住了。不过父亲"吞下"了这句玩笑话，举起了酒杯，并为此而干杯。

他从中学起就积累了一些有关语言的知识，他那时曾研究过拉丁文和希腊文。他能看格鲁吉亚文的书，可是他总说他忘得差不多了。他对俄语的口语简单形式掌握得很好，但他不是一个雄辩的演说家或是作家，他掌握的同义词、语言细微色彩及深度还嫌不够。他能借助字典看懂普通的德文。他认为有了这些就足以在一九五〇年加入在语言学理论方面的争辩、并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谴责世界有名的语言学家马尔的学派了。* 这恰好给了马尔的敌人以可乘之机，因为他们的后台是"英明领袖"。孟德尔—摩根遗传理论也是这样的下场。当时因为父亲支持特·李森科，被这位沽名钓誉者的伪"求实精神"哄得迷迷糊糊。这个人也巧妙地利用了父亲对"实践"的偏爱。我还记得，当时在党中央科学部工作的尤里·日丹诺夫曾在一九四八年反对过李森科的意见，父亲马上就出来卫护李森科。"现在遗传学彻底完蛋了，"尤里当时这么说。为服从党纪，尤里·日丹诺夫不得不"认错"并且给斯大林写了悔过信，这封信就发表在《真理报》上。与此同时还责成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从理论上击溃染色体理论……

父亲擅长将事物简化，归之于实践，归之于"妇孺皆知"。这并不是一个人有了大量知识积累和修养之后，经过精炼提纯而得出来的深入浅出的结论；也不是那些学富五车的人在付出

---

* 按此处指斯大林于一九五〇年发表的那篇《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马尔：1864——1934年。苏联语言学家、科学院院士、高加索语言研究者。

了巨大而复杂的脑力劳动之后达到的举一反三的境界。这是一个对生活、对科学、对艺术复杂的多样性不甚了了也不求甚解的人的快刀斩乱麻的办法。

俄罗斯历史上有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 这样一个人。他是白海渔夫之子。十八世纪时他徒步跋涉来到当时的莫斯科求学，他还到过欧洲各个大学去寻求知识，后来成了一位伟大的俄罗斯学者、科学院院士，创办了莫斯科大学，曾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学者通信。俄国历史上也有夏里亚平* * 、有高尔基——这些都是我父亲同时代的人，他们由下里巴人一举登上了西欧文化的顶峰，他们为这种文化自豪，而绝对不以"庄稼汉的讲求实在"而自诩。这些人的心中有一种内在的光，吸引他们奔向美好的事物。可父亲完全被另外一种因素所推动，这种因素提示他，依靠落后就甚么都可以得到……

母亲的弃世反倒使我父亲得到解脱，因为她曾是家庭里起抑制作用的中心。当然和他一起她并不幸福、也不可能幸福。可是也该说，对于我父亲，她是个过于复杂、精细、要求又过高的女人。他高兴地看到她是个好主妇，对孩子们的一切安排都井井有条，但是超出这以外的东西：她的抱负、个人见解以及独立精神就使他恼火了。在**他自己**的家里有这么一个现代的、有思想的女人，一个坚持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的女人，他觉得这是悖乎常理的。诚然，在必须鼓励群众参加劳动时，他也曾不止一次地鼓吹妇女的平等地位，象他的"集体农庄的妇女，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种至理名言已经成了所有农村俱乐部的装饰品。可是在家里他赞成的是另一套。

---

* 1711——1765年。俄罗斯思想家、学者、自然科学创始人，语言文学的奠基者。

* * 1873——1938年。俄国男低音歌唱家。

当瓦西里告诉他说，他和第一个老婆离了婚，因为“和她没有什么话说”时，父亲哈哈大笑说：“咳，你想找个原则性强的呀！哈！咱们可知道那号政治思想好的……咸鱼干，都是些皮包骨！”这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的；随后这父子二人就开始一场猥亵的讨论，我只好走开。父亲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通常是不感兴趣，不抱好感；他也受不了我母亲请到家里来的那些家庭女教师。母亲本人是个例外，因为她是在结婚以后心灵上日趋成熟和发展，从一个不识世事的中学女生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有教养的人。父亲并未在这方面起过任何促进作用。他对女人的要求要简单明瞭、直截了当得多。

姨妈和舅妈告诉我说，在某一次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父亲曾和当地一个农妇同居，说他的儿子现在还在某地，此人粗通文墨，并无攀龙附凤之意。父亲对待许多事物有一种天生的农民观点：极狭隘的实用性，不相信“学识”。晚年他常对管理员们说：“就该把你们都撵走，啥事都干不来！农村的老娘儿们也比你们做得好吃，比你们管家管得好些！”我认为，圆脸翘鼻子的瓦莲金娜，那最后十八年一直当他的女管家的人，完全合乎他心目中看家女人的理想：她长得高头大马、服饰整洁，服侍吃饭很利落，从不插话多嘴。西方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什么“斯大林的第三夫人”——一位神秘的罗莎·卡冈诺维奇，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再说我在卡冈诺维奇家可从未碰见一位叫“罗莎”的。还有一种推想，认为父亲对一位犹太女知识分子（根据这种说法是一位医生）很动心，这只能说明人家对父亲的脾性完全没摸准。他绝对不会喜欢这种女性。听姨妈她们说，他很少想女人，充其量不过对演唱俄国民歌的女演员达维多娃*

* 1906年生，女中音，苏联大剧院的独唱家，擅长民歌。

表示赞赏而已。他对那些想取悦于他的主攻型的女士们也不抱好感。

再说，在西方人家却固执地要把我家和卡冈诺维奇家“结成眷属”。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从德国《明星》报上获悉我已经嫁给了“卡冈诺维奇的儿子”。使我吃惊的是卡冈诺维奇并无儿子。我和他的女儿确实是好朋友，至于他家抱养的小男孩要比我小十岁，他长大以后，娶了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女大学生。

和瓦西里谈及“政治思想好的咸鱼干”时，父亲心目中指的是革命初期独立自由、政治上积极的那些妇女，这些人在三十年代就逐渐销声匿迹了。在当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能达到什么成就的活样板是：女拖拉机手芭莎·安格林娜，收甜菜的玛利亚·杰姆钦柯，收棉花的玛姆拉卡特·那汉郭娃，还有那女飞行员瓦莲金娜·格里佐杜波娃等等。（文化部长福尔采娃是由赫鲁晓夫引进政治局的，但这已经在父亲死后。这件事足以证明，在苏联社会活动型的富有政治头脑的妇女已长期绝迹了。）以这种“女劳模”为原型，苏联艺术于三十年代创造了新型的电影明星：取代了具有英国式的优美仪态的柳波芙·奥尔洛娃的是系红头巾的养猪员玛琳娜·拉窦妮娜和大块头的、以“粗重的俄罗斯美”著称的塔玛拉·玛卡洛娃。

毫无疑问，这是符合“伟大领袖”的美学观点的，因为所有的新影片他都看了。他对艺术的态度是实利主义的。象“拖拉机手”和“养猪员和放羊娃”这种吹牛皮、摆样子的影片他由衷赞赏，他说：“佩里耶夫* 出色地表现了集体劳动的愉快。”于是佩里耶夫的老婆、演技平平的玛琳娜·拉窦妮娜就

* 1901年生，苏联导演、人民演员。

当上了苏联影坛挂头牌的明星……

在和作家、演员、学者很少的几次会见中，父亲总想显出关切和了解情况的样子，这样倒真的常常产生效果。要是有客人上他的别墅去，那他就对女士们显示老式的殷勤周到：他会给她们送上一朵刚剪下来的玫瑰花或是一束盛开的丁香。他对知名的航空设计师的夫人们极其殷勤有礼，对元帅夫人也是至为关注，但这只限于有必要对她们的丈夫表示亲切有礼时他才这样。可是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他根本不想讲什么礼貌，也不想追求什么美。

家里，在和一群"战友"共同进餐的时候，他说的都是"市井俚语"，满口粗话。一直到战事发生以前，他每晚照例由政治局的人陪同吃饭。他们一般都是不带老婆，自己上他别墅里来。大家都模仿他，尽可能装成不要家室的禁欲主义者，仿佛除了"党的伟大事业"外，别无所求。在这伙鲁男子宴饮的场合中，他只有点顾忌我也在坐，但仍免不了说些汉子们中间的下流笑话和不堪入耳的打趣话。我有时不得不一走了事。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个把钟头他会忽然想起来，赶紧派人去找我，并且说："请女主人上桌。"要是他心情好时就会对我说："你这位女主人同志怎么搞的，自己走了，扔下我们这些黑暗中的迷途者也不指引指引？我们现在该上哪儿去呢？引路吧，指点迷津吧！"（这是故意嘲弄"斯大林同志引导我们走列宁的道路"这种正式颂词而作的滑稽模仿。）这一个玩笑话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直到我长大成人。

在他心情不佳的时候，他就会当着众人的面挺不客气地对我说："咳，走吧，我有事！"他也常常会象这样当着好些人的面说我的外表和衣服这不好、那不好，当时使得我这个半大人听了他一些评头品足的意见难为情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

说：“你穿着这种紧绷绷的毛线衣干什么？你要知道，你已是大姑娘了，衣服要穿宽大一些！”我听了这些话只有离开房间，一走了事。

此外，他同样动辄损害一个成年人的自尊心，一点也没有难为情的意思。有一次，这还是在安·日丹诺夫死前不久，他也知道他经常心脏病发作，父亲却因为他在餐桌上一言不发十分生气，忽然冲着他说：“怎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象个耶稣，就象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似的！瞧他那副模样，就象耶稣那样盯着我看。”日丹诺夫脸气得煞白，额头上都冒出汗来，不过他还是一言不发。我吓坏了，生怕他要犯病，赶紧给他倒了一杯水。这是一九四七年秋天发生的事，是在黑海岸边的父亲的一所别墅中，大家都去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波斯克列贝舍夫* 对父亲说有谁来吃晚饭并提到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列宁格勒书记）。父亲未表示反对。在客人到齐之后，年轻英俊的库兹涅佐夫微笑着走到父亲跟前，可是父亲却不伸手给他握，只干巴巴地说了一句：“我没叫您来。”库兹涅佐夫一下变了脸色，缩着身子就走了。那时可能是“列宁格勒案件”行将事发，没过多久他就被撤职，后来遭到逮捕，死于狱中。

最后几年在索契和孔策沃吃饭时人很多，酒也喝得多。我看到过几次，总是很快就走开了。父亲酒喝得不多，可是见到别人大吃大喝他觉得舒服，按照俄国规矩，客人们很快就喝到“酒后失态”。有一次父亲还是喝过了头，于是和卫生部长斯米尔诺夫一起唱起了民歌。那位部长喝得站都站不稳了，但是

* 当时担任斯大林的私人秘书。

** 阿·亚·库兹涅佐夫，1905—1950年，苏国家和党的活动家，1941—1945领导列宁格勒保卫战，后因此案被捕，瘐死狱中。

觉得十分幸福。一直到最后才好不容易使这位部长安静了下来，把他送到汽车上，打发回家了。

一般晚饭之后都要靠警卫员来收拾残局，每一个“贴身”的警卫员都要生拉硬拽着自己所“保卫的人”走。这些放浪形骸的领袖们就爱开些粗俗不堪的玩笑，被取笑最多的是波斯克列贝舍夫和米高扬，而贝利亚则总是在挑起父亲去攻击别人。椅子上偷偷放上西红柿，等人往下坐的时候大家就粗声大笑起来。酒杯里放一匙盐，或把伏特加和葡萄酒混起来。父亲只是坐在那里吸烟斗，看着，不直接参与“逗乐”。看来米高扬以及被父亲称为“席长”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是最乖的了。“席长”经常是烂醉如泥，被弄回家去，一般他都是醉倒在厕所里，吐了一地。贝利亚回家时也是这副模样，虽说谁也不敢往他的坐椅上偷偷搁西红柿。父亲把他叫作“检察官”。

有时父亲也取笑一下贝利亚。他老重复一个笑话，针对的是“检察官”，要是换个一人开这种玩笑，贝利亚早就受不了啦……这个笑话讲的是一个契卡工作人员和他的邻居——一位教授，有一天这位教授对邻居的不学无术十分恼火，便对他说：“嗨，您呀，连《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著名长诗〕是谁写的都不知道！”这位契卡觉得受了奚落（因为他确实不知道），不久就把自己的教授邻居给抓起来了，于是他在朋友面前夸耀说：“他在我手里承认了！他就是作者！”

这个笑话很阴沉，一般人听了谁也不笑。

…………

到了夏天领袖们就在露天寻欢作乐。父亲的别墅里有一个不大的浅水池，有时候人家就把这位“席长”推到水池里去，引起一阵轰然大笑。后来警卫员就找了个理由把这个小水池的水放了，免得哪位领袖呛死在里面。这很象彼得大帝时代皇帝

解闷拿宫廷大臣取乐。这是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决不可能有的事。当时大家都带夫人上我家作客，也没有这么一股纵酒行乐的风气。即使在战前也没有这种事。在后来那些年里，我亲眼见到过几次这种情况。我知道这些亲密“战友”之间小范围的行乐已成了家常便饭，而且每次都是老一套。

这可真不象那真正的格鲁吉亚宴会，无论城里、乡下，格鲁吉亚宴会都是一个样，在宴会上是妙语竞赛，是谈友谊、谈爱情、谈美好事物和永恒事物的祝酒词竞赛，还有三、四个声部组成的无伴奏合唱，吃饱喝足以后，就跳一会舞，然后再回到席上……在格鲁吉亚人看来，喝得烂醉和口出粗言在宴席上是绝不允许的。

战后苏联的电影和绘画里，几乎难以见到象佛来芒式艺术作品里表现的那种佳肴盛筵：矿工、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团团坐定，大吃大喝。因为这种场面毕竟离现实生活太远，有如梦境。可是父亲哪里会知道呢？他餐桌上的鱼是从特别的鱼池里捞上来的，野鸡和小羊羔是由特别饲养场喂养的，格鲁吉亚葡萄酒是特殊酿制的，新鲜水果是从南方用飞机运来的。他不知道为了按时供应这一切食品国家要出多少运费，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搞来的。侍候在餐桌边的服务员都得到命令，如果他问：“这些樱桃从哪儿来的？”那么就要答：“从供应基地来的，斯大林同志。”有一次他火了，又问了一句：“这个叫基地的城市在哪儿？”别人不言声。尽管他本人吃喝得不多，但他举办的筵席之丰盛是有名的。当他在电影里看到这种丰盛场面时，他就认为“艺术真实地反映了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搞不清父亲究竟知不知道，这个“基地”是专为他而设的：一批专门医生给送到他厨房里的食品进行化验，看看有没

有毒。每一个面包、肉或是水果的封包上都有专门的“接收书”，上面盖了印鉴，还有责任毒品学家签名的鉴定：“未发现有毒物质。”有时那位叫佳柯夫的医生上我们克里姆林宫的家里来，带着一些试管，在每个房间里取一些“空气试样”。我们住在那里，收拾房间的佣人还活得好好的，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医生仍然必须不时地来“取试样”，写“鉴定书”。

父亲不知道，他的一顿晚饭值多少钱，还有他的各处别墅、“毒品化验”等所值若干，因为他是从来不用掏钱的。他的生活全部由国家包干。每个月从苏共中央、国防部、部长会议以及其他由他当荣誉成员或象征性成员的机关源源不断寄来的工资口袋，他看也不看，就塞在抽屉里了。克里姆林宫住所里有一张这样的书桌。后来所有的东西运到了别墅，那里也有一张他从来不用的书桌。抽屉里放满了这样的工资口袋，等一塞满就不知把它们弄到哪儿去了。父亲死后这些钱马上就不翼而飞。

瓦莲奇卡，也就是我父亲的那位女管家，在父亲刚死不久就问我，抽屉里那些钱是给我了还是给什么亲属了。可是我根本不知道钱在哪儿。瓦莲奇卡于是“口出不逊”，她认准：“给人偷了，这些畜牲！”我不知道她指的是谁，是指最后几天和最后几个钟头还在这个家里主事的警卫人员呢，还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二年以后，我领退职金的那间储蓄所的出纳员非常秘密地告诉我，在另一个支行有用我父亲的名义开的户头（她还告诉了我帐户号码），显然是他的秘书去开的，现在“遗产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孙男孙女和我，可以动用这笔钱。我们通过公证机关写了有关申请，于是发给我们每人大约二百到三百卢布。这笔钱是一九四七年第一次币制改革时存进银行的，此后

由于数次兑换，钱贬值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好心的、可爱的出纳员想帮我们一把，不惜违反规章制度，把这笔存款的事告诉了我，当时对我们大家来说的确是雪里送炭……看来警卫处的那些将军们，在父亲去世的那天，倒的确挺关心自己的家。至于我父亲，他从不为子女，也不为孙子，也不为遗嘱的事想一想。他"超脱"于物质财富之上——叨的却是国家的光。

在艺术中，除了纯宣传以外，父亲最喜欢的是讽刺、幽默的体裁。在这些作品里他内心的嘲讽和多疑可以得到发泄。他经常一再阅读果戈里以及契诃夫的早期的作品；他有时和日丹诺夫一起从书架上取出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的书来看，以便从《格鲁波夫城的历史》这本书里找出某句话来引用。也只有他们二位才能这样做：苏联的讽刺作家是严禁"给现实抹黑"的。萨尔蒂柯夫，一位枢密官兼贵族，曾恶毒嘲笑十九世纪的俄国，这在我们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不过，银幕上还是"准许上演"卓别麟的幽默喜剧片，象《城市之光》和《摩登时代》等。父亲常在别墅里重看这些影片，他特别欣赏"资本主义下传送带上作工那一段讽刺得好"。可是揭露性的《大独裁者》这部影片，由于里面有一段卓别麟自己写的捍卫犹太人不受法西斯迫害的动人的演说词，因而从来没有在苏联放映过。苏联的讽刺作品全靠米哈尔柯夫* 一些老掉牙的寓言故事来撑场面，而伟大的悲喜剧演员法茵娜·拉涅芙斯卡娅〔1896年生，苏联女演员，先后三次获斯大林奖金〕则必须从楼梯上倒栽葱滚下来，父亲见此笑得眼泪直流，导演为这两下子得了奖……

父亲不喜欢诗意的或有心理深度的艺术。我从来没见他读

* 苏联诗人及剧作家，1913年生，为苏联旧国歌歌词作者之一。

过诗，什么诗也没有读过，只有鲁斯塔维利* 的《虎皮骑士》例外。他认为对这首诗的译文他完全有权置褒贬。他书桌上从未见过有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的著作。不过他曾和我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遗憾的是我没有问他一句，他指的是什么：是《魔鬼》里面的深刻社会心理分析，还是《罪与罚》里面的行为分析呢？

可能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发现了一些纯属他个人所有的东西，只是他不愿说出是什么罢了。在当时，官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绝对“反动”的作家。

我想，父亲在自己最喜欢的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里也为自己找到了一点什么东西，他在晚年常常去看这出戏，自己独个儿坐在包厢里。有一次他把我也带去了，当我听到鲍里斯的独白、听到苦行僧的宣叙调时我简直毛骨悚然，我真不敢朝我父亲看……会不会是他此刻“眼里闪过血淋淋的小儿”呢？为什么他偏偏要听这个歌剧，因为一般他的口味倾向于听一些轻松、民间风味的类似《萨德阔》或《白雪公主》这一类的剧目。我们还不止一次地去听过《伊凡·苏萨宁》〔俄国作曲家格林卡作曲，是部反映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不过只是去看森林里那场戏，这场完后父亲就回家了。

这森林中一场非常富有戏剧性。俄国老农民伊凡·苏萨宁把波兰军队引到偏远的冬天森林里，走到尽头，使他们绕不出来。结果敌人把他杀了，可是波兰军队也永远陷在森林里，冻馁而死。这场戏一完，父亲就走了，下面一场剧是美妙非凡的芭蕾——玛祖卡舞和波罗乃兹舞，可他不顾而去。波兰人死在

---

*格鲁吉亚12世纪时诗人。《虎皮骑士》为其著名作品，为当时民主思潮的代表。

**原为普希金于1825年写的长诗，由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改编为歌剧。

森林里关他什么事呢？是不是因为这能使他想起在卡腾尼森林里消灭的那一万名被俘的波兰军官，那些在一九四〇年由苏联政府秘密处决了的人呢？

父亲在他的晚年重读了一次高尔基的作品，但是提起他时父亲火气挺大。可是很早以前，当他想巴结高尔基的时候，他就亲笔在高尔基写的《少女与死》这篇童话上题字，他写道："这本东西可比歌德的《浮士德》要强。约·斯大林。"

我不知道，他对高尔基这首并不算高明的小诗如此拔高是否使作者感到舒服，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女人、对爱情的浪漫式颂扬是我父亲最无法理解的艺术，高尔基以诚挚的、有深度的笔触写了大量的爱情和女人，这占了他生活和世界观的主要部分。可是我父亲对此则无所谓。由于高尔基是好不容易才从国外动员回苏联来的，并且必须把他吸引到党的方面来，父亲就不惜恭维他，以致使苏联的文学研究家们日后颇伤脑筋：怎么七嘴八舌也沾不上歌德的边。

再也没有比一九四九年为庆祝父亲七十寿辰而举办的那次美术展览这样作践艺术的了。国家特列季雅科夫画廊全部展品的题目只有一个：斯大林。所有的画面上都只有同一个面孔：要末是一位超凡出众的格鲁吉亚青年，双眼仰视高山；要末是一位两鬓斑白的将军，穿着带肩章的沙俄时代军服。如果这幅画出自亚美尼亚艺术家之手，父亲的脸就象亚美尼亚人；如果出自乌兹别克人之手，他就象乌兹别克人。有一张画象甚至有些象毛泽东——他们俩人被画成并排站着，穿一样的半军式直领制服，脸上的表情也一模一样。

在群众性宴会上，花果成堆，他坐在红脸蛋的妇女和向他靠过去的儿童中间，象一位慈祥的白胡子老爷爷。在那批被画成黑眉毛勇士的政治局成员当中，他坐在最前面，就象俄罗斯

壮士歌中的勇士，虎背熊腰，骁勇无比。这一套假的民间美学无非是用来迎合“领袖”的口味，而领袖则想讨好某些并非上乘的民间传统，人民的支持他还是需要的。应当指出，这些绘画父亲一张也没有过目，这可是这批创作者的运气。可是评选委员会还是给“最优秀”的作品颁发了奖金。

他不止一次鼓吹“人民性”，号召面向“普通老百姓”，他故意在自己的演说词里卖弄多种民间谚语，把裤腿塞在靴筒里，就象革命前的工人一样。他这一手倒的确收买了人数众多的苏联半小市民阶级，这些人全靠他提拔到党、国家机构、保安部门以及意识形态部门里掌权，他有时还诉诸最反动的俄罗斯的弱点——反犹、战争期间大抢劫。他正式允许军队官兵掠夺战败的欧洲：“给他们瞧瞧，人皮是怎么层层剥下来的！”他幸灾乐祸地说。他不仅放手让官兵抢，胡作非为，还允许杀死“德国鬼子”，也就是那些他特别想与之永结同盟之好的德国人。他没有猜到也没有预见到，一九三九年订的条约，即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他原以为是自己最高的一招，殊不知竟会被更狡猾的对手给撕毁。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战争初期那么忧心忡忡。这是他政治上最大的一次失着。“嗨，对付德国人我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他不止一次地这么说，不过此时战局已见分晓了。

他可是从来不认错的。认错和他天性绝对不相容。他认为自己是天生圣人，决无过错。认定自己一贯正确，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认为自己的政治敏感性是超群出众的。

“想算计斯大林！瞧哇，人家还想欺骗斯大林哩！”他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这样谈到自己，仿佛从旁冷眼观察那些想胡弄他的可怜虫。他可没想到，人可以自欺。他一直到死都在盯着瞧，看看有谁想暗算他。这在后来成了他所犯的一种狂症。

我不认为，他曾因受良心的谴责而负疚；我也不认为，他尝过内疚的滋味。可是他毕竟算不上幸福，他作得太过份了：杀了许多，降服另外的，又使某些人深为折服……

他既不幸福，也不得安宁。他在黑海边上盖了一所又一所的别墅：有在新阿方的，有在苏呼米的，有在里察湖的，还有居高临下在山上的。克里米亚的沙皇旧宫殿现在已归了他了，可他还嫌不够，于是又给他在雅尔塔附近盖了几座别墅。我没有见过这些新房子，因为他已不带我一同去南方；我也未见过他在瓦尔代湖边、诺夫哥罗德市附近的新房子。

听他的原译员、曾被选为十九大代表的弗·尼·巴甫洛夫说过，父亲在一九五二年底曾两次向中央委员会的新机构提出批准他退休。大家同声一致说，这绝对不行……究竟他是否希望从这个调门一致的合唱队听见另一种回答呢？还是他在怀疑有某人会真的同意起而代之呢？谁也不敢这么干。谁也没把他的话当真。再说他是不是真心想引退呢？这一着倒令人想起伊凡雷帝的诡计多端，他动不动就到修道院去静修，诡称他老了，身体支持不住了，命令大臣选新君。大臣们于是跪着求他别离开他们，因为他们害怕，只要他们一选出来，那位新君的脑袋就得搬家。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人家还象往常一样到他这里来和他讨论各项事宜，他也样样事都死死抓住不放手。他自己知道得了病，所以就把烟戒了。他把自己的老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给撤了，逮捕了自己的老警卫符拉西克，还逮捕了自己的老私人医生。他对什么事、什么人一概不放心，但他又什么事都不愿放弃……他成了自己的“牺牲品”，这是他内心的可怕的统治欲使然。所有的暴君都是带着这种欲望降生的。这种欲望使他五脏如焚，促使他的一生走向悲剧性的死胡同。在通向这

条死胡同的漫长道路上，他把四周凡有生命的东西统统打杀。到头来他只落得一个对己、对人都不敢承认的内心空虚，而这正是他的下场。

现在，我就象通过反过来的望远镜全面观察他和他的一生，我感到这一切离我已经是多么遥远。内心的轻松、不平常的内在解放又令我多么欢欣。这就象一个久病初愈的人，清晨醒来打开窗子，呼吸着充满朝晖的空气时的感觉："上帝呀，多么幸福——我是一个健康人了！"

五十周年纪念

康涅狄克州的公路起伏于山峦之间。正值天高气爽的晚秋十月，微有凉意的天空一片湛蓝。极目四望，层林尽染，红黄相间，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真是俄罗斯人所说的“金秋时节”啊……

这时离开纽约前往新英格兰可真太好了。在这个“五十周年纪念”年份里，是会大书特书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哪家报纸、哪份杂志、哪个电视节目能不谈谈革命的成就”呢。周年纪念就是周年纪念：按老例是只能报喜的。到处在谈人造卫星、标致的苏联芭蕾舞演员这一类的炒冷饭的话。阿特·布赫瓦尔德已经说起挖苦话来了：“美国已经成立起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保护协会。”

我嘛，生平第一次度过这么一个秋天：没有硬性规定的正式的庆祝十月节的活动。这是一个极其乏味的节日，打动不了成千上万的苏联人的心。谁也不因它而喜，但也躲不脱。可以想见，在今年这样一个年头，那里又搞的是什么名堂！

我在布里斯托尔那位退休的女上校鲁丝·勃丽格斯家住了一个半月。这位上校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浅色的头发结成辫子，象俄国妇女一样，将它盘在头上。她看上去已五十多了，不过我现在在这个国家里再也不敢瞎猜人家的年龄。她看起来很年轻，每天穿着高跟鞋跑来跑去，抽着香烟，大声笑着。这位上校乐天知命，活动力很强，一分钟都不让我独个儿发愣。

我们很快就侍弄起她的大花园来，从花园望过去，纳拉甘瑟特湾晚秋新凉的景色历历在目。我们先是把缠在山茱萸上的

长春藤扯掉，这些藤差点把这可怜的树给缠死了。有半天功夫我们在地上爬来爬去，把藤根挖掉或是锯掉，然后爬上梯子，用树剪把缠在枝上的藤蔓剪掉。上校的两只手都被划破了，但她十分满意：我们除掉了藤蔓的那株树又生意盎然了，愉快地簌簌地抖动它的枝叶。干完以后我简直腰酸背痛，可是这位上校象啥事也没有。傍晚我们坐在客厅里的电视机旁，点起了壁炉，在一傍四肢伸开躺在地毯上的有其它"家庭成员"——一条狗和两只黑猫。鲁丝搬来两张伸缩桌子开晚饭，抽起香烟，还准备了两杯加冰块的浓马提尼酒。

从现在起这就是我们每晚的例行公事了。除了电视和香烟烟雾使我受不了以外，这家别的什么都好。上校是一位快乐善良的人，那条狗和两只猫也没拿我当外人看待。有一只有缅甸血统的猫对种姓制度略有研究。因此她对我就象印度的大君和王妃一样，带有一种强忍的、彬彬有礼的轻视。另外一只猫是法国种的，这是一只象是穿了白胸衣、带白套袖胖呼呼的猫，完全是一副绅士派头。它很有礼貌地请我给它开门，和我一起在花园散步，在脚边转来转去，妙呜妙呜叫得怪甜的。那只狗什么都懂，它望着人的眼睛，是亲密的伴侣，有时到我住的楼上来睡觉。

我在上校的园子里劳动，享受着清新的风和苹果的香味。每天从大苹果树上都有不少果实掉下来。我们把它们拣在篮子里，然后拿去酿造西得尔苹果酒。然后给全部花卉除草过冬。十一月份下过几次雪，我心想：瞧，冬天来了！……可是根本不是什么冬天。过不多久雪就化了。

我们带着狗到海湾的岸边去散步。那边的树下有一块空地供野餐者歇足，有桌子和长凳，从那里可以眺望西下的夕阳。我们还驱车到新港附近的海边去玩，那里可以看到潮水涌上多

石的滩头。大西洋的鼻息是深沉而均匀的，海鸥在我们头上盘旋。潮水退后，露出了苔痕斑斑的石头。

在布里斯托尔周围散步中，我发现了莫斯科近郊生长的植物和草。有一天我竟在路畔发现了有香味的白色苜蓿，我真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居然能在这里看到草场上生长的发出醉人香味的草，这种在俄国夏天收割、然后晒成干草的芳香扑鼻的草，一种甜密的感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可是从我到美国后，头一天就看到，这里周围的树木很特殊：树干是圆的，树枝繁茂，叶子清新；这些树木自由生长，纵情呼吸，就象这里的人一样。

十月三十一日是勃拉哲士·辛格的周年忌辰，只不过一年以前我还在莫斯科，在我自己的家里，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踏上新英格兰的土地。

生活是多么变化无常、不可思议啊！这一天是本地儿童玩乐的节日——万圣节〔即每年十一月一日前夕〕。傍晚，孩子们串游到各家按门铃，到我们这里时我给他们把糖果饼干送出去。他们戴着滑稽面具。毫无疑问，卡拉康卡村此刻也同样在过节呢；在印度，祭师们为追荐亡人而款待孩子们，他们都可以上门。也就在这一天，我们在报刊上登了一则启事，宣布《二十封信》出版所得的钱，将有一部分用在印度建立一个医院，还赠送一些给巴黎和瑞士的两所幼儿园，给在美国的俄国侨胞报纸和杂志以及托尔斯泰基金会*。

一封以苏莱士和卡拉康卡村全体村民的名义拍发的长电送到了罗德岛的布里斯托尔。这里每逢星期天电报和电话都是通

---

* 1939年由托尔斯泰的幼女亚历山德拉在美设立，专门资助那些苏联留居外国的人士。

过药房转的。这样一来，全城人都知道了我的地址，记者们又朝鲁丝·勃丽格斯的家蜂拥而来。可是上校轻而易举地击退了所有的进攻，我们就靠报上登的一则短消息和家里的照片总算脱了身。

一般讲来，布里斯托尔的居民对我没有任何好奇心，这可是太好了。我自己徒步上邮局给鲁丝·勃丽格斯取报纸，在大街上散步。要是在纽约，经过这么多次电视采访，这一点是办不到的。我开始驾驶着上校的大“雪佛兰”牌汽车到安静的大街上去兜风，或是驱车沿着海湾走，我好容易才习惯自动换档。一位当地的女士一个劲儿问我沙皇王族的下落，我的确是什么也不知道。她于是说道：“看来有关俄国的事我知道得比您还多！”

我不得不去光顾的一位牙医老和我说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的事，以致简直没法儿工作：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讲话了。然后我和他全家一起吃饭。这位牙医的生活比莫斯科院士还强。近邻布朗大学的一位教授的家和莫斯科的标准简直无从比起，那里的部长作梦也想不到住这样的房子。

这时刚巧有四个苏联的研究生在布朗大学进修，他们都是工程师：一个立陶宛人、一个乌克兰人、一个亚美尼亚人、一个俄罗斯人。报纸上有一篇报道他们的采访记，当我看到“美国有许多事物使我们想起我们的祖国”时，我心中感到很欣慰。这就是说，自我抵美之日起一直萦绕我心头的想法并非我一人的想法。这就是说，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因为我从未和这几个年轻人商量或会见过。我知道，在国外接受采访的苏联公民无不是如履薄冰：出了一点小纰漏就会在党组织内以“政治上幼稚”的罪名长期挨整。从这些小伙子的话中，你可以听出他们

对美国以及周围人的欣赏和真诚的好感。只要是睁着眼睛、张着耳朵的人，只要是未受官方宣传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个国家的友善而不同样地以友善报之……

可是事情并非完全如此。九月份我忽然收到一封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女工作人员的信，这个人我在莫斯科有过接触。她写道，她想和我见一面，如果我想给子女写信或寄邮包的话她可以帮忙转交。她是“忽然”想起我来的，尽管我在这里已经半年了，她还为我在美国“形单影只”而感到难过。她说她本人“两年来什么朋友也没交上”。她写道：“我每到晚上就想起您。您在这里难道找得出一个您能说得上话的人吗？我可知道这些美国人，他们从来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对别人的生活是不屑与闻的。”对她这番高论我丝毫不感到奇怪：在大使馆干事就只能是公事公办，不可能有私人友谊。也可能她和别人接触时，引不起人家的好感。她提议和我见面，谈话完全是假惺惺的一套：我们在莫斯科时从不是朋友。她在这里完全是不折不扣的使馆人员，这会儿买足了够用几年的一应物品家什之后，正准备打道回府。她忽然对我来的这份殷勤劲儿，肯定是奉上级的命令。我给她回信说，我用不着她帮什么忙，至于谈谈“心里话”嘛，我这里有的是美国朋友。

• • •

十一月七日和八日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挖空心思要使自己和人家相信它所取得的胜利和具有的优越性。

对于我来说，这个节日是被糟塌了——它令我想起母亲的死。今年是她的忌辰卅五周年。

我还记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由妈妈带我去红场参观游行。当时我才六岁半，儿时的印象犹历历在目。第二天我的家庭女

教师要瓦西里和我写一写头天红场所见。我写道："伏罗希洛夫大叔骑着大马"。我十一岁的哥哥嘲笑我说，应该写"伏罗希洛夫同志跨骏马疾驰而过"。他把我惹哭了，妈妈却笑起来，那天她穿着一件鲜艳的浴衣，到儿童室看了一下，就走了。从此遂成永诀。

我哥哥有可能造就成一名能干的编辑：他马上就发现我低估了重大事件的政治意义，把历史时刻简单化了。看来，我的这一特点终生都未能去掉。伏罗希洛夫始终是我心目中的"大叔"，我没有理由将他提到更高的水平。还有另外那些"大伯大叔们"，他们多年来一直以没有台词的跑龙套的脚色出现在父亲周围，在我心目中始终没有升华到"领袖"、亦即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地位。他们实际上也从来没有当过领袖。

我认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子女，知道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的生活并无任何吸引人的地方，我和他们也并不亲近。他们的妻子曾是我母亲生前的朋友，至今还珍视对我母亲的记忆，犹如记念一位立过功勋、灵魂伟大而纯洁的人。叶卡捷琳娜·伏罗希洛娃、波琳娜·莫洛托娃、朵拉·安德烈耶娃和玛丽亚·卡冈诺维奇、齐娜·奥尔忠尼启则她们一谈起我母亲时总是带着十分赞赏的口吻，她成了她们眼中真理和灵魂独立的象征。这一点她们自己作不到，她们过的是苏联达官贵人的生活，是革命把旧贵族消灭后在苏俄所创立的那个新阶级中的贵妇人的生活。她们只能追随自己的丈夫，这批人过去是工农，现在却成了苏联的名门望族。齐娜依达·日丹诺娃* 说我母亲是"病人"，可是她从未见过我母亲，只不过是重复党内的官方说法。

---

* 即安德烈·日丹诺夫之妻，作者第二个丈夫尤里·日丹诺夫之母。

这些家庭中的年轻一代有时竟能提高认识到对自己的父母以及他们的事业持批判态度。这些后生得力于教育、大学学府、外国语。这一切是他们的父母辈所未能问津的。

伏罗希洛夫“大叔”是革命显贵中资格最老、声望最高的一个，也是内战中声名赫赫的第一骑兵师少数仅存的几个老指挥官之一。只剩下他和布琼尼，因为这两个人政治上均不太活跃。布琼尼现在致力于育马，生活简朴。伏罗希洛夫则十分讲究阔气排场。

他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可能要算最气派、最宏伟的了。“劳动人民”送给领袖们的礼物只有我父亲一人是上交博物馆的。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住房和别墅摆满了地毯、高加索的金银武器和贵重磁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送的礼物，源源不断地象流水一样献了上来。这些“革命元老”的家里什么装饰品没有啊：玉瓶哪、牙雕哪、印度绸哪、波斯地毯哪，南斯拉夫、捷克、保加利亚的手工艺品哪。礼品还继续从世界各地送来，以此作为“劳动人民的兄弟团结”的象征。中古世纪向老爷纳贡的旧习俗又复活了。伏罗希洛夫作为一个老骑兵，还继续享受送给他的马匹；他一直在别墅里骑马蹓弯。米高扬也一样，他们的别墅变成富丽堂皇的大庄园，有花园、暖房、马厩，当然，这一切都是用国家的钱来维持和经营的。总之，全部“领袖”的生活费用都只有一条来路，所不同的是房子的外观，它取决于女主人的审美力和男主人的嗜好。

六十岁时的伏罗希洛夫仍然是雄姿英发。他身着白色法兰绒长裤、迈着年老军官矫健的步伐在别墅中散步。米高扬看起来也是如此英气勃勃，衣冠楚楚，他是绝对控制饮食以防止体重增加的。

米高扬和他的妻子主要受他们第一次出访美国的巨大影响，从此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有了改变，房子也现代化了。可是伏罗希洛夫总超不过他那骑兵水平的鉴赏力。他的艺术修养极限就是他还能唱乌克兰民歌，唱得还相当不错。他别墅里墙壁上挂的是“宫廷绘画院士”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 给他一家人画的粗制滥造的肖象画。伏罗希洛夫在摆姿势给人作画倒不厌其烦，至于别的领袖的肖象都是照像片画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许多事情是夫人们说了算的：叶卡捷琳娜·伏罗希洛娃喜欢肖象画，别的夫人对绘画则毫无兴趣。给“绘画院士”付润笔当然仍旧是国家。至于伏罗希洛夫夫人本人，原是女工出身，当过党的积极份子，后来成了一位又高又胖的贵妇人，立志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她在高级党校干了许多年，与齐娜伊达·日丹诺娃是同事。有一个笑话说，这一对夫人是“苏共党史教程的直观教材”。

伏罗希洛夫本人则喜欢在餐桌边找点由头发表讲话，将它和政治情况结合起来。在别墅里的家庭餐桌上发表点权威性言论已成了“领袖”们的常规。即便饭桌上坐的是老婆、孙子和象我这样的老熟人，伏罗希洛夫仍是手执酒杯来一番政治祝酒词。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们眼睛下垂，由于十分乏味而轻声叹着气。

那位尼·米·什维尔尼克* *，也就是在加里宁死后当了苏联元首的那位，在家庭的周末餐桌上也是这么干的。此外我再没有看见别人有过这种情况：人们在家里总还是比较正常的。

---

* 1881—1963年。苏联著名画家、院士。作品曾获列宁勋章及斯大林奖。擅长人物画，为现实主义画派。

* * 1888—1970年。1946—1953年期间曾任最高苏维埃主席。

伏罗希洛夫的一所宽敞的、带有大藏书室的三层楼别墅在战后由于小孙子的不慎，被烧成一片灰烬：小孙子在新年枞树旁边玩火来着。可是别墅很快又盖起来了，规模依旧，只是藏书室就再也没有了。

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家的藏书规模，和我父亲在克里姆林宫住宅中的一样。书刚一出版，出版社就赶紧将它们寄来，这是规矩。当然，谁也不用付书款。这些藏书的价值就在于其中有一批廿年代和卅年代出版的苏联书刊仅存的孤本，因为一九三七——三八年的"大清洗"已将它们从各普通图书馆中取缔。在这些人家的藏书里任何人无权取缔，故而一些日后被捕、被处死的作家所写的文艺作品，依然完整无恙地摆在书架上。一应反映党内派系和思潮斗争的党内出版物，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作品，凡是公共图书馆中已经没有了的，这里都有。凡苏联从革命以后的初年起发行的出版物，包括重要的期刊，都收藏在这些"家庭"图书室里，主要是青年人翻阅。

伏罗希洛夫的藏书室是烧掉了。我家的呢，国家决定收去并按自己的考虑加以处置。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被赶出政治局和克里姆林宫以后，允许他们将藏书作为"私产"据为己有：一部分稀有版本他们卖了，另一部分他们带出了克里姆林宫，运到自己寒酸的新居。在苏联，国家对一切法律是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这其中也包括对财产的法律。米高扬家的藏书分给了各个儿子，他们以使用这些书籍为乐事。

阿什罕·米高扬是一位安详、美丽、出色的女主人。在别墅住的时候，她总坐在房前修剪得很整齐的草坪上，把高加索的羊毛毯子、枕头、地毯、冬天的衣物拿出来晒。她有五个儿子、一大群每年从亚美尼亚来此度夏的侄子、侄女，她亲自下

厨房，一年到头穿家常衣着，手里离不开抹布。阿什罕没当过、也不想当贵妇人，或者当什么党史专家……

美国人的合理的生活方式给了她很深的印象，于是她把家里的浴室、厨房全部按亲眼见过的洋玩意进行了一番改建。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老房子是最朴素的了，所以当阿什罕看到给其余所有的“领袖们”都提供了位于列宁山上的官邸时，心里挺不是滋味。那些官邸里有绸布糊的墙，有贵重木材做的护壁板，大理石的壁炉和沉甸甸的家具。她还是喜欢别墅，在这里的草坪上她可以抖落抖落自己的枕头。她待人热情，淳朴而又逗人喜欢，一种内心的敏感帮助她直至死前都不失原来的本色，而没有变成“苏维埃夫人”。

米高扬去古巴时，她得了重病。我在别墅里看见她，她躺在卧榻上，说什么也不愿搬到莫斯科市内的宅邸去。她的四周依然是那些覆有织花壁毯的木壁、瓷砖地、雕花橡木家具，这些东西都还是革命前房主的。在这所房子里新贵没有添制什么东西。看来她情愿这样。当米高扬和卡斯特罗会晤时，阿什罕去世了。

这个家庭里保持了民主和淳朴的关系，可是也不要忘了国家在他们家人数众多的亲戚、四个成家的儿子、十一个孙子孙女儿的出国旅行、汽车、住宅上面所耗费的大量钱财……

米高扬的儿子们对现代化生活有很好的鉴别力。象格拉西莫夫院士给伏罗希洛夫一家画的那些肖象画他们早就会扔出房门外。常有这种情况，米高扬要是出席宴会或是出访外国时，常常要向儿子们借高级袜子和领带。

人们对多年担任商业部长的米高扬也瞒着开设有特殊“内部”商店这件事，他的儿媳妇们就在那里给他的儿子们买进口洋货。这位部长一直以为，战争期间和配给制期间的“内部供

应商店”早就随配给制一起取消了。可是莫斯科的权贵和商业部却和他想的是两码事，经过严格甄别的少数人可以进入莫斯科百货公司的特殊供应处，那里他们不用排队、不用挤成一团就能买到南斯拉夫的鞋、英国的针织紧身衫和法国的香水。这些事人们没告诉米高扬，因为怕他立即取缔这种非法贸易，那么一来，出国的苏联“外交官”就不能穿得象个样，因而也就无从在国外“体面地代表”苏联了。

我到印度以前，对外交部各种规矩门道摸得一清二楚的卡西洛娃，把我领到“特殊供应处”去。我在那里买了一件英国的夏季大衣，就是我现在普林斯顿还一直在穿的这件。至于那双白色南斯拉夫鞋，也就是在长岛对我采访以后各报都作了描写的那双鞋，其实不是我在纽约买的，而是在莫斯科买的，而且是多亏一位我认得的女售货员，是她把这双鞋藏在柜台底下给我留起来的。米高扬以为，苏联的“进口贸易每年都在扩大”。

他相信送给他这位部长审阅的一切数字。甚至于冬天，他的别墅里新鲜蔬菜供应也是从未间断，——取自他家自己的温室。他一边给我敬菜，一边说：“苏联没有吃新鲜蔬菜的习惯。”我回答说，蔬菜是大家都爱吃的，就是买不到。

“怎么！”米高扬嚷了起来，“今年我们卖给居民的新鲜蔬菜比过去任何一年多一倍！”

莫洛托夫的住宅和别墅陈设雅致、讲究。当然这是按苏联标准而言。莫洛托夫的夫人是政府夫人中穿得最讲究的。莫洛托夫的房子和我家在克里姆林宫的公家住宅的那种单调乏味比较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比哪家的房子都富丽堂皇。

莫洛托夫的妻子也曾当过工厂的女工，头上扎着红头巾，*

---

* 这是苏联革命后二十到三十年代女工的劳动打扮。

也是一个党的积极分子。后来她成了苏联香水工业的头子。到过巴黎、柏林、美国后，她忘记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成了莫斯科第一夫人。她是在自己的别墅和官邸中举行的外交宴会上的女主人。她的家气派是很大的。她使她的独养女儿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学了英文、法文、德文、音乐，还有专任教师给她上自由体操课。波琳娜·莫洛托娃当过党中央委员、渔业部长、最高苏维埃代表、时装馆评判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各种协会和机构的委员。当时她得了各种怪病，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治。她到欧洲——柏林、卡罗维发利等地去治过病。

一九四九年她被捕时，大家都认为她身体可能受不了。整整四年，甚至女儿也不知道母亲上哪儿去了，大家都以为她早死了。我父亲一死，她立刻从哈萨克流放中回来。她还活着，几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可是她却笑着说："严酷的气候条件增进了我的健康。"事实上她的气色的确比过去好些，那些"莫名其妙的怪病"也都不药而愈了。

在苏联，人们的命运的确是祸福莫测，人们对自己遭遇的反应有时也是很奇怪的……

波琳娜·莫洛托娃的被捕显然是得到父亲的同意（也许还是奉他本人之命）的。他认为，波琳娜作为一个犹太女人，一定"卷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刺探莫洛托夫的秘密"。这一点她本人非常之清楚。可是她硬把这一切归罪于贝利亚，她还对我说，听见贝利亚被捕的消息以后，她"象疯子一样跳起舞来"。谁也没有象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那样强烈地抵制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新方针，莫洛托夫的妻子尤其坚决：他们把赫鲁晓夫当成自己的私敌，因为他把他们赶出了政府并建议开除他们的党籍。柯西金上台以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立刻递交申诉书，要求恢复党籍，但是遭到拒绝。于是这样一来，

他们就憎恨世界上的一切，并开始颂扬对“伟大的斯大林的怀念”。

我见到了脸色苍白、垂垂老矣的莫洛托夫，这时他已是一位领养老金者，住在一所不算大的住宅里，这是柯西金取代赫鲁晓夫之后的事。象平常一样，莫洛托夫寡言少语，只唯唯称是。过去我总是看见他在父亲面前唯唯诺诺的。现在他对老婆也是这样。他夫人的确精力充沛，斗志旺盛。

她没有被开除出党，所以她还和青年时代一样，到糖果厂去出席党的会议。他们全家围坐在餐桌前，波琳娜对我说：“你父亲是个天才。他消灭了我们国家的第五纵队，战争刚开始时，党和人民是团结一致的。现在再没有什么革命精神了，到处只有机会主义。你瞧瞧那些意大利共产党员干的什么事！可耻！大伙儿都被战争吓坏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只有在那儿才保持了完整的革命精神！”

莫洛托夫连声称是，直点头。他们的女儿和女婿默不作声，两眼看着盘子。这是另外一代人，他们为此感到羞耻。父母亲就象保存在冰川里并且已变成了化石的古代恐龙。波琳娜把红菜汤里面的蒜切得细细的，还说，“斯大林一直是这么一种吃法”。后来她又骂洗衣坊，说衣服取回来以后还得重洗。然后又骂赫鲁晓夫，说决不能原谅他把她的丈夫开除出党。至于我的父亲，她却“原谅”他杀死了千百万人，她把这些人叫作“第五纵队”。

他们那么喜欢莫洛托夫一度出使的蒙古*，我对此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他们两个人在那里找到了他们趁心的、落后的、政治地位卑微的卫星国，找到了从部落制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

* 1957—1960年期间莫洛托夫被赫鲁晓夫贬谪到蒙古当大使。

的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波琳娜不止一次地提到蒙古共和国的“健全精神”。当我离开他们时，我觉得我好象是从一个古生物博物馆走出来。

幸好类似这样的拜会机会在我是少而又少。我之所以去拜访波琳娜·莫洛托娃是因为她曾是我母亲生前的女友，而且记得并了解我母亲的人为数已经不多了。

我没有看到另一位领养老金者卡冈诺维奇是如何生活的。不过在他还是一个有职有权的政治局委员时，我到过他家几次。他漂亮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建筑工程师，是很可爱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和父母亲的全然是两码事。其实我是上他俩家作客的。

卡冈诺维奇也是老一代的共产党显贵。他也有同样的高级宽敞的别墅，同样的大而不花钱的图书室……他的教育程度和伏罗希洛夫也不相上下。她的夫人和莫洛托夫的夫人一样，在纺织工业部门工作过，慷国家之慨给一大群亲戚提供不花钱的衣着。他家象其他要人的家一样也有一位“指定的”国家安全部派出的军官负责指挥警卫队。他也有一条“尾巴”——一辆尾随他的私人大轿车的第二辆汽车，上面坐的是契卡工作人员。（契卡们管自己的工作叫“坐上尾巴兜风”）他也有一辆他们这号人都有的“帕卡德”牌的装甲汽车，装有绿色的防弹玻璃。

幽默是处处都有的。“克里姆林宫的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俏皮话。一大串政府高级官员的“帕卡德”牌装甲汽车，拉着汽笛在阿尔巴特大街向克里姆林宫疾驶而去，大家管这叫“狗仔娶亲”。在警察的语言中，要人住宅和别墅被称为几号项目，因此孩子们开玩笑说“主体驱车前往客体”。*

---

* 梅努欣，一译作美努兴，按此系文字游戏，俄文“项目”与“客体”为同一词，但二者在中文中则完全为不相同之词，无法互换。

卡冈诺维奇的家既无伏罗希洛夫家那种气派，也无莫洛托夫家那种排场与鉴赏力，也缺乏米高扬家那种民主合理性。这是一个暴发户的家，满是一些不中看的贵重物品，每个屋角里都放着栽在大木桶里的棕榈。至于卡冈诺维奇本人，咋咋呼呼、粗声大气，外表看起来很象一位居住在自己庄园里的普普通通的胖老爷。他被认为是工业和交通部门的良好组织者，他一度领导过这两个部门。不过他在首都的政治活动，除了修建地铁以外，就是破坏文物古迹。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显圣堂、克里姆林宫的红阶、救世主耶稣教堂、苏哈列夫塔、伊维尔门和钟楼通通拆除掉。环绕城市的那圈由林荫道组成的绿花圆环路已变成“柏油路的海洋”……在拆掉救世主教堂的地方始终没有把苏维埃宫建起来，这还是卡冈诺维奇主事时绘制的蓝图，当时是由他亲自批准所谓“莫斯科城改建总平面图”的。

这个首都“改建”自然毫无例外地要全体莫斯科党政要人与闻其事。这是党一贯的精神。建筑师们徒劳无益地试图说服赫鲁晓夫，要他别在克里姆林的大教堂旁建代表大会宫，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克里姆林宫的建筑群的风格*。可是，赫鲁晓夫听都不要听。现在克里姆林宫墙之上一座现代化建筑巍然高耸，象一座大百货商店，上面还怪模怪样地冒出一个金顶——伊凡大帝钟楼的金顶。青年人把代表大会宫称为“大臣中间的阿飞”。

可是卡冈诺维奇曾力图附庸风雅。他有一个亲戚是小提琴家，所以孩子们有时带他去听音乐会。有一次去听耶胡迪·梅

---

* 按克里姆林宫原为石结构，建于1367年。1485年以后改为砖砌。由三个大教堂、许多塔楼、钟楼、宫殿及大厦等组成，形成一个统一风格的建筑群，从建筑艺术角度看来不容割裂。

纽因* 在莫斯科举行的演奏会，我也坐在同一包厢里。这次演出真是艺术盛会：梅纽因和大卫·奥依斯特拉赫** 演奏了巴赫的双提琴协奏曲。这一对配合得真是珠联璧合。忽然卡冈诺维奇转过身来，对我挤挤眼说："咱们的那一位可把美国人压下去了！"在他看来，演奏会是竞技，就和赛马一样。

比起那些"老一辈的领袖们"来，后起之秀的生活方式稍稍不同一些。贝利亚是平步青云，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因此也有资格享受那种国家的标准俸禄和待遇。不过格鲁吉亚人天生有艺术爱好，因此他的家看上去是很现代化、挺雅致的。

但是应该给予那位女主人——迷人的大美人妮娜——应得的评价。还不到十七岁的时候，她只是敏格列思村的一位村姑。有一次，当她听说格鲁吉亚格帕乌〔即"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缩写〕的首长拉夫连第·贝利亚亲自上这里来了，她就赶忙去给她被捕的哥哥求情。贝利亚是坐专车来的。妮娜走进了车厢之后就再也未回她家乡的村子。人家把她带走了，因为她漂亮，首长看上了她。他把她锁在卧车里，她就这样委身于他了。

可是格鲁吉亚的妇女从来就是忠贞的妻子。虽则妮娜有时当着我的面哭诉自己不幸的受屈辱的生活，可是，对别人她是决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她上过学，成了一位农业化学家，本来有可能如生平所愿，在自己家乡格鲁吉亚的田野和花园里有成效地工作。但这是不可能的。丈夫把她带到了莫斯科，一个她最不喜欢的地方。她继续扮演为人妇和主持中馈的角色，可是实际上她早就什么都不是了。没有出路，她于是全副精力用来

* 1916年生。美小提琴家。七岁开始演出，为当代世界提琴大师之一。

** 1908—1974年。苏联提琴大师、人民演员、音乐教授，常出国巡回演出，享有世界声誉。死于阿姆斯特丹，后归葬苏联。

培养她的独子，成效卓著：她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懂德文和英文，是国内第一批火箭工程师之一，制造了国家第一批导弹。他性格温和，逗人喜欢，和他母亲一样。这母子二人和贝利亚恰成对比，他嘛是天生的刽子手和豺狼成性的人，干秘密警察这一行正是他的天职。

甚至在家里碰见他也是撞了丧门星。星期天他在别墅以打靶为消遣，用各种武器在靶场练习射击。晚上他就看电影——他儿子给他翻译美国和德国影片。然后一下子不知去向。和这个人谈话总谈不拢，他恶声恶气，又爱说下流话。

贝利亚住在有名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弗拉斯·丘巴里过去的别墅里，这个人于一九三七年被捕。这些房子各有不同的命运。由优秀的建筑师设计、国家花钱盖的高级别墅，都由下一批房主来“继承”。莫洛托夫住的是雅果达过去的别墅。日丹诺夫住的是过去鲁祖达克的别墅。我们于一九三三年搬进了克里姆林宫布哈林的住房。在那些房子里过去房主的阴魂不散……贝利亚一家于一九五三年被捕，地点就在过去丘巴里被捕的别墅。虽说赫鲁晓夫自己本来有一所别墅。但是在莫洛托夫被清除出党之后，赫鲁晓夫却搬进了过去莫洛托夫的别墅。可是这所房子也要算一座凶宅：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被强迫离开这所大别墅，在他居留期间他把千姣百媚的玫瑰花一概挖掉，到处都种上了玉米。

谁又说得清呢，米高扬之所以能一路上官运亨通、稳坐钓鱼船，看来是和他不作非分之想、只捞了一所房子这一点有关。这所房子是他一九一九年就到了手的，而且还一直保持它原来的外观。

贝利亚的别墅既宽敞、又豪华。白色的房子为高大整齐的松树所掩映。家具、糊壁纸、灯具都是按建筑师的设计图制作

的。这位设计师不是别人，就是米朗·梅尔让诺夫，他也设计过我父亲的几所别墅。他于一九四九年进了监狱，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妮娜，因她本人就很可爱，把家里布置得更舒适了，看起来令人舒服。家里有“电影室”，这和所有的“领袖们”的别墅都一样。这是青年人喜爱的活动，他们更乐意看外国电影，为的是练习听听外国语。在当时，德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电影是这个圈子获得外部情报的最重要的来源。我认为这么说一点都不错。因为除此之外其它如书、报、杂志等来源都封锁了。而青年们则如饥似渴地寻求能提供新知识的源泉。

可是在贝利亚的家里总能找到英文、德文书籍和外国杂志。妮娜家里用了一个不声不响、规规矩矩的德国女人给她看孩子，战争期间妮娜使她免于流放。儿子结婚以后添了几个孙女儿，妮娜就带她们。她根本没有个人的生活，再说和那样的丈夫在一起也不可能有个人的生活。但她的行为从来都庄严持重。

贝利亚于一九五三年六月被捕并立即枪决后，过了一段时间政府发了一份秘密文件，历数贝利亚的“罪状”。在党内会议上宣读这份文件花了三个多小时。除宣布贝利亚“为帝国主义搞谍报工作”之外，党中央的秘密信有一半是谈他的“不道德面貌”。党的侦察人员有滋有味地去挖掘这位已解除危险的政敌的“风流丑事”，还从来没有任何一次党的会议开得如此引人入胜：这位业已垮台的“领袖”的色情生活被描写得淋漓尽致。但有一点却始终不清楚：党中央究竟想向党内群众说清楚什么？因为谈的那些事和政治没有关系，和党内斗争也没有关系。文件没说清楚，也不能使人信服，只除了一点：也许中央委员会里的那些假道学也照见了自己肮脏的本性。

一九五三年以后，贝利亚的妻子和儿子从莫斯科流放到乌

拉尔。几年以后，妮娜请求到格鲁吉亚去生活和工作，她期望可能最终回到家乡的村子去干她的农业化学。可是她的请求遭到拒绝。实际情况是，这位美丽而不幸的妇女，她的整个一生毁于专制，她什么政治罪也没有，却遭到了流放。

马林科夫、安德烈耶夫和日丹诺夫这批较年轻的“领袖们”的生活看起来不那么奢侈，比较民主。当然，他们的民主作风是相对的，他们只是不那么想当达官贵人。可是和整个苏联社会的生活水平比较，他们还是处在权力的九重天上，这种豪华的水准是一般老百姓做梦都难以想象的。

我过去常到这些家庭去，因为我认得这些人家的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晚辈。可能，这些人家的生活安排就取决于后生晚辈。日丹诺夫的儿子是学化学的，他家里老有一帮子大学里来的朋友。安德烈耶夫的女儿是生物化学家，女婿是建筑师，她的弟弟——航空设计师，弟媳——艺术研究家。马林科夫的女儿——建筑师。他们夏天打网球，站在由小汽艇拖行的驾浪板上在河上滑行（至于水上橇板运动那是以后才时兴的）；冬天就滑雪。他们给子女和孙子作生日，到树林里采蘑菇，音乐学院的精彩演奏会他们一场不拉。在某种程度上老父母还得听他们的，总想赶上年轻一代的观点。

马林科夫一家可能是这个“上层”中最有文化教养的。他受的是电气工程师教育。他的妻子许多年一直担任动力学院的院长，这是一所莫斯科最先进的技术学府。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在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家庭中薰陶出来的，对达官贵人的豪华奢侈，并不孜孜以求。他家不找人画象，不收集波斯地毯、中国玉器和镀金的武器。家庭陈设简简单单，没有资产阶级的磁器陈列玻璃橱，没有避暑的“夏宫”。

马林科夫的两个儿子在特殊的学校里学习英文。他们的舅

舅，一位教员，和他们住在一起并辅导他们的功课。夏天他们就种种花、侍弄菜园子。饭桌上大伙儿有说有笑，家长与子女同乐。男孩子还出版墙报，就象我们小的时候一样。

马林科夫显然是思想最健康、也是政治局最年轻的人，这一点是不足为怪的。他于一九五三年三月提出了发展轻工业的计划，受到了最热烈的反响，因为这在当时是国家的当务之急。他马上就赢得了威信——可是，也就是这一点把他给害了。从他被赶出政府以后，他到了哈萨克斯坦，可能，现在还在那里当一座小型水电站的站长。此后他一次也没有到莫斯科去"朝拜"过，也没有请求"宽恕"他。政治局很恼火，于是继续整他，给他横加各种罪名，比如说他"蛊惑人心"。所谓"蛊惑"也者就是马林科夫和这个小城市的居民一起排队买面包。这被认为是对政府的"蛮横挑战"。

其实对于他以及他们一家，生活的变化并不是那么大难临头，象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所感觉的那样。因为后两位离开政府、离开权力就等于彻底完蛋。而马林科夫一家只不过回到普通一般的生活中去，他们受过的教育使他们能适应这种生活，至于失去的权力对他们来说，算不了太大的损失。象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还有现在的赫鲁晓夫这样一些被强迫领养老金的人，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体力上都很快地垮了下来，因为那种离了对别人进行统治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了无意趣的。

日丹诺夫的命运稍稍不同。对这个家庭我比较了解，因为尤里·日丹诺夫曾是我的丈夫，我在他家住了两年。这是在日丹诺夫本人死了以后。

安德烈·日丹诺夫出身于中学督学家庭，他曾梦想当个农学家，喜欢花草和花园。除他以外家里还有三个姊妹。所有的

孩子都是在家里受的教育。他的母亲是个贵族、钢琴家，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

日丹诺夫有三个姐姐，她们都醉心于民粹主义。革命前在这个家庭里谁也没有听说过什么马克思主义。姐姐们教书，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两个姐姐自愿参军，当了卡车司机。妇女干这个在当年可算得是没听说过的独立精神。这姐儿俩当了一辈子司机，革命以后继续干这个，一直没有成家，有机会就搞点教育工作。大姐一直当教员，有一个儿子和几个孙子。可她离开了丈夫，自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家之主。她几乎从不到莫斯科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随后革命发生之后，安德烈·日丹诺夫当时是莫斯科彼德罗夫斯克·拉祖莫夫农学院的学生。就在那时他成了布尔什维克，因为当时有这么一股风。象所有缺乏能耐的人一样，如果干的是与志趣不合的事，他就会变成一个卖傻力气的教条主义者，就会死不开窍、自己逼着自己干。我了解这个日丹诺夫，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又有心脏病，总的说来是个性格温和、极好相处的人。至于他的名字怎么会在苏联艺术史上和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八年的迫害镇压那黑暗的一页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他过于卖力地去执行别人的意志所致。在这件事上，就是指我父亲的意志。

我怀疑我父亲究竟是不是那样详尽地了解阿赫玛托娃的诗的细微处，或了解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阔维奇* 的音乐，或者是左琴科的讽刺作品。他“顾不上”这些细节，不过认为，“日丹诺夫了解艺术问题”，于是就责成日丹诺夫去“整顿一

---

* 1905—1975年。苏联著名作曲家，人民演员，其交响乐作品多以揭示现代全球性矛盾为主。

番”。于是这一位就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说“苏联的文学是世界上最有思想的文学”，谴责阿赫玛托娃的诗“藏头露尾”，左琴科的短篇小说是“心理主义”。他一边在钢琴上弹着琴示范，“教训”作曲家们应该如何“为人民”写音乐。他对一个影片被否定的电影导演说道：“你们为什么把苏联现实生活拍成黑白的，而把早八百年的事反倒用彩色胶带来拍呢？难道说我们的生活是——灰色的不成？！”

必要的时候，也会要日丹诺夫作各式各样的报告：谈对外政策、谈哲学史、谈国际工运。弄到后来大家都恨死他了，恨他这执行命令的副官，党内“斯大林的可能的继承人”。

可是，他并不想当这样的角色，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可别活过头！……”（意谓走在我父亲后头）。他丝毫不想抓权，他能心甘情愿地把权让出来。

他在家里从来是唯女人之命是从：听他姐姐们的，听老婆的。全家的生活都围着那个独养儿子、儿子的朋友、儿子的兴趣转。他家常常开有意思的、愉快的青年晚会。尤里在中学和大学的朋友都到这里来，丝毫不念及这家主人“身居要职”。这里对那些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遭到整肃的那些人的子女还是给予帮助的；友谊并未因灾难而中断。这家人没有坏心眼，也不厉害。可是眼光狭窄、教条主义以及许多方面表现的狂热性。

日丹诺夫的确是以党内流行的偏执的、清教徒式的观点来看待艺术的。这一点可从日丹诺夫夫人某一天所讲的一句警句中得到极好的说明。她说：“怪不得伊利亚·爱伦堡那么喜欢巴黎，原来那里有裸体女人。”音乐、绘画、电影中形象思维的本质简直和高等数学一样，和日丹诺夫是一点缘分都没有。可是他咬紧马嚼子，使劲冲锋陷阵，为的是证明他比“皇帝本

人”更加是“保皇党”，为的是“证明”铁托的坏心眼和各世纪以来唯心主义哲学的毫无价值。也可能他想用这种方法永远清除自己身上的唯心主义残余。

在从事党的活动初期，他曾经领导过高尔基州，那里建立了苏联第一所汽车厂，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黄金时代。基洛夫被刺以后，他立刻调到列宁格勒来，进了中央委员会，还让他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讲话。对于一个心脏病人，一个能力不强的人，这可是非同小可。他于是揪着我父亲，就象小孩子紧拉着大人的手不放、自己也想学大人一样。这样一来，日丹诺夫永远给人留下一副恶警察的坏印象〔作者此处原指果戈里所著《钦差大臣》中行为粗暴、强迫命令作风严重的警察劫日磨多〕。

总之，处于国家顶端的“十大家族”的生活都差不多：乏味、平淡无奇。子女们都想尽快脱离父母，自立生活。“克里姆林宫的孩子们”差不多没有一个继承父辈的政治生涯的。列宁的姪女奥尔珈·乌里扬诺娃成了化学家，伏龙芝* 的女儿也是。拉·卡冈诺维奇的女儿是建筑师，克·伏罗希洛夫的儿子是工程师，米高扬三个儿子和安德烈耶夫一个儿子是航空设计师，安德烈耶夫的女儿和日丹诺夫的儿子是化学家，尼·古比雪夫** 的儿子和格·马林科夫的女儿是建筑师，拉·贝利亚的儿子是导弹设计师，尼·什维尔尼克的儿子是电视工程师。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生活、对文化的看

*1885—1925年，苏联革命初年的党的活动家及军事领导人、军事理论家。1924年任苏联军事学院院长，后该院以他的名字命名。

**1893—1938年，苏联军事领导人。1937年起担任外高加索军区司令，现在苏联许多企业及水电站都以他命名。

法远远走在父辈们的前面。唯一"接了班的人"是雅·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安德烈，他是一个职业的契卡工作人员，在与"托洛茨基残余分子作斗争"方面十分卖力，特别是在对"青年思潮"所作的斗争方面更是成绩斐然，他已把许多人投进了监狱。

差不多每个家庭都遭了"清洗"之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家都未能幸免。受牵连的不是亲戚就是朋友。米高扬的小儿子娶了阿历克谢·库兹涅佐夫的女儿为妻。当时这位列宁格勒党的领导已经撤职、等候逮捕。在女儿的婚礼上他显得瘦削、心情沉重。没过多久库兹涅佐夫和他的妻子一道逮捕，而阿拉·库兹涅佐娃却住在米高扬家，公婆视她如同己出。伏罗希洛夫的儿媳的父母也被捕，花了好多力气和伏罗希洛夫本人的干预才使他们免于进集中营，改为流放。每个家庭中都不敢说心里话。大家闷声闷气地过小日子，生儿育女，不言声。

这就是政治局——党政权力最高机构——委员全部"领袖活动"之所在，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保持沉默，唯唯诺诺。我父亲在世时，全体政治局委员就是干这个。唯其如此，他们才得以苟全性命，免遭池鱼之殃，安安静静地终老在自己的别墅里。他们中间哪一位都是这样：从掌握秘密警察的贝利亚到专司经济的马林科夫和米高扬，无一不是唯唯诺诺、亦步亦趋。

不错，还有一种表面上看不见，只偶尔露出点蛛丝马迹的秘密活动：这就是领袖们互相拆台、勾心斗角，这个恨不得把那个干掉，千方百计地争宠冒尖。不过大家都小心谨慎，当"踩"着人家往上爬的时候，生怕自己也丢了脑袋。这个内幕完全暴露出来是在我父亲去世以后。

一九五三年三月以前常可以看到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手挽着手散步。他们同出同进，一块儿上父亲的别墅里来，看起来好象亲密朋友。这种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的友谊，看来是出于一种考虑：即在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这两个人总是互相撑腰的。政治局内部的相互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互相没安好心。日丹诺夫家里轻蔑地戏称马林科夫为“马兰娘”，这是因为他有一张滚圆的婆娘脸。（马兰娘、马拉施卡等都是乡下娘儿们的名字。）

日丹诺夫比起马林科夫及贝利亚来刚好是一个阴，一个阳。人人都毫无例外地恐惧。莫洛托夫在他妻子于一九四九年被捕以后实际上是靠边站了。至于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什维尔尼克这些人，实在别人也没有正经拿他们当回事，而米高扬呢则千方百计和稀泥，谁都不得罪……

可是父亲一死，贝利亚刚伸手抢权，大伙儿就立刻转过身来反对他，那个心齐就甭提了。一九五三年六月马林科夫丝毫不念“旧交”，政治局一致通过搞掉贝利亚，并将他逮捕。父亲死后，贝利亚唯一的靠山就只剩下秘密警察和它所属的部队。元帅们和将军们支持政治局，于是在贝利亚被捕的那天莫斯科街头布置了坦克：怕的是内务部的部队。当时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民警还问道：“你们怎么啦？是军事演习吗？那就该绕着城走嘛！要不然把马路都轧坏了。”谁也不支持这个大伙儿畏之如虎狼、其程度不次于畏惧我父亲的那个人。政府的秘密档案抓在贝利亚手里，这一点政治局的人心里都有点惴惴然。这会儿，就连贝利亚在内务部和谍报系统中的亲密同事象伊·阿·谢罗夫将军这种人都认为有必要支持政府了。此种情况在这么一个国家倒的确是见怪不怪，因为在社会上民主生活方式缺如，秘密勾结和宫廷政变乃成了更换政权领导人的唯

一形式。

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局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变化。"时代变了，名字也换了。"叶夫图申科这么写道……政治地平线上新人辈出，一批又一批，但是制度依旧，社会体制依旧。新的"十大家族"的生活风格，继续存在，总的来说，不减当年。

斯大林当权的时候，赫鲁晓夫无籍籍名、从不多嘴多舌。可是，他一旦掌了权可就了不得了：话也多了，爱揽权了，脾气也暴了，一副霸主派头。我几乎不了解他的家事，也没有去过他的家，不过一个人的本性变得如此之快倒的确惊人。

在赫鲁晓夫的全部宦海浮沉史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女婿阿历克谢·阿朱别依的命运了。他的命运，有如一滴水珠，反映了苏联内部生活最丑恶、最不民主的体制。

阿廖沙·阿朱别依原是一个立志当新闻记者的有才能的大学生。我和他母亲很熟，他母亲是莫斯科最好的女裁缝，专门给"十大家族"的太太小姐们缝衣服的。她的确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她的美学修养和精力在她心爱的独子身上也都具备。阿廖沙于一九四九年和赫鲁晓夫的女儿结了婚，当时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决没有想到他日后会大起大落。他学成之后原本可以象别的新闻记者——好的、赖的都算——一样过日子，只要乖乖地听编辑、书刊检查者的话，在党里看风驶舵，凡事不出格就行了。

可是他运气来了。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他是平步青云，这也亏他，他的确才华横溢，人又机灵。我对他颇有好感，因为我喜欢他的母亲，而且尊敬她。她相当自尊，很瞧不起那批政府里的夫人小姐，即她的主顾。她从外省来到莫斯科，好不容易才挣扎出来，这全亏她干得一手漂亮活。她盼子成龙的心也很切。到了这位有权有势的总理家以后，她就不再在门市部

接活了，只偶尔给亲家母妮娜·彼得罗夫娜和儿媳妇做点特别的衣着，因为她们再三恳求她。此外，她和赫鲁晓夫一家没有任何别的联系，她也不去高攀。她现在搬到儿子家旁边的自己住宅里去了，儿子对他可说极尽孝道。

自他当上《消息报》——莫斯科中央报纸——总编以后，他把这份报纸办成在制度允许范围内一份最生动、最有趣的报纸。于是订户数量一下子猛增，他还把报纸办成晚报，改组了编辑部。他重新组织了整个机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都得到住房，他很清楚贫穷是个什么味儿，他也知道报社普通工作人员过的是什么日子。《消息报》编辑部的人都特别敬爱他。这样本来就挺不错的了。可是人心总是不足……

赫鲁晓夫当权的十一年里，阿朱别依成了一个大政治活动家。已经不能直接打电话到编辑部去找他。“和阿朱别依谈一谈”就等于说和政府里什么要人谈一样的意思。阿廖沙和老丈人一起出国访问，他还掌管了赫鲁晓夫的新闻局；人家都巴结他，想抱他的粗腿，想他成全自己。

可是没想到，忽然一天之间什么都完了，赫鲁晓夫被推翻了。这个能干的编辑再也不被委以重任、领导报刊了。对他就象和对他的老丈人一样，阿朱别伊简直被认为十恶不赦，“整”了他好长时间，其实他的行为和人家都一样，酒也喝得不比别人多。他被迫卷起铺盖走路之后，《消息报》的销路马上一落千丈，又变成了和过去多年来一样的灰抹布一块。

现在他在一家小杂志社里当编辑。他的母亲，大概又在给莫斯科仕女界缝衣服了吧。他儿子从古巴带给她那件带高冠的古老的西班牙大披肩，〔西班牙妇女所戴，连头蒙上〕恐怕是她十一年来身居“豪门”留下的唯一纪念吧。可能，她并不惋惜失去这样的岁月……

新总理、新的第一书记、新的“十大家族”、新的政治局仍照老套办事，根本什么也领导不了。新阶级——苏维埃贵族——的大臣们出身于工农。他们政权的标本超不出、也不可能超出过去老爷当权的那个范畴；他们的理想超不出自己也当庄园老爷这个境界，而他们的眼光也超不出“在咱们村子里”这个范围。

五十年来，苏联的社会就生活在种姓和特权的法律之下，这实际上就确立了印度已宣布废除的种姓制度。祭司们（党）和武士们（军队）代表这个社会的权力，这个社会却以亿万劳动者为垫脚石，他们为祭司所愚弄，给武器唬得胆颤心惊。

我在印度待了两个月的那个村子里，人们可以批评政府，可以在七个不同政党的七个候选人中间进行选举。苏联比印度落后了五十年，这是要从一九一七年那个难忘的日子算起，当时国家权力被一小批布尔什维克所攫取，后来这帮人就组成了执政党。现在该“赶上并且超过”印度，超过她的议会民主！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祭司们、伪善者们，年年都聚集在莫斯科老红场上的“庙宇”里，向众百姓“发布”的共产主义官方的圣训中就缺了这一条……

每年十一月七日政治局全体委员、他们的妻子、孩子和孙子都到红场上去观看游行。有的在列宁陵墓上看，有的在旁边看。大家都冻得要死，然后是伤风感冒，然后病好些日子。节日前夕照例是周年纪念的报告会，然后就是盛大演出晚会。年复一年，还是那些老套颂词，作报告的照例是当年政治局最红的人。报告是中央委员会事先拟好的，所有的节日口号也是那里审定的。

在红场上，由莫斯科党委会的嗓门最大的出面呼口号，他拿着纸照本宣科，还朝游行的人那边摇动着手臂。游行者于是

回报一声有声没气的"乌拉"。他们不回报这一声也成，因为有扩音器代替他们喊。扩音器就装在红场上。"万民欢腾"的声音也同审定的歌曲和进行曲一样 事先都录好了音。于是广播里就把红场上和列宁陵墓——共产主义圣坛——传出的事先准备好和批准了的欢呼声传遍了全地球 但这并非广场上游行者的真正声音。因为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活的、不在预料之中的人可能喊出一些没有经过批准的话 他们不叫"万岁"，而叫"滚蛋"……于是扩音机就扯着嗓子喊，谁也盖不过它发出的声音。

我母亲带我第一次去参观游行时就是这个样子。三十五年来一贯如此：斯大林在世时是这样 赫鲁晓夫在台上时也是这样，赫鲁晓夫不当权时也还是这样。这会儿在莫斯科、在红场上、在列宁格勒、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都是这老一套。象往常一样 政治局站在列宁陵墓上，他们的妻子、孩子和孙子站在下面 靠近圣者祭坛的旁边。再远一些，冻得左右脚一个劲倒换的是那些外交使团的人。再远一些是整整齐齐的行列，这里面有国家官僚、部长、将军、中央委员和党的官员带着他们的妻子、孩子和孙子，给人看到一种狂欢的群众场面。电影摄影师每年都把这老一套的把戏拍下来。画面都是千篇一律的。不同的只是列宁陵墓上的新面孔和广场上的新式炮而已

手持纸花和标语牌的群众你推我挤地急急忙忙行经广场，经过便衣卫队。这些人排成梳齿形 但走别停，赶快赶快。

后面在靠克里姆林宫墙的地方有一个台子，上面堆放着步枪，以防万一

我知道这一切的滋味。我是和那些经过精选的人一起站在列宁陵墓旁边的。我和同班的大学生们一起走过那些"梳齿"，

走过广场，向那些站在陵墓上的人挥手。我长大了以后，就不再挥手了。后来我再也不游行、再也不去站了。从莫斯科的电视节目中，看了许多次这种场面，我都背得出，宣布游行开始或接受检阅的那位元帅说的是哪几句话。很久前是“伏罗希洛夫大叔骑着大马”——骑得挺棒。布琼尼也是如此。布尔加宁骑得勉强，他为此受过很长时间的骑术训练，可他老怕摔下来。后来就学了西方派头：坐敞篷汽车，站着，行举手礼，绕各军兵种一周。

人们是七点钟就集合，开始等候。后来又在街上等候，花上好几个小时慢慢穿过莫斯科。为了快点穿越红场，大家都严格遵守“不得逗留”的规定。然后他们就按清单把花和标语牌上交，然后各自回家，这样总算可以休息一下，在挨了半天冻以后喝上一盅。今天那个站在陵墓上的值勤元帅叫了些什么口号他们不管。他们只知道年年如此，国家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改变。每年照例有一批新人物登上古埃及式的、法老的、野蛮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圣坛——列宁的陵墓。

听说要永久保存列宁遗体的想法是我父亲提出来的。列宁全家都反对，克鲁普斯卡娅根本就拒绝去“谒陵”。我是理解克鲁普斯卡娅的：我自己就觉得搞陵墓这种思想本身就十分荒谬，因为“显圣”的世纪早已成为过去了。当人家把父亲的遗体和列宁的遗体并排放在陵墓的时候，我受到邀请作为第一批参观者，直到很久以后，我心里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因这种“违反自然”的“拜谒遗体”感到非常可怕……所以我认为父亲的遗体，经过这么长久的折腾以后，终于入土，是合乎自然的。不过政府这么作的意思，是想把斯大林从“圣者之尊”降为死囚，使他不配装殓在法老的水晶棺里。

今天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认为，清除了“罪人”的圣坛又重

在全世界大放异彩。那些从苏联各个角落以及其它国家来此朝拜的香客们，那些瞎了眼睛的、不要自由只要水晶棺、金字塔和法老权力的奴隶们，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相信这些的。

我多么幸福啊，我不在他们之中了。

* * *

在这不寻常的一年中，我没有过那寻常的“十月革命节”，过的是美国节日——感恩节。这个节日是第一批登上美洲大陆的移民，为获得第一批收成而感谢上帝恩典的节日，这是秋季丰收的节日，是农事已过进行休息的节日。这是我的节日。我是移民，我来到了这片乐土，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和希奇怪诞的一生。一切焦急不安都已成为过去。让我们坐到桌上来吧！

一早起我和鲁丝就烤火鸡，煮土豆和南瓜作泥。桌上摆了水果和核桃。我们的客人有布伦大学的教授和夫人，大家过得很开心。美国的食品真是丰富异常：可能她不象法国菜或中国菜那样精美，但是十分可口，吃得一点不剩。怪不得第一批移民要到这个大陆来。在秋天感谢大自然慷慨的赐予要比莫名其妙地膜拜法老的水晶棺材自然得多。

我要感谢这个在困难时刻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他们收容了我、帮助了我，不顾那些诽谤者们大声而又整齐的大合唱。在莫斯科整整一个夏天对我攻击之后，在我那本书引起一番轰动之后，在我看到报刊和书评里登了有关我自己的事情之后，我是神经极度紧张地来到布里斯托尔的，我一连很多夜睡不着觉。勃丽格斯上校家里的军规、咯咯作响的高跟鞋跟和爽朗愉快的笑声使我又回复到正常。

我应感谢她，感谢小小的布里斯托尔，感谢可爱的年轻州

长切飞，感谢这个伟大国家，命运的波浪把我抛向了她的海岸，就象那第一批移民一样。

我以一片虔诚之心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第一个感恩节。这个节日出色地代替了官方的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

旅 途 终 结

一年来的仆仆风尘和吉普赛人式的流浪生涯行将结束。我的前半辈子根本没有到过这么些国家：亚洲、欧洲、美洲……终于到了收拾行装去过定居生活的时候了。

去过怎样一种生活呢？我在这里要过的新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是什么？

我离开苏联并不是为了到这里也当“独裁者”的女儿的。要是那样的话，我如何不去格鲁吉亚，安安稳稳地住在那些永志不忘那个“伟大的格鲁吉亚人”的崇拜者中间呢？话又说回来，不离开莫斯科也行：苏联政府愈来愈频繁地号召纪念这个人了。

一九六七年秋天，莫斯科突然改变战术，他们间接地授意要我回去。为此他们利用了西德《明星》画刊对我儿子进行的电视采访，采访是在我的寓所，也就是我儿女现在的住处进行的。我的儿子“声明”：“如果妈妈此刻回来的话，不会受到任何处分。”廿二岁的大学生自己是说不出这种话来的，无疑是人家教他这么说的。作为答复，我给法国的《基督与世界报》寄出一个短篇，说到苏联让外国记者采访是事先“布置”的，我还说，一九五五年小赫斯特对我进行的采访就是事先由莫洛托夫教我的。

这个世界上好人很多。一位正在德国巡回演出的以色列音乐家看到了我儿子的采访记以后，立刻写信告诉我说，我孩子们的表情极不自然，这是一出导演得相当拙劣的戏。我也根本不怀疑这的确是一出戏，但对于这位陌生人我只有感激，因为

他肯定了这一点。

我知道断无回头之理。

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候，我喜出望外地得到了我朋友玛丽娜的消息，她当时正在意大利。她的信转给了我，虽说是投寄到《生活》画报。我和她通了电话。我从布里斯托尔叫了她意大利的电话号码。唉呀，可真了不起呀！我听见玛丽娜的声音了。

她告诉我的话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不要挂虑小孩。他们都好。我们都爱你，都记得你。我们知道咱们不会很快见面。我们都爱你！"哎，这些话多关紧要啊！要知道，除了那次在瑞士和伯莎通话以外，打去年十二月以来我就没有听见朋友们对我说过一句话……

"我们记得你、爱你。"这就是我要听的全部话语。

我亲爱的玛丽娜，这是一位大无畏的娇小的女子。她天生快乐、精力充沛。谁想得到，她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呢？谁猜得出，她在监狱、劳改营和流放中度过了漫长的十七年呢？

玛丽娜遍尝了人间的辛酸苦楚，她多亏有一个开朗的性格、乐观主义和真理必胜的信念，否则她早就完了。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她曾经和我谈及她的女儿如何失而复得的事。她讲得真令闻者动容。她还想把这件事写下来。这篇故事即便写出来也会遭到"封存"：因为苏联杂志编辑部门不喜欢这种故事。

一九三八年玛丽娜被捕时她还是一个少妇，她的独生女儿才五岁。战争开始的时候，她正在劳改营里"服刑"。开首她在伐木场工作，后来，由于她有外科护士的技能，被调到劳改营的医院去工作。囚犯们的消息是不灵通的，不过玛丽娜还是知道了列宁格勒遭到围困、没有吃的、孩子们都已疏散这些事情。可是，怎么才能知道她小女儿还活着没有呢？她现在怎么

样了呢？

玛丽娜的基本信念是："天下到处有好人"。可能真的是因为她相信这一点，她也就真走运了，好人处处帮衬她。她不知转了多少个弯，终于向列宁格勒负责疏散儿童的机构打了报告去询问女儿的下落。过了好久好久才来了一封回信，说她女儿被送到遥远的阿尔泰区一个农村的幼儿园去了。可是玛丽娜本人此刻却在乌拉尔的一个劳改营里。于是玛丽娜就请求医院领导准许她去接女儿，把孩子带到劳改营来，她可以在这里抚养她，因为列宁格勒已经遭到围困。这种请求本来就不得体，可是，由于玛丽娜相信好人，所以人家也对她深信不疑。于是给了她两个星期假期，还给她开了医院的"出差介绍信"。

这位小小的女人，就凭着自己的"口头保证"，获得了两个星期的自由。四处战火纷飞。这是一九四四年的事情。各个车站都实行了灯火管制。火车根本不按时刻表运行。"我走到了一片黑暗与混乱当中，"她说。"我对周围的情况简直摸不着头脑。因为我是在和平时期被捕的。那时列宁格勒一片繁荣景象，我一直过的是衣食无缺的生活，没受过罪。可现在我却象到了地狱一般。我肩上背着个口袋，里面放的是面包和盛了酒精的瓶子，这是顶钱用的，人家告诉我说，有了这个走遍天下也不难。我除了想女儿想疯了之外，什么都顾不得了。这时我女儿也该十一岁了。我手里只有一张那个阿尔泰村子的地名，再就是老天爷的保佑。"

玛丽娜从这个车换到那个车，给这个人一点面包，给那个人一点酒精，她又哀求，又说好话，说明她干么出门。她根本没有什么票，火车装的都是军队、伤兵和疏散的人……可是人家还是帮了她的忙，她终于到了阿尔泰。

现在就要截住顺路的卡车或者是马匹，或者索性徒步。玛

丽娜是靠两条腿走的，仍然是靠给别人一点面包或酒精之类，让人家捎她一程。路上逢到过夜的时候，她就躲在大石头后面避避风，就这样睡上一觉。然后又再走。

她找到了那个村子，找到了那个幼儿园，但是没找到她的女儿，因为五岁与十一岁之间实在有很大的差别。所有的孩子看起来都是一副受罪、挨饿的模样。人家把她领到一个瘦小的哭丧着脸的孩子跟前，可是小姑娘对她丝毫不感兴趣。女孩子的皮肤上长满了烂疮，头发里面全是虱子。玛丽娜不知道要对她说些什么才好……

第二天就该走了。保育院的院长给她订好了一个卡车坐位，当晚还给这位幸福的母亲举行了“晚宴”。这六年来玛丽娜没见过这么丰富的食品，但奇怪的是，孩子们只给稀饭吃。小姑娘见了吃的就像不要命似的，结果第二天就闹病了。她发烧，还泻肚子。玛丽娜只好拖着这个病孩子上路，因为她“休假”限期已经满了。

她便领着这个孩子又坐顺路的卡车、火车，又和铁路站长说好话，把孩子抱在手里。小女孩有几次不省人事。又有好人帮了这母女俩的忙，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给她们腾了个座位。

玛丽娜把女儿带到了劳改营，在劳改营的医院里护理她。当她“刑满”释放后，她们回到了列宁格勒。女儿读完了中学，上了大学，后来就结婚了。可是一九四八年玛丽娜再度被捕。因为她违反了劳改释放后不得留居列宁格勒这条规章。又一连七年她没有见着自己的女儿。

当玛丽娜终于从哈萨克斯坦流放回来以后，她已经有了两个外孙了。

我知道，她这会儿很替我担忧，就象当年为她的女儿担忧

一样；可能还更甚一些……

为什么玛丽娜爱我如此之深呢？为什么她能把我和我生长的环境加以区别呢？这是因为受过磨难的人眼界最广，他们是以最伟大、最明智的人道主义者的身份来看待人、看待生活的。

· · ·

我不想给朋友写信，也不想给子女写信。苏联把我当成政治犯，和我的任何接触对于他们都只会是危险和有害的。

我在从布里斯托尔打给玛丽娜的电话里面一再重复，我是不回去了。不过她自己心里早就有数。我这个人从来就是有了今天不想明天的，因此，我想象不出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只知道一点：我是再也不回苏联了。有时在梦里我看见莫斯科的大厅、我家里的房间，我醒来时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恶梦。

我在美国处处遇到的都是好心人，只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是例外。我继续收到以"Welcome to America!"〔"欢迎你到美国来！"〕开头的信件。人家请我去作客，邀请我到许多城市、许多州去定居。人家还邀请我去作报告，给各种不同类型的听众讲演：谈苏联，谈我自己，谈苏联的妇女和家庭，谈我父亲，谈我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和共产主义决裂并且抛弃自己的祖国。我当然也可以接受任何邀请，也可以走遍全国，也会找到许多新朋友，但是我不愿意这么作。

我从来不想，现在也不想当报告人、历史学家、克里姆林通、我父亲的传记作者、"四海云游的社会学家"。我认为我和社会舆论界交谈的唯一的、也是我认为最好的形式是写作。我什么都想写：凡是善意的或者非善意的信里问的问题我都

写。只要是我想到的、我知道的，我一定说。

还在夏天的时候，那时乔治·凯南刚从挪威回到农场，我曾和他谈起我下一本书的计划，这本书的梗概已渐渐在我脑中形成。这本书我原可以在印度、在瑞士、在我离开苏联后到过的任何一个国家中写。可是现在这本特定体裁的书的范围已很明确：就写一年来的变迁，写使我整个生活急遽改变的一年。秋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肯菲尔德—哈泼和罗埃公司的发行人。不过这只是一种设想，现在终究要找一个安静的落脚点好开始正常的生活并进行工作。

我本想在小小的大学城普林斯顿“扎根”，全世界各地都有学者到这里来。普林斯顿——这是一座国际城；这里对南来北往的人都看惯了，对什么人、什么事都不会少见多怪的。

夏秋之际我不止一次见到这个城。它有一种舒适、古老之感。街道两旁都是悦目的老树，就象公园的林荫道一般。我是要和树木交往的，离了这个不行。这里生活十分平静。大家都在一样的店里采购食品，在一个药房买药；这里有一所邮政分局，一条中央街道，一个“主要广场”——帕默广场，当中有青铜老虎塑像，这是普林斯顿和这所大学的象征。街上走的都是大学生，但他们都没有大胡子，没有又长、又脏、又乱的头发。普林斯顿是保守的，不过看得出来，嬉皮士的影响也传到了这里。

我和凯南在秋天的树林子里散步，林子离他执教的学院不远。我们绕过校园，走进大学的附属教堂，把那条处处跟着我们走的黑狮子狗留在街上了。这里谁也没把我当一回事，这是我求之不得的。

我在普林斯顿还想维持我原来的普通生活方式，这是我十五年来在莫斯科形成的：没有佣人，没有什么人常年给我效

劳，因为这只会养成我的依赖性。不过我不知道，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里我要过独立自主的生活是不是受得了，因为这里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制度，任何一位“新闻人物”都会处在众目睽睽之下。

公众！在苏联就没有这个。没有公众舆论，没有公众新闻，没有公众反应！社会处于严重瘫痪中，就像得了昏睡病一般，它对世界性的问题不感兴趣，也没有反应，更不要说对个别人的生活了。我从一个缄默而大家昏睡的世界来到了自由世界。现在我必须适应一种我最发怵的困难，那就是习惯那种幕布永远拉开的新生活。在一定的程度上这可能还好些：因为我这个人没有秘密，无不可告人之事；我腻味死了那一天到晚的苏联“机密”、高墙和篱笆、灰色的“熊窝”，里面是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的正在冬眠的狗熊……

我想和更多的人接触，我知道我要找到同意我观点的人并不难。这半年来，我实际上并没有越出一个非常狭小的圈子。我可以说我根本还没有熟人，因为我老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不想以旅游者的身份走马看花似的去了解这个国家，而是想从里面、通过许许多多“厨房里的餐桌”去认识她。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不管环境如何多变，我希望，我仍然是我。

我什么也不怕，我相信一切都太平无事。我生平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确信自己正确。对自己、对自己的能力和才干缺乏信心使我这辈子吃了亏。我总易于相信我作的事都不好，都不对。思想束缚和害羞心理妨碍我和人们、和听众接触。我常常想要自己走开，把门关上。所有这些都是长期在压力下生活的心理结果，是不正常的家庭环境中的教育结果，长期生活在一个受奴役的、万马齐喑的社会的结果。在苏联，这种受压制

的、精神半瘫痪的人何止千千万万……

从我离开莫斯科、生活在印度和美国以来，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朋友们绝不会相信我在陌生人中间能如此应对自如。也没法解释这究竟是什么——我内心充满了一种自由的感觉。这种感觉没有一个苏联人知道，我自己过去也不知道。现在如果没有它，我是一天也活不下去了。一些日常琐事和鸡毛蒜皮的细节都退居第二位。疲倦、情绪低落、身体有病可能仍会象过去一样使明朗的天空蒙上阴霾，但是自由的阳光却在内部、在心的深处照射。要感受这个，只有重温一遍我过去的经历……

十二月初我把书和箱子带到了普林斯顿我租赁的房子里，租期是一年。过去一年内我的藏书大大充实，这都是不相识的读者和作者从邮局寄给我的各种俄文书和英文书。我带到这里来的只有书和随身衣服。我租赁的房子是附有一应家俱和使用什物的。

这所房子属于一个不久以前过世的纽约大出版商，里面有很好的藏书。她的遗孀、一位职业音乐家多萝西·柯明斯告诉我：“我们十年前盖了这所房子是为工作的，而不是待客的。”

一个很大的客厅是考虑到可以用来开家庭室内音乐会：多·柯明斯的朋友都属于音乐界人士，她的儿子拉小提琴，她的孙子们也参加演出。女主人还让我使用她一大批唱片和质量很好的电唱机。她迎接我时不把我当“房客”，而把我当成一位朋友，一位历尽艰辛、十分疲惫而终于找到一个安静的歇足处的朋友。她尽一切可能让我感到舒适，就象在家里一样，给我留下一切家用什物，只要能用得着的她都想到了。我实际上可以安安稳稳地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一整年，不必购置任何东西。

多·柯明斯知道，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客厅里有一张大橡木桌，这是他丈夫阅读稿件的地方。她不久以前发表了世界各国摇篮曲集，为此她数年来收集了大量的歌词和音乐。普林斯顿的儿童、大学生和教授中有她的学生，她是一个很出色的钢琴教员。现在她要外出一年，到东方和西方的十三个国家收集儿童民间歌曲和音乐游戏。她已不年轻了，身板看起来也不够硬朗，但她还是勇敢地单身一人出访，她坚信，到处都会有朋友相助的。

这个家里有许多书、乐谱和唱片，墙上挂着很好的版画和水彩画，有古老的银器和青铜制品，有沉甸甸的家具和一架非常好的大钢琴。这里有一种妙不可言的居家的安静，是那种喜欢工作的家主人多年来一直享受和爱惜的安谧和宁静……我每到一家都把我当朋友看待。我这段期间在许多人家里作客：约翰逊家、凯南家、肯菲尔德家、格林色姆家、埃伦娜·弗立德家、鲁丝·勃丽格斯家、多萝西·柯明斯家。家家都对我热忱相待，就象回到了我自己家里一样。这不就是那个美国——移民、被逐者和新大陆开发者之国——的真正面目吗？这不仅是款待的问题——在俄国没有和世界隔绝以前，她待客也从来是很爽气的。重要得多的是，美国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按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保留自己本色的权利。

多萝西·柯明斯在离开之前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她不想留下我一个人“举目无亲”，没人帮助。

阿尔曼·波雷尔，一位瑞士数学家，和他一家同住在普林斯顿已有多年了。他是多·柯明斯新收的钢琴徒弟。他收集了一大批古典音乐和民歌；他对音乐文化的严肃态度，使我想起了莫斯科的数学家……而阿尔曼又认得他们其中许多人，也和

他们一样，对莫斯科大学格尔方德教授* 十分崇拜。在家里他和妻子、女儿说法文。嘉碧很会作饭，两个女儿一个十二、一个十四，生得妩媚而优雅，这只有法国女性才能在小小年纪就这般成熟。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肯达尔博士**，是可的松的发明者，他喜欢坐在客厅的壁炉旁。他已经八十岁了，但是看起来要年轻得多，象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他有一双湛蓝明亮的眼睛、灵活的头脑和一心为科学献身的生活。他每小时、每天都在探索新的可能性，有时候也有所获。

马尔果·爱因斯坦是一位雕刻家。她的作品《小圣母象》就放在多·柯明斯家客厅的钢琴上：这是一个神情忧郁的坐着的女象，婴儿放在她两膝之间。马尔果本人也有些神情忧郁，她身材瘦小，有点害羞。和她很容易谈得来，你的话没说出来，她就领悟其意了。她家里的工作室堆满了小巧玲珑的作品，意趣盎然。

弗兰克和蓓姬·特甫林夫妇家差不多每晚都有室内音乐。他们家两个女儿是一对长着柔和的褐色眼睛的大姑娘，深色头发披散着，很象我的卡佳。我常在这里的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当中发现我自己的子女，这实在令人高兴。这不但不会使我难过，对于我反倒是一种慰藉。

路易·费歇尔在苏联当了十四年记者，他的儿子在莫斯科学校里上过学，他写过很多谈苏联政治和生活的作品。现在他

---

*1906—1968年，苏联数学家。192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31年起任该校教授。专门研究数论及函数论。曾获列宁勋章。

**美国生物化学家。1886年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50年因发明可的松与另两位学者共获诺贝尔奖金。

是一位教授、历史学家和作家。印度在他的生活中也有很大影响，他了解印度，爱这个国家，在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认得普林斯顿大学塔克教授。他的夫人是俄国人，来自莫斯科。他俩经过多少年的忧患和期待，直到最后苏联政府才把签证发给了妻子，她才得以上丈夫这里来！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以后苏联才“允许”自己人和外国人通婚。现在热妮亚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俄文。

多萝西·柯明斯不用担心了：我在这里不会没有人照看的。凯南一家离我这里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是安奈丽莎帮我找到这所房子并且替我租下的。

十二月中我陆续收到祝贺圣诞节的卡片。这是我生平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因为在苏联只过新年。可是新年实际上不是一月一号开始，而是“冬至”那天开始，在一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那天过去后，白天就以分钟计逐渐加长。从这一刻起心里就亮堂了。

就这样我又有了一个新节日。家里装了圣诞树，蜡烛和树上的装饰是我的维也纳出版人的妻子送给我的，这一天我要待在家里，点起蜡烛，欣赏那圣诞节赞美诗，在这里是由小孩子来唱，从一家走到另一家*。我要一个人过，我喜欢待在自己家里，不到别人家作客。四面都摆满了圣诞卡，大约有二百张，大部分是我素昧平生的美国人寄来的，其中有热情的祝贺，愿我在新的一年、新的国家里幸福的祝愿和衷心的祝福。还有一部分是从德国、瑞士、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

---

*按即基督教习俗，“天使报信”，圣诞前夜唱诗班的人着白衣装扮天使，挨家挨户地在大门口停留，唱赞美诗，报告“救主已经降生”。

美、瑞典那些知道我不回苏联或是读过我《二十封信》的人寄来的。我常因看到这些明信片流泪，它们带来世界各地陌生人对我的温暖。我知道——在苏联是没有人会相信这些的；苏联政权建立五十年已经教会人们相信世上并无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仁爱。

• •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普林斯顿旅社的餐厅里坐着安奈丽莎·凯南、路易·费歇尔和我。"你们知道吗，"我说，"我只不过是一年前的今天离开莫斯科的……那天刮着多大的暴风雪啊！那天深夜儿子把我送到飞机场。那个时候谁会想得到我会搬到普林斯顿来，和你们团团围坐在餐桌边呢？"

"为这获得自由的一年来干一杯。"路易·费歇尔说。

于是我们三人一齐举起了酒杯。

一九六八年四月至十一月

美国　普林斯顿